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借精神与情感——犹如凭借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分

五个系列编辑。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味又具普及性的书库，有助读者凭借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目　录

1 科学语义学的产生条件
1 1 语义学当前的状况
1 a）意义与人文科学
3 b）可怜的小兄弟：语义学
6 2 意义与感知
6 a）认识论角度上的第一次选择
7 b）质的描写
8 c）第一批操作性概念
9 3 符号集与自然语言
9 a）能指分类
10 b）能指与所指的关联
11 c）“自然”意义与“人工”意义
11 d）自然语言的优势地位
13 4 语言的层次
13 a）语言符号集的封闭性
14 b）意义的逻辑层次

15 c）语义学是一门语言
17 d）认识论层面
18 e）标记符号

20 意义的基本结构
20 1 连续性和间断性
21 2 结构的初步设计
22 3 合取与析取
23 4 基本结构
24 5 语义轴
25 6 关系
26 7 义素衔接
28 8 义素衔接方式
32 9 形式与实体
34 10 义素与词位
35 11 关于结构的第二个定义
36 12 整体与部分

38 语言与话语
38 1 意义与交流
40 2 义素系统
45 3 义素与词位
47 4 话语的层面
51 5 关系的表征

55 意义的表征
55 1 义子
55 a）交流单位和表意单位
56 b）词位：修辞风格的义丛
58 c）义子的定义
61 2 核心形象
61 a）“头”的第一个核心：端点
64 b）“头”的第二个核心：球体
65 c）公共义素核心
66 d）简单形象和复合形象
67 e）走向内容的符号形象（符像）层
67 3 定位义素
67 a）语境义素
69 b）词位和义子
71 c）定位义素的定义
72 d）走向语义层
74 4 工具概念

75 符像层
75 1 逼近法与近似法
75 a）符像层的自主性
77 b）以人为中心的词汇学
79 c）一个保留的领地：象征研究

80 d）想像界和语言学
83 2 符像的地位
83 a）象征与符像
84 b）吉罗（P. Guiraud）的“语义原型”
88 c）符像层与生理学诠释
90 3 符像描写的各种可能性
90 a）应用语言学术语的建构
93 b）抽象的程度
95 c）描写步骤

96 话语中的同位关系
96 1 话语的异质特征
96 a）信息的同位性
97 b）同位关系的变化
99 c）关于同位关系的上下文向度
101 2 话语的元语言功能
101 a）扩展与定义
103 b）压缩与命名
107 c）转义命名法
110 d）定位义素的双重功能
111 e）形象名称的分析
113 f）转义名称的分析
114 g）定义的分析
118 h）构造义子

120 i）形象的同构
121 3 同位关系成立的条件
121 a）间接定义
126 b）关于世界的知识
127 c）文本的封闭性
131 d）从个人文本到集体语料库
132 e）同位与变体
135 4 话语的多义性
135 a）双重同位关系的表现
137 b）文学象征的多义性
138 c）双重同位以及它们的读法

144 语义世界的组织形式
144 1 意义的内在世界
144 a）双向认识途径
145 b）归纳与演绎
147 c）内在世界的经验方法
148 d）系统与词素
150 2 意义的表征世界
150 a）内容
153 b）组合群
154 c）战略选择
155 d）义子语料库的开放性
156 e）抽象的和具体的义子

158 f）不兼容问题
159 3 话语
159 a）词汇化和语法化
160 b）表达的差异和内容的同一
163 c）交流
165 d）信息的组织方式

168 意义的描写
168 1 表征与话语
168 a）表征世界的二分
170 b）基础同位
171 c）句法组合群
174 d）编造与罗列
175 2 话语表征
175 a）组织的实用基础
176 b）话语表征的出现方式
178 c）语义微观世界
180 d）微观世界的类型
181 e）谓词与行动元
183 f）行动元的类别
185 g）逻辑句法和语义句法
186 h）行动元类的模态特征
188 i）语言学认识论
190 3 形象表征和非形象表征

190 a）一个例子：诗歌交流
193 b）暗含的与明言的
195 c）非形象性的
196 d）走向科学的元语言
198 e）描写模型的检验

200 描写的程序
200 1 语料库的构成
200 a）目标与程序
202 b）语料库
206 c）文本
207 d）清减还是提取？
208 e）清单
209 f）个体与集体的清单
211 g）层级和时段
216 2 规范化
216 a）描写的一致性
217 b）文本的客观化
219 c）描写的基本句法
222 d）描写的词汇
225 3 建造
225 a）建造模型：清减和建构
226 b）简单清减
229 c）复杂清减

235 d）语义学与文体学
237 e）建构
239 f）对应与生成
242 g）内容的建立及其组织

244 对行动元模型的思考
244 1 描写的两个层次
245 2 语言学意义上的行动元
247 3 俄国民间童话中的行动元
249 4 戏剧中的行动元
251 5 行动元范畴：主体/客体
252 6 行动元范畴：发送者/接受者
254 7 行动元范畴：辅助者/反对者
256 8 神话行动元的模型
257 9 “主题”赋值
260 10 经济上的赋值
262 11 行动元和角色
265 12 行动元的能量学
267 13 行动元模型与心理分析批评
270 14 心理分析的行动元模型

276 对转换模型的探索
276 1 清减与建构
276 a）功能的组织方式

278 b）功能清单
279 c）功能配对
280 d）契约
283 e）考验
285 f）主人公的缺席
287 g）异化与再同化
291 h）考验及其结果
292 i）清减的结果
292 2 阐释与定义
292 a）叙事的历时性和无时性成分
294 b）考验的历时性地位
296 c）叙事的戏剧性张力
297 d）对叙事的两种阐释
299 e）叙事的无时性意义
302 f）转换模型
305 g）作为中和的叙事
307 3 转换模型与心理剧
307 a）从集体到个人
308 b）起始的补偿结构
310 c）拼斗的出现
311 d）考验的发展
313 e）考验的完成
315 f）得到承认和褒奖的问题
317 g）模型的形象表征

317 h）转换模型的意义

319 一个描写的样本
319 1 总则
319 a）样例：贝纳诺斯的世界
320 b）通过提取组成文本
323 c）同位关系的选择
325 2 生存的“中间”
325 a）表征的形式和分析的类型
327 b）生与死
330 c）火
332 d）水
335 e）组合模型
336 3 生存的赌注
336 a）疾病
337 b）动物
340 c）假象
342 d）及物的假象
343 e）经济的清减
345 f）不及物的假象
346 g）真理
348 4 模型的比较和挑选
348 a）一致性的缺乏
350 b）结果的比较

353 c）模型与内容
355 d）功能模型的模态性质
358 5 辨证的生命观
358 a）模态
360 b）贝纳诺斯的否定
361 c）贝纳诺斯的肯定
362 d）辨证的算法
365 e）历史与常态

科学语义学的产生条件

1　语义学当前的状况

a）意义与人文科学

意义问题是当今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要想把人的种种不同行为组织成一门人类学，把先后发生的事件串连成有机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对人类活动的含义和历史的含义发问。

对人而言，人类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大概就是意义的世界。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决不会被称为“人”的世界。

因此，正是在探寻意义这一点上，各门不同的人文学科找到了它们的共性。实际上，如果说自然科学要回答什么是人和什么是世界的问题，那么，人文科学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所探讨的，则是它们二者各有什么意义。

各人文学科都希望明确界定意义问题。不过，似乎只有语言学的位置得天独厚：它更完善，更形式化，可以给其他学科提供经验和方法。所以，语言学在50年代

的法国就已经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主导学科的称号。

这样一来，语言学的地位就十分优越，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极为反常的局面：语言学向外挥洒出了两轮光辉，而其内部却无声无息。

第一道光辉是它风光一时的必然代价，最先尝其苦果的不是语言学而是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它的特点是以“通俗化”的名义根据某一学科的需要而对语言学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结构进行扭曲和变形，甚至不惜抹去语言学中某些基本概念之间的根本对立。于是，一整套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且极端贫血的术语在某些先锋派刊物上泛滥起来，甚至连语言学家自己也认不出它们曾是自家的孩子。

同时，语言学在方法论上还洒出了另一道清晰的光辉。不过，那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方法借用，而是一种从认识论角度所取的态度：若干模式、若干发现程序的移植，极大地丰富了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拉康（Lacan）、巴尔特（Barthes）等人的思想。然而，这些具有认识论意义的模式与它们被应用的领域之间的距离甚大，学者们不得不一再使之具体化。由此而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已经使得某些圈内人士在大谈“人类学法国学派”了，而从方法论上对它们起催化作用的主角却自居台后，这确实令人遗憾。

这个起催化剂作用的主角自然是语言学。耐人寻味

的是，方方面面都有求于语言学的时候，语言学自己却对任何的语义研究都颇有抵触甚至充满敌意，其原因何在呢？

b）可怜的小兄弟：语义学

应该承认语义学一直是语言学中的困难户。它在语言学家族中最后降生，到19世纪末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在语言学的发展史上，最先诞生的是语音学，其形式化程度最高，其次是语法。即使是在有了自己的名字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语义学仍在不时借用传统修辞学或内省心理学的方法。

结构语言学的发展遵循的也是相同的次序。布拉格学派首先创立了音位学，紧随其后的哥本哈根学派则致力于语言学理论的建构、革新传统语法研究。置语义学于不顾是明显的也是有意的：直到今天，在语言学界，人们还在问语义学到底有没有一个同质的研究对象，以及有没有可能对这个对象进行结构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有没有权力把语义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学科。

困难确实存在：我们很难构想出专门为语义学服务的研究方法，也难以划分出其研究对象的最基本单元。音位数目有限，并且，值人类历史上首次科学革命之时，人就察觉到了音位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各语言最初的字母便由此而来。音位上述的两个特点——数量有限、相互

区别——促进了语音学及后来的音位学的发展。语义学的处境就大不相同了：传统上，语义学研究的对象总是被人们半遮半掩地定义为“心理之物”，使得语义学始终无法摆脱心理学乃至后来的社会学而自成一家。至于语义内部基本单位的切分，其名称也是五花八门：义素、义位、义子等等，充分说明了其境况的尴尬和概念的混乱。在这种条件下，就是最乐观的语言学家也只能认为语义学还在草创阶段。

行为主义心理学在语言学研究中的胜利，又给了语义学致命的一击。大家都知道布龙菲尔德关于语言符号的著名定义（Language）：它是“一个有意义的语音形式”（第 138 页），但“这个意义是不可知的”（第 162 页）。以此类行为主义观点为依据，人们渐渐习惯于将语义问题看作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然而，正如雅各布森所指出的那样，“说意义问题没意义，这句话我们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说话的人知道自己说什么，于是意义问题有意义；一是说话的人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他作出的判断当然也就毫无意义”（*Essais*，第 38、39 页）。

语义学起步较晚、其研究对象难以确定以及形式主义潮流久盛不衰，构成了影响语义学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因，也使得语言学家们在语义问题面前裹足不前。

因此，对于一个明了语义问题的迫切性、并愿就科学地研究意义之必要条件进行思考的人来说，形势并不

乐观。他将面临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困难。

第一类困难来自于语义学本身所包含的巨大范围。一方面，语义学必须让语言学容纳并分享其全部公设和工具概念，成为语言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语义学又必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只有这样，它将来所使用的方法才不会和其他研究意义的学科产生矛盾。换句话说，语义学虽以自然语言为其研究对象，但对自然语言的描述又属于一个更广泛的、以一切意义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索绪尔所言的符号学。

第二类困难与将来应用语义学的人有关。在某一学科的草创阶段，我们必须对一些基本概念命名，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定义，尽量做到精确、严格，以确保新概念的单义性。这种前科学的摸索阶段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当然是十分枯燥的，而且还颇有卖弄学问之嫌，因为他们更习惯读有故事情节的历史或文学作品。可是，对于搞数理逻辑或纯逻辑的人来说，这些定义又显得不够"量化"，不够全面。而他们的意见，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对当今语言学界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在两难之间，笔者只好选择中庸之道，以便让双方都能读懂，虽然这很可能会把两个方面都给得罪了：没有数理逻辑和纯逻辑的支持，语义学只能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语义学在起步阶段如果不能兼收并蓄，和其他各门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人文学科相沟通相融合，就有可能长期呆在书斋中成为少数人把玩的对象。

2　意义与感知

a）认识论角度上的第一次选择

只要你对意义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意义无处不在，千姿百态。其实这并不奇怪：想一想人生，从早到晚，从生到死，哪一刻不在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试问在何处人的身体和感官能躲过意义的围剿？某些文学运动想要建立一种“无意义”美学，他们真是太天真了，非科学意义上的天真。如果一个房间里有两把摆在一起的椅子让阿兰·罗布一格里耶感到含义暧昧，说是会让人联想到许多别的东西，那么，只摆一把椅子难道就没有意义了吗？一把椅子不过是两把椅子在语言纵聚合轴上的一个替换单位（paradigme），我们可以假定另一把椅子的缺席，它含义同样丰富。

如果根据意义的无所不在来建构语义学，那我们就有可能把语义学同认识论混为一谈，用语义学取代认识论，或者把语义学弄成某种隶属认识论的哲学思辨。叶姆斯列夫早就看出了语义学的这一窘况。他指出语义学不仅仅属于语言学，也属于所有科学，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并在建构理论时务必谨慎。所以，关于认识论方面的先设，要尽量少一些，宽泛一些。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把感知作为获取意义的非语言

性地域。这样做有利有弊：我们无法根据人的感知来建立一个自足的语言意义类别，从而也就无法明确区分语义学和索绪尔的符号学。当然，我们不否认最近由梅洛—庞蒂在法国发展起来的感知方面的理论对我们有很大影响，不过，我们在认识论上的态度是完全符合20世纪人文科学的大趋势的。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形式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取代了“官能”心理学和内省心理学，对美学因素的解释现在也是更多地放在对作品的感知上，而不是放在作家的天分和想象力上。这种认知态度——即使它是暂时的——对我们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十分有益：很难想出另一种众人都能接受的标准。

b）质的描写

我们说意义处在感知层面，这等于说只有在人所共有的感觉中，或者说在感性世界中，才能找到意义。于是，语义学等于公开宣称自己要描写的是人的感觉质量的世界。

鉴于量化计算在当今语言学各领域的支配地位，采取上述立场可能会让一些人吃惊。可他们没有注意到量化方法在语言学中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这并非量化方法本身的错，而是因为和“量”相对的“质”的概念化程度不够高，才使得量化计算无法操作。另一方面，越来越精密的质的分析只会对弥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现存的裂痕有益：自然科学是量化的，那么人文科学

呢？抛开那些常常使人迷惑的表象不谈，它应该是以质为其特征的。再者，自然科学中最近似乎出现了一个平行的、但却是反向的运动，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思维》（*La Pensée sauvage*，第20页）一书中说："现代化学把不同滋味和香味的产生归结为五种元素的不同搭配：氧、碳、氢、硫、氮。通过去掉或添加某一元素，增大或减小某一元素的剂量，人们又开发出一些新味道。这些味道，过去一直被化学看作是次要的而被忽略过去。"质的描写将在感觉世界和"意义效果"这片雾茫茫的大地上建起一座桥，也许有一天它将有可能调和质与量、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

注：在列维—斯特劳斯所举的例子中，与符号学系统成分相呼应的并不是化学系统，而是化合过程中的横组合单位（syntagmes）。

c）第一批操作性概念

先确定第一批操作性术语。我们用"能指"（signifiant）来指代所有通过刺激人的感官而产生意义的成分或成分组合，并且，确认它在表意时是外在于人的。"所指"（signifié）指被"能指"覆盖的、并必须借助于"能指"显示出来的单个意义或多重意义。

惟有某事物确实显示出某种意义时，才能被称之为能指。因此能指的存在便预设了所指的存在。

同样，“所指”之所以为“所指”，只是因为它是意指的所在，也就是说有个“能指”在指示它。所以“所指”也预设了“能指”的存在。

这个双向预设是我们惟一没有定义的逻辑概念。继叶姆斯列夫之后，我们也使用它来互相定义能指与所指。

另外，我们还打算暂时用“符号集”(ensemble signifiant)来称呼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共同体。请注意，本概念中的“集”强调的是整体的概念，暂时不予定义。

3 符号集与自然语言

a）能指分类

根据上边给出的第一个定义，表达外在于人并作用于人的感官，这说明能指是一种自然现象，具有能够被感知的品质。我们似乎可以把感官类别作为对能指进行初步分类的依据。于是，表达——或符号集——的类别大致如下：

视觉类——面部表情、手势、文字、实物画、雕塑、交通信号等；

听觉类——自然语言、音乐等；

触觉类——盲文、抚摸等；

其他……

这种常见的分类法与语言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

过，有一点我们必须现在就牢牢记住：被我们定义为外于人的能指的质决不等同于所指的质。实际上，必要时，不同感官的组织成分也可以被视为所指，于是感觉世界便成了表意的对象。

b）能指与所指的关联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按上述能指的分类来划分所指，但却应看到它们之间的某些关联：

1. 同属某一感官的能指有可能被用来组成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例如自然语言和音乐。不过，根据语言病理学研究的结果，人们发现人耳对噪音（作为整体的噪音符号集）、乐音和语音的分辨早于对具体内容的识别。也就是说，如果要对听觉类再次进行分类，似乎应先大而统之地分为几个大意义类："噪音"、"乐音"、"语音"。

2. 不同感觉类的能指有可能覆盖着同一个所指，或者至少具有等值的所指，比如口语和文字。

3. 多种能指形式可以在同一个表意行为过程中互为参照，例如语言和手势。

能指的性质如何无关紧要，因为所指决不能按能指的分类方式来进行分类。虽然表意行为必须通过能指实现，但表意行为与能指的性质无关。有人说音乐有音乐意义，绘画有绘画意义，其实这话没有意义，因为音乐和绘画都是能指性质的，而不是所指性质的性的。绘画和音乐的含义必须因人而生。所以，此处人们最多可以

这样说：这两个能指从整体上来说分别含有“音乐”和“绘画”的意思。

c）“自然”意义与“人工”意义

还可以作另一种区分：即把以“衔接”（articulation）方式构成的自然语言符号集与人工符号集区分开来。

这种区分标准也不是那么明白无误的。似乎可以在能指的基本成分的可切分性中找到它：在人工符号集中，构成成分的可切分性是先验的；在自然符号集中，构成成分的可切分性的展示则是经验的。

不过，根据我们的观点，即站在感知的角度上，此区分标准似乎难以成立。要想在感知某一能指之前了解其成分是否能够切分，这取决于其意义的传递条件，而这已经不属于语义学的范畴了。根据我们限定的研究范围，任何问题都应在一个研究能指类型学的学科内解决，也就是在感知的层面上解决。所以，我们惟一可借重的标准只能来自于所指，或来自于它与能指之间的关系。

d）自然语言的优势地位

和其他符号集相比，自然语言的地位得天独厚，因为只有它具有转换和翻译的功能。

转换形式有两种：

1. 如果仅把自然语言看作是所指，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感官的需要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形式来表现

它。例如，法语可以用注音形式表达也可以用书写形式表达。

对于口语和文字这两种形式，大家一般都接受口语在先、文字衍生于口语的说法。不过，这种由雅各布森所提出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叶姆斯列夫和胡塞尔的赞同。

2. 一个被看作是符号集的自然语言，可被转换成其他感官能接收的形式。比如梦中的画面（可分为黑白、彩色两种），就是由自然语转换而成的画面语——对此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有一些极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语言也是如此。

当然，有理由认为这些转换过来的形式会获得或渐渐获得相对或完全的独立。20年代的电影艺术曾致力于创建自己的独立语言，可是在有声电影问世之后，这种语言就退化了。

翻译只是在取向上与第二种转换形式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所有非自然语言的符号集都可能被比较忠实地译成某种自然语言，比如说一幅画和画评对其进行的语言描述。

把一套符号体系翻译成另一套符号体系，必然会增值或减值，生出变异。二者之间所产生的差异不仅是语义学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与意义有关的学科所关心的问题。

自然语言无疑占有特别的地位：把语言换成其他的符号表达形式叫转换，其他的符号形式变成语言叫翻译。

由此便知，自然语言这个符号集有多么复杂。

4 语言的层次

a）语言符号集的封闭性

语言既然是一个符号集，那么，语义学的目标就是要找到足够的必要的概念工具来描写如法语这样的语言。

描写的最大难处就在于上述的语言的特殊地位：要描写一幅画，我们可以把画面上表达出来的意思翻译成语言，而要描写语言本身，我们似乎只能把语言“翻译”成语言。于是，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混为一体，一如被告成了审判自己的法官。

词汇学就提供了一个不太恰当但却相当典型的例子：一部用单一语言编撰的词典是个封闭系统，命名和定义这两种不同的描写方法在其中永远纠缠不清。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自然语言的封闭圈中去研究语言的固有意义，所有术语、定义和公式所使用的也只能是这种语言。

承认语义是个封闭世界，就等于否定了语言学中的一个观点，即把意义定义为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它同时还拒绝了在符号结构中引进参照对象（référent）这一补充性维度。“现实主义”语义学家厄尔曼（Ulmann）引进参照对象是为了能在索绪尔的理论框架中自圆其

说，这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牵强的妥协，也可以说是他们对索绪尔结构主义所作的一个可能的诠释。然而，为解释符号而"参照"现实中的"事物"，其实就是在把包含在自然语言中的意义转换成非语言符号，这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无法做到。

注：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着非语言背景，这似乎与我们的论述不太一致。其实，我们认为那不过是语言交流过程中多种符号集的相互干涉，语言交流的过程可以是异质的，这并不影响语言符号集本身的自足和完整。

b）意义的逻辑层次

借助于现代逻辑学，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语言层次理论，部分地克服无法在语言封闭圈外研究语言的这一难题。

此处引进的层次概念应被当作逻辑上的先设关系来理解，不过，正像我们先前指出的那样，现有的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定义这个概念。先设关系是两个内容之间的关系，对这两个内容我们一无所知，或者仅知道它们可能是两个符号集——例如画评符号集预设了绘画符号集，也可能是两个切分开来的表达段。比如说，下边三个分行排列的表达段之间就有先设关系：

我意识到

我说

天冷

注：举这个例子仅仅是为了说明语言中确实有层次，而不是要大家注意那些非语言问题——如现实或意识中的层次。

在一个符号集内，意义可以分成几个层次，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一开始便把语义学涉及到的语言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本学科研究的对象，我们继续按术语称其为对象语言；另一个是语义研究中的工具语言，对于对象语言来说，它就是元语言。

注：语言现今常常被人们用来称呼其他非人类语言的符号系统。我们以后只用语言来称呼自然语言符号集或自然语言中的亚符号集。

c）语义学是一门语言

层次这一新概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翻译的概念。当一个艺术评论家谈论绘画或谈论音乐时，其谈论行为本身就预设了绘画或音乐作为符号集的存在。相对于他看到的画和听到的音乐来说，他对它们的谈论是元语言。也就是说，不管表达的性质如何，无论作为对象的符号集处于哪个层次，对其意义的研究一定处在一个相对而言更高的元语言层次上。这种层次上的区别在自

然语言研究中就更加明显了：如我们可以把法语当作研究英语和德语的元语言，反之亦然。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一个相当普遍的原则：这个具有转述和描写功能的元语言不仅可以用来研究任何一种符号集，其本身也可以是任何一种自然语言。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问：意义的元语言诠释是否非得完全依赖自然语言？一种多少与自然语言拉开距离的元语言是不是更有利于描写呢？

据叶姆斯列夫，我们应该把科学学科的元语言和非科学学科的元语言区分开来。非科学的元语言和它所诠释的对象语言一样，是“自然”的。如画评语言就是几代评论家的集体创作，它只能算是法语符号集的一个子集。而科学元语言则是建构的：也就是说，其中的每个术语都处在一个严密一致的整体定义之中。

元语言本身也是对象语言，又被当作元语言在更高的层次被人研究，所以，要想把惟一让我们感兴趣的语义学元语言变成为“科学”的元语言，它的每个术语就必须被精确地定义、被严格地审查。既然定义是科学元语言的先决条件，那么定义就是元语言的元语言，即第三级的元元语言。不过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它若不是被用来分析既定的元语言，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至此，我们知道了创立科学语义学的条件，它应该是两个相互预设的元语言的组合：一个转述和描写对象语言所含有的意义，另一个则是方法论性质的，其作用

就是定义各工具概念，检验它们的内在一致性。

d）认识论层面

方法论性质的语言，即使已经可以用来研究自然语言的内部语义，似乎还不足以把语义学的地位提升到自然语言之上。语义学仰赖它成为元语言，而它自己则身处第三层面，只能靠演绎而非归纳来建构。

我们赞同由叶姆斯列夫提出的这个公设，并可以举一个语法的例子来说明它。例如法语有个时态概念叫“未完成过去时”，我们可以通过它在句子中的分布情况归纳出它来。“未完成过去时”属于描写语言层面，不过，一旦我们把它引入到方法论语言层面，其有效性就会在法语中的体、时态和语式上得到验证。然而，我们都知道不能把这个概念用于别的语言，比如说用它来分析德语的未完成过去时。惟有建立一个公理系统，演绎推理出一套语法概念，才能为一个普通词法学或比较词法学提供理论基础。

对归纳和演绎在方法论方面的价值所作的思考已把我们引入了另一个更高的层面，即第四语言层面。上述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涉及到两种不同的真理观：一个把“内在一致性”看作真理，另一个把与现实相符当作真理。

当然，如果描写某种对象语言便是对这种语言的翻译，那么我们所使用的描写语言就必须与现实相符，忠实地反映它。此处的现实是对象语言层面上的现实。在

这一点上，归纳方法很有价值。

但，我们又必须指出归纳描述无法超越某一特定符号集，它不可能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层面。例如逻辑学的选择就不是偶然的，其公设完全靠演绎，全部处在第四语言层面。

在语义学范畴，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人为建构的作为“自然规律”的语言模型与语言现实之间的一致性。从理论到实践，模型和表象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科学的产生便有赖于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基本方法，但科学也是以演绎为主、归纳为辅的。

既然我们把演绎和归纳看作是语义学成立的先决条件，认为有必要讨论二者的效用，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第四层面，并将催生出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语义学。这门语义学会借用某一自然语言，但它必须有能力保持独立，并对各种形式的符号集作出恰如其分的描写。催生的首要条件就是第四层面，即认识论语言层面本身，另外，处于该层面的语义描写效果分析也是条件之一。

为了分析对象语言，科学的语义学以及语义描写（其实就是语义的多层面概念在实践中的应用）只有同时照顾到三个不同的逻辑层面时才是可行的。这三个不同层面的语言就是认识论语言、方法论语言和描写性语言。

e）标记符号

最后还有个技术性问题，即如何使用标记符号。它

们在实际运作中极为重要，所以有必要注意。

来自数学、逻辑学以及有着最新发展的语言学的例子都说明，如果我们用字符和数字符而不是用“自然语言”来标示一套单义的概念，我们就有可能更精确地进行推理，并为操作提供极大的方便。

引进这样一套人工符号，一定要严格控制数量，其数量的多少取决于以后的分析，这也是语义学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标记符号本身并不是一个发现机制，但在一个特定领域里使用它有可能间接地替我们铺平研究的道路（见 Reichenbach，*l'Avènement de la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pp. 187—195）。

意义的基本结构

1　连续性和间断性

在喜欢强调语言现象之间的连续性这个方面，传统语言学与其时代的主流是一致的。若找不到连续性，拉丁语单词 mare（大海）中的 [α] 演变成法语单词 mer 中的 [ε] 这一过程就只能被认为是无意识的、无法理解的。同样，如果我们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穿过高卢—罗曼语区，我们就会感受到两个语言变体、两个方言之间有着渐变的过渡。于是，历史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回到从前，寻找各种变体的同一源头。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索绪尔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观点：语言是由对立构成的。

此论断并非不证自明。人们也许要问：在现实生活中，在听见某人发出一串具体语音时，是否可能不把音位看成是空气的振荡，一如炮弹出膛时那样？或者，是否可能发掘出语言材料中的间断性，用别的方法来描写语言，而不仅仅说它是“无所不容”、“包罗万象”？

今天我们接触意义的惟一办法就是先肯定感知中存在着间断性，存在着微分差（列维—斯特劳斯便是这样做的）。差别是产生意义的基础，至于差别的性质，我们可以暂不考虑。

注：间断性概念无法定义，它不是语义学的专有概念，却是数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当作认识论公理系统中一个无须论证的预设。

2 结构的初步设计

我们感知差异，借助感知，世界在我们面前“成形”。这“形”仅仅为我们而在。那么，具体到语言层面，“感知差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感知差异，就是说至少发现了两个作为对象的词项同时在场；

2. 感知差异，就是说发现了对象词项间存在着关系，并通过某种方式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给结构下的第一个定义，该定义被广泛地用在其他领域：两个词项同时在场，外加它们之间的关系。

于是马上得出了两个结果：

1. 一个对象词项单独在场没有意义；

2. 意义预设了关系的存在：词项间关系的存在是意义产生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若想深入研究结构这个概念，就得分析其定义的各个构件，分别考察“关系”和“对象词项”的含义。而“在场”这个说法却是我们无法分析的：它不仅涉及了对象词项在感知中的存在方式，而且必然涉及到感知本身的性质。根据认知公理越少越好的逻辑原则，对它的分析不应当由语言学来承担。同理，“同时性”概念在认识论上类似于连续性和同一性，即使我们从它内部抽掉时间性因素，还是会有内容无法分析。

3 合取与析取

关于“关系”这个概念，有两点在开始时就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1. 两个对象词项若要一起被感知，它们之间就必须有某种共性的东西（相似性问题，相似的极端是同一）；

2. 若想把两个对象词项区分开来，它们就必须有着某种形式的差异（相异性问题，即“非同一”）。

于是，连续性问题和间断性问题在此重现，只是在场的方式稍有不同。的确，这一关系开始显露出它的双重特性：既是**析取**又是**合取**。

4　基本结构

该关系的双重性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

例：α)　国道/省道

pas/bas

β)　浊/非浊

大/小

前两组例子比较好理解：两例中都是第一个成分相异（国/省，p/b），后边的成分相同（道，as）。

后两组例子比较麻烦，而且麻烦来自于它们的简单。如果说每两个相对的项间肯定有着某种联系，那么，哪一部分是合取，哪一部分是析取，似乎很难看出来。

以上关系类型被我们称为基本结构。既然对象词项本身不产生意义，那么，就不应在词项单元这个层次上寻找意义的基本单位，而应到结构的层次上去寻找它，因此，那些被叫做符号、结构单元、或者符素的东西在意义研究中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语言也不是一个符号系统，而是多重意义结构的聚合体（聚合体的构造有待于澄清）。

5 语义轴

基本结构并不在

pas/bas

的对立之中，而在更深一层的

p/b

的对立中。显然，这一对立其实就是

浊音/非浊音

两个音位之间的对立。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以上两个辅音进行比较和区别，是因为它们的对立建立在同一个轴上，即声带振动轴。“声带振动”这个词不怎么准确，因为这两个音中只有一个振动了声带，另一个根本就不振动。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要找的只是一个描写性的、元语言层面上的术语，我们以后甚至会用字母或数字来指代它。重要的是，要选同一个切入的角度，因为只有在同一个维度中，对立才得以成立，对立是同一根轴上的两极。

语义层面上的对立也应该具有相同的性质：

白/黑

大/小

每一组对立项都拥有一根共同轴：前一组的共性是彩色的缺席，后一组的共性是连续体的度量。

两个项共一轴，意义在轴上衔接，我们建议称此轴为语义轴。由此可见，语义衔接是语义轴的固有性质，语义轴对语义衔接具有进行归类、整合之功能。

6 关 系

为了方便今后的具体操作，我们必须找到——或构思出——几个适合于语义轴的名称。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关系型的结构描写模型，一方面标示出关系中对立的双方，另一方面也标示出该关系所含有的语义内容。我们打算用A和B来命名两个对立的对象词项，用S来称呼语义内容，这一结构大概可以表达为：

A与B/有（S）关系

A与B之间的关系可分解为：

1．“有关系”这一部分，是对两项之间存在关系（r）的“抽象”肯定；

2．关系的语义内容是（S），即我们先前提到过的语义轴。

我们将其化简为公式：

A/r（S）/B

下面我们将仔细说明公式中每个符号在语言学中的身份。

毫无疑问，词项A、B属于对象语言，是话语过程的

产物、感知的对象。语义轴 S 则是我们对 A、B 二词项的异同进行整体把握之后的结果，因而，S 轴属于描写性的语义元语言。关系（r）是理论阐述前的先设，属于方法论，对它的分析只能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进行。

7 义素衔接

关系的内容（命名为 S）一旦被视为元语言，我们在方法论上就有了安全保障，就可以开始考虑给语义轴构想一个可操作的表达式。一关系必然涉及到数个不同的对象词项，我们将其处理成数个不同的意义成分，并把这些成分看作是词项的特性。

再看上边那个例子：声带振动轴（S）可被理解为声带振动元（s_1）和非声带振动元（s_2）之间的关系（r）。由此，词项 A（音位 b）有 s_1（声带振动）的特性，词项 B（音位 p）有 s_2（声带不振动）的特性：

b（声带振动）　　r　　*p*（声带不振动）

这是一个实例，可以将其概括成以下形式：

A（s_1）　　r　　B（s_2）

该公式可以用来分析各种类型的关系。例如有以下两个对象词项：

姑娘　　r（性）　　小伙子

我们可以将其改写为：

姑娘（女）　r　小伙子（男）

雅各布森把这两个分解出来的意义成分（s_1，s_2）叫作区别性特征（traits distinctifs），他还认为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索绪尔的"差别成分"（*éléments différentiels*），只是先从法语译成英语，然后再从英语译回法语，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为了简化术语，我们建议称其为"义素"（sème）。

由此可见，一个基本结构既可被理解和表达为语义轴，也可被理解和表达为义素的衔接。

从实际效果来看，应该指出义素描写法要比语义轴的汇集法高明得多。再者，根据叶姆斯列夫的简练原则，我们也应该首选义素描写法。在此我们还可以借用雅各布森描写古阿拉伯语音的例子：据康迪诺（Cantineau）计算，雅各布森所做的二十六个音位的搭配可以给出三百二十五种对立（这些对立关系均未用轴形式或其他形式描写过）。然而，尽管北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方言有三十一个音位，对该方言的描写却揭示出它总共只使用了九组对立。①

---

① 见 R. Jakobson, "Mufaxxama". The Emphatic Phonemes in Arabic, in *Studies presented to Joshuad Whatmough*, La Haye, pp. 105—115.

8　义素衔接方式

如何认识义素衔接的存在方式，如何对其进行描写，这是当今语言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

雅各布森及其弟子是二分法的拥护者，他们注重逻辑和概念的可操作性，认为语义轴由两个义素组成，可表述为下边这个可能产生歧义的形式：

有标记/无标记

然而，仅就这个层次而言，衔接方式已有不同。

浊音/非浊音

这个例子还好解释，可以说是一个有标记（表示某成分在场，是轴的一极）的义素和一个没标记的义素（即该成分未出现在轴的另一极）发生了关系：

s/-s

但该模式无法用于下面这个具有双重对立的例子：

小伙子（男）/姑娘（女）

仅说词项“姑娘”中没有义素“男”是不够的，因为它本身就含有一个义素“女”。看来，我们得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类衔接：

s/非 s

雅各布森所关心的正是上边这两类衔接。然而，在

大/小

的中间，我们似乎还可以列出第三个词项："中等"。

在布龙达尔创立的作为公理的基本结构中，这个现象被处理为：

s/非 s

这两极被布龙达尔描写为

正/负

那么，在正负之间，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出第三个义素，它既不是正（s）也不是负（非 s），而是"中性"的。其衔接方式如下：

正 / 中性 / 负

（大） （中等） （小）

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中间义素是 s 和非 s 的综合，因此我们称之为综合义素。例如下边这个例子：

棉布/棉绸/丝绸

就可被理解成

正 / 综合 / 负

（棉） （棉＋绸） （绸）

继而，布龙达尔又研究了另两种可能存在的衔接方式：尤其是正综合和负综合，即由正义素或负义素占统治地位的综合义素。

初看上去，雅各布森和布龙达尔二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互不相容，其实他们的矛盾仅仅是表面上的。本质上，布氏与叶氏一样，也是二元论者。被他称作综合的东西其实就是衔接，而衔接所涉及到的义素的个数也是固定的

两个。

为了消除到现在为止还存在着的模糊观点，我们有必要在此处提前引进关于意义的两个概念，可能也是人类摄取意义并使之概念化的两种不同方式：即把内在(immanence)意义和表征(manifestation)意义区分开来。如果我们把意义的基本结构看作是一个“自在”之物，从“自在”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和描写——就是说完全脱离表意背景，那么这个结构就只能是二元的。说它是二元的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某些未说明的理论上的原因，即属于认识论语言层面上的原因，但在更大程度上却是出于当今语言学界的共识。基本结构衔接了二个义素：

s/非 s

其定义已经讨论清楚，所以我们建议给它一个固定的名称：义素组（catégorie Sémique）。该名称和“语义轴”的叫法相重叠，不过，以后大家就会知道它比语义轴的叫法更精确。

毫无疑问，在这个层次里，我们既无权引入也无权假设布龙达尔的中性词项或雅各布森的-s 项的存在：一个义素的不存在(-s)就等于说这不是一个义素或者没有这个义素。既然它不是一个义素，那我们当然只能在表征层面上记录它。因为在表征层面上存在着两个义素背景，同义的和异义的；第一个背景中有它在场，用 s 表示，第二个背景里 s 不出场，习惯上用-s 表示。此处论及的不是

关系结构中的意义单位，即义素本身，而是某一义素项是否出场、是否表征的问题，二者不容混淆。下表可进一步澄清二者的区别：

义素项		义素内容
正	s	义素 s 在场
负	非 s	义素非 s 在场
中性	-s	义素 s 和非 s 均不在场
综合	s＋非 s	义素组（s 和非 s）在场

注：据布龙达尔，所谓综合义素，在表征时，内含两个单义素，二者或势均力敌，或其中某一个占据上风。这个问题稍后再论。

还可以尝试另一种区分，即精确地区分义素组和义素衔接。不过，作这种区分已不再是认识论的需要，它为描写程序服务。对义素衔接的描写好比是一个分布分析(analyse distributionnelle)，它记录了各义素项在可比义素背景中的分布。既然要分析义素的分布情况，当然得预先假定它的存在：因为只有事先认定义素 s 的存在，然后才能说它不在场（-s）；同理，两个相分离的义素的存在则是我们识别义素组的前提，否则，综合义素和单纯义素就没有区别了。这等于说，义素组先于义素衔接而存在，如果说描写的出发点是对义素衔接的分析，那么它

便能证明或否定义素组的先验存在。语义描写就是这样一个建立元语言的过程。

9 形式与实体

分析义素关系，我们有时把它看作是语义轴，有时又把它看作是义素衔接。这种选择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结构定义这个范畴。

让我们用叶姆斯列夫的那个关于色谱的著名例子（*Prolegomena*，p. 33）来说明问题。此语义轴是个标准的语义轴，具有较强的概括力：我们无法想像世上会有"无色"的语言，所以每种语言中都有这个轴。下边是同一个语义轴的两种衔接方式——英语的和威尔士语的：

green	*gwyrdd*
blue	*glas*
gray	
brown	*llwyd*

无疑，这两种不同的义素衔接方式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色谱的特点，而且也是绝大多数语义轴的特点——它们不过是各类文化、文明或各专业对世界所作的不同划分。所以，叶姆斯列夫完全有理由把这种语言衔接称作"内容的形式"，把统辖它们的语义轴称作"内容的

实体”。[1]

关于“内容实体”这个概念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说明：实体无疑是抓不住摸不着的，人惟有通过表意世界中的词语才有可能把握它，这一点在谈及语义轴时我们就已强调过。内容实体不应被理解为外在于语言的心理或物理的实在，而应被看作是处在与形式不同的层面上的语言表现。

形式与实体的对立完全是内容分析内部的对立。它和能指(形式)与所指(内容)间的对立完全不同，但19世纪以来的文化传统却总是促使我们对两种对立进行某种类比。形式与实体一样能够表意。可惜的是，叶姆斯列夫这一极有价值的观点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而，我们说一门语言的义素衔接便是它的形式，而其语义轴的集合就是它的实体。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符号集要进入分析性描写，都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形式(义素)的层面和实体(语义)的层面，其结果当然不同。

无须进一步补充，大家都知道形式和实体这两个概念纯粹是操作性的，它们与我们所选择的分析层面关系密切：在一个分析层面上被看作实体的东西到了另一个层面上有可能成为形式。

---

① 叶姆斯列夫把“表达的层面”和“内容的层面”这两个概念进一步一分为二，分为“表达实体”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内容形式”。内容实体“先验”地指向被所有语言“任意”进行划分的“自然世界”。参见叶氏《语言学理论导论》(同前，pp. 65—79)。——译者注

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前边那种特殊的语义轴（意义的最小单位结构）另取名叫“义素组”的原因。为了操作上的方便，我们将继续使用语义轴来命名“衔接成结构的内容实体单位”。

10 义素与词位①

在感知层面上我们还曾提出过对象词项这一概念，在考察过所有相当于结构概念的“关系”之后，有必要再来确定一下对象词项在结构组织中所起的作用。

大家知道关系可以被分解为义素，我们曾建议把这些义素看作是对象词项的性质，问题是如何理解下面这个表达式：

(A) 的性质是 (s)
(姑娘) (女)

胡塞尔在分析专有名词时曾正确地指出："常识以为凡事物皆有性质，但性质却不能反过来定义事物"（*Signfication et vérité* , p. 133）。根据这一观点，事物是“自在的”，独立于它的性质；事物是无法认识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分析其性质，都不可能完整地把握其本质。

描写实体（非语言学意义上的实体）的意图使得认

① 词位（lexème），语言词汇的基本单位。见《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哈特曼、斯托克著，黄长著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译者注

知变得更加困难。胡塞尔还指出："如果说'它是红的'这一命题把一个性质赋予了一个实体，如果说一个实体并不是它各种性质的相加之和，那么，即使两个事物拥有完全相同的谓词，它们仍然可以是不同的事物"（同上，p. 112）。于是，同一性原则被重新打上了问号。

所有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一个想法：语义学的方向决不会是"心理实体"的描写。我们必须植根于现象学，也就是语言现象，像胡塞尔那样假定事物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义素 s 是对象词项 A 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我们对词项 A 的所有性质进行穷尽性分析，那么 A 的定义就是 s_1、s_2、s_3……的集合。

现在，我们只需以词位来称呼对象词项：它属于对象语言，在话语中实现。由于它是语言学另一个分支的基本单位，其定义不应该包含在我们对基本结构的定义之中。

11 关于结构的第二个定义

既然要把词位（对象词项）的定义排除在结构的定义之外，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结构的定义再做一次调整。根据前边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结构是意义的存在方式，以衔接两义素的关系为特征。至于那个提到过的、内在于对象语言的义素组，其定义也只能在本框架之外。

该定义初看上去可能会让人吃惊。不过仔细一想，它

离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远，至少是离操作方式不远。比如说法语有三种语式：命令式、陈述式和虚拟式，这三种语式轴可以简单地分解为义素s与非s，并被衔接成下列形式：

$$\frac{\text{命令式}}{s}\Big/\frac{\text{陈述式}}{\text{非}s\text{、非非}s}\Big/\frac{\text{虚拟式}}{\text{非}s}$$

这些义素组内在于法语，其中的每个义素都在众多词位中得到了实现。

注：请注意，以上对法语语式的解释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畴，点到为止。

12 整体与部分

以上对结构的设计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我们曾强调过以下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义轴包容着数个可解析出来的义素成分。也就是说，相对于义素组这个“整体”而言，义素就是“部分”。既然如此，我们似乎必须在结构的定义中再加上一层关系，即从结构整体到构成单位的关系。

当代语言学家们对这种关系的态度可以说是比较矛盾的。例如叶姆斯列夫在结构的定义中就使用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Prolegomena，pp. 20—21），可是在他的语言理论经济学中，却又没有这一关系的位置。一个像安

博斯（P. Imbs）那样的语法学家假若敢把“整体”这一概念引入语法分析，那么人们就有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怀疑他驾驭组织结构的能力。“整体”这一概念确实被某些人文学科滥用了，它们以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就会被其宽泛性愚弄。

为了避免类似的误解并使我们的工具概念更加精炼，我们打算尽量限制对整体—部分关系的使用：如果说我们把义素组和属于它的义素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仅仅是因为它们在逻辑上互为前提。于是我们认为：在属于同一个义素组的义素之间，有反义关系（析取与合取）；除此之外，在每一个单独的义素和被当作整体的义素组之间，还有上下位的关系，这便是意义的基本结构。

注：以上关系在实际操作中还涉及到一个方向性问题：如，义素是义素组的下位，义素组是义素的上位。

“上下位”这个词的使用将仅限于基本结构内部。至于一般义素（不一定属于同一个义素组）和义素组之间的抽象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上下级”关系。

依靠上边这几个有限的工具概念，在理论分析中我们大概可以尽量避免使用换喻，因为换喻会产生歧义。

语言与话语

1　意义与交流

我们所描写的意义结构在交流中表征，就是说它在人的感觉活动中自呈于前。交流汇集了其表征的必要条件。正是在交流活动或“交流动程”中，内容重新找到了表达。

能指与所指——或按丹麦人叶姆斯列夫的说法，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的结合表征出话语中的两个最小单位：音位和词位。bas 的在场假定了未在场的 pas 的存在，并实现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双向预设：若想 b 成为能指的一个具有分辨功能的元素，在 bas/pas 的背景中，b/p 对立应能生成一个意义上的区别；不过，若要分辨出 bas 的意义，b/p 对立则必须先期存在。

对能指的分析必须参照所指，反之亦然。当然，这并不是能指与所指不能分离的终极原因（ultima ratio）。借此机会，我们正好谈一谈另外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1. 我们首先应该清楚，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同构

关系，分处在两个层面上的交流单位并不对等，不是一个音位对应于一个词位，而是数个音位的组合对应于一个词位。所以，分析两个层面所用的方法虽然一致，但却必须分别进行。分析的目的是确立能指与所指的最小单位，它们分别是形素和义素。

2. 音位对立在更大一些的语言单位中构成，并产生一个意思。不过这个意思只能是“否定”的，它仅仅是意思生成的一种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如 bas/pas，其对立似乎赋予 bas 以某种含义，于是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在交流过程中，在选择的多种可能性中，说话者选中了 bas（低）：天低，天花板低（Le ciel est bas. Le plafond est bas.）；其选择必然与未表征的 pas 产生联系，pas 和 bas 是一对捆绑在一起的关系。此话大谬，因为藏在 bas（低）的背影中的是 haut（高），而不是 pas。这说明我们在借用其他兄弟学科的概念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比如说信息理论，它处理的仅仅是能指方面的材料，而且是根据自然语言进行过代码转换的能指材料，所以，它可以对意义的基本问题置之不理（记得曾有人试图在词的长度和信息量之间找到某种必然的联系）。

如果我们想在能指或者所指的研究上稍有建树，就必须把在交流中合体的所指与能指再次分开。要记住，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在研究能指时借助所指，在研究所指时借助能指。这也正是“对象词项”所扮演的角色。

2　义素系统

于是我们知道，词位 bas（低）在交流中出现时，其意思并不产生于它与 pas 的对立，bas/pas 是分辨结构，而非意义结构。

于是我们要问：

1. 前边研究过的意义的基本结构如何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呢？

2. 基本结构在表征层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要知道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它们体现为词与词的组合，并最终构成了所谓的话语。

首先，与 bas（低）对立的不是 pas 而是 haut（高）：虽然在表达的层面上也存在着有效区别，但这种区别却无法简约成 bas/pas 这样的单纯音位对立。

情况将永远如此：无论你记录下来的表达层面上的有效区别是多么正确多么全面，它只能是一个排他体系，对我们研究意义没有任何帮助。换句话说，意义的有效差别不可能从能指的差别中得来，语义描写属于另一个层次，它是元语言活动，遵循的是意义的结构衔接法则，而这法则是语言组合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先于其他[illegible]

序体系之间找到相关性。

有必要声明一下：因为缺乏验证的程序，所以下面将引用的例子带有随意性。如果有人就此质疑，那么他肯定是对的。然而，在斟酌过语义描写的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一是全力以赴地去寻找描写意义的程序，甚至不惜暂时忽略验证程序；二是千方百计地移植音位对比记录、分布分析等方法，但却置语义学本质于不顾，忘掉了公理系统认识论的基本条件，忘掉了以精炼为原则的概念体系，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语义描写的基础和理据。

我们再次强调，下面的例子仅仅是为了阐明我们的思路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它们大概经不起推敲，而且在其有限的适用领域里甚至不一定为"真"。

下边的推演就是如此。我们还是从 bas（低）和 haut（高）的对立出发。为了简化，我们先不考虑其对立在名词化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指别性功能[①]：

高/低

如果把它们当形容词看，高和低似乎都可以被理解成"相对数量"，这个相对数量又分成两个义素：较大的量与较小的量。对于一个具体的说话者来讲，似乎存在着一个标准量，他根据标准量判断具有不同义素内容的东

① "指别性"功能，语言学专门术语，指的是语言成分对现实事物的指示功能，它受制于必要的语境，是语言与现实沟通的桥梁，如"我"、"你"、"这里"、"昨天"等都是指别成分，具有指别功能。——译者注

西是高还是低。在以下词组里，我们见到了同样的义素项和义素组：

长/短

宽/窄

我们当下的目的并不是要对“相对数量”这个义素组进行义素分析，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将其放在一边，仅用含有“较大的量”义素的这个词汇来指代上边两个相对立的词位。

有了这一步骤，探讨下轴的含义就变得较为容易了：

高/长/宽/广/厚

此轴为多项对立，意义涵盖较宽，可以命名为“空间轴”。初次二分后，前三项在法语中为空间维度，后二项为空间广延，列式如下：

$$\frac{\text{维度}}{(\text{高/长/宽})} \Big/ \frac{\text{非维度}}{(\text{广/厚})}$$

暂时把“非维度”分析放一放，以便进一步简化例句。“维度”义素本身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义素轴，于是就出现了新的衔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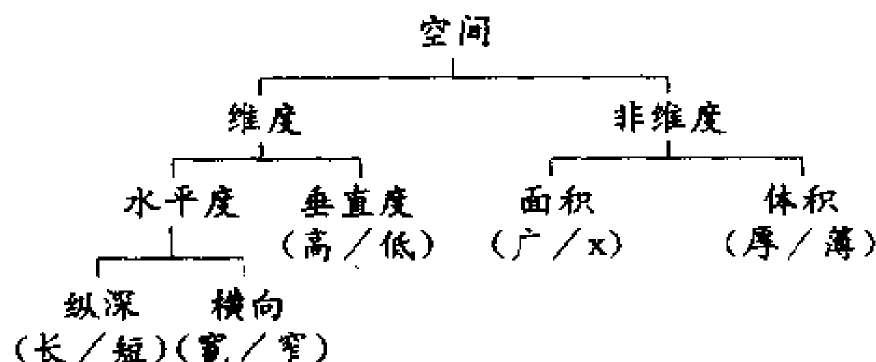
$$\frac{\text{垂直度}}{(\text{高})} \Big/ \frac{\text{水平度}}{(\text{长/宽})}$$

若把“水平度”也看作是一个轴，那么它所衔接的两个义素就是：

$$\frac{\text{纵深}}{(\text{长})} \Big/ \frac{\text{横向}}{(\text{宽})}$$

注：法语中，长度作为维度坐落在以说话者为出发点的纵深方向。我们相信自己有把握证明这个观点，但在此处却无法花过多的笔墨——我们不是第一次这样做，而且有些不该省的也省了。

把以上所有的衔接都汇集到下图中：



该示意图还很肤浅，例如对“非维度”就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不过，它仍然能表达出被人们称为“空间”的义素体系。

这一体系是如何得来的呢？

1. 如果我们对以上的思维步骤一一进行审查，就会发现我们在理论建构之先已经有了一个假设，而且我们多少意识到了这个假设，即法语这一符号集中有种空间概念的存在方式。所有的科学体系都有这样一个看似天真的先验存在，指责这一假设把主观因素引入描写通常是没有道理的。

2. 第二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步骤便是根据能指的差别来进行义素组的衔接。我们在此还不可能谈清楚验证

的程序，不过需指出一个明显的但常常被认为可以忽略的事实，即以下词位的对立发生在能指层面：

高/广/厚

能指的差别使得以下对立义素的存在得以确立：

维度/平面/体积

注：K. 托日毕（Knud Togeby）在《词汇学手册》(*Cahiers de lexicologie*, VI）中提供了一些有关以上空间词汇在话语中的具体表现的例子，并阐明了构思验证程序的方向和精神，他的观点就是我们的观点。

3. 还须强调一点：上边的描写是纯语义学的，也就是说是元语言的，任何一个义素或义素组的名称——虽说这些名称来自于法语——都在原则上与日常话语中的意义不同。

注：分析之初，我们曾提到过“相对数量”这个义素组，它作为空间义素体系的参照，却没有进入我们后来的示意图。以后，我们有必要再回到这个参照问题上来。

3 义素与词位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义素体系和其词位表征之间的关系，我们制了一个表，见下图：

义素 / 词位	空间	维度	垂直度	水平度	纵深	横向
高	+	+	+	−	−	−
低	+	+	+	−	−	−
长	+	+	−	+	+	−
短	+	+	−	+	+	−
宽	+	+	−	+	−	+
窄	+	+	−	+	−	+
广	+	−				
厚	+	−				

该表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一个词位的特点就是某些义素在场（+），某些义素不在场（−）。一群词位共有一个义素基，其中的一个义素通过自己的不在场把一个词位和其他词位区分开来。因此，义素的不在场应被理解为义素对立的表征。例如在词位组“高/低”中，义素“垂直度”在场，而在“长/短”、“宽/窄”中，它不在场——在场的是义素“水平度”，于是形成对立。义素的对立造成词位的分离。

2. 前边的六个词位中都有义素“维度”在场。这一共同的义素使得它们之间具有了合取的关系，于是后边的析取成为可能。

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义素悬置”现象，该现象在话语中屡见不鲜，例如：

较小的量＋空间＋维度

等义素的合取就把

短腿≠身材高

里的“垂直度”与“水平度”之间的对立悬置起来。

3. 除了对表中的成分作纵向的比较外，在横向义素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发现（前文已提示）任何一个词位都是一组义素的集合。

从左向右看表，词位——或义素集合——内部的关系是上下位的关系，也就是从整体到部分的关系；从右往左，义素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下上位的关系，即从部分到整体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a)词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义素集合；义素之间存在着层次关系；

(b)既然层次关系在义素间存在，那么，在词位——更大的话语单位——之间也一定存在着同样的关系。比如说，在“垂直维度”这个话语单位中，词位“维度”和词位“垂直”的关系就是上下位关系。

4　话语的层面

前边的研究旨在弄懂意义结构的"存在方式"；现在，我们来考察这些结构在交流行为中的"出场方式"。

交流是一个行为，作为行为，它首先是一种选择。它在意义世界之中并从意义世界出发去进行操作，择取某些意义并同时排除另一些意义。交流是一种自由活动，不过这自由非常有限。

对交流的限制有两类。如果我们把语句看作是交流行为完成后的产品，看作是自足的，那么就会发现造句的自由处在一系列先验的限制中。不错，正像叶姆斯列夫所说的那样，这些限制首先是语言内部的限制：词性、时态、语式、动词的体。所谓自由选择，也就是说，所有将被选出来给语句明确赋值的义素只能在已有的形态和语义类别中去寻找。

另一方面，"自然"的和人的世界包围着话语者，一切事件和信息都在这世界的内部发生，世界本身则相对稳定。于是乎，交流的自由又受制于习惯，表现为语言的重复。世间有许多情境会反复出现，带给我们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用拉康（Lacan）的话来说，人类始终受两种疯狂的威胁：一种是精神分裂症，表现为交流中遣词造句的极端随意，结果阻碍了交流；另一种便是个人的言语

彻底地丧失了个性，重复僵化，就如格诺（Queneau）书中的“聊吧，聊吧，你就会聊”，言语空洞无物，没有信息，最后导致对交流的否定。

这些道理人人都懂，在这里提出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确定意义的表征问题在话语中的地位。下面，我们先从词位内部结构着手。

前边那些例子并没有全面反映词位内部的义素状况，例如“高/低”、“长/短”等，它们可以说是一些与意义结构最接近、其内部义素体系也特别“标准”的词位范例，所以才受到了我们的偏爱。然而，就是在这些极为简单的例子中，我们也未能避免异质成分的干扰：比如我们在建构空间概念体系时，就不得不引入“量化”的评判。在同一词位中，混杂着两个相互参照的义素体系：空间体系和数量体系。

这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恰恰相反，它是词位存在的正常方式。

下边两个例子将更加清楚地说明词位内部的义素组织的某些特征。第一个例子来自玻梯叶（B. Pottier, *Recherches sur l'analyse sémantique en linguistique et en traduction mécanique*），他为了确定语义描写的范围，建议对词位进行义素分析（这和我们的研究方向一致）。他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来描写“扶手椅”：

扶手椅＝{ “有靠背”（/板凳）
“有扶手”（/椅子）
“能坐”（/柜子）

虽然我们不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主要不同意他把“有靠背”、“有扶手”、“能坐”等成分处理为最小的单位——义素），但仍会发现他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因为它容纳了两个异质的义素体系：一个空间视觉体系和一个没有确定的、与“功能”有关的意义域，两体系的义素共同生成了“扶手椅”词位。

第二个例子取自法语。冠词 la，作为形态词位，常被看作是一个多种形态的综合体，从中可以分解出三个形态义素：

单数＋阴性＋确指

传统上，它们属于以下义素组：

数＋性＋限定性

可是，在对复数定冠词 les 的分析中，语法学家却发现它仅仅含有“数”和“限定性”这两个义素，“性”义素缺席。这个例子比较特殊，不过，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例如“性”的在场预设了“数”和“限定性”的在场，反之不然。由此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词位内部的属于两个不同义素体系的义素之间存在着层次关系。

这两个例子补充了前边的论证，使得我们有可能对词位重新进行更精确的定义：词位是表征之地，它汇聚了通常是来自于不同义素组和不同义素体系的义素，这些义素间有层次关系，即上下级关系。

不过，词位也是一个历史沉淀之地。尽管词义相当固

定，但它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受历史事件的影响。就是说，在历史进程中，词位有可能变丰富，增加新义素；反过来，同是一段历史（极端的说法，从上一句话到下一句话也是一段历史，因为五个世纪是历时性，五秒钟也是历时性），却也可能剥夺词位的某些义素。所以，按巴什拉（Bachelard）的设想，诗的语言就是要用谷仓的“适意”去对照地窖的“忧虑”，于是，通过冗余的形式，某些义素组得到了强调，而另一些义素则变得苍白贫瘠。当然，这只是诗歌造成的暂时现象。

所以我们说，词位是交流中一个相对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位。尽管这种稳定是相对的，但它毕竟允许我们把一个词位内的义素间的关系和更大交流单元内的义素间的关系看作是同一性质的，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描写。

再来看看交流单元由小到大的变化：

词位	→	超词位	→	词组
abricot（杏子）		pomme de terre（土豆）		pain de seigle（燕麦面包）

由于历史对词的功用有不同的需要，它们便演变成了上边那样不同程度的拼盘。不过，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它们内部义素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上边三个单元对语义学来说没有区别，可以用相同的程序来处理。

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一个词位内部的义素间的关系，除了通过词位这惟一的表皮以外，再没有其他表征的途径。我们称这种表征为“混合型”表征。在超

词位和词组中，义素间关系表征得反而要更清楚一些，例如在 pain de seigle（燕麦面包）中，介词 de 就点明了义素间的关系。

5 关系的表征

关系，起初被我们看作是属于意义结构的固有性质，它先是演变成词位内部的各异质义素之间的粘合剂，后来又在话语流程中显示出了独立的倾向。关系的表征形式是如此多样，这就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系表征形式的多样性，二是关系相对于意义基本结构所具有的独立性。

1. 话语是语言的表征，无疑，它是我们了解语言内在意义的惟一途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开始就把话语当作对象语言。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所建立的全部元语言概念、以及先我们而“在”的语言学术语会自动地回归话语。对于那些用语言创立的“非语言”理论体系来说，表象之下的本质也是一样的：例如逻辑学家为了建立逻辑语言概念，也是从话语中先提取一个相对完整的“语料”库，然后用它建构连词的类别，而这个类别一旦形成，就不再属于对象语言了。

在这个问题上，语言学家比逻辑学家更谨慎：经验告诉他们，能指与所指（表达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准确地说，是能指的有效差别与由它引起的所指的有效差别之间的相关性——相当灵活，且形式多样。例如形态词位 et（和）是标准的连词，但前后连贯的词位也能表达同样的意思："约翰、皮埃尔、保尔"。所以，由于连贯，由于次序，甚至由于混杂，某个关系义素有可能在能指的区别性特征的后边冒出来，这个关系义素可能是个独立的构词因素，也可能是一个综合体。就拿一般语法意义上的连词来说，如果仅仅依据统计出来的词位表，那么对连词的描写就很难做到全面和完整。

在确定关系意义的地位时也必须同样谨慎。在形态词中就有一类是从属连词，其中有些词的义素较丰富，但也有一些关系成分相对贫乏。例如前置词 de 和 à，其作用仅限于在两个词间搭起一个简单的层次关系。由此，我们很容易想到义素集合即词位内部的关系也应如此：其中的一些仅仅是简单的层次关系，例如冠词中的"数"和"性"，而另一些却可能极为复杂，例如描写扶手椅的"能坐"。

2.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关系与结构项之间的联系及其自主程度。当我们对意义的基本结构进行思考时，我们知道关系概念要想成立，最少得有两个项同时在场。这个"同时"可以表现为合取和析取的相互预设，也可以表现为一个单向的预设：若预设从部分指向整体，那就是下位的；若整体有被分解的可能，那就是上位的。我们发现所有同质的内容成分都有可能受到类似的扭曲。不过，我

们还注意到关系在级别上要高于它所衔接的内容。因此，大家不难理解意义在话语中的表征可以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设置内容，在异类义素项间编织关系网，而所有这一切操作皆可独立于关系表征的类型。

以上的分析让我们明白：从我们的立场出发，话语层面既是同质的又是异质的。

(a) 说它是同质的是因为它独立于交流单元：词位、词组、句子；关系在义素或义素集合之间形成，其结构形式有限，总之，很容易进行编号。

说它是同质的还因为义素相互联系，无论是一个词位内的义素还是一个扩展词组内的义素，它们都有可能属于而且确实属于完全不同的义素体系。换句话说，义素的异质以同质的方式分布在话语中。

由此得知，为了进行语义分析，把话语分解成“词”是没有道理的，可能比把话语分解成词组或句子更没道理。

(b) 通过话语的词汇形式我们读出了关系，而关系中聚集着多少有些复杂的义素。关系的分析才刚刚起步(B. Pottier)，此举对语义学来说非同小可。不过，千万不要把它们看成是纯“关系成分”。单独分开来看，它们每一个都含有一个关系成分也就是元语言成分，可像所有词汇一样，它们还常常另外带有描写的内容，该内容也可分解成义素。泰聂尔(Tesnière)对此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能够从副词性的次要内容中分解出纯转换成分，

例如他指出从属连词 parce que，alors que，avant que（因为、然而、在……之前）中 que 的作用就是把后边的句子转换成相当于名词性的东西。

以上分析不仅替我们区分开了合取关系与析取关系（若不是“句法”这个术语已被人用了，我们真想用它来称呼这两种关系），而且把我们称之为上下级的层次关系也区别开来（请记住，上下位关系仅用来指称基本结构内部的构成关系，不可混淆）。

一个是基本结构的基本关系，另一个是与其相对应的表征在话语中的关系，如果大家接受这两种关系的划分，大家就会发现话语层面整体从本质上来说是异质的：一方面，不同性质的义素、词位、语句在此层面上汇合并生成合取或析取的关系；另一方面，同是这些成分，相互间还会生出上下级联系。于是，第一种关系表现为话语内部纵聚合轴（paradigmatique）上的单位，第二种关系则在同一个话语中排列成横组合轴（syntagmatique）。换句话说，根据所使用的关系的不同，话语层面或者表现为纵聚合形式，或者表现为横组合形式。以上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有些语言学家以及借用语言学方法的学者常常混淆这两种关系，甚至以为话语层面就是横组合层面。

意义的表征

1 义 子[①]

a）交流单位和表意单位

我们承认人类自身条件有限，承认意义的描写有赖于语言的建构，而这种建构起来的语言必须善于表达意义结构的存在方式和表征方式。语言的建构依托于话语，话语不仅是能指与所指相会之地，也是意义在各种要求和各种力量的左右之下变形的所在：比照惰性和历史的不同作用，人在交流中既受约束又渴望自由。由此看来，话语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拼凑物，因而根据话语分析而得来的交流单位似乎很难为意义描写服务。比如说词位、超词位和词组，它们显然属于不同的结构层面，可是从

① 义子（sémème）是所指层面上的一个单位。它独立于能指层面，是一个符号单位中的可辨认出来的一群义素的集合。它指的并不是一个词（词组）的全部意义，而是指一个词（词组）在一个具体的上下文中被表征出来时所显示的具体意义。其构成方式是：义素形象＋定位义素基础。见 *Sémiotique,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 A. J. Greimas & J. Courtés, 1979, Hachette, p. 334. ——译者注

表意角度来说，似乎它们每一个都很有可能和意义单位相当甚至对等。

这就是说，在根据词法和句法类别建立起来的交流单位之外，我们有权再建立一些语义单位。此刻我们已经有了几个有限的基本概念，可以越过意义的表征形式直接去描写其存在方式。我们还考察了意义在话语即交流单位中的表现形式，而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交流单位——词位是意义的载体。话语本身的混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意义的话语交流和意义本身的表征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倒转研究的方向：不是像我们前边所做的那样从义素出发去定义词位，而是把词位作为起点，通过对它的分析揭示义素的组织情况，以便最终获得更详细的关于义素衔接的信息。第一个被我们选为试验品的是词位“头”（tête），或者说，是所有收集在《理特雷词典》（Littré）中含有“头”这个词位的句子和词组。为了清楚地阐明在一个特定的词位场中义素的各种衔接形式，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胆地把词典所提供的这一语料集切分成几个部分，以便系列地给各种不同的衔接形式提供例子。

b）词位：修辞风格的义丛

关于“头”的第一定义，也就是最基本的定义——其他定义皆由此而来，《理特雷词典》是这样说的：

“[身体的]一部分……，通过脖子与身体相连……”。这个定义显然是“现实主义”的，它参照的是非语言的身体形象（顺便提一句，《理特雷词典》中的所有例句均不再说明“头”是身体的一部分，这也算是传统词典学的一个特征）。

从这个基本“形象”出发，我们可以把《理特雷词典》给出的关于“头”的不同意思稍加整理，做点修辞练习。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形象”有点像一个向外辐射“意义”的光源，而辐射出来的意义都多少有点转义。我们已掌握的两种结构性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次归类：

1. 上级关系。

据《理特雷词典》，“头”可以仅指头骨部分，也可以连带着包括覆盖在头上的皮肤和头发：

(a)在后一种情况下，该词指的是被头发所覆盖的那一部分：

光头

洗头

愁白了头

或者指的是没有头发的那一部分（脸）：

faire une tête de circonstance

随场合而做出的头（表情）[①]

① 法语和汉语的表达习惯不同，对有些例句我们先“硬译”，然后再把汉语习惯说法放在括号中。——译者注

tu en fais une tête

你哭丧着个头（脸）

(b) 否则，该词仅指头骨：

劈开他的头

撞破了头

骷髅头

2. 下级关系。

“头”一词既然指的是身体的一部分，那它就可以用来代指一个有独立意味的机体；或再添加一点形象的色彩，用它来代指人或生命体。我们暂时还不想进行真正的义素分析，所以仅满足于列举：

(a) 指有独立意味的机体：

这群牲口有一百头

你必须按头数付钱

(b) 指生命体或生命：

高价悬赏某人的头

il paya de sa tête

他付出了自己的头（生命）

(c) 指人：

一个戴皇冠的头

台上有两个秃头

c) 义子的定义

修辞分析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张数量不太大

的样例表，可以进行一些议论了。

我们刚才把“头”。这个词位和某些语境联系起来，先假定它的意思是“身体的一部分”，继而汇集了一些相关语境，并由此凸现出一簇“意义”的存在。这一簇意义以“头＝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假设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有上下级关系的义素网。具体到“头”这个词位，其内容的变化显然与语境的改变密切相关。这些变化应该被定义为意义基本结构内的关系。

由此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关于词位内容的一般情况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无疑，通过音位对比替换：头、土、塔、豆等，我们知道它含有“否定内容”[①]；反过来当然可以断定它含有“肯定内容”，而且一定是该内容安排了义素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这个“肯定内容”应该是一个义素核心，我们把它简写为Ns，并假定它由极少数稳定的义素组成，是一个不变量。

如果Ns是一个不变量，那么前边所出现的“意义”的变化就只能来自于语境，也就是说，义素的变量藏在语境中，是它们造成了不同的可感知到的“语义效果”。我们暂且把这些变量看作是语境义素，并将其简写成Cs。

义素变量的整体数量和所有可能出现的语境密切相

① 否定自己不是土、塔、豆，而是“头”。——译者注

关。然而，我们知道语境是无限的，而义素变量的数量却是有限的，比如以下的语境：

劈碎某人的头

撞破了头

骷髅头等

所产生的是同一个"意义"："头骨部分"。我们似乎有可能把语境归类，由于每类产生的语义效果总是相同，所以可以认为每个语境类都共有一个相同的语境义素。

即使有了上面的定义，我们对语境义素还是知之甚少，只知道它与一般义素——即意义的最小单位——没有任何区别。在某种情况下，这个语境类"公分母"很有可能含有多个义素（标准意义上的义素），而要想弄清这一切，就必须对具体语境类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应当承认，为了尽量减少分析表征单位所必需的操作概念，我们只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即仅由一个语境义素定义的语境类。实际上，我们定义中的核心义素 Ns 和语境义素 Cs 已允许我们把语义效果看作是 Ns 和 Cs 的组合体了，即义子：

$$义子\ Sm = Ns + Cs$$ ①

① N＝noyau（核心），C＝contexte（语境），s＝sème（义素）。——译者注

2 核心形象

a）“头”的第一个核心：端点

核心义素和语境义素在话语层面相遇后所形成的各种语义效果就是“义子”，这是“义子”的临时定义。现在再回到被我们暂时搁置起来的核心义素上来，另选一些语境实例，姑且用另一种标准将其分类：

α）端点＋上＋纵向

山头

一个部门的头

债务淹过了头

β）端点＋前＋横向＋连续

船头

河流的源头

线头

γ）端点＋前＋横向＋间断

头一辆车

头羊

文章的开头

很容易看出这些例子含有合取和析取的成分。

1．大体上来说，上述语境实例中没有一例中的“头”意为“身体的一部分”。

2. 全部实例均含有第一个成分，“端点”这个义素。

在惯用语和成语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与“头”有关的说法，一般都和人、动物（或鱼）的形象有关，它们有时是“纵向”的，有时是“横向”的，但都明显含有“端点”这一义素：

(a) 从头到脚

头重脚轻

(b) 虎头蛇尾

无头无尾（又如：首尾不能相顾）

3. 上述义素组中的第二个成分有时被我们标为“上”，有时被我们标为“前”。其实，与“脚”或“尾”相对的“头”只不过是两个端点中的一个，以上两种叫法所代表的是同一个义素，即“第一个端点”，其意义在衔接“纵向”或“横向”义素之后才会有所变化。我们在另一篇文章（les Topologiques，*Cahiers de lexicologie*，1964）里曾指出，“上”和“前”是人类时空观中不共生的一个特例[①]，二者的反面是“下”和“后”。我们用一个更抽象的名称来统一称呼二者，它就是我们将要建立的义素核心表中的第二个义素，名叫“上首”[②]。下面把我们的分析转换成公式：

---

① 二者不会同时指涉一种自然现象。——译者注

② 格雷马斯在此处造了个新词：supérativité，该词源自 supériorité（“上”或“高”）。可汉语无法从“上”中再变出一个更抽象的词来，所以我们选用“上首”。——译者注

$$Ns = s_1（端点）+ s_2（上首）$$

4. 义素组中的第三个成分不像是个简单的义素，倒像是一个义素轴。它含有两个义素："纵向"（s_3）和"横向"（s_4），两义素在话语层面上的析取构成两个语境类别。再分析得更细一点，我们将发现这两个语境义素其实是同一词组内的另一些语义核心的基本成分（"山头"是纵向，"船头"是横向）。

5. 对于义素组中的第四个成分，我们也可以作如是说：语境β类里有一个义素："连续"（s_5），语境γ类里有一个义素："间断"（s_6），而语境类α则对这一区别置之不理。在此，语义轴衔接的是"实体连线"/"虚点断线"，我们注意到这两个义素是在与"头"相邻的义素核心内实现的（线头/头一辆车）。惟有α类代表了义素衔接的中性项（非"连续"亦非"间断"）。

初看起来，这一提炼核心义素常量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十分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曾说过，头两个义素是不变量，这是义素核心的特征；然而，在分析所谓的语境义素时，我们在邻接义素核心的领域里遇到了麻烦，我们发现这些邻接的义素核心相当依赖我们正在研究的这第一个义素核心。如果我们用斜杠（/）来表示义素的析取，似乎可以这样来表达本阶段的研究成果：

$$N_1 (s_1 + s_2) + C [N_2 (s_3/s_4) + (s_5/s_6)] + \cdots$$

在这个公式里，一个义素既有核心义素的功能，又有语境义素的功能。关于语境义素定义上的模糊之处，将在下

文澄清。

b）“头”的第二个核心：球体

从同一个语料库中我们还择取了另一组例子，它们与上一组例句并列。把它们归为一类虽然有点勉强，但却突出了几个明显的义素特征。例句如下：

α）球体

彗星头

大头针的头、椽皮头等

（法语口语还把头叫脑瓜子、脑球、脑蛋等）

β）球体＋固体

撞破头

他有个很硬的头

头裂了

γ）球体＋固体＋容器

记在头（脑袋）里

塞满了头

se creuser la tête

挖头里的东西（动脑筋）

初看上去，这次义素分解的结果和我们对第一义素核心的分析结果完全不同，人们有理由问：词位“头”内部到底含有一个还是两个独立的义素核心？只有对这两个核心作仔细的比较我们才能得出答案。不过，在这以前，我们想指出惟有“球体”在第二组的各个语境类中

都能找到，而“固体”和“容器”仅仅是语境变量而已。

c）公共义素核心

细读第二组例子，我们发现在所有的语境类都或隐或现地显示出前边的第一个义素核心：事实上，β和γ类中的“头”说的就是“身体的一部分”；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头”就必须被认为是“上部端点”，与“脚”相对。至于α类，我们知道彗星除了“头”外，还有一个尾巴，而大头针一头是“头”，另一头是针尖。所以，

端点＋上首

这个从第一组例子中抽象出来的核心也包含在第二组例句之中。

现在再来整合“球体”这个新的核心义素，我们求助于对比法。确实，“球体”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得前边的义素分析出现了问题，因为在第一组例句中它没有出场。我们发现我们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中并没有考虑到空间的维度，而维度对空间而言始终是潜在的。于是“球体”出场，它预设了一个可以容纳物体并被物体充满的空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只谈纯维度的空间呢还是一个有面积有体积的世界？根据不同情况，“端点”可以被设想为某一维度的约定俗成的顶端，也可以被看作是某一个空间中的实体；就是说，或者是（连续的或间断的）线上的一个（极）点，或者是三维世界中的一个球体。

“点”/“球”的对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复合结构，或显示肯定项，或显示否定项。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复合结构在义素核心内十分常见。请不要忘了，义素核心是话语层面上的衔接，是属于语言体系层面上的类别。作为这类衔接的第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列举关于“整体”类别的定义：受布龙达尔的启发（*Comment définir les indéfinis*, dans *Etudes de linguistique appliauée*, I），我们曾成功地指出过“整体”这一概念有时表示“全部”，有时表示“可切分”，代表了两种绝然不同的不确定的量。

d）简单形象和复合形象

如果我们对“头”的义素核心所作的初步分析不错，那么就有可能部分地阐明词位“核心”（这个名称不一定合适）的构成。一如它在例子中所显示的那样，“核心”既不是一个孤立的义素，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义素群，而是一个义素整合器，从基本结构的各种可能表征到更加复杂的结构组合，它把分属于各个相对独立体系的义素联系到一起。

如“端点”和“上首”就是两个独立义素，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义素组，这两个义素组完全可以不交错。“端点”和“上首”在核心内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由一个逻辑先设定义，所以该关系相对于它们二者来说也是“独立”的。如果我们同意用一个自左向右的箭头来表示这种关系，即从主义素到辅义素的关系，那么“端点”（s_1）和“上首”（s_2）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Ns = s_1 \rightarrow s_2$$

我们把这种义素核心称作简单核心形象，其特点就是构成它的义素没有超越词位的边界，义素之间的关系是分等级的。反之，如果义素之间的等级关系横跨一个词组中的两个或多个词位，就像例子“山头”中的情形：

$$Ns = (s_1 \rightarrow s_2) \rightarrow s_3$$

我们便称其为复合核心形象。

e）走向内容的符号形象（符像）层

仍需注意的是，我们方才研究的那些构成形象的义素都和一种总体空间观有关，它们皆属于一个更大的义素体系。换句话说，我们曾假设只要把一个内容切分成最小的构成单位来进行分析，就能挖掘出潜在的义素体系，并且断言该体系能够反映绝大多数词位的表现形式；在此，这一假设再次得到了验证。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引进一个新的操作概念，即在表征中构成核心形象的义素属于一种性质特殊的义素体系，所有这类体系的集合构成了表意世界中的“符像层”。

3 定位义素

a）语境义素

在本章开头，我们曾把义子暂时定义为义素核心和

语境义素的结合；而后，为了使该定义更精确，我们研究了义素核心，并把义素核心命名为核心形象。现在我们来确定语境成分在义子中所扮演的角色。

随便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此问题的复杂程度。请看下面这句极为简单的话：

狗叫

根据前边用过的方法，“叫”的语境分析应能帮助我们提取义素核心（其代号将是Ns_1，不过分析义素核心并不是本小节的目的，所以我们仅仅指出其内容是“一种声音”），它还让我们见识到了两种能与“叫”组合的“主语”语境类。一种是动物的：

狗

狐狸

豺　（等等）

一种是人的：

男人

第欧根尼

那个野心勃勃的家伙（等等）

我们说这两个类各有一个公共义素：第一类中的公共义素是“动物”（Cs_1），第二类中的是“人”（Cs_2）。在话语中，它们其中之一将通过具体的语境表现出来并与核心Ns_1相结合，两个不同的义素给出两个不同的义子：

$Sm_1 = Ns_1 + Cs_1$（动物叫声）

$Sm_2 = Ns_1 + Cs_2$（人的叫声）

再扼要地谈一谈词位"狗"。我们说它也同样出现在两个不同的语境类型中。第一类语境与核心 Ns_2结合成 Sm_3：

狗叫

吠

咬（等等）

这其中的公共义素也是"动物"(Cs_1)。第二语境类则表征出一种义子的"语义效果"：比如法语把一种船锚（grappin）叫做"抓狗"，把箍桶匠的工具（outil de tonnelier）和矿井下的手推车（chariot à bras dans les mines）也叫做"狗"。此处的公共义素自然是"物"。

b）词位和义子

对上述分析的结论可以有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先取每个词位中的形象并把它们看作是不变量，然后再加进所有那些有可能与它们相结合的语境义素，于是我们便得到了关于"狗"和"叫"这两个词位的两种不同的表达式：

$$L_1 = N_1 + C\ (s_1/s_2)$$

$$L_2 = N_2 + C\ (s_1/s_3)$$

语境义素通过析取关系两个一组地集合在一起，表达了以下的义素对立：

动物/人

动物/物

它们甚至在话语表征之前就囊括了被分析词位的所有可能用法。

我们给词位的定义在这个最初的表达式中得到了验证：话语只生产具体的义子，而词位的定形早于话语中所有的具体表征，所以词位似乎是一个潜在的模型，承担了意义形象的全部功能。

若说以上观点就是勃梯叶（B. Potier）的研究所证明的观点，大概不会曲解他的意思。他的研究和我们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的。一本词位模型词典的问世将会为解决机器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语义问题带来极大的便利。对我们而言，单纯的词汇语义学和表达层面的衔接形式联系得太紧，所以它很难解决"同义"这个关键问题，并对内容进行真正的分析。

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是对每一个词位都作单独的描写，而是把"狗叫"看作是两个义子相遇的话语段，我们立即就进入了表征意义的层面，该出现的义素在这个层面上已经选定。于是，"叫"在进入话语的同时就选定了包含在"狗"语境中的义素 s_1，成为义子；反之，"叫"作为背景的在场使得选择义素 s_1成为必然，让"狗——动物"义子得到了落实。"狗叫"作为话语段摒弃了 s_2和 s_3，仅选定 s_1作为语境义素，所以其惟一可能的义子组合是：

$$S_q\text{（话语段）} = [N_2 + Cs_1] + [N_1 + Cs_1]$$

从理论上讲，上式中的每个核心应该与相邻词位内的语境义素相结合。我们之所以说“从理论上”，是因为这两个语境义素实际上是同一的，在邻居身上找自己体内已有的东西似乎有点犯傻，可是只要我们给这个话语段换一个词位：

警官叫

我们就会发现“叫”的新语境义素这一回变成了 s_2，新核心 N_3（警官）的语境义素必定也是 s_2：

$$Sq_1\text{（话语段）} = [N_3+Cs_2] + [N_1+Cs_2]$$

以上这些基本功练习让我们暂时对语义学有了一个总的认识，它们对后边的研究十分有益。

c）定位义素的定义

至此，我们了解了语境是比词位更大的话语单位，它在话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构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层次——内容的新的衔接层次。实际上，语境在话语中实现时，以是否兼容作为系统运行的标准，并以此来判断两个义素形象是否能组合在一起，而兼容就意味着两个义素核心可以结合，因为它们可以共享一个语境义素。

换个稍微有点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我们又发现只要显现在话语层面上的义素核心不止一个，就会自动引起一个或数个语境义素的重复显现。我们上边的公式把“狗叫”这一话语段描写成两个义子的组合，我们

还可以对其提取公因子：

$$Sq\ (\text{话语段}) = (N_2+N_1)\ Cs_1$$

这一新的表达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一个具体话语段里有两个义素形象，那它就只有一个语境义素；换句话说，语境义素与交流单位有关，与比词位大的词组和句子有关，而义素核心却被禁锢在单个的词位之中。仅凭这一现象，我们就应该把语境义素单独抽出来进行研究，而不是把它和义素形象混为一谈。

然而，在应用中，我们发现"语境义素"这个名字并不太准确，例如本章开头的分析就清楚地说明了有的语境义素只是针对某一个被研究的核心而言的，它们其实属于与该核心相邻的另一个核心，而不属于我们想重点研究的反复出现的语境。所以，我们建议，与核心义素相对，把真正的语境义素叫做"定位义素"。

注：继义素之后，我们再向B.玻梯叶借用定位义素一词。

d）走向语义层

提炼出一个独立的义素组，并断言它在话语的组织中具有独立功能，这一想法源自一个双重的需要。叶姆斯列夫曾提出过每个信息和每个词位都具有一个"整体意义"，这个概念很有用但比较模糊。那么，一个以重复出

现为特征的定位义素的建立就应能显示出较强的解释功能，帮助大家很好地理解这个“整体意义”。在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信息或任意一截话语段，只有在共享一个或数个定位义素时，才能被称作是“同位”的。借助于“同位”这一概念，我们将跳出“信息”这个小框框，试着指出所有文本从头至尾都处在一个同质的语义层中，而一个符号集的所指整体，与其说是先验的（像叶姆斯列夫所认定的那样），还不如说是一个语言表征的结构性现实。

另一方面，关于定位义素相对地独立于核心义素这一假设，在开始不过是为了用来启迪思考的，但它现在开始得到了验证。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在前边例子中偶得的几个定位义素，就会发现：

物/动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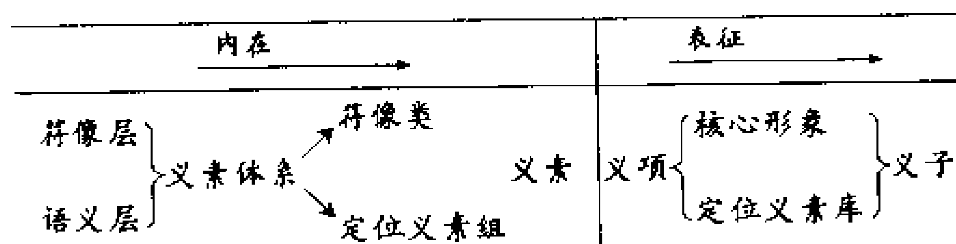
这几个定位义素可以被衔接成一个义素体系，其更清晰的表达形式大概如下：



现在对它们进行概括：如果说（简单的或复合的）义素形象属于总符像层，它们不过是符像层的具体衔接，以便能在话语中得到赋值；定位义素则是不同性质的体系，它们属于总语义层，其表征保证了信息和文本的“同位性”。

4 工具概念

在继续深入之前，有必要总结一下我们为设定以上概念所作的第一步努力。描写意义不能没有建构的单位，我们的第一步努力就是为了确定这些单位。下图汇集了前文中提到的主要概念，其定义虽然宽严不一，但都对后边的研究有用。



符像层

1　逼近法与近似法

a）符像层的自主性

在上一章，我们梳理出两个独立的语言层面：语义层和符像层。这是两个具有建筑构造特点的集合，它们的成分在话语中汇集一处，构成了维度不同的表征单位，同时也表征了意义本身。现在，我们要分别考察这两个层面，这与其说是为了描写它们，还不如说是为了尽可能地精确它们的存在方式，尤其是要勾画出它们的轮廓和构像模式，对当前语义研究状况来说，这样做大概更现实一些。

在意义世界中引进两个层面，首先要强调的就是它们二者相对于对方的自主性。不过这两个层面都属于意义的内在世界，其存在从理论上来讲必然地先于其成分在话语中的表征。大多数语言学家都熟悉体系和组合过程的对立，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人都了解它。比如说，符号学现今成了多门人文学科交叉的领域，具有现

象心理学或遗传心理学特点的研究也常常和我们的研究平行，因此，为了把这些研究和结构语义学区分开来，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强调符号结构本身的自足性及逻辑上的先在性。在此我们想到了那些关于象征的研究，关于其性质和起源的作品，特别是吉·杜兰（Gilbert Durand）所著的《想像界的人类学结构》。该书相当追求系统化，研究的问题也和我们的相同。不过吉·杜兰的研究方法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和我们的大不一样。他花了很大的气力去给象征符号分类，但分类标准却是遗传学性质的。他的理论依据是别赫捷列夫的反射心理学和三个“主反射系统”（人体姿势系统、消化系统和衔接系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认为身体反应是个体发生学的基础，人体姿势在此基础上形成体系，于是象征符号与该体系“共生”。生理反应虽不是象征，但却是象征的根基，是其分类的依据；多亏了生理反应，想像力才有了发展成“图式”或“原型”的可能性。动作可以而且也应该被看作是第一性的，惟有它才有资格充当“图式”，尔后，“图式”生“原型”。比如说垂直的动作由姿势统辖，“上、下”二词的“原型”由此而生；比如说吞咽这个动作属消化系统管辖，它不仅包含了“下”之动态，而且还进一步生出“包容/被包容”两个原型。以上“图式”还能孕育出其他一些名词性“原型”，如“光明、黑暗”、“颜色、器皿、形状、材料”等。

该作品兼收并蓄，瑕瑜互见，我们不再赘述。我们之

所以提到这本书，是因为它极具代表性：它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思想与语言学的方法论风马牛不相及。

1. 我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外在于语言的区别是不能拿来作为描写象征符号的标准的，即使这些标准并非是纯粹的假设。符像一如所有的语言体系，可以从感知内部的层面上去把握，外部现实作为表达的形式显现在其中，仅仅给符像体系提供了否定意义，否定意义衔接起区别作用。

2. 话语中，义素体系生成核心形象，这既不能用象征符号越来越复杂的繁衍来解释，也不能归因于那些虚假的因果关系（如吞咽“延伸”并创造了“包容”这一概念）。把象征符号分为两大类形象，根据非语言学的理由分离（析取）出“上去”/“下来”的对立，这不仅是对词汇的滥用，而且根本就与结构主义不沾边。惟有接受义素结构先于义子在话语中的多种表征这一假设，内容的结构分析才是可能的。这一设想说起来简单，但却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相去甚远。

b）以人为中心的词汇学

传统的词典学不仅强加给我们一套词典的编排格式，而且还给词意定了等级。所有和人、人的环境、人的常识有关的“意义”都被放在第一位，理所当然地是“原意”。这样一来，说“头”是“身体的一部分”是对“头”的最自然的描写；同理，“prendre”（拿）意为“把

某物据为己有”，虽说在下边的例子中：

Cet arbre prend bien.（这棵树长得好。）

Le bois prend.（枝条生根。）

义素核心中出现了“扩展”的义素，在另两例中：

La rivière a pris.（河上冻了。）

Le lait prend.（奶粘锅。）

又出现了“收缩”的义素，但它们不过是该词所有可能被表征出来的辞格之一，prendre 的原意只能是“用手”抓一个东西。同样，“用牙”才叫真“咬”，吉·杜兰从中提取出了“能咬”的图式，但他并没有离开传统模式。由此可见，“图式”不等于“义素”。

在语言研究的另一些“异端”领域里，如神话、诗歌、释梦等，也有这种潜在的倾向，即把“人”作为切分意义的最基本、最优先的尺度。对象征形式的最初描写，便是先以“释梦之钥”的方式列举各象征物，继而区分宇宙间各神奇现象并对其进行简要分类（Mircea Eliade），于是天上地下的各种象征构成了一些并不太统一的组合，而象征——它可以是一个词汇，也可以是一个实物——则总是被看作是描写中的一个密封的整体单位。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描写物质象征方面做过一个有创意的试验。众所周知，他的分类标准是物理性质，是近乎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四大元素：土、气、火、水。这是一个创新。然而，作者本人最后也承认这种分法既不方便也不是单义的，比如在“陆地上”还有“田地

的松软”对“岩石的坚硬”，“水的世界里”亦有静水对怒涛。

这一发现把巴什拉引到了我们义素分析的门坎上，于是他也开始认为

软/硬

静态/动态

的对立应被预设为先于词位或象征物“土”和“水”。后来在《空间诗学》(*Poétique de l'espace*)中，巴什拉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义素描写，并着手从符像层角度来研究诗学的交流。

c) 一个保留的领地：象征研究

在关于诗、梦和无意识的意象性质的思辨中，以上那些本来就模糊的问题变得更加混乱了：为象征的多义性而陶醉，把多义性看作是诗歌语言不可取代的明证，看作是神秘象征取之不尽的富矿。即便是拉康和杜兰这样敏锐的学问家，也不由自主地在意义的描写中引进了价值判断，确立什么“真言”和“习语”的区别，认为有的是“真语义”，有的是“俗符像”。语义学要想成为一门科学，就应该只描写价值观，而不是创立价值观。

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换个提法，比如说不是同一个词为什么会有多个意思或一个词为什么可以同时指一事物和该事物的对立面（阿拉伯语法学家和哲学家们曾长期

对 addād 这个词的存在感到迷惑，该词既有“相似”的意思，也有“相反”的意思），而是自符像描写出发，认真研究符像的各种表征形式。届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漂亮的诗歌意象和任何自然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位——例如我们的“头”——的运作方式并无二致。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明智地承认一个真理：所有属于语言范畴的东西只能是语言的，就是说它们都拥有一个相同的或类似的语言结构，其表征条件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连接，连接的方式可以被确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确定。这样一来，那个认为在语言中神秘与通晓并存的现代天方夜谭也就不攻自破了：语言现象可能是一种十分神秘的现象——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语言机制本身却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笛卡儿的“蜡块”的神秘程度丝毫不亚于月亮的象征意义，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化学家弄清楚蜡烛的成分。结构语义学所要进行的分析正是如此。不错，“意义效果”在以上两种情况中都存在，然而，对现实进行分析的新层面——不管它是化学的还是符像的——都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

d）想像界和语言学

最后要指出的是，象征研究在策略上不该囿于一个描写层面，即被大家统称为想像界的层面。语言层面是否是惟一合适的描写层面？或者，从操作的角度来说它是我

们的最佳选择吗?其他与语言平行的描写层面难道都不合适，都无法给出相应的结果来吗?

对诗歌象征来说，此事不言自明：诗歌是一种语言，说得更明白些，它是语言的一个部分。所有对诗歌进行的非语言描写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一定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翻译。但神话象征就不同了，在神话里，“自然”物、“自然”行为与词汇或语段并列，似乎都具有相同的象征功能，它们之间甚至可以相互替换。这必然会造成某种混淆，尤其是在人们不大注意描写层面的一致性问题时。可惜此类事情时有发生。

举一个被人滥用了的例子：阳物的象征。大家知道，自弗洛伊德始，在心理分析和神话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理解为阳物：人体各部分、整个人体、植物、树木、鱼类、人工制品等等。阳物的比喻似乎是一个开放类，一个收破烂的，在这类比喻中惟一不变的就只有 tertium comparationis（被喻对象）。至于那些实际出现的喻体，它们到底是语言的、视觉的还是“自然”的，这无关紧要。那个把它们串成一个类的成分，那个它们共享的成分，也就是“关系”，它并不是一个能指的客体，而是一个义素衔接，或者顶多算是一个属于内容层面的核心形象。于是我们便自动地从物的世界过渡到意义世界，物的世界给我们提供研究对象，意义世界则天然地适合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并不打算就此断言阳物的象征性来自于对象征

物的阐释，阐释给它们提供了必要的语境，尔后阳物的意义才得以表征。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此话大概没错。当然，还有一些仪式的或象征性的行为也可以为其构成自然的语境。总之，这个例子具体地说明了我们前边提出的观点：无论表达是由“自然”之物构成还是由音位或笔画构成，对其意义的分析方法不变。

把常识世界当作能指，对其进行内容分析，这在理论上来说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大概是可行的。语言层面的优越之处就在于此：任何其他符号体系，当然也包括使用实物的象征，都可以被译成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反之不然。人们无法想像马拉美的某首诗被译成“物的语言”。这在视听语言教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必须把自然语言的语音表达转换成与之相应的视符，如果说用屏幕表现行动元（actants）还马马虎虎说得过去，那么，如何用视觉表达来指代谓语、指代关系则是一个刚出现不久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自然语言的能指相对简单，而且已经被部分地分解，这就给我们创建更多更有把握的分辨意义差异的技术提供了方便，虽说意义结构仅仅是我们逻辑推理起步时的一个假设。在应用这些技术分析内容的实践中，我们的确还在蹒跚学步，但这些技术对人文科学的价值却相当于代数对自然科学的价值。那些从其他文科研究中产生出来的直觉，虽说有时相当敏锐，但缺少一套严密的方法，而正是在方法论上，结构语言学远优于所有直觉。

2 符像的地位

a）象征与符像

象征，不管其表现如何，在本质上与其他意义形式没有区别，所以，对象征的分析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这便是我们一直想要说明的事。不过有必要补充一点，即象征与符像结构之间有许多共性，但二者也并非完全相等。象征的运作有其特性，它依赖于符像层，但却永远是他物的参照，是异于符像层的另一个语言层面上的东西。

我们可以说符像层是一种能指，一种解说奥义的载体，它衔接象征性的所指并使其构成一个具有区别性意义的网络。若想让内容层面不再是索绪尔式的“一头雾水”，我们就需要有衔接起来的表达层面；同理，“内容形式”的衔接切分了“内容实体”，并因此赋予它生命。

另一方面，供符像实现结构的领域要比任何具体的象征体系都宽，所以说在象征域和符像域间没有相关性。承载符像的象征取什么形式，符像无所谓，而同一符像层却可以用来衔接不同的象征形式。还拿阳具的形象做例子：能够把无数个修辞变体推演为一个不变的阳具，这说明在符像层上只提出了一个意义平面，就是“性”。于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核心形象就成了串起所有具体形象的连线。其实，选定阳具这一所指和选其他的所指都具有

合法性。叶姆斯列夫在《语言学论文集》中说，语法类别建立在义素对立上：

扩展/收缩

而“雌/雄”不过是以上符像对立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义素核心与定位义素“有生命（的）”结合后的结果。

描写符像层是一个独立的任务，不应掺进具体象征。

b）吉罗（P. Guiraud）的“语义原型”

通过比较符像和象征，我们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可以用它们来定义符像层。符像是内容的形式，只要有了某一个阐释平面的参与，它就能表征出一个具体的象征意义。然而，符像并不就等于“内容的形式”，如果说符像层的东西都理所当然地隶属于内容的形式，那么，反过来却不然，因为定位义素以及由定位义素所构成的语义层（起诠释作用的“同位”关系便由此而生）也是内容的形式。

叶姆斯列夫的这个关于“内容的形式”的概念相当具有革命性，它敲响了形式主义的丧钟，但我们却不能用这个概念来划分语言的实际层面。我们的情况不同，所以有必要继续遵循索绪尔的观点，即语言是一个形式，语义效果相当于内容实体，惟有形式的表征才导致了语义效果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分开的不是形式和实体，而是符像和语义。

最好还是来看实例。在这方面，吉罗在他命名为“形

态语义场”的领域里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其成果极富启发性。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语言学协会学报》，t，LVII，fasc. 7）中，他明确指出，在词位这一级上存在着各种音位变化矩阵，它们与一些义素衔接模型相对应，二者之间的关系虽说不是同构的，但却是平行的。他做了一个参照表，里面共四百个义子，完整地研究了一个“语义场”，即以辅音［t-k］为词根基础、以“击打”（frapper）为意义核心的语义场。我们先简述一下这篇论文的主要成果。从多个方面来看，这些成果都很有意义。

在以上词根的领属下，“词意”的变体大致能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

1. 第一类与构形成分的变化有关，矩阵中若是出现了元音变化：

［t-i-k］/［t-o-k］/［t-a-k］

义素便产生相应的变化：

轻敲/重击/平拍

矩阵还会有其他的变化，如辅音上的变化。与之相应，内容层面也会出现新的义素衔接。例如，在上述音标中间加［-r-］：

［t-r-i-k］/［t-r-o-k］/［t-r-a-k］

便在语义模型中也加进了一个新义素：“频率性”；同样，如果用［ʃ］替换［k］，则表达了

缓缓地（一击）/痛快地（一击）

2. 另一方面、语义模型中也有一些与音位矩阵中的

变体无关的义素衔接。吉罗的“语义原型”既描写动词也描写名词，所以它不仅生成了“击打”的义子，同时也生成了“一击”（coup）的义子。于是，同一种构形成分既能用来指击打的工具（铁锹、拨火棍、木槌），也能用来指那些在击打时垫底的东西（各种托板和垫板）。总之，它还能以一种初看上去非常古怪的方式构造一些意为“斑点”、“斑疹”、“痂盖”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皮肤病的义子。

集合在一个模型下的义素衔接被清楚地分成了两类，不过其分类的标准并非出自内容层面，而是属于表达层面。

1. 有些意义的变化与音位矩阵的变化相关。这些变化构成了上下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

(a) 触觉类的意义核心——“触摸”与辅音基 [t-k] 有关，但吉罗对此未作分析；

(b) 感官义素的种种变化与构形成分的替换有关，因此：

轻敲/重击

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力量强度轴的两极，而吉罗列举的第三个义项则与以上二者的综合项对立，讲的是受敲打的面积：

面/点

至于中缀 [-r-]，以及它的变体 [ʃ]，它们引进的是语体、语态方面的补充说明。

显然，符像模型中的各类义素所对应的是人的感觉：触觉、空间、情态。

注：于是我们有必要在符像层上进行一次实用主义的分类，分类的依据是感官，也就是说是外在于语言的。这种分类具有操作性，但必须是在对构成符像层的义素体系的描写完成之后，它才能成立和建立。

2. 另外的一些义素变化具有独立性，与构形成分没有任何共生关系。例如：

名词/动词

的对立相对于核心衔接来说大概是次要的。下面的对立也是如此：

发放者/接受者

（击打工具）　　（挨打对象）

注：请大家记住最后这组对立。对于能够"延长"人类动作的工具，继勒里奥—古寒（Lerio-Gourhan）的工具分类之后，杜兰一直在研究它们的命名问题，以上对立多少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我们在此着重提出杜兰的研究成果自有我们的道理。首先，杜兰作为统计学方法的倡导人、研究词素的专

家，在研究中终于走上了相当严谨的义素分析道路；其次，这一研究显示出词源学和义素分析不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后者还可以助前者一臂之力；最后，也正是这个例子对我们有用的地方，就是它揭示一个现象：符像变化与音位矩阵变化共现，而所有定位义素的变化却与矩阵变化完全无关，这便让我们窥见了核心义素和定位义素之间的界线，窥见了语义层与符像层之间的区别之所在。

注：我们思考的问题与语言起源无关。当然，以上的音义的共生共现的现象给音义相关论提供了新材料，但现在没有人会对这个观点认真。

c）符像层与生理学诠释

所有这些变化都让人感到存在着两个核心：一个是辅音 [t-k] 形式的音位核心，另一个是所谓的语义原型："击打"。《理特雷词典》在 tic 词条下涉及到了这个义素核心，说 tic 是一个"抽搐"动作。由此可见该核心是一个综合项衔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方言的法语中代表着下边这组对立中的一级：

攻击性接触/抽搐性反应

先不谈其后的义素组合，我们敢说这一形象代表了一个意义衔接：其内涵便是外界的刺激和活细胞的反应，这两种行为反应在生理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和杜兰将其归为人类个体发生学范畴的想法有出入（至于"斑

点"、"斑疹"、"痂盖"等义子，以及产生它们的头癣、疥癣、疥疮、麻风等，在这个层面上大概可以解释为受感染的肤面的反应）。在这一层面上，与其根据"主反射系统"来给象征符号分类，还不如像罗兰·巴尔特提议的那样设立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所指（个人写作风格对他而言不过是"肉体的饰音"），以便说明个人风格中的符像衔接，并将其看作是一个有机体的"吸引和排斥系统"。罗兰·巴尔特的提法比较合理。

以生理学为基础的诠释把生理行为看作是深层内容，如果这一诠释从纯象征的意义上来讲是有价值的话，那它在符像层上的价值不大。比如说义子"托板"：一个义素形象和相关的定位义素结合，生成"托板"这个义子，这个义素形象本身不可能含有"有机物"之义素，也就是说"有机物/无机物"（见"有生命/无生命"）的对立在义素核心之外，甚至还可能在符像之外。因为我们必须把核心形象从有机世界中彻底抽象出来，把它变成一种纯感知，一种属于触觉感官之系统衔接的义素组。在此我们仍然不取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例如在分析义素核心"头"时我们采用的就是空间衔接模式。

但这么一来，符像层本身的存在方式就显得不是那么确切了：它似乎是一个包括多种类型、多种义素体系的集合。这些类型和义素体系是可以被感知的，就有点像莱蒙·吕埃（Raymond Ruyer）为鉴别鸟的视觉所提供的模式，鸟类就是凭这种模式来区分敌友的：

长脖子/短尾巴　与　短脖子/长尾巴

符像类型产生于感知过程，可以说它代表了外部世界对意义生成所作的贡献，这也是它外向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符像类型和感觉世界内所划分的各种质量应是同构的，大概就相当于手势语言中的“形素”。这并不奇怪，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门独立于对能指所进行的第二次切分[1]的语义学。无论如何，以上的论述似乎足以证明我们为什么将这一层次的语言定名为符像语言。

3　符像描写的各种可能性

a）应用语言学术语的建构

符像层的义素分析似乎成了结构语义学的第一要务。这一分析若能成功，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语言中所固有的各种象征机制，而且还能直接服务于应用语言学和机器翻译。例如机器翻译现今就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它必须较好地解决忠实原文的问题。这一研究还可以帮助资料学建构术语体系，更恰当地切分语言

① 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的术语：对话语连续体进行第一次切分，可得到含有意义内容的单位，符素（monème）；第二次切分将符素分成更小的语音单位，音素（phonème），音素不含有意义，它的惟一作用是完成对符素的切分。双层切分（double articulation）为人类语言专有，是“人语”和“兽语”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译者注

单位，恰到好处地解析它们相互拼接的方式。

以上几个学科其实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互不相干，可惜它们都关起门来搞研究，没意识到大家所面临的几乎是同一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关于符像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象征问题上，那么请大家来看看机器翻译的情况：过去机器翻译选择了词对词的翻译方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现在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思考和我们的研究方向几乎一致，思维敏锐的勃提埃（B. Potier）就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代表。另一个代表是罗斯·吉琏（Ross Quillian），他提议创建一套术语来描写语义世界，而他的那些按阶梯形排列的术语和我们的义素概念已经非常接近了，他的理论代表了近年来研究机器翻译的语言学家的流行思潮。为了对其理论有个印象，我们将引用一段他1961年在剑桥大学语义学研讨会上的报告："语言中的语义问题"。该论文中有一个表（第150页），其中探索了语义学术语所可能具有的几个尺度。他为"本体感受"和"内感受"（不过他对这两个词没敢多说）预留了二十五个义素的位置，其他则是"外感受"的分类，我们原文照抄如下：

(a) The Five Abstract Scales：《*Number*》(the real number continuum)，《*Correlation*》(in the statistical sense)，《*Make-up*》(notion of whole-to-part or whole-to-aspect)，《*Similarity*》，《*Derivative*》(in the mathematical sense)；

(b) Visual Scales: hue, brightness, saturation;

(c) Temporal Scales: time, length (with subscripts);

(d) Degree of Existence, degree of awareness;

(e) Auditory Scales: pitch, loudness;

(f) Gustatory Scales: sweetness, souriness, saltiness and bitterness;

(g) Olfactory Scales: not yet determined
(h) Cutaneous Scales: not yet determined } say, 25 max.

注：我们不打算把上面的这段用英文进行的分类译成法文，因为其中的单词只要一离开英文背景就语义含混并会产生许多歧义。再说让我们感兴趣的也不是吉琏如何分类，而是他如此分类的理由。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充分反映了当今语义学研究领域里的主导思潮。

以上的几个类别已经勾画出了该设想的轮廓，不过(a)是例外，(a)几乎囊括了所有语言学分析方法的公设；(d)也是个例外，而且我们承认(d)不太容易让人理解。罗斯·吉琏所设计的这个语义描写模式的第一个步骤大概是先扫描出所有与感觉有关的词汇，建立一个先验框架，然后再把定义精确的、属于“本体感受”和“内感

受”的成分补充进去。据他设想，以上为语义描写而设的元素的总数不会超过一百多个。

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在设计“国际语”（interlingua）时也把语义分类元素定为一百个，显然是受化学元素表的影响。不过，他的分类元素并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这是随便选的几个元素：air，cold，give，laugh，one，sign，went，body，eat，how，more，red，yes，you 等等）。我们在此提到马斯特曼仅仅是为了说明像他这样的语言学家为数不少，他们在感情上都倾向于认为语义描写元素的数量是或应该是有限的。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如果我们在描写语言中盲目地认定先验设定的合法性，就会犯主观臆断的错误。

b）抽象的程度

我们承认“描写”过程必然是理论建构的过程，但描写本身必须遵循某些科学伦理上的要求。自由并非没有限制，先验的建构也绝不是主观任意的。人类生存状态中的语言现象是一个社会现实，对一种语言的理论描述必须与该语言的实际情况相符。换句话说，能指内部存在着各种能起区别作用的差异，是它们限制了建构的自由：或者在最初的系统化建构阶段，或者继逻辑描写之后出现且是必不可少的验证阶段，所有使用归纳法的描写——替换测验、分布分析——都必须考虑到以上差异。

再举个例子进一步阐明我们的观点。有两个词位：

“给”（donner）和“拿”（prendre），我们替它们设想了两个义素核心，列成如下对立形式：

伸展/伸展＋收缩

在这个分析阶段，由于词位表中只有两个词，我们很难说“伸展”和“收缩”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即义素。如果我们扩大词位表，在中间插入一个新词位“持”（tenir），我们就会发现：

1. “拿”和“持”似乎都含有“收缩”义素这一核心，但这个核心的内部还有一组对立义素：

$$\frac{\text{拿}}{\text{持}} \simeq \frac{\text{收缩＋始动}}{\text{收缩＋持续}}$$

2. 义素“收缩”在“拿”词位里似乎是动态的，但在“持”中却是静态的。于是“收缩”分裂成两个义素：牢固性＋（动态/静态），“拿”和“持”的对立也可以表述为：

$$\frac{\text{拿}}{\text{持}} \simeq \frac{\text{（伸展）＋牢固性＋动态＋始动}}{\text{牢固性＋静态＋持续}}$$

即使如此，我们也丝毫不敢肯定我们已经分析到了最小的意义单位，也不敢说以上的分析就一定正确（“动态”和“始动”二义素会不会有点冗余的味道？）：再加进几个新的词位，说不定又会发现新的分法。

以上分析就不继续进行下去了，它差不多已经给语义描写的逻辑建构定了位：只要这一建构是从一门具体的语言出发，分析的是一批数量有限的词位，它的功用就是通过抽象概括来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如此这般地扩大分析词位的量或者对数个词位表进行对比，这种方

法如果对分析一门语言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它对涉及到多语种的机器翻译和情报自动化就更有意义了。通过对多种自然语言进行平行描写，我们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中介语言。

描写所遵循的两个原则既是共现的又是矛盾的：描写必须反映现实，所以它是归纳的；它又是演绎的，因为它必须保证建造中的模型的内在一致性，高度概括出语料中所隐含的共相。建立在以上二方法的妥协上的描写程序，如果不能成为所有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共识，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c）描写步骤

从整体上描写符像层，这一想法初看上去似乎有点不实际，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无论你选择什么东西作语料，《法语宝典》(*Le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或《理特雷词典》，最后所得到的义素数量从原则上来讲都应该是有限的。当然，我们不会忘了，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随着语料库的扩大，我们会进入更深的层次并发现更小的意义单位，但意义单位越小，抽象程度越高，义素的数量反而会越少。

描写的程序将在另一章专门论述。在此我们仅仅指出一点：描写为了从形象过渡到义素体系，从义素体系过渡到符像层面，就必须完全按分析的步骤进行，即建设语料库，归约，确定其构成成分。

话语中的同位关系

1 话语的异质特征

a）信息的同位性

为了更好地确定语义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到意义的表征层面，找出话语运行的结构性条件。语义问题，当你真想弄懂它时，就会发现它有许多自相矛盾的成分。

有人解释说，是人类精神的述谓能力，或者用时髦一点的说法，是发话者的意向，把信息排列组织成话语。我们难以接受这种观点，这并非由于担心与心灵主义纠缠不清，只因为这种说法是从发话人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信息传播和接收的角度出发的。根据后一种视角，话语听起来虽然是线性的，却在一步步地走向精确，并建立了句法的层次。

意义的多层集合会生出一个同位信息，这一现象如何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你是越过词汇限制，根据一个义群（lexie——具有一个意思的词或词组）对话语进行

分析，还是把更小的单位组织成较大的句法成分，信息本身总是被人当作一个整体，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个丹麦语言学家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建议根据词法类别的冗余现象来判断信息的同位关系。实际上，多层次的句法结构给词法结构的重现提供了框架：为同一理由而重现，便是大家传统上叫做搭配的东西；同类词形的重复，则和管辖支配有关。

语法上的这种冗余现象为我们理解信息的语义同位性提供了一个模式。不过请记住，从内容层面看，各种词法类型只能算是定位义素中的一个小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虽然是同位关系的构成成分，但仅仅对表征为某几种句成分的信息有用。它们既不能说明同位现象，也不能解释话语中更大的修辞单位的同位变化，更不用说整个话语的同位关系了。看来我们不一定非求助于词法类型不可，而应该求助于各种类型的定位义素，越过句子成分的限制去考察同位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估价问题的难度，由此找到答案，确定跨语句的同位关系。

有意思的是，反而是在那些玩文字游戏的传统文学中，语言技巧的使用特别明显，我们很容易从中发现同位关系的延续或突变。

b）同位关系的变化

下面是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那是上流社会的一个晚会，办得很漂亮，异常热闹，

嘉宾皆当世俊彦。其间，有两个客人走到室外透气。

其中的一个很满意地说："很像样的晚会，对不？晚餐真棒！……toilettes（多义词：服饰或洗手间）也不错。"

另一个答："这我可一无所知。"

"什么意思？"

"我没去过。"①

像所有这类故事一样，上边的故事有几个常见的特点：

1. 故事有两部分，一部分介绍故事情节，一部分是对话；

2. 介绍部分为故事的铺垫，一般是一个简短的叙述，建立起一个意义的统一层面，一个同位关系；

3. 对话继第一个同位关系之后突然引进第二个同位关系，破坏了故事的统一性，使之生出戏剧性变化；

4. 两个同位关系被一个共同的"字眼"联系在一起。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双关语，一个同形或同音但具有多义的词就能让我们从一个同位关系过渡到另一个同位关系（人们不会问多义词是否含有一个共同的义素形象）；

5. 幽默之处就在于自以为找到固定的同位关系时却突然发现了另一个同位关系。

由此可见，在这类文学中，一个"机智"的字眼便是

---

① 此人把 toilettes 理解成洗手间了。这个法语中的文字游戏无法译成汉语，译者愿意提供另一种类型的例子：

一个中年妇女找大夫看病。

大夫问："您多大岁数了？"

中年妇女为了显得年轻，便答道："二十多岁吧。"

大夫听了，在病历上写：丧失记忆。

——译者注

一个陷阱，它既掩盖了话语中的第二个同位关系，同时又把我们引向了这个同位关系。

另一个标准则是选择不同的行动元来参加这种微型喜剧。这是一个强调不同的同位关系的辅助方法。大致分一下类，我们便能得到讲俏皮话者比较常用的对立类型：

成年/儿童

多数/少数

正常/疯子

人类/动物或物品

这两个同位关系并不仅仅是在两个不同位的语段之间造成冲突：从内容角度看，对话语的同位关系允许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人类在思想意识上有差异的反映。由此可见，对此类“故事”内容的描写有可能形成一个社会阶层的类型学，不过这就是题外话了。

c）关于同位关系的上下文向度

这类故事开头的背景交待其实是在建立一个同位关系，听众需要确立一个同位关系才能安心。这个上下文一般来说相当“宽松”，以便为引进新同位关系作准备。一个严肃的人说话自然不含糊，他一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语言游戏的目的却恰恰相反，就是要利用新同位关系让你猜不到要说什么。由此可见，辨别和区分“同位”上下文的向度极为重要。这也是机器翻译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比如下面的简单句所提供的上下文：

狗吠

警官狂吠

其同位关系问题还不难解决，那么在稍微复杂一点的句子里，问题就大不一样了：

警官的狗在狂吠。

这句话既有动物的定位义素又有人类的定位义素，要想知道是真狗在吠还是警官的秘书在吠，就得到更大范围的上下文中去寻找依据。

上下文是有层次的，而且层次之间相互镶嵌。在寻找能够确定同位关系的标准时，语义分析也开始使用相互镶嵌的概念。于是一个组合了至少两个义素形象的词组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最小的上下文，让人从中找出一个同位关系，然后在短语中去验证这个同位关系的正确性；而短语的正确性则要到句子中去验证。在句子范围内，由于句法单位是确定的，它们之间具有可比性和可替换性，所以同位关系的描写还是比较容易的。一旦超出了句子，麻烦就来了。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想要确定话语中的超句子单位：段落、“过渡”(叙事、图表、对话等)、然后还有章节。然而对于这些单位，我们不可能从严格的意义上来使用替换法，所以，仅仅依靠以前的形式标准在这里就远远不够了。应该说这些超句子的单位也是内容单位，所以，我们想知道它们在语义赋值之后是否会呈现出新的特征，从而帮助我们确定一个连续的同位关系。

2 话语的元语言功能

a）扩展与定义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和一个新概念有很大关系，它就是“扩展”(expansion)。现代语言学不仅发现了扩展这一现象，而且还把它并入了自己的工具概念库。无论你用什么名称来称呼“扩展”现象，它所表达的意思没有区别：话语内部有等级，其中大单位包容小单位，但话语本身却又含有对这一等级现象的否定。也就是说，不同等级的单位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等值”的。

这一不同等级的单位之间的等值原则，一旦被应用于两种语言的比较（尤其是机器翻译，比如英语的 potato 和法语的 pomme de terre[土豆]就是等值的），便显示出熟语特征；如果把该原则应用在一门语言之内，它便能说明话语本身所具有的元语言功能。当然，元语言功能不可能强过语言功能。换个更幼稚的说法：这个原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两个简单的单词来叙说一件事或指示一个东西，也可以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说上一大堆话。一个词可以用一大段话来解释，一大段话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可以在一个词之后不断地增加别的词来修饰它，那是句法而不是扩展。扩展是话语本身固有的特征，只有当一个低一级的句法单位被认为和一个高一级的句法单

位是等值的时候，我们才能称其为扩展。从理论上讲，这个等值有可能随时出现——当然不总是以词汇的形式出现，它是一个可以用来定义话语元语言功能的结构性差异。

离开语言学的整体角度，仅取语义学角度，我们发现当扩展现象被局限在句成分的框架内时，当它没有溢出句子时，它在“话语定义”——我们这样称呼是为了避免任何误解——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事实上，词典中就常用一个或数个语段（其数量取决于该词有几个意思）来代替一个需要解释的词。这些语段和它们所解释的词是等值的，但前者的长度大于后者。在任何一本词典里我们都能找到许多运用等值功能系统的例子：

咬——“用牙切”

切——“接触一个（完整的）物体使其产生裂痕”

接触——“与某人或某物发生关系或挨在一起”（等等）

《通用词典》

定义部分的组成情况如下：

1. 扩展部分的句法功能和被扩展词位的句法功能一致（此处是我们预料之中的述谓结构）；

2. 左边的定义由两部分组成：一个与右边等值的词位，一个对这个词位作进一步规定的补充部分。

逻辑定义可以是规定性的内涵或者罗列性的外延，“话语定义”和逻辑性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也有比较接近的地方。另外，对逻辑性定义的要求是具有强制性和惟一性，而话语定义的特点却是自由性和相近性。话语定

义并不要求前后两部分的同一，仅仅要求它们相等，而且往往是临时的、短暂的相等。等值的基础是二者之间所共有的一个或某几个义素。

注：“等值”概念在语言学中十分常见，人们习以为常，于是忘了给定义。它的定义应属于认识论层面，我们在此也只能给出以上的初步描写。

如果说词典中的定义常常在模仿逻辑学定义，二者还似乎相当接近，那么在“交叉词填字游戏”（mots croisés）中出现的定义就不同了，从中我们更能看出什么是自然语言的“正常”扩展功能。下面是在《法兰西晚报》上随便摘的一个极为常见的“交叉词填字”题，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定义部分：

竞赛≃体育比赛
狗窝≃肮脏简陋的住所
芭蕾≃形象化的舞蹈
欲望≃并不是总能满足的意愿
海≃水域

右边的部分被认为和左边的等值，但却没有列出左边词位所含有的全部义素，只是涉及到其中的一部分。

b）压缩与命名

在上边这个“交叉词填字游戏”中，我们故意颠倒

了词项的顺序：填字游戏的设计者当然是先确定一个词再给出定义，但读者（即从接收者的角度出发）却是根据这些定义来寻找合适的词。这说明话语元语言功能中还有一个和扩展反向的功能，它就是“收缩”。收缩就是对被扩展了的信息进行解码，进行简述。人们常常会在听了某人的长篇大论之后概括说：“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您的意思是……”，这便是在压缩对方的话语。以上的扩展由于句子本身的限制大概不会太长（逻辑和科学的定义则不尽然），而收缩的极致则是“命名”。这只需去一个专门的商店里听一听就知道了，比如说一个五金店，顾客会十分随便地说：

我想买　　一个用来……的机器
　　　　　一个……的东西
　　　　　一个类似于……的玩意
　　　　　一个能够……的器械
　　　　　一个干……用的工具

而售货员推荐的商品名则可能与他的要求相符，也有可能是引导性的。

话语元语言的这一功能可以一直不断地循环下去，从一个层次跳到另一个层次，有如钟摆，不停地在扩展与收缩、定义与命名之间来回地摆动。如果语言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比如说其中的词位和义子完全同一，即一只“猫”永远只能被称作是一只“猫”，以上的元语言游戏就会失去平衡：就如在一个由N项元素所组成所规

定的系统中，假如 N 的数值相当大，那么定义所能具有的各种组合的可能性就会极大，但反过来的命名则不然，它将总是把我们引回到同样的项上。在所谓的索绪尔传统中，便有人设想出一个言语的自由来对抗语言的封闭。然而，语言并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定义和命名这两项活动在其中不分昼夜地变换着花样。

我们并不想在此描写这两项活动的形式和方式，也不打算介绍《论词汇的形成（或变化）》的缩写本，这本书要从基本概念开始彻底重写。对命名的分析决不能想当然地只依靠历时语言学，这大概就是它在今天无人问津的原因。我们必须考虑共时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的涉及面有多广，我们下面讲一讲它的主要形式：

1. 其中有一部分很好辨认，它们既是功能性的又具有形式上的特征。换句话说，它们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命名的。

(a) 派生词就是这一类。从广义上讲，派生词是一种分类系统，是简单命名系统活动的框架。可以说整个 18 世纪法国的技术词汇都是这样形成的：根据工作方式或工具的名称，在命名体系所提供的空位上派生出生产者、生产活动、生产过程、乃至生产地点的名称。杜博阿 (J. Dubois) 最近出了本书，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再赘言了。

(b) 偶尔的“借用”也是如此。不过以上道理更适用于西方各语种对希腊—拉丁语的系统的、普遍的借用。

希腊一拉丁语是整个西方文明的语言文化遗产，其词位的意义比较单纯，再加上科学语言定义的单义性，便成了用来建设现代科学术语的最佳材料。关于从组合名称过渡到派生名称的问题，杜博阿研究过。这个问题相当难，因为组合词根的义素内容比较简单，很难把它们和派生词区分开来。

2. 我们刚提到的名称的构形成分是可以切分的，在它们和使用别的构形成分的命名之间，还有一种特殊的命名方式：这是一种让名称等同于定义的方式，准确地说就是名称承担了定义的功能。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 plafond（天花板）、fer à cheval（马掌铁）、acide acétique（醋酸），虽然它们在横组合轴上的组合形式不尽相同，但解释方法基本一致。无论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素合为一个，以达到扩展核心形象的目的，还是在定位义素的构架中悬置数个义素（命名和定义的区别就是命名一定会省略掉某些义素），“话语定义”都会因此而变成命名，而新的名称又需要新的定义。

3. 利用现有的词位库（当然不是指那些语法化了的词汇，比如说那些派生成分）生成新的带有命名性质的交流单位，这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方法之一。

(a) 方法之一大概可以称之为“形象命名法”。大家知道，一个核心形象，比如说“头”这个义素核心，在法语中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名义素模型。作为原型，它拥有一个开放的派生类：大头针头、别针头、桅

杆头、烟囱头、钉锤头、蒜头、洋葱头、山头、船头等等。初看上去核心形象和派生词的运作方式完全一样，区别只有一个：其构形成分在句子中的行为方式。其实更深入一些，我们还会发现其义素的组织方式也不一样：如果说语法类派生词原则上由定位义素构成，形象类派生词则是一个从属于内容之符像层面的义素模型。

P. 吉罗关于“词法语义场”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开端，他把这类形象模型收集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来支持这个派生符像类的观点，我们对此不再赘言。

(b) 如果把形象命名法看作是派生现象，那么还有另一种命名法，它是一个话语单位的迁移，它让一个话语单位带着它所有的定位义素和核心特征一块从一个同位关系转移到另一个同位关系。从命名角度来看，它让人想起了“借用造词法”。

c) 转义命名法

在前边“交叉词填字游戏”的定义表中，我们有意少说了一个定义，它就是“念珠”，与其对应的名称是“念经”。这种命名方式所要求的条件显然和前边的不同。前边要求的是定义和名称之间的等值关系，例如“狗窝≃住所”，“芭蕾≃舞蹈”。从形式上来看，这一命名形式也无法归入以上所列举的任何一类。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一种内部的借用，是一个话语单位（词位或词组）从一个语义域向另一个较远的语义域的迁移。

转移命名法——这是我们选的名称——在所有命名中所占的比重不小，请浏览一下《理特雷词典》中关于“头”的词条：

狼头[1]≃一种羽毛掸子

土耳其头≃一种铁砧

黑鬼头≃一种颜色

头碰头≃一种茶具

此外，还有五十多种植物、贝壳、鱼类和鸟类的名称：

植物名：驴头（草）

鸡头（花）

贝壳名：蜘蛛头

蛇头（贝）

鱼名：虎头（鱼）

兔头（鱼）

蛇名：狗头（蛇）

黑头……

如果我们在逻辑上预设：“黑鬼头”说的首先应该是身体的一部分，然后才是“颜色”，那么，“转义命名法”这个称呼就很合适；可是换一个角度，与“形象命名法”相对立的“义子命名法”这个名称也未尝不可：“黑鬼头”是由两个义素核心（或者同一个扩展形象）所组成的词组，它尤其是一个由所有前边上下文分析所能分解出来的定位

① 靠左边的单词都是从法语“硬译”过来的。——译者注

义素所组成的词组。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它被用来指代某种深棕色或深灰色，这和“运河头”的命名法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必须确定“黑鬼头”指代颜色的条件，也就是它在元语言功能中被当作颜色等值物的条件，我们相信这必须到义子中而不是形象中去找。

注：区别形象命名法和转义命名法还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另一个次要的、但却曾让词源学家们头痛的问题：形象命名法是从具体到抽象，而转义命名法却也有可能从抽象到具体，如从“念经”到“念珠”。

你若是站在受话人而不是发话人的角度来处理话语元语言功能，解析接收到的文本，就会发现：

1. 义子一旦移进了新的上下文，就自动地接受新上下文中的新的定位义素（C_1s）；

2. 将被用来命名的原始义子重新组合其核心义素和定位义素，构成一个新形象，一个新的命名义子：（Ns+Cs）$=N_1s$。

由此，转义的命名义子便可以被表达为下式：

$$Sm(t) = (Ns+Cs)\,C_1s$$

注：有必要说明一下，被转移的义子的原始义素被放在括号中，因为它们会对以上机制生出较大干扰：元语言功能将仅仅使用其中的部分义素，剩

下的义素将被“悬置”起来。不过悬置不是取消，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会重现，否则话语的多线并行的功能就无法理解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是否存在着相当独立的语义域。转义的观点需要这种语义域的存在。看来我们只有对定位义素的性质和作用作更深入的思考，才能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

d）定位义素的双重功能

在前边的一个章节里，我们曾说定位义素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反复出现，另一个是它在横组合轴上的延伸。正是这一跨词位的延伸显示出了语义在话语中相对一致的线性特征。现在我们想强调话语的另一个特征，即由“扩展”和“收缩”这一松一紧所显示的“伸缩性”，这个“伸缩性”逐渐让我们看到定位义素的另一个功能，即给语义世界的组织结构提供框架的功能。大家知道，假若两个不同长度的话语段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个语义单位的定义和名称，那只能是因为二者共有相当数量的相同义素，由此我们便发现了一种具有新的分类功能的义素。

前不久在南锡中心开过一个关于同义词问题的研讨会，A. 马尔丹（A. Martin）在会上有个发言，他用“劳累”这个同义词场来说明同义问题，为我们说明以上的新功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劳累”这个词位在现代法语

中有五十多个同义词或准同义词，是分析的好材料。

e）形象名称的分析

经过对词位形象和上下文的初步分析，这个词位表上的词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次类：

“rompre”（折断）
- brisé（折了）
- rompu（断了）
- éreinté（伤了腰）
- échiné（脊椎断了）
- roué（被车轮压）
- esquinté（被弄伤）

不断反复
- “secouer”（摇晃）vanné（被颠簸）
- “frotter”（搓揉）lessivé（被搓洗）
- “broyer”（弄碎）
  - moulu（被磨碎）
  - broyé（被砸碎）

“vider”（掏空）
- vidé（被掏空）
- crevé（筋疲力尽）
- pompé（被吸干）
- épuisé（被榨干）
- époumoné（肺里没气了）
- claqué（象声词：爆裂的声音）

以上这个词位清单虽然被我们初步分了类，但也只能算是勉强地接近了我们的要求：这一研究的局限性不允许我们对每一个词位进行周遍性分析，虽说在理论上这样做

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要想真正做到全面，最后形成的词位清单应该是两个周遍性分析的结果：

1. 一方面，它预设了分布性分析，因为只有分布性分析才允许我们把这个清单看作是一个不变的（或数个互补的）上下文中的可相互替换的词类。分析的目的是提炼出其中的定位义素。我们知道，这些上下文中的义素和词位内部的义素结合成义子。没有它们，义子无法产生。具体到“劳累”的例子，比如说有下边这样一个上下文：

干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我觉得……

我们不难在其中找到两个为全部次类所共有的、并和上下文同位的定位义素：“有生命”（/“无生命”）和“受动”（/“施动”）。“有生命”这一义素在主语“我”和“工作”这两个单位中构成了冗余，所以不难辨认；“受动”则是由过去分词的形态变化和“……之后”这两个因素显示出来的。

注：对清单中的个别例子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比如crevé（筋疲力尽）之中就含有“动物”和“人类”两个定位义素的对立。

2. 另一方面，把以上清单中的词位再分成次类，这表明我们打算对每个词位的核心做单独的符像分析。这其中暗含了另一种形式的分布分析，即把允许这些词汇出现的每个上下文都看作是变量，然后从每个词汇中提

取一个不变的核心常量。一旦我们获得了这些核心，并对其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判断出这些词位的核心形象是否共有一到数个义素。为了让以上的词位清单更有条理些，我们把这些几乎是假设出来的共同义素写在旁边作为次类的名称：rompre（折断）和 vider（掏空）。它们似乎是许多形象所共有的东西，而另外一个义素——“反复”，在核心的整体形象中似乎是次要的。

4

然而，还是冒出了一个为各个次类所共有的义素，它是在我们用动词指示义素时出现的，尽管我们这样做完全是无意识的：此处所有词位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由于我们一时还找不到更恰当的义素来指示动词类，所以我们先谨慎一点，用传统上的习惯说法——“动程”(procès）来指示以上的动态形象特征。

f）转义名称的分析

于是我们有了三个定位义素：

动程＋有生命＋受动

它们将是清单中所有实例共享的定位义素基，除非你能找到相反的证据，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能引进一些新的次类并对其进行考察；这个基础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转义命名法。下面是关于“劳累”的几个新的说法：

（累）瘫了

趴下了

倒下了

垮了

它们构成一个新的转义命名的次类，不过，定位义素的定位机制在命名之前就已经启动，否则转义命名就不能成立。

在这个次类中，“受动”这一定位义素的作用特别令人注目。在前边的例子中，它以过去分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是定位义素的完美表征；而在此，它却成了整个次类中次要核心形象的共同定位因素。另外还有两个涉及范围更广的问题：

1. “受动”这个定位义素的特别之处让我们对定位义素基的内部结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中，“受动”在预设，而“动程”作为“施动”则处在被预设的地位。于是，那些用来命名的核心形象被这个定位义素集合在一起，预设了“动程”义素。在核心层还有一个与“动程”相对应的义素形象，义素“倒塌”是其特征（“累趴下”或“累瘫了”只会发生在由“倒塌”所预设的“动程”之后）。

2. 在最后这个次类中，定位义素“受动”所起的作用与“动程”在第一个次类中的作用差不多；二者均把分类因素引进符像领域，并给核心形象分类。

g）定义的分析

马尔丹的这个同义词清单很难用我们提供的方法来分析。虽然我们的分析方法用在某些定位义素上还比较顺利，但那不过是对已有结果的证实。无论是符像分析还是对义素核心的解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

方。我们当然可以去拉丁语中寻源，暂时忘掉历时性特征，“fatigare”（拉丁词：掏干、劳累、折磨）的原始义素核心相当能说明问题。这样做至少可以证明（虽然没有更多的例证），核心形象是常态的，它是历史的产物而并非像荣格及其追随者所说的那样是外在于历史的东西。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试试以下两种方法：

1. 如果描写的目的仅在于建立同位关系，进行义子分析，那么我们借助词典编撰中用同义词代替定义的方法就能大大压缩上述清单。例如，《通用词典》对词项的解释玩的就是这种小孩捉迷藏的游戏：

rendu≃“劳累、筋疲力尽”

fourbu≃“筋疲力尽”

recru≃“劳累得筋疲力尽”

在我们的研究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以上清单中的五个词位已缩减为两个：

劳累

筋疲力尽

2. 我们可以用一个新方法来描写这个新的次类，即通过分析一个命名的定义来确定这个命名。用这方法有可能获得双重收获：

(a) 定义和命名是两个不同长度的话语组合单位，它们共享某些义素，是等值的。我们认为通过分析定义能够了解命名中的义素（即使不是全部，至少

也是部分义素）的性质。对定位义素基的两种组织方式我们已有所了解，我们还知道命名和被命名的现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命名是抽象的，是没有符像内容的，所以以上定义分析的好处就在于它有可能揭示此类命名的核心形象。

(b）探究各项定义的必然结果就是它将扩大我们研究的领域，因为我们可以按等值原则把清单中所有词位可能带来的定义都列出来。

如果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技术难关的话，把等值原则使用在定义与被定义的关系上还有可能解决相当一部分在电脑资料处理上悬而未决的难题。我们还是举加尔丹（J. C. Gardin）提供的例子，例如我们可以事先对命名进行义素编码，在“禁止”的命名下放进所有类似于“因……而停止”的定义项。

再回到被我们压缩成两个词位的清单上来，下边的图式简洁地表述了以上的分析步骤：

名称：“劳累”

步骤	应用		
第一个定义	abattre（击倒）	由于→	支出体力
对第一个定义的分解定义	（通过一击或数击）使一个站着的人跌倒		“施动性活动”
义素等值	“倒塌”	“受动”	（“动程”+“有生命”）+“施动”

名称："筋疲力尽"

步骤	应用				
第一个定义	accabler（压倒）	由于→	劳累（同上图式）		
对上边定义的分解定义	在重压下倒下		使一个站着的人跌倒	由于→	支出体力
义素等值	"倒塌"	"受动"	"倒塌"	"受动"	（"动程"+"有生命"）+"施动"

注：此处直接引用了《通用词典》内容，所以分析的是动词不定式，不是分词形式。分词变化只会以冗余的形式更清楚地表现出"受动"的含义。

以上的取样分析不仅让我们找出了所有的定位义素，证明在话语中有以冗余形式存在的同位关系，而且还揭示出一个核心形象成分：倒塌。虽然两个例子的共同义素"倒塌"的出现可能是个偶然，但这种方法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发现核心内容的途径。

方法一旦确定，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于清单的其他成员。图表的形式还可以更精炼一些：

命名	定义		
halbrener	过了限度	由于→	劳累
surmener	过了限度……太快或者太长	由于→	（坐骑的）劳累，不让它停下
excéder	……到了限度之外		继续……
义素等价	"过量"	"受动"	"动程"+"有生命"

注：“受动”有时并不以独立的词位形式表现出来，它常常体现在过去分词所表现的被动态上。

除了一个“过量”的情态义素外，上表的分析并没有新东西。不过，这个义素是惟一能够揭示符像层参与了话语衔接的证据，它在义子中所占的位置无疑是核心形象的位置。

h）构造义子

仅就我们开始宣告的目的而言，对这个清单的分析确实冗长，不过这样做对后边有用，因为这个分析不仅给出了命名法的例子，确定了利用词位定义的条件，还显示出如何把一组同义词归纳为一个义子。为了与出现在实际话语中的义子相区别，我们把这个推理出来的义子叫做“构造义子”。

在建构语义学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方法论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构造义子”这个概念割断了内容描写与话语表征的最后联系，使前者得到了解脱。构造义子摆脱了词汇的外壳和上下文的纠缠，成为内容的单位。另外，有了构造义子的概念，定位义素和语义层面的双重功能就显得更加明确了。它们一方面建立了意义表征在横组合轴上的同位关系，另一方面还构成了意义世界借以分类的总的纵聚合框架。

下面的图表将更精确地描述出构造义子的内部衔接

方式：

在话语中的表现形式	构造义子	
命名	定位基	核心形象
定义	共同成分	专有成分
例：“劳累”的近义词系列	“动程”＋“有生命”＋“受动”	“折断” “掏空” “倒塌” “过量”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图，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命名的定位义素基就是定义中起概括作用的成分，它们构成了一些总体框架，框架可以容纳为数众多且长短不同的交流单位。有了这个基础，我们便能比较放心地对在元语言和语言之间穿梭往返的话语文本展开分析；

2. 构造义子只是部分地相当于实际义子。原则上讲，构造义子使用了所有的定位义素，但满足于最小量却已足够的义素；这儿的义素既是定义的专门成分又是核心形象的构件。就此我们还发现了语义分析的必经之路：它倾向于淡化符像实体，强化意义世界中定位成分的价值；

3. 符像成分的作用也因此而变得更清楚了：它们的作用就是利用每个类或次类中的专有成分，以及义子的每一次具体表征，尽量减低定位框架所具有的过高的抽象度。如果说，通过整体核心形象，我们达到了专门化、个别化的最高程度，获得了每一个义子的独一无二的特性，

那么我们在其中就已经发现了一些新的次序成分，它们表现为不同命名和不同定义的共同成分，并能形成核心组合。人们有可能想到一个新的分析形式，一个与修辞有关的分析形式：其目的在于建立符像同位关系和各种核心形象类。但此刻我们拒绝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只想知道是否能够对专有成分类进行抽象，给它们找一个共同的名字，因为是它们决定了对核心的选择。在构造义子中，这些初看如一团乱麻的专有成分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i）形象的同构

的确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个很特别的义素，我们把它看作是义素类别中的一组对立：

适意/难受

就拿“折断”、“掏空”、“倒塌”、“过量”（另见法语副词 trop[①]）来说，这些符像之所以能通过转义命名来丰富同义词义子系列的等值类，使得抽象定义具像化，是因为它们都让人感到“难受”。可以这样说，当人面对其中一个形象时，主观感觉中的固有感受便会与这些形象汇合，进入一个先验的二元机制，即感觉好或感觉坏。在认识论上如何表述姑且不论，我们先从现代法语中找一个与我们的义素核心相当接近的例子：

鼓气/泄气

① 表示“太、过多、过分”等，与英语的“too”同义。——译者注

二元的特点在此表现得极为明显。在定位机制的作用下，最后这两个义子与“劳累”（含有“难受”的义素）的内容不一样，但它们也是按“适意”/“难受”的方式衔接的。这种本体固有感觉的分类在微观意义世界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注：本分析只使用了清减法，并不完整；此定位义素基仅由一个义素“难受”来限定，可转译为“某一活动所导致的令人不高兴的结果”，若不考虑符像在其中所起的特有作用，我们无权说单独这一义素定位基就足以阐明作为整体的义子“劳累”。

3 同位关系成立的条件

a）间接定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寻找长度不同的话语单位之间的等值上。我们提供的方法和程序必须能应付诸多难题，如话语中存在着各种短语，以及各种婉转的、转弯抹角的说法，我们必须把它们都统一到一个意义的同位层面上来。不过，可能还有一些其它的扩展类型即定义的类型还没有探讨，在它们身上我们找不到或者很难找到等值关系。

1. 举个例子，属于众所周知的博虚埃（Bossuet）时

代的例子：

他	是	天上的主 地上所有帝国的创造者 集光荣、伟大与独立不羁于一身
惟有他	拥有	给所有国王立法的荣光 随心所欲地对他们严厉惩戒

这是个很标准的定义，很容易压缩成一个名：上帝。然而，这个压缩的前提是你必须具备有关基督教和王权的文化背景知识，一种在阅读这个定义前就已经存在的语义世界。不过，这并不是内容描写的正常条件，因为从分析方法的定义上来讲，我们不可能去考虑所有这些"先天"的知识。

不过这个定义本身也提供了另一些信息：

(a) 在左边，它提供了一些等值的"笼统称呼"："他"和"惟有他"，二者都带有"行动元"和"独特性"这两个定位义素，不过这两个称呼都过于笼统宽泛，我们不可能通过它们得到命名。

(b) 右边还有一些通过扩展而得到的定义成分，它利用一些形容词或修饰成分来限定笼统词。

由于定位义素基有所欠缺，我们只能用（或几乎只能用）一些专门成分来寻找和确定与其等值的命名。这

样的定义是一个间接定义，因为它预设了建立这种等值关系的可能性。

2. 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困难之所在。这是一个关于在“交叉词填字游戏”字格中填什么词的定义。关于文化背景，它没有作任何提示：

un coup de langue lui fait clore un bavardage parfois familier.

舌头的一动　让他停止（或关闭）了　有时是很随便的闲谈。

第一个问题：如何依靠以上定义找到那个浓缩了其含义的词汇来填空？如果猜不出，原因何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对定义做一个形式上的分解，下边是拆卸后的部件：

功能	F：使停止（关闭）
与	X：他（它）
	Y：有时是很随便的闲谈
3个行动元	Z：舌头的一动

(a)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定义的结构类型，我们再做一点转换。

以头词形式出现的“他”是一个具有等值性质的命名，也是一个笼统的成分，仅带有“行动元”的定位义素。由于：“使停止”带有“施动”义素，我们可以把X这个假受事者转换成“主语兼施事者”。于是有：

X停止（或关闭）Y

然而，“功能”F在此处由“施动”变成了“非施动”，所以行动元Z也有必要转换成“状态辅助元”，整个完整的句型应该这样的：

X借助Z停上（或关闭）Y

注：这并不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我们并不打算以它为依据去表述我们的转换规则。我们有意保留着该例的朴素形式。

如果以上的句子也算是定义的话，那么它就代表了一种新的间接定义：定位义素基的不足，这一回不是靠形容词或修饰成分来补充，而是靠述谓来具体化。

(b) 除了间接性外，以上定义还有一个特点：定义中没有一个成分是单义的，且不说X还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确定，Y、Z和F也都同时横跨在数个同位关系上。比如说“舌头的一动”和“有时是很随便的闲谈”就可以是一个扩展的词组，或一个转义的命名，甚至是一个第二级的定义。clore这个动词既可以表示使停止（止住闲谈）也可以表示关闭（闭嘴）。

这个定义的难解之处还体现在两个方面：

α) 定义所构成的上下文本身并不是同位的：如果把每一个构成成分取出来当作变量，剩下的成分就不可能被看作是不变量。识别定位义素一般得依靠定位义素的冗余，在此处却不可能。

β）其它确认等值的研究方法也都无用武之地。如果我们假设Z项是单义的，那么它就有可能被纳入以下定义：

X借助舌头的一动停止Y（有时是很随便的闲谈）

但这仍然是述谓，即间接定义形式。再假设在定义"有时是很随便的闲谈"的背后藏的是"一封信"，那么这个间接定义就是：

X借助舌头的一动封上（关闭）了这封信

我们大概猜中了谜底。

注：大概有人会说，这类定义仅见于"交叉词填字游戏"，它们太特殊了，不能代表话语的正常功能，研究从"定义"到"命名"的技术不应该用它们来做材料。但我们认为这个例子并不特殊，比如诗歌、神话和梦的微观宇宙就常常这样曲折地传达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敷衍过去。

"交叉词填字游戏"对以上的困难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它还提供了一个帮助读者更容易确定"命名"的辅助方法：既然"交叉词"游戏是在一些空格中一个一个地填上所需字母，那么周围已经存在的词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是它们决定了这个词的能指形式，而定义所决定的则是词的所指，前边博虚埃的描写所给出的也是所指层面上的东西。这种一个一个填写空格的方式非常

形象地说明了描写的关键步骤。

b）关于世界的知识

确认话语的同位比较困难，需要拥有广泛的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在遇到间接定义时这一需要则更是明显，这令人怀疑是不是有可能进行客观的语义分析。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和技术，我们根本无法给机器翻译配备这么一个大得无边的知识库，这一事实说明了描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析者的主观意识。有些专家，甚至最出色的专家——我们想到了巴尔-黑叶（Bar-Hillet）——，甚至断言：如果不在电脑的记忆库中装上整个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获得高质量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

在建立信息资料管理方面的人工语言体系时，人们

这一现象也可能是由话语本身的功能所引起的：它有时讲究明确、等值，有时又转弯抹角颇费周章。如果说义子的定义就是一簇义素，有可能再加上某些能改变其表达的符像，那么，其意义也同样是由它包含的所有可能的规定性所决定的。所谓规定性便是述谓，便是所有可能用来限定它和修饰它的动词和形容词。而以述谓的形式描写世界上的某个象征物，其形式又何止千万。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交叉词填字游戏”的定义：“和尼禄有关”，其答案可能是“暴君”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和尼禄有关的东西天知道有多少！

尤其是个人的一些关于某个具体事件的记忆，我们称之为“事件性定义”，其等值定义的曲折程度完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说纳瓦尔（Nerval）对一个地方的记忆是“葡萄蔓与玫瑰相连”，这是一种象征层面上的记忆，事件因此在他那里具有了“惟一性”，对这种“惟一性”的时间和地点他人往往一无所知，例如谁能猜出“今天在海德公园拿着鸵鸟蛋散步的”就是巴尔—黑叶而不是九百万个伦敦人中的另一个？

c）文本的封闭性

由此看来，话语的自动分析和内容描写是不可能的事了。幸亏定义不会真的像在谜语或“交叉词填字游戏”中那样就那么孤零零的一句，它们一般都嵌在一个文本中。文本中自然也有一些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但

也不能说完全是来无影去无踪。这里有一个弗洛伊德提供的俏皮话例子，它不仅明确地道出了分析的困难程度，而且还多少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一个马贩子向客户推荐一匹坐骑：

"您要是骑这匹马早上四点出发，六点半就能到培斯堡。"

"我六点半去培斯堡干嘛？"

在这个故事里，第二个直来直去的同位关系明显地预设了第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同位关系的存在。这也是诙谐游戏赖以产生的条件。每一个"智力中等并且受过教育"(Riffaterre 语)的听话者只要接收了这一游戏的形式规则，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现第一个同位关系的存在。其实，有许多与第一个同位关系有关的材料听话者并未掌握，比如说他可能不知道培斯堡是布拉迪斯拉发（捷克）的旧名，甚至这两个地名一个也没听说过；还有，以上的话是在什么地方说的，马贩子和客户又是谁，他肯定都不知道，因此他也不可能知道以上两地之间的距离。尽管如此，听话者还是能立即猜出两地之间的距离一定很远，一匹能在两个半小时内跑完这段距离的马一定很快。所有这些自然而然发生的知识在话语中并未出现，这就是说，它们不是来自于我们对事件细节的了解，请注意这一点，而是来自于整个上下文，来自上下文的一些简短提示："一个马贩子向客户推荐一匹坐骑……"上下文利用所含的信息总和，利用分号（[：]——句法标志，

在口语中则是一个较长的切分音位），预示了某些程度极高的或然性：

(a) 后边有话要说；

(b) 说话的是马贩子；

(c) 话题是坐骑；

(d) 述谓的内容应该是谈坐骑的某个优点。

由此可见，上下文中的同位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可能出现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只能在所有关于坐骑的褒扬词语的变量中去选一个。文中表现层面上的信息是“出发—到达”，也就是“行走”，它是赋予马的惟一的一个谓词。然后我们到马的具体优点中去挑选并确定一个与“行走”这个笼统词相关联的词，至此，这个述谓的意思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这匹马是一匹快马。”

现在我们大概较为了解认知行为的步骤了：它是推理性的（因为马快，跑的距离自然就远），所以可以免去关于事件的一些具体知识。这一现象对语义描写在方法论上的意义非常大：它把语义学从其最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它告诉我们应该先建立一个明确的同位关系，然后，在这个同位关系的基础上，想办法安置那些可能出现的千奇百怪的形象。

即使是关于某个事件的间接定义也可以被命名，只要它处在一个文本中，而文本的同位关系又相当紧密和绵长。也就是说，该同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如果出现一个偏离以上同位的新同位关系的框架，我们可以立即把它认出来。塔善·尤赛尔（Tahsin Yücel）在研究贝纳诺斯（Bernanos）小说的想像世界时发现，限定“死亡”或与“死亡”有关的词汇在小说故事的进程中渐渐减少，没用多久，这个系列的词汇清单就完全自我封闭了。我们也可以进行这么一个操作：尽管这些词汇在文本的许多地方显得重复和冗余，并有相互取代的倾向，但它们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上下文背景，并向读者揭示一些新的对“死亡”的命名，如“淤泥”、“忧愁”、“孤独”。各种保险系数更大的用来确定同位关系的方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

文本的同位性，以及它的自我封闭倾向，为我们发掘语义世界提供了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杜博阿（J. Dubois）关于失语症话语现象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在南锡应用语言学国际研讨会（1964）上，在谈到横组合多义性的问题时，杜博阿强调了文本所具有的这个特点：即文章越长，冗余现象越严重，引进的新信息也就越少；不过，由于作者偏爱的句子结构和词组的反复出现，文本也替自己建立起一个自足的“次编码”。

信息源的逐渐干涸导致了文本的封闭，也给文本打上了“个人习惯语”的烙印。实际上，文本中的命名是由文本中的定义所决定的，而且也只能由它们来决定，所以说文本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微观语义世界。话语的这一语义特征等于是在封闭的文本和封闭的意义世界之间建

立了一个等比公式，它给局部的语义分析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不过，如何描写一个新信息不断涌现的开放性语义世界，它没有提供现成的解决办法。

d）从个人文本到集体语料库

打上个人烙印的文本也是人类交流的一部分，而人类交流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社会性。我们现在应该拓宽研究的视野，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即某些个人文本完全可以构成一个语义学研究的语料库。挑选文本的标准是非语言性质的，它保证了文本的内在一致性，由此而构成的语料库将被我们看作是一个具有相当一致的同位关系的语料库。

为了讲清这种集体同位性，我们选了一个小型的语料库做例子，它们是普瓦提埃大学法文系大学生们对一次投射测验的反应，问题是斯坦恩（Stein）型的，仅给出一句话的开头，然后由学生补充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的命运是……

回答像是对"命运"的某种定义，可以根据定位义素分成下面几类：

好（10）/坏（11）

确定（9）/既非确定亦非不确定（4）/不确定（9）

注：其它的回答或者是事件性的，如：

教语文；

在法国生活；

或者是很“特别”的：

做个恶魔；

填写一些愚蠢的测验。

给它们分类很容易，不过，为了本章的清晰、我们不打算另生枝节。

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是夹在其他十五个问题中间提出来的，表达方式略有不同：

约翰觉得自己的未来……

学生的回答就更容易分类了：

好（12）/坏（25）

确定（9）/不确定（6）

注：对“确定”其实还可以一分为二：“由自己决定”/“由别人决定”。

有意思的是，“未来”和“命运”不同，没能引起“特别”的回答。

e）同位与变体

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收集了五十多个人的回答，汇集成一个集体语料库。通过这个例子，大家便知道什么是语料库的非语言一致性了：它们是一个集合，其共性就是这些被测试学生的共同点。他们属于同一个语言群体，同一个年龄阶层，还有相同的文化水平和相同的受

测试的处境。

从语言学角度看，促使我们将以上的定义看作是“同位关系”的，是含有“将来”和“判断”的定位义素。前者是从命名“命运”和“未来”中抽象出来的，后者则包含在谓词“是”和“觉得”中。再者，定位义素“将来”又提供了两个选项：“确定”/“不确定”；“判断”则引出了“好”/“坏”两种对立的回答。

在前边替“交叉词填字游戏”寻找答案时，我们的分析步骤是从定义到命名，现在恰好相反，从命名到定义。从什么开始这并不重要。假设“交叉词”的编写者也从命名到定义，他很容易就能造出同等数量的定义来：例如“可好可坏”、“常常是无法捉摸的”等，就是“命运”的几个标准的“交叉词填字游戏”定义。

由此可见，在一个集体的同位关系中，个体的一些变量构成了种种选择，它们之间的衔接是有等级的：

1. 在定位基内：

(a) 在以下的定位义素组中选择：

确定与不确定/好与坏

(b) 进入到以上选定的项中，再对其中的衔接项作进一步选择：

正/中性/负

2. 一个构造义子已经被赋予了一个或一组定位义素的特征，但其内部还有一个具体的义子待选，例如我

们要把“将来”确定成“坏”的，便可用以下的专有义子来进行具体表征：

不安的（15答）

一团糟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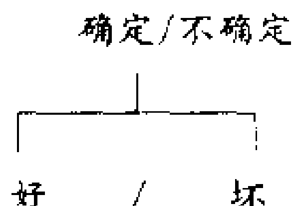
破碎的（1）

黑暗的（1）

没有欢乐的（1）

这个例子清楚地揭示了个人（或一部分人）的信息变量是如何与语料库中的严格的同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变量分布在我们已知的两个层面上：语义层和符像层。

1. 语义层的变量。在这个具体例子中，定位基似乎由两组互不相干的对立义素组成。就是说，它们在语义层面上似乎属于不同的定位体系。实际上，它们之间有等级关系，上一级对立是下一级对立的生成基础。比如，只有在“将来”已被确定和可以被确定时，人才有权说它“好”或“坏”。下边就是这种定位基的上下级结构：



这就让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文本同位的真正性质：它是一个时刻在左右着语义的定位基，它通过提供定位义素作为选项，促使我们在表征层面上选定其中的一个变量，这个选定的变量不仅不会破坏同位关系，反而进一

步确立它。

2. 符像层的变量。在文本的一个确定位置上到底表现哪一个义子，由入选的义素形象决定。形象的形成与本体感受有关，我们曾从一个形象类中提取过相同的义素，并且知道，要对内容做同位分析，我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越过符像的独特性。在此，符像变量又给我们出了个难题：是否存在着另一个同位，一个符像的同位？是否是它决定了文本中义素形象的选择机制？

4 话语的多义性

a）双重同位关系的表现

我们一直在千变万化的话语形式中寻找同位的踪迹，但我们决不能忘记人类交流的特点决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单义的和单线的，还是用前边那个例子：

警官的狗在狂吠。

一般来说，把这句话放在大一点的上下文中，我们总是能通过析分“动物”和“人类”这两个义素来判断“狂吠”的是狗还是警官的秘书。但也不能否认第三种可能性的存在：比如说有可能有这么一段不长不短的文本，作者故意把以上的析分悬置起来，就是不让你知道“吠”的到底是狗还是“狗奴才”。

这种故意制造的意义上的模棱两可会立即让人想起

果戈里的“鼻子”以及其他一些有名的例子，它是一个修辞手法，是作家追求的一种效果，同时也是自然语言的重要特征。请看下例：

这男人是一头狮子。

在一般的社会背景中，由于“人类”定位义素的反复出现，这句话是单义的，狮子不过是人的一个品质而已，其值为“勇敢”。但是，如果是一个“狮人”的社会，由于上下文中其它地方所出现的冗余义素，这句话反而会成为对狮、人双义等值的肯定，变成人、狮的共同参照。

你如果认为这类具有多义的话语只会出现在“初民”社会，那就错了。带有神话（虚构）成分的话语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比重不会太小，巴尔特便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吃的不仅是牛排和炸土豆，而且还是法兰西的特性）。日常的社会交流和“初民”话语虽然不同，但神话的无处不在却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表征层面上可能出现的多线性。

因此，在分析内容时，重要的是不抱成见地承认话语中有时候会出现多个同位关系共存的局面，然后是必须给予这种多义现象以结构解释。我们以为，当话语在表征层面上拒绝对一组和数组定位义素进行析分时，就会出现多义现象。照老习惯，我们还是借用最简单的例子来对以上现象进行定义：它是一组对立的定位义素的复合衔接（如“人类”和“动物”）在文本中的不规则显现，它时而选择对立组的正项，时而选择负项，时而属

于这个同位关系，时而属于那个同位关系，于是自身也构成了一个同位关系。如果一个文本符合上述条件，它就是一个复合同位。

b）文学象征的多义性

这种对相离义素的综合，是一个修辞方法，有时也是某些文学体裁的特征。如波德莱尔就曾这样说自己：

我是间枯萎玫瑰的闺房，
里头一大堆过时的时髦式样，
惟有布歇的苍白，粉画的哀悲，
散发着打开的香水瓶的气味。①

这就是在两个对立的义素项中建立等值关系，合二为一：

（内容）表／（内容）里

通过以上的形象转换，话语在一个双重的同位上展开，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从对身体的“闺房”的描写中提取那些相应的义素，用它们来保持和发展第二个同位，即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来的诗人的内在状态。

对更长一些的叙事性诗歌和散文来说，情形也一样。无论是维尼这个现代文学神话创造者的《摩西》还是加缪的《鼠疫》，在故事发展的某些地方，都会出现这种具有双值的复合衔接，迫使读者从多个层面上去阅读和领会文本。

---

① “忧郁之二”，《恶之花》，郭宏安译，漓江出版社，93页。——译者注

顺便再谈一个并不完全属于语言学的问题。无疑，波德莱尔不是“闺房”，兰波不是“醉舟”，正如辛巴武士不是狮子，疯人院的房客不是拿破仑一样。无意识的话语在运行中承载着社会和个人的神话。我们能很容易地把一个作家精心建造的双重同位与以上的日常话语对立起来，把文学当作是精神游戏，通过发明和揭示暗藏的同位关系让我们获得美学的享受。不错，有一些文学类型，有一些跨过了数个历史阶段的文字作品就很适合于这种解释。但我们还是要问，即使是在那些最简单的例子里，在对立的义素衔接已经得到了明确宣示、通往另一个同位关系的钥匙已经明确地给出时，在新的同位线上，会不会意想不到地出现一些新义素，让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困惑呢？如果不谈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区别，诗歌交流就是一种让作者和读者都会产生新奇感的交流。

c）双重同位以及它们的读法

无论话语的双重同位是说话者有意还是无意间造成的，对其表现出来的结构看来不会有什么影响。不过，着意追求这种双重同位关系有可能迫使作者添加一些人为的东西，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语言现象。

自官能心理学之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让人们习惯于在每一段话中都寻找两个层次上的东西：一个显意的，一个是隐意的。这一划分在话语的功能分析上并不适用。一方面，听话者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对他来说

所有的信息都在话语中得到了表现；另一方面，一切信息都是潜在的，因为所有的话语都是编码，对编码，受话人必须解码。

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为听者和说者所共有的自成一体的完整代码，现在大家放弃了这种观点，开始考察日常口语的交流，并发现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话语交流也是困难的和不完整的。所以，做梦的无法对自己的梦进行解码就不奇怪了。要想解释他的失败，不用“隐意”层次的概念也行。有不少语言学家至少在私下承认，读叶姆斯列夫的《语言学导论》就不断地遇到困难，很难说这是因为叶氏在文章中故意插进了另一层奥义。不管是哪种情况，困难都在于确认同位关系并将其一直保持下去。

如果大家觉得在术语中应该有两个相应的名字把以上两个缠绕在一起的同位关系区分开来，我们以为用“文本”和“元文本”较好，至少它们比显意层和隐意层要清楚一些。提出这两个概念仅仅是为了操作上的方便，所以其依据暂时只能说是感觉的，当然是指一般大众对交流的正确感觉。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梦作为文本对做梦人来说既是可读的也是古怪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透顶的。而梦作为元文本却是难解的，只有经过分析的阅读才有可能变成合乎情理的。比如下边这个文本：

忧郁的黑太阳

是可读的但也是荒诞的，它的另一层面——元文本，在

字面上读不出来但却不难领会。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炼金术士，或一个秘密会门的信徒，都会有这种不按常规阅读并颠倒一些定义项的习惯。只要我们用一个想像的阅读去取代一个理性的阅读，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以上二概念的可操作性。文本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它是一个语言存在，但阅读却是个人行为（个体变量），解码者的个性成了一个给文本定性的标准，这就是我们舍弃弗洛伊德关于显意和隐意划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进一步阐明话语本身的结构关系，我们建议从表征层面入手，根据展现在语言链上的定位义素的复合项来确定话语的双重同位关系。双重同位关系是一种可能出现的话语类型的形式特征，能起区别作用。如果我们单独地对每一个实现了的话语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够弄清其具有代表性的复合项的义素内容，定义出存在着的两个同位关系。例如，在前边那个“警官的狗”的例子中，定位义素“动物”让我们在文本中选取“正同位”，而定位义素“人类”却让我们在元文本中选取“负同位”。在每一个具体的话语中，“文本”和“元文本”都是完全可以确定的，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概念既能操作又不见得太抽象，也就是说，它们受读者对话语的主观感悟的控制。

经过以上的澄清，我们现在来设想双重同位关系的不同表征。大家知道，布龙达尔在设计语言基本体系时，除复合项外，他还提出了另外两个项：一个正复合项和一个负复合项。也就是说，同是两个对立义素的衔接，其

中一个义素有可能占统治地位。

到此，语义研究关于基本结构的互补衔接，关于正复合项和负复合项的设置，所有这些观点很难说已是不争之论。不过，引进它们却给我们认识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宽广的活动余地，比如说对拉康博士在心理分析上提出的“升华”（assomption）的观点——其重要性人人皆知，以上框架就给出一个语言学解释。总之，布龙达尔设计的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从结构上区分三种双重同位运作方式的可能性：

1. 双重同位中两个选项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说者和听者都完全接受了正负两个同位的立场。还是举辛巴武士的例子：

$$\frac{\text{男人}}{\text{狮子}} \simeq \frac{\text{正}}{\text{负}}$$

这是处于平衡状态的双重同位关系。

2. 正项占主导地位，交流双方完全接受了正项的立场，部分地接受了负项的立场：

$$\frac{\text{兰波}}{\text{醉舟}} \simeq \frac{\text{正}}{\text{负}}$$

此例中显示的是以正项为主的双重同位关系。

3. 负项占统治地位，交流双方完全接受了负项的立场，部分地接受了正项的立场：M. 杜邦先生以为自己是吊灯[①]的例子就是如此：

---

① 类似于“庄生梦蝶”，以为自己是蝴蝶而不是庄周。——译者注

$$\frac{\text{杜邦}}{\text{吊灯}} \simeq \frac{\text{正}}{\text{负}}$$

此例显然是以负项为主的双重同位关系。

注：这儿的"正"、"负"并不表示一种价值取向，例如大家也可以把正叫做负，把负叫做正。

多少读过一点布龙达尔的人都知道他对基本结构所赋予的厚望，他想靠这个结构建立一个包容所有自然语言的类型学。他的眼光盯得是整个语言体系，而不像我们，眼睛仅盯在话语的表征层面上。他认为基本结构反映了一个语言群体的意识形态，甚至说，"初民"语言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复合结构，而文明语的进步就是把这类复合结构改造成二元逻辑结构。试图用一个标准来定义所有的自然语言，忘了在每一个历史背景、语言群体中都可能出现某些特别的语言阶层，这未免有些过分简单化。毫无疑问，某些集体性的元语言的确有以上的特点，喜欢用复合结构：比如反义词的叠用、模糊的中介，这些都是列维—斯特劳斯曾明确指出过的特征。然而，在我们对随意选的一小部分法语语义形象进行了分析之后，我们却发现复合结构在任何一个意义世界中都有可能存在（例如现代的多值逻辑），不同的仅仅是各个语言群体对其利用的程度。

另外，选取单一同位关系还是双重同位关系取决于个体变量。对说话者而言，其同位关系的复杂度与其独

特人格的话语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听话者而言，道理也是一样：接收问题，就是他有没有能力同时把握两个层面、对两个信息进行解码的问题。下面是我个人的一次经历：我偶尔遇见了一位老朋友，他在一次局部脑溢血之后失去了领悟诗歌另一个同位上的含义的能力。但是，说起来很惨，他还清醒地记得有这么一个“元文本”存在，但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无法“抓”住它。他的例子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脑神经在理解语言时似乎确实拥有一个与双重同位相对应的机制，其中的两个层面既是共生的又是相对独立的，正是这个语言理解机制精确地规定了对义素的析分和综合。

语义世界的组织形式

1 意义的内在世界

a）双向认识途径

所有描写都具有元语言性质，整个语义学理论的建立也是如此。阐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首先以几个有限的概念为基础，建立起意义的最小单位（切分到极限的单位）。由此出发，我们观察了这些基本成分在两个层面（内在和表征）上的组接方式，并且尽可能地给出了考虑到这些更大的组合单位的新定义。

现在，我们的思考应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前边探索意义领域是自最小的单位出发，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意义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看能否找出一些新概念，一些与意义世界的衔接和切分紧密相关的概念。

两个步骤前后衔接，一个整合，一个切分。二步骤相互配合，便可能构成一个描写内容的完整理论。不过，到此为止，该理论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希望和想像之中：如

何对例证进行定域分析（analyse partielle[①]），以便证明或者推翻那些常常是带有假定性质的命题，这部分工作还暂告阙如。

b）归纳与演绎

在这一新的认识方向上，我们的第一个二分依然是语言的两个最基本层次。我们发现了两种义素：核心义素和定位义素，它们构成了两个层面，一是符像，一是语义。尽管我们使用了许多方法，但归根到底这个二分是归纳性的：定义二义素的依据是它们在话语中的表征方式。核心义素在表征层上形成义素形象，人们可以在句子的另一单位（词位）中找到它；定位义素则不然，它需要更大的句子成分作舞台，起码是两个词位的组合。两个程序，用于大小不同且层次不同的话语段，以达到提取两类义素的目的。

以上定义当然成立，但不够完整。首先，它用义素的表征方式来定义这个在表征前就存在的东西；其次，它是归纳性的，必然会受到描写的局限性和随机性的干扰，并因此而失效。也就是说，既然义子是核心义素和定位义素的明显结合，表征又是语言的符像和语义的综合，我们就无法回避前边的定义。在语言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必须老实交待构成这些定义的结构组，通过它们的先验

① 亦可译成“部分分析”，即在一个给定的范围、或特定的语料库中的分析。——译者注

特征来确保其建构基础。

问题提出后，我们发现：

符像/语义

是语言中两个相互区别的层面，在其地位和性质得到确认之前，我们至少在原则上得保证“语言”概念的基础，即内在和表征的对立，以及“层面”的概念。

在前几章，我们一直使用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即把语言看作是内在语言体系或外在语言行为。它们可以说是语言学的经典概念，用起来较方便，现在的问题是在建立语义学理论中如何继续借用和确定这个二分。

我们所有理论思考的中心都包含在这个天真的假设中：自最小的意义单位出发，我们就能一步步描写并组织起越来越大的意义集合。我们称最小的意义单位为义素，但义素本身并不是一个实体，只有在义素属于某个意义结构时，我们才能根据某些关系，即一些非义素的东西来想像和描写义素。

人的感知是意义的生存之地，那么义素也应包含在人的感知之中。在一个对立的义素组中，通过析分，义素展现自己；通过汇合到我们称之为义素基或义素形象的义素群中，义素得到确认。我们发现，借助于这两个符号集，义素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存在。

义素同时属于两个意义世界，从操作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内在世界”和“表征世界”。其实，它们不过是意义的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罢了。鉴于意义表

征的条件是它必须先被衔接成可析分的结构，又鉴于意义只有表征后才有可能被感知，我们说这两个意义世界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的。它们连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说的“语义世界”。现在，哲学界和文学界都滥用“语言”这个概念，使其变得相当含混，我们甚至认为可以用“语义世界”的概念来取代“语言”的概念。

经过以上的澄清，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语义世界，去寻找新的定义成分。

c）内在世界的经验方法

我们以为，义素作为意义的基本成分，必须是义素对立组的一员，必须串联成意义的基本结构。可以说这些义素对立组构成了一个集合，我们曾用“层面”这个概念强调该集合的二分性，即它可以被分成符像层和语义层。

“集合”这个说法在此并没有特殊含义，这当然也说明了我们在该领域的无知。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义素对立组是否全都组织在一个系统之中，也不知道这些义素系统是不是与人的感官（比如说符像层上的嗅觉、触觉等）一一对应，共生共存，更不知道所有这些感官类是不是就是包容所有系统的总系统。我们说义素的序列是一个系统集，又说符像层是一个义素序列集，借助于“序列”和“层面”这两个概念，我们指出了层面的概貌，并假设义素系统就存身在这些层面之中。其实，这一切

都有待于后边的义素分析，惟有义素分析能确定义素结构的衔接方式。

对于内在世界各层面的内部组织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法。借此机会我们还需要提醒语言学家对“集合”这个概念保持警惕，因为这个概念在当今的某些语言学研究领域里过分受宠。我们不否认其操作上的价值，但必须指出它在整个分析程序中只是一个临时的借用：例如清单的提法是它在术语中的一个变体，清单概念很有用，圈定了例句的范围，尔后我们有可能通过分析将其抽象成一个或数个系统。但我们若是把清单中的例子当作检验描写的最后标准，那则是十分危险的事。以上说法也适用于“具体结构”，在社会学中，有人喜欢用“具体结构”对“抽象结构”，“抽象结构”是系统性质的。

d）系统与词素[1]

我们还可以从认识论的高度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在“结构”概念形成的层面上引进几个经典逻辑的概念，如切分和列举。结构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一个可切分成义素的轴线，代表其内部组织关系特征的或者是反义（合取和析分）关系，或者是上下位关系。我们已知这些关系能够独立地表现自己，我们还把一种与上下位关系

---

[1] 词素（morphème），指语法的最小区别性单位。——译者注

相同但连接的却是异类义素对立组的关系分离出来，称其为上下级关系。

通过简述前边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两类结构：系统结构和词素结构。第一类结构从一个共同整合轴出发，仅仅由同质的义素衔接而成。所谓同质，就是说与一个义素对立组发生关系的或者是它内部的义素之一，或者是它的上位，即另一个更高一层的义素组——在这个组中，它变成了一个义素。第二类关系相反，在构成其意义的成分中，惟有共同整合轴和上下级的关系得到了保证，也就是说这些成分是异质的，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是把一个整体切分成数个部分，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则是在对一个类中的个体进行列举。

重新思考“内在”与“表征”，我们说所有的义素都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结构：系统结构和词素结构。

注：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系统是内在的，但却不能就此而断言系统的特征是内在的，“表征”永远是词素性的。我们将看到，行动元在句中的结构是系统在词素上的投射。反之，对于词素“身体”的常有的分类型用法（列维—斯特劳斯），我们反而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内在的模型。

有了以上的思考，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来定义内在世界的层次：在真正了解其组织结构之前，我们应将其

看作是由义素组和义素系统构成的词素结构。内在世界因此而被分成两个层面：符像和语义。两个层面的结构轴从整体上定义了各自的层面，且分别等于下边的元义素对立组中的一项：

外感受/内感受

2　意义的表征世界

a）内容

叶姆斯列夫把内容二分为形式与实体，是不是能把他的二分与我们关于符像层和语义层的二分对应起来呢？我们已做过此类尝试，并清醒地认识到它们的可操作性和相对性。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内容实体构成了这样一个“背景网”，少数几个“人类精神”所固有的对立组构成了网的纲，然后人们将感知外部世界的种种因素添加在这个网纲上以表达意义。这样一种世界观对于描写语言来说其实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愿说符像与语义这两个内在层面的结合构成了内容的表征。然而，若想表征得圆满，还必须跨过两个阶段，满足两个条件。

1. 两个层面必须结合，即在不同层面的最少量义素之间建立一个关系，把异质成分结合成一体。这个结合就是“表征”，它进一步限定了“表征”的意思：

2. 内容的结合还必须显现为表达，根据它们的相互预设，在表达层面上找到与其相应、平行但却不同结构的组合。表达的组合通过一连串“语义效果”表达出内容，这时便是意义表征的话语形式了。

注：内容层面上有一个形式与实体的结合，表达层面上也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类似的结合。我们觉得，要实现表达的这一结合，并不一定非发出声音不可，即使没有在听觉上产生“语义效果”，它也能很好地被作为“内心语言”来运用。

再分别考察意义表征所必需的两个条件。

1. 表达和内容两个层面同时衔接，于是形成最后成品——话语，这个同时性的衔接在理论上没有问题。至于说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哪些与语义学有关的结论，以后再论不迟。

2. 表征被定义为异质义素的结合，这就引出了一个大问题，即义素间的关系问题：

(a)符像层和语义层的结合确立了内容的表征，二层面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的关系。麻烦的是，在词汇中，已经有了一些讲关系的词，例如法语的连词 et 和 ou(和、或者)，比较副词 plus 和 moins（更多、更少），再加上定位义素所生产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词汇（连词、名词等），问题就变得格外复杂。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符像成

分在场，元义素和定位义素也能表征。我们得承认有两类表征单位：一类是由不同层面的义素所合成的义子，另一类是仅仅显示定位义素组合的元义子。

承认有两种结构的义子，不仅进一步证明了我们把义素一分为二的设想，而且还证明了这两种义素在表征的程序中互为前提的假设。义子是表征的最基本层面，相当于逻辑学家的“对象语言”。元义子则处于另一层面，它在预设义子的同时也预设了符像层。

我们说语义层和符像层在表征过程中互为前提，其实这也是建构意义基本层面的必要条件。其他一些处于第二位的层面有赖于基本层面的存在，可以拥有仅仅包含定位义素的组合。

(b) 处在同一个内在层次中的义素之间若要发生关系，这关系会是什么性质的呢？我们曾经分辨出了三种关系，三种关系之中似乎仅仅只有上下级关系可以用来解释义子的内部组织，定域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家知道，合取关系发生在义子和义子类之间，它在二者之间建立整体的或部分的等值关系，并能说明话语的元语言功能；析取关系也一样，应被排除在义子的描写工具之外；惟有对义素进行析分，才能说明两个义素组织完全一样的义子之间的意思区别。承认义子的内部有义素存在，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文本的义子分析，重新捡起我们以前拒绝过的词位分析法。词位是一个功能模型，不是内容描写的一个单位。

b）组合群

语义世界另外还有两个面貌，仅仅用“内在”和“表征”的对立还不足以完全解释。例如我们一旦不把表征看作话语，而把它看作是由语音或文字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就成了两个可比的模型，二者用不同的方式显示了同一现象。两个模型的内部机制完全不同，但它们同是交流的载体：内在世界借助于表征世界重塑自身，表征世界则以内在世界为依据。对应于内在世界的构造规则，必然有一套表征世界的生成规则。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内在世界看作是义素组的集合，那么表征世界就是它们衔接的组合群，如果说义素组的串联是系统性质的话，那义素衔接的组合就是词素性质的。

通过以上的层层限定，组合群的构造规则其实已经有了，现简述一下：

1. 义素组的集合被分为两个子集：由核心义素组成的子集 E 和由定位义素组成的子集 I；

2. 每个表征的单位最少由两个义素构成；

3. 表征出来的组合单位有两类，义子和元义子；

(a) 根据单独的子集 I 推导出来的组合群构成元义子的语料库；

(b) 同时使用子集 I 和子集 E 的组合群构成义子语料库。义子的构成方式如下：每个义子最少有两个元素

项，子集I和子集E各占一项。

4. 组成子集的义素组都是二元的，但在表征层面上，如果一个义素组实现了所有的可能衔接，就会让我们见到六个不同的项。因此，对应于内在世界的每一个义素组，表征层上有六个可能出现的义子。

c）战略选择

如果真要在内容分析实践中应用上述的语义世界概念，就必须先对符像层和语义层进行描写，哪怕是部分的描写。但这一预先的描写本身也有一个先决条件：首先我们得从战略上确定抽象的最佳深度。

通过前边的思考，我们发现，在建构义素的过程中描写的抽象程度是由语料库的内容决定的。和一般想法相反，语料库建得越大，从中提取出来的义素就会越抽象，当然义素的数量也就会越少。如果我们仅考察一种语言或这种语言的一个共时切面，义素组的数量就会相应地多一些；如果我们打算建一个内在世界，用它来说明数种语言和某种语言的多个历时性切面，那这里的义素组的数量就会相应地少一些，当然也不会少很多。

能否把义素描写抽象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同时（至少在理论上）解决各语言之间的可比性问题呢？这是所有应用语言学分支都极为关心的问题。如果说这样做有意义，那就必须考虑义子表征层面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内在世界是单纯的，与其相对应的是由义子的衔接所构

成的表征世界的复杂性：可用来组合的义素越少，每个义子的词形结构就越复杂、越繁多。

d）义子语料库的开放性

表征世界还有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即在任何一门语言中，实际上实现了的内容和可能实现的内容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即便是大约地估算一下，我们也能知道一个数量有限的义素集合能产生亿万个义子。所以，从理论上讲，没有一种语言能全部用完其义子的库存。它提供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了实际的需要，应该是预留给未来语言的发展的。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好，在有限数量的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历史的开放性（社会结构一定会进入历史时间）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不该有的矛盾，有了以上的说法，这一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总而言之，如果说语义世界的义素模型是封闭性的，其义子库却是相当开放的。

注：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所有的义子库都是不完整的，不可能收集到所有的义子，但这并不妨碍义素集合的规模，因为在组合群中实现的义子杂乱而没有规律，所以义素组的数量不可能因此而减少；恰恰相反，由于义子库的不全面，说不定我们得多设置一些义素组。

e）抽象的和具体的义子

义素组合成义子时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点就是其密度的不一致：实际上，组合群内不仅能生成以两个义素衔接为特征的义子，同样也能在一个义子的内部生成那些仅代表每个义素组的一个衔接的词项。义子中的密度在两极中游移，一级义素最少，仅有两个，另一级的义素数与用来描写该世界的义素组的数量相当。密度是一个量化的尺度，可以用来衡量义子的抽象或具体的水平。例如，如果撇开组成义子的符像和语义层面，义子“关系”或“速度”就是抽象的，而义子“雨”和“结构”则可以说是具体的。

我们之所以对测量义子的抽象度感兴趣，是因为不同的义素密度能反映话语进展的特征，我们可以直接从中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有人可能会说这仅仅是对话语功能的一个理论上的说法罢了，但我们很难想像一个边解码边理解义子的人可以一下子就领悟含有20多个义素的词素结构。抽象过程，就是受话人对传递过来的信息进行筛选，他仅择取对他理解话语所必须的那一部分。对我们而言，受话人的这一努力反映在话语功能的每一个层次上。在《语言基础》一书的头几页中，雅格布森正是用“抽象”这个概念（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解释了编码的经济功能，以及语音传递中的省略特征。

抽象无疑是内容的贫乏化，但这也是交流中所必须

付出的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传递意义的一致性。与其像某些“具像”哲学家们那样为这一现象感到伤心，我们还不如好好认识它，把它作为一个必要性接受下来，并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它为哲学——包括具像哲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无论带有抽象内容的义子已经表达为词汇，还是我们正在对其进行抽象，就是说我们悬置某些义素，对具有过大的规定性密度进行剥皮抽筋，这些并不重要。在研究构造义子时我们已经考察过义素简化问题，而抽象作为交流的一个基本特征，给义素简化法提供了合法的理据。在交流的动程中，构造义子的形成是对语言活动的一个模拟。

简化法的对立面是复杂化，复杂化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发现，在抽象化程度极高的语义微型世界中，比如说数学语言，其表征层面上就没有一个数量较大的词汇化了的义子群，所以数学语言的潜在含义无法直接用机器转换成话语操作，于是机器语言如 Algol 语言就只好被设计成二者间的过渡。俄国数学家们为了设计出一个适宜的处理资料的语言，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复杂化方法用在抽象的话语上就等于是一个元语言，有点类似于数理逻辑学家们所说的“语义”。

所以说，理论的构成既需要简化法也需要复杂化方法，它既不等于前者也不等于后者。

f）不兼容问题

由于以上原因，一门语言的组合群不可能用完它在理论上所拥有的所有可能性，其实，在这个运用上它还受另一种游戏规则的限制，即不兼容性。不兼容性排除掉了相当一部分义子的组合，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形式和实体。

1. 形式不兼容：大家记得，布龙达尔在测试他的语言基本系统中的六项组合时，想看看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结构，结果发现在一百四十四种从理论上来说有可能发生的组合模式中，只有六十四种是“兼容”的。这还只表明有多大数量的组合仅仅是由于不兼容而被排斥掉了。我们和布龙达尔的立足点不一样，我们所观察的不是内在性层面，而是这些结构在表征层面上的表现，因此暂时我们还很难设计出与“不兼容”有关的构造规则。我们只能先提示一下，并请大家记住，一个义子若想拥有某个义素组的中性项，就必须先拥有该义素组的中轴，将其作为自己的义素，否则这个义子就不可能被表征；同样，一个复合项的表征也预设了拥有单独的“正”或“负”项的义子的存在，等等。以上例子充分说明，不兼容性说的并不是某一个特殊的义子，而是它们的连接方式。

2. 实体不兼容：要确定这一点在经验上有些困难，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只有在做过义素描写、哪怕是部分义素描写之后，我们才可能对义素组合的“不合语法性”、“不合词法性”、当然首先是“不合语义性”进

行判断，并对上述问题进行描述。

3 话 语

a）词汇化和语法化

我们已经把表征和话语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在内在世界自我实现的进程中，有两个可以辨别出来的阶段与之相对应：义素表征为义子，陪伴它的过程则是义子"进入话语"，在此过程中义子将与表达层的相应义素衔接相结合。

我们想给这个过程取名为"词汇化"，如果我们还能像不少语言学家所坚持的那样认为语言的正常状况就是两个层面的结合，即构形成分（音位的组合）和义子（义素的组合）的结合，那就太方便了，可惜实情并非如此。例如，对语言编码的现代描写方法就不得不把分析分解为一连串子程序，程序小且复杂，这让我们对话语编码的复杂程度有了一个起码的了解。

1. 在最好的情况下，构形成分所覆盖的不是义子，而仅仅是义子的义素核心。通过它与其他类似的构形成分的对立，构形成分保证了义子的"否定义"，并间接地保证了义子的形象特征。有时当然也会出现一种现象，它一般出现在元义子和具有分类作用的义子身上：一个单义的词位与其所覆盖的义子相当接近，但即使在这种情

况下，这个义子所具有的分类成分也还是会溢出该词位的疆界。

2. 大家知道，与定位义素结合的是比词位大的句子成分。要想认出这些定位义素，我们必须依赖相邻的不同的词位构形，而这些词位构形则可以精简为几个构形成分类。我们不应该把词汇化理解为义子变词位，而应将其理解为词汇的再次转化，即人们所说的“词汇转换为上下文”。

3. 最后，义子在实现过程中还有可能一次结合好几个词位，这或者是由于其核心形象的扩展，或者是由于它通过不同命名和不同定义在进行表征。于是，词汇化过程和语法化过程混在一起。词汇化和语法化是两个操作术语，表面上看容易掌握，理论上也不难区别，但在生成话语的交流过程中，二者的用法则常常纠缠不清。

b）表达的差异和内容的同一

表征的单位与交流的单位不同构，这就提出了一个老问题：同义问题。只要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体系，而符号——即我们术语中的词位——是一个构形成分和一个义子的结合，问题似乎就很简单：从理论上讲，一切构形上的差异都必将引起一个意义上的差异，同义不可能存在。

在词形研究领域，这个过于绝对、或者多少有些问题的原则开始动摇了。在分析词形类时，人们发现有些

不同的标记（例如法语的复数形式 s 和 x）所表达的内容是同一的，这个同一的条件是：它们的上下文不一样。

因此，只要一个标记在两个不同的结构层次上出现过两次，比如说先表现为音位间的对立，然后又表现为音位组之间的对立，那么前一个区别性特征所生的语义效果就会被第二个起区别作用的差异给抹去。因此，在某些条件下，两个组合在一起的标记可以相互抵消：

$$x+(-x)=0$$

于是表达层上的一个冗余的变体就失去了产生意义差异的作用。同义也就成为可能。

我们发现，对能指的形态差异所做的这种分析使我们在内容的分析上获得了某种可贵的自由。不过有个条件，我们必须把能指的各种不同的衔接方式摆在两个层次上来考察：一个是语言层次，另一个是元语言层次。我们还可以在不过分背离结构语言学基本概念的情况下支持以下观点：即逻辑定义与被定义项的同一。坚持同义的不可能，便是坚持能指的差异是意义产生的根由，这也是一个逻辑的必然，但是，在元语言活动中，这一观点并非无法消化。元语言就是在多样的衔接中寻找同一，这也是使语义世界有序化的必要条件。

能难者便能易。既然我们有权说义子的同一是可能的，那么，义子的等价——即不同的义子共有某些相同的义素——的条件也就容易确定了。由此，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方法，一个能验证从上下文词汇中提取到的定位

义素的方法。交流单位被我们一分为二，一边是词位，我们将提取其核心，另一边是一个与该词位相兼容的上下文。如果我们认为这种上下文的子类共享同一个定位义素，那我们就是在表达善变的表象之后看到了内容的某种稳定常态，并要求在能指的差异中发掘出义素的同一。这个想法若想成立，我们就需要另一个层次上所出现的第二个差异，依靠它消灭前一个差异所生的意义。这另一个层次指的是整个交流层面，而不仅仅是由某些上下文变量所构成的子类。这个整体有两个构形成分：一个是单词的语音外壳，另一个是上下文构形成分的封闭的子类。我们认为，能指差异的创义功能就是这两个相互区别、定义清楚的构形成分相结合的结果。例如用一个词位去取代另一个词位（条件是它们属于同一个可替换类），就必将产生一个意义上的差异。

在此，我们有两个能指的差异，两个标记，它们的效果相互抵消。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选定的上下文子类，先定的义素同一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局限在表达层面上的分析对了解我们所希望存在的这种定位义素的内容没有什么帮助，甚至不允许我们说法语中的 s 和 x 都是复数形式。持形式主义立场的语言学家们做的正是语义学的工作，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确认内容层上同一的存在，便产生了以上的种种很难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曲折，可能有人会觉得没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在语言研究

中引进同一性的好机会。因为自索绪尔发表了那些著名论断之后，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全放在了差异性上，而缺了同一性原则，一切内容的分析就只能是空谈。我们要指出，内容层面的同一形式是多样的，表达层面上并没有什么与之完全不相容的东西。于是，“等值”的观点变得更加坚挺有力，它的定义就是部分义素的同一，它解释了话语的元语言功能，使语义描写获得了合法性。

c）交流

前边说过，词汇化现象和语法化现象紧密相连。话语不仅是意义的表征之地，同时也是它的传递方式。对表征的研究揭示出交流成功所必须的机制，其本质特征就是重复。我们还观察到某些定位义素如何散铺在面上，以便构成话语的同位层。关于义素如何借助冗余现象跨距离建立联系，我们也有所见识。

由此，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为了保证交流的进行，为了完成那个被雅格布森所阐明的“寒暄功能”，某些内容的成分会被牺牲掉。寒暄功能从整体上来讲其实就是语法性质的功能。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组织起第二套语法系统就能把话语表征的意义从传递交流的繁务中解脱出来，至少是部分地解脱出来。要组成这第二套系统，我们必须先在一门自然语言的义素组中进行挑选，不过现时挑选的标准还不够明确，而且这第二套系统的运行方式也十分特别，

其特点就是大量的冗余。

相对于内容表征系统，我们把语法结构看作是第二套系统，这并不是说它已自成一体，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内在层面：构成它的义素组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义子中，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反之，在表征层面上这个体系倒是相对独立的。在表征层上，我们可以见到一些构形独特、义素密度较小的义子，它们形成了一个语法形态词的系列，具有迁移作用。这个从泰聂尔（Tesnière）处借来的迁移观点恰到好处地解释了语法形态词所扮演的角色，它们负责处理词位，将其看成语言子系统中的一个项，一个传送的对象，有如足球运动员传球，不过其传球的方法是语法形式的冗余，通过一次次重复把球往前递，直至最终目标——受话者。如果意义功能和交流功能能够清楚地分离开，那表征层上的这一语法特性就是一个极好的东西。无论他人怎么说，我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交流结构表达意义，意义结构也在调整着自己便于交流，所以整个话语过程充满了扭曲。

这样理解语法结构，它就是一个双重的冗余。首先是形态类型的重复，为了保证同位关系而产生的语法类别的反复出现，它在话语中成扇形向前展开；然后是一些相同的基本图式的重现，信息就揉在图式之中。

然而，语法结构也是一个表意结构，它在运行中还能创造出另一种类型的冗余。说它冗余是因为在词位和迁移成分中存在着相同的义素（例如包含在词根和词形

曲折变化中的语态和语体的变化），而且还有某些“标记”在重新确定语法的类别，语法结构的派生体系则重新拾起定位义素，用它们来定义那些已经在位的语法类（例如那些把动词变为名词的尾缀）。这种冗余可以说是人类为时刻倾听世界信息而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于是，清除这些过滥的冗余就成了内容分析的首要任务。这任务相当棘手，最忌走极端，既不能过分简单化，也不能太复杂化。所以，为了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首先得从战略上解决最佳描写程度的问题。

d）信息的组织方式

仅用几行字来简述语法结构的功能和存在方式是不严肃的，所以，我们决不敢说自己已经客观地把握了复杂的语法现实。我们只不过是向这个问题投去了困惑的一眼。作为语义学家，为了更好地观察被编码在语法中的意义的运作，我们在寻找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以便砸烂语法这个巴罗克建筑。

由此看来，句法建设倒有点像是一个没有规划和明确目标的东西，一个楼层和平台不分的建筑：派生词处理的是词根类，句法“功能成分”则把语法类加以改造，让它们扮演与自己并不相宜的角色；一个个完整的句子则被掐头去尾，成为副词的同类。分析者的任务就是通过以上无数个转移找出话语的主线，把多层关系清减为一个交流的同位层面。

尽管表面上像个破烂摊，但句法却承担了一项极重要的功能。它从构成成分也就是从义子中又弄出一个组合群，新的组合群生产着信息，能造出无穷个讲述世界的语句。在给出了组合群的成分之后，句法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贡献则是提供了一批数量不大的造句规则。有了这些规则，义子就能在一个个基本句法图式中安身立命。句法的游戏就是用千千万万个例子来上演同一幕话剧：这话剧有发展动程，有几个演员和一个具体程度各不相同的情景。句法还可能是一片障眼叶，并不能反映世间万物的真实面貌，不过这没办法，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符号的象征体系来观察世界和组织世界，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惟一方法，世界就是这样被我们用句法规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对分析者来说，问题是如何建造自己的语义学句法。该句法将用不变量的形式反映句法游戏的整体情况。当然，句法游戏中有很多变量，而且在每个语言层次上都有。该句法还必须是语义的，它不会对无意义的形式进行操作，后者只不过是某些数理逻辑学家的幻想。我们永远地被关闭在语义世界里，而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真正弄明白所谓世界观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其实就是意义和产生意义的条件。

语义学句法内在于语言活动。只要内容是信息，是对世界的言说，是关于内在或外在世界中的事件的叙述，建立内容描写模型的惟一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循序渐进的

句法解释。我们现在就可以给该句法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1. 语言活动制造信息的过程似乎就是把几个义子——功能词、行动元、状态元——放进一个上下级关系框架的过程，所以它构成的基础是单词内的语法词素，就像一个算法，展示了一个系列的信息。不过，还有一个系统结构与这个上下级结构重叠，那就是给各行动元分配角色的系统结构，它提供的信息就好比是一个客观化投射，一个对世界的模拟，而交流中的发话人和受话人都将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

2. 元语言活动似乎是对等值关系的寻找和建设，所以它更像是合取关系的表征。借助于等值关系，也就是某些义素的同一关系，它提供了关于世界的补充信息。于是这些曾是冗余的补充信息摇身一变，依靠新的规定和定义为建造对象语言服务。元语言活动的手段是系统的，所以它必然导致对象的创立。而这些对象，说到底，就是一些词素结构。

由此看来，制约我们句法活动的图式很像是一些提供给我们的内在模型，我们用它们来设计和组织内容，而内容的首选形式是义子。

意义的描写

1　表征与话语

a）表征世界的二分

在上一章，我们给语义世界构思了一个总体框架，先后把语义世界看作是不同的东西：它首先是一个潜在世界，继而是一个表征的组合群，最后才是话语，结果我们发现话语的表征也应该被阐释为一个可以生成信息的第二等的组合群。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意义组织的这一侧面。

首先，有必要在表征层面引进与语义世界相同的二分，即我们在内在世界内部所作的划分：外感受/内感受。不过，这两个二分的方式并不相同。

给予这个二分组以元义素的地位，我们就能根据义素那猜想中的本源来对义素进行分类，在内在世界中分辨出两个义素层次。可是，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义子的分类而非义素的分类，我们就不能再把以上的二分组看作是元义素了：由于这个二分组把表征组织成义子，所以

二分组中所使用的词项只能是定位义素。

定位义素组既然被用来区分表征的两个基本向度，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它就具有普遍意义。如果说每个义子为了表征都需要至少一个定位义素，那么这个定位义素就一定是基本对立组中的 I 或 E 项。

这样一来，我们使用的虽是同一个义素组，但每次使用它时其地位却不尽相同，于是我们得到了两个不同的分类，两个分类既不是平行的，也不是相矛盾的。举一个例子：义素“沉重”——假定它是一个单纯义素——在内在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核心义素，也就是说它属于由子集 E 定义的符像层，但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的意思不同：

沉重的袋子

沉重的心情

“沉重”核心义素在头一例中与 E 类定位义素结合，在第二例中与 I 类定位义素结合。

如果使用昂柏尔（Ampère）用过的术语，我们可以把一个拥有 E 类定位义素的同位层或者义子清单叫做宇宙物质向度，同理，把一个拥有 I 类定位义素的同位层或义子单叫做精神向度。

所有的描写都必须针对内容的一个向度，不是物质向度就是精神向度。一个对物质向度的完整的描写应能囊括所有我们关于外部物质世界的知识；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对精神向度的完整的描写应能说明我们整个内

部的精神世界。但是，由于语义世界无限大，无论是物质向度还是精神向度，其表征都只能是部分的，有关它的描写就更是部分的了。我们认为语义世界可以被分成数个微型世界，而与这些微型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用于描写的语料库的大小则是有限的。物质向度的部分表征将被我们称之为“实用表征”，精神向度的部分表征将被我们称之为“神话（虚构）表征”。另外，在选择用于描写的语料库时我们必须假设一个个体的或者集体的发话者。部分表征也将如此，它时而是个人性质的，时而是集体性质的。

b）基础同位

粗看上去，在表征层中新增加的这个二分只会把问题搅得更复杂。话语本身就已经够复杂了：多义词引起含糊，语法结构造出种种交叉和重叠，使得话语充满了时而是“实用”、时而是“虚构”的片断，像是一串无序的组合。

实际上，以上的独立向度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基本同位，根据基本同位，我们能确定一些次等同位，并据此判断微型世界的实用或虚构表征。比如说，前置词、副词等词汇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拓扑系统，它组织着向度的各个不同的指别轴，仅仅借助于义素组词项的变换，它便能改变主题，形成一个“象征”域（我们关于层面、向度和同位的思考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c）句法组合群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思考的是如何把表征层定义为一个义子组合群的问题，把如何对其边界进行界定的问题放在一边。仅仅把语言活动狭义地看作是展开的各种上下级关系，我们便找不到任何可以确定义子间边界的标准。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由于核心形象可以扩展，使得核心形象很容易越出词位给它们划定的“自然”疆界（例：河流源头）；其后我们又把重点放在命名和定义的等值上，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个比较稳固的测量基础，即根据词位来确定义素核心。

提出表征层单位的边界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在换一种方式重新捡起话语现实化这个老问题，即话语如何建构物体世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语言学家们相当怀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有道理的。把义子定义为表征单位，就是新建一个句法基础，而表征单位就是句法中可用来组合的单位。

不过，断言这种特殊义子是一个单位，这并不仅仅是给它添加了一个定位义素，即“单位”；定位义素“单位”把义子这样一个层层叠叠的义素结构改造成一个词素结构，使它拥有了一个可以作为整体来感知的公共轴，并进一步使义子成为一个独立类，就是说，一个包括所有表征义子的语料库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类别：义子类。

所以，我们说整个表征世界可以用义素组“整体”来定义，受布龙达尔的启发，我们可以把这个义素组设计

成下边的衔接：

可分解/可整合

在表征时，人们只取其中的一个项。两个项把表征世界分成两个子类，前者说的是可分离的单位，后者说它们可以被整合为一体。取表征的各种实例，我们发现，所有含有“可分解”定位义素的义子都可以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处理，因此产出一个“本体”的“意义”。有了新添加的定位义素作规定，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样“东西”，一个“人”，一幅“画”，或一个“象征”。反过来，所有含有“可整合”定位义素的义子则被看作是一个整合了多个义素规定的集合。

语义世界表现为义子形式。假如把它当作一个含有多个子类的总类，那么它就是一个内在的句法世界，能够生成句法表征层上更大的单位。我们提议用“行动元”来命名可分解成一个个独立单位的义子，用“述谓”来命名那类起整合作用的义子。一个述谓和至少是一个行动元的结合便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单位，对这个单位我们也可以取个名字，就叫它“信息”(若有必要，我们在提到它时还可以更精确一点，叫它“语义信息”)。

组织成信息的句法表征层很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新组合群，现在我们来确定它的组建规则。粗看上去，信息的运作方法是先设定一些可分解的物体，然后再提供有关这些物体的信息。提供信息的方式是通过一些多少能起整合作用的规定，这些规定必须能用于物体。这是

传统逻辑的观点，这也是我们接触到句子时会立即产生的感觉，是句法功能的表征。然而，一旦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一个信息，而是对串在一起的一组信息的意义发问，我们就会发现，在一个语料库内的句法活动也就是根据有关世界的状态和事件的语言知识来对物体进行设定。所以我们说，在整个语义世界中，述谓先验地预设了行动元的存在，但在微观世界的内部，一个完整的述谓清单则后天地构成了行动元。

如果把句法表征说得再复杂一点，我们就得对述谓再分类，设定一个新的定位义素组，即“静态”义素和“动态”义素所构成的对立。述谓义子能够提供关于行动元的静态或动程的信息，所以，在语法化之前，在实现为话语之时，述谓义子就已经做出了选择，例如 aller（去）这个词位就含有以上二义：

Cette robe lui *va* bien.（这裙子她穿很合身。）

Cet enfant *va* à l'école.（这孩子上学。）

在前一句中它含有静态定位义素，在后一句中它含有动态定位义素。

我们将用“功能词”来指“动态”述谓，用“品质词”来指“静态”述谓，而作为义子组合群的信息则必定带有一个功能词或一个品质词，外加几个数量有限的行动元，信息的全体构成了意义的句法表征。

注：行动元之间的衔接方式极为复杂，后边将

专门论述。

d）编造与罗列

通过设计以上这些与表征组织有关的概念，我们已经窥见了几个初步的描写步骤：选择用于描写的“实用”或“虚构”同位，确定义子的边界，组建信息。无疑，这个语义的解码必将导致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对动态信息和静态信息进行二分。于是，一个文本的同位便表现为两种信息的并存。

功能述谓在意义组织中引进了动态向度，使微观语义世界显得像是一个一连串的变化，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行动元。不过，如果我们撇开命令式和呼唤式（因为它们可能是人用语言行为左右世界的工具）不谈，功能述谓便只不过是一个对行为的模拟，对人间事件的叙述。对这些叙述我们现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它们的演进是否有逻辑，我们只能把它们看作是编造。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对物质向度的同位的解码而获得的动态信息清单构成了一个“实用编造”；反之，如果这一用来建造信息的同位是精神的，那么该信息清单就是“神话编造”。

至于以品质词义子为特征的信息清单，在它预设的微型世界中，似乎就是一个由习惯和常态所形成的集合。这类信息的功能就是通过连续的限定来增大其所参照的行动元的存在。这个静态的清单中装的其实就是我们对比较熟悉的人和事的一些片断描述，如果我们建议给它

取名为“罗列”，想来大家也不会太惊讶。与陈述一样，根据所选同位的不同，罗列也可以是“实用”的或“神话”的。

综上所述，无论句法表征被看作是编造性的还是罗列性的，它的信息单位都是一些定形的图式，图式中倾入了我们关于行动元即“象征物体”的行为和存在方式的知识。

2 话语表征

a）组织的实用基础

只要观察一下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编造”，我们就能发现几个主要线索，话语意义的组织就是根据它们在进行操作。如果说在语言层面上有一系列的功能词对应于一系列实际生活中的行为，那么这些功能词便是在模拟这些行为，与之构成平行关系，它们内含了某种非语言性质的做一件事的“做”字。一个单一的义子，例如“刺绣”，就可被归入一个功能算式，作为某种“实用知识”的命名出现。在另一领域，比如说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式的神话“罗列”，其引导者是一个希腊专有名称，对我们来说这个名称没有意义，但名称后边跟着一串串有序的品质的总和却有能力生成一个“性格”。依靠一串功能词或者一串品质词，话语表征便成功地生产出

一个个有组织的集合。这些集合不仅大大地超出了句法所强加的限制，而且，由于它们各自都可能被概括在一个命名之下，它们也就以整体即结构的方式出现，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些结构是词素性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们是系统性的。

不管这种结构早已被命名（刺绣）还是在话语段表征时才被命名（依菲斯①），正如命名所提供的可能性一样，它们仍然可以是隐性的。在话语表征中，我们暂时只需要记录下这些语义世界的组织成分，并记住它们以命名为特征，属于意义的元语言功能，所以它们是或者可以是被话语预设的成分。由此还出现了一个原则，内在于我们所说的“编造”和“罗列”：话语表征由信息单位构成，在这个层面上，应该也有一个内在世界，控制表征的模型就含在这个内在世界中，我们语义学描写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些模型。

b）话语表征的出现方式

一般来说，第一眼看上去话语表征的特点有二：一是各种组织模型的出现方式不同，二是这些模型的解释深度也不一样。

1. 在好的情况下，“编造”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算法，一个实用或神话的知识的算法，“罗列”表现为分类术语，

① 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485？—406年）剧中的人物。——译者注

是有组织的实用或神话的知识的结果。

2. 在多数情况下，编造以省略的方式表征，仅仅提供一些关于技术或神话的不完全的算法片断；“罗列”则常常是曲言的，表现形式是不完整的分类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描写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分类系统汇集综合到一个个模型中，用模型来说明所有这些不完整的表征。

3. 在一个实用的表征中，编造和罗列一样，都可能表现为具有神话特征的独立信息形式，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者说在实用表征中出现了“散状神话”，或者说在神话表征中出现了“散状实用”。

在此，我们又一次发现话语的平衡是不大稳定的。在双重同位的运作中，每个信息既可以被读成是实用的，也可以被读成是神话的；其实这仅仅是它运作的方式之一。不错，这类情况在某类虚构作品中十分常见，例如民间童话，但在更多情况下，复杂表征是不平衡的：它或者为“正”，或者为“负”。所以，在日常交流中，神话只会以散状的形式表征，占第一位的总是对实用的专注。反之，在梦和诗歌中，实用受到过分发展的神话的挤压，只好满足于散状的表征（如弗洛伊德设想的次要表征）。

有人把表征的不足怪罪于模型的缺乏，这是不对的。部分的表征，无论是省略的还是曲言的，也需要完整的模型。在下文我们将有机会举例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作为个体的或集体的发话者偏爱某种模型，出现哪一种表现方式与他们的偏爱有关。不

过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最后，尽管这不言自明，我们还是想提示一下：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是一个宽泛的分法，其实，实用或神话的话语表征还可以分成许多个表征的微观世界。为在操作上谨慎起见，我们必须预先设防：由于在一个文本中我们有可能同时使用多种技术和多种分类法，所以根据所谓实用交流中的散状神话来创建一个能承担运作功能的惟一模型是不可取的。

c）语义微观世界

在更进一步深入话语表征层之前，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已有的成果。前边所进行的关于语义世界的描写让我们明白了可以用两个抽象的模型来阐释它，第一个解释它的内容，第二个阐述表征内容的组织方式。

1. 内在世界：这是我们给第一个模型取的名字，它的设立是为了阐明表征世界。我们在前边仅仅提出了它的公设，其义素衔接还有待于描写。根据其存在方式，表征出来的内容是一个义子组合群；根据其表象，它构成了一个定性的世界，类似于一个不透明的银屏，上面反射着千万种意义效果。

2. 表征世界：它的控制模型只有一个，这个模型通过把义子组合成信息来组织它的功能运行。因此，必须为它设计一个内在的句法，然后借助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组合群来解释表征信息的类型。

第一个模型由意义的对立组构成，给每个个别的义子提供了义素的赋值；和第一个模型不同，句法模型的构成成分是元义素组，操作的也不是具体义子，而是与实际赋值内容无关的术语类层次上的义子。

处在两个不同等级上的两个阐释模型一起控制着意义的表征，所以意义的表征也具有“双层切分”的特点，对它可以进行两种分析。第一种分析解释在义子中实现了的义素赋值，第二种阐明赋值内容的组织方式。此刻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这第二种分析的条件，以及找到那些与它相关的具有解释功能的模型。

设想一下，起步之初，我们仅有一个句法模型，必须根据它来设计表征世界内部内容的组织方式。开始，这个句法模型简单得令人惊讶：一方面构成信息成分的数量极少，另一方面，在话语进程中留给信息展开的位子也相当有限。所以，当我们天真地提出这一问题时，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句子是话语的最大单位，为什么，当一个表征的时间向度未被事先强加上去时，真正属于语言活动的关于内容的组织只能在句子中进行。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只有一种回答是可能的：接收意义必须具备一些客观条件，而句法活动的限制就来自于这些客观条件。尽管信息展现给接收方的形式是一个意义的连续衔接，也就是说它具有历时性，但在接收意义时我们必须同时把握它们，接收方必须把心理历时性改造成共时性。如果布龙达尔说的不错的话，一个人对共时意义

的领悟一次不可能超过六项。

如果把同时领悟数个意义作为起码的条件，作为一个用在所有表征上的原则，那么，非时性的就不仅仅是信息，还有表征的整个组织。从广义上讲，所有内在句法都应被看作是一个为便于接收而进行的内容装配。于是语义世界分裂成多个微观世界，我们能够领悟、记住和“体验”的也就是这些微观世界。实际上，如果我们通过某物去想像另一物，我们会把它投射在眼前，把它看成是一个带有少量词项的简单意义结构。至于说在这之后我们有可能进行更深的思考，比如专注于一个对立组或一个项，并发展起一系列意义的等级结构，这些都不会改变我们对意义的瞬间感知方式。

这便是在探讨方法论的阶段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微观世界这一概念的道理：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内在模型，一方面它是一个由少量可被同时感知的义素组构成的结构，另一方面，借助于上下级的衔接，它能说明表现为同位文本形式的表征内容。

d）微观世界的类型

暂时把微观世界内部结构的问题放一放。我们先用与表征层的各种不同形式有关的材料来给微观世界做第一次分类，分类的基础是表征标准。大家知道，处在同一个同位上的信息应被分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清单：功能信息和品质信息。我们说头一个清单是属于功能模型的

微观世界的话语表征，对能够说清这一组织方式的分析我们称之为“功能分析”。第二个信息清单一样，是一个微观世界的话语表征，可以用一个品质模型来解释，用于它的描写程序将被称为“品质分析”。

其后我们还将进一步说明，这个用来阐明功能模型的分析如果以实用表征为出发点，它能解释技艺微观世界；若以神话表征为出发点，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意识形态微观世界。反过来，品质模型作为实用表征的基础，对解释科学微观世界有用；如果其操作的基础是神话表征，它阐明的则是价值观微观世界。

所以，对我们来说，语义微观世界有时是内在的，有时又是外显的，它们有两个主要的表征模式和两个可预计的组织方式，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初步归类：

模型 表征	功能的	品质的
实用	技艺的	科学的
神话	意识形态的	价值观的

e）谓词与行动元

至此，我们对信息和信息清单的研究还十分简单和片面，仅仅是考察过一下它们的谓词。而一个功能信息清单对我们来说就等于是一个功能算式，也就是说是一个包含着数个功能词的连续体，它们共同产生一个意思。一个品质清单更像是一个含各种限定的汇编，虽然表面上看它们一个接一个，但实际上却在遵循着一个排序规

则，很容易把它们改造成分类型。其后我们又建议设立几个模型（其结构之简单似乎已得到保证，后边有对这些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它们的组织方式分为两类：一种是算式型的，由一连串功能词构成；另一种是分类型的，分类的基础是合取与析取关系。这么一个假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也可能是暂时的框架，有了它，我们就能在一个给定的语义微观世界内进行内容描写。

我们没有考虑行动元和信息的关系，所以把问题简单化了。只有在被表征出来的功能词都与一个行动元发生关系时，一串相连的信息才能被看作是一个算式。同理，只有在所有品质信息都在给一个行动元定性时，它们才能算是一个类。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及其复杂性，在信息和信息清单中引进几个行动元。

在研究信息结构时，我们已经发现行动元和谓词的关系相当复杂。

单从信息角度来看，功能词和品质词似乎应该附属于行动元，但在话语表征层面上，情况却相反：在这一层面，因为谓词类是行动元的内涵，行动元是谓词类的代表，所以是功能词和品质词赋予了行动元一个元语言生命，它们是行动元的创造者。因此，在我们设计的功能模型和品质模型之上，应该还有一些管辖它们的组织模型，那就是行动元模型。

我们用以下的方式来确定行动元的这个双重身份：作为赋值的对象，行动元在每个微观世界中都是谓词组

合的产物；作为句法的一个次类，行动元又确实先于谓词而存在。把某些品质赋予某些实体，这就是话语行为的本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行动元进行分类，区别出不同的行动元次类来，以便确认它们的多样性。一旦确认了行动元的不同类型，再加上在表征微观世界中所进行的述谓分析，我们就有了对内容进行结构性组织的框架。

f）行动元的类别

无论是在话语信息层面还是在微观世界内部，以对立和合并的形式存在着的行动元代表着一个意义世界，对它们如何精确地分类，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在句法和逻辑这两个领域里曾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提出的解决办法都不太令人满意。我们在此要做的当然不是列举前人的观点并提出几个建议和一点不成熟的设想；其实，前几章里所提供的平行分析，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过它们还是属于经验型的。

在法语句法研究中，也曾有人（泰聂尔、马丁内）敢于赋予行动元一个语义内容，不过其方案都是经验型的。他们提供了三种行动元：

施动者/受动者/受益者

他们既不考虑三者之间的衔接关系，也不想想“受益者”所预设的对立面并不是一个“施动者”，而是一个“行善者”。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提议便是把行动元设计成两个

分开的衔接：

主体/客体

发送者/接受者

必要时，用几个行动元的合并来解释某些语言现象，如下边这句话：

夏娃给亚当一个苹果。

主语夏娃是两个关系的出发点：首先是她和苹果的关系，然后是她和亚当的关系，所以夏娃既是“主体行动元”又是“发送行动元”。

另一个提议是，我们有必要区别纯粹的句法行动元和语义行动元。例如下边两句话：

夏娃给亚当一个苹果。

亚当自夏娃处得到一个苹果。

意思几乎一样，句法行动元的转换对语义毫无影响。对这种转换，人们最多可以说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偏爱（就是说作者更喜欢某种句法类型的行动元，习惯于用它来引导和组织叙事），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在文学运动中时髦过一阵子的东西。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那就是转换必须是并列的：一个接受元一旦被转换成发送元，那么在功能层面上便必定有一个对应的转换，以便消去原发送元的作用。这就等于说，行动元的对立区别表现在信息内部的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一个是行动元层面，一个是功能词层面。

g）逻辑句法和语义句法

逻辑句法所选择的可以说是后一个层面，即把解决行动元问题的主攻方向放在功能词上。为了说明行动元之间的关系，有人设计了一个元义素性质的内容概念，叫“走向”，用来描写功能词。例如下边这类句子：

x在y之上。

指示并决定两个行动元地位和身份的是功能词（用什么符号表示无关紧要）。一旦确定了句法的这一“走向”，我们就能把行动元从其语义赋值中（如那些专有名称）抽象出来。不过，逻辑学方法在功能层上引起了许多麻烦，并且把这些麻烦一直带到了命题的计算中。它所看重不是分类而是横向组合，意义世界便是一个叙事或一连串先后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逻辑学所寻找的是一个能够控制意义世界的类似于代数算式的东西。

如果语义学也照搬逻辑学句法模型，它会很快走进死胡同。陈述世间事件的语句成千上万，由于缺少监控手段，语义学会迷失在永无穷尽的描写之中。巴尔—黑叶(Bar-Hillet)的研究表明，任何记忆都无法存储人类所有关于世界的言语，任何科学都无法囊括世间所有的事件。意义的保存和接收需要一些客观条件，而这些客观条件与逻辑句法的思维方式大概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给语义内容穿上一件句法形式的外衣，而是找到一个方法，把句法抽象成语义，把千万事件剥离成结构。

所以，虽说逻辑句法给我们提供了一套设计得不错

的方案，我们还是不得不和它拉开距离。比如说，有这样两个句子：

x在y之上。

y在x之上。

我们不仅要给它们设计转换规则，把两个句子抽象成一个惟一的语义信息，还必须在行动元层面上确定功能词的义素内容。总的来说，我们以为同样的义素类别同时表现在行动元和谓词之中。比如说，

顶楼/地窖

这两个行动元就拥有“在上”和“在下”的义素特性，它们具有和具体谓词一样的功用，能够指示自己与对方之间的相对拓扑关系。从拓扑学和指别功用这两个方面来描写同一内容，这不过是我们对表征意义的出现方式的一个概括。从某种意义上讲，依靠功能分析和品质分析来树立行动元，其实就是把谓词类的语义内容转移到行动元身上。如果确实存在着比较抽象的行动元类别，如果这些类别像我们前边所说的那样既表现在功能层上也表征在行动元层上，我们就有必要给它们一个行动元的说法而不仅仅是功能解释。我们可以把语义微观世界的内容设想为另一种形式：它不是一个接一个的事件，而是一部有场景的“活剧”。

h）行动元类的模态特征

在行动元类的运作中最令人惊奇的现象便是它们的

冗余性：在每一个信息中，每一类至少会表征两次。第一次，它通过其中的一个项而出现在每一个行动元中；第二次，它同时以两个项出现在将两个行动元联在一起的功能词中。例如：

皮埃尔打保尔。

出现在这句话中的是S对立组，于是有s和（非s）的对立，表述如下：

行动元$_1$（s）＋功能词（s＋非$_s$）＋行动元$_2$（非$_s$）

在此，我们见到了一个形态句法关系，该关系把功能词和“主”、“宾”行动元连在一起，使不同词项间生出某种同一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上下位关系这个术语）。不过，其重复方式不同，时而表征为整体，时而表征为其中的一个项。

从这个角度看，信息说到底不过是意义的基本结构在已组织成行动元类和谓词类的内容上的投射，这一结构在层次上无疑要高于义子层次。我们在前边把行动元定义为可分离出来的义子类，不过对它们还有一些由元义素形成的补充限定，正是这些限定使它们成为了“主词元”、“宾词元”、“发送元”和“接受元”。而功能词则被我们设计成整合过的义素内容，由一些类型负责确定它们相对于行动元的地位，并因此而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的信息，即一个事件的“场景”。我们之所以把这一类型称为行动元类型，是因为它们首先是那些分派给行动元的特殊角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似乎是某种模态类

型，其性质是给每个“信息—场景”分派一个特有地位。在探索方法论的这个阶段，语义学的任务越来越清楚了：它必须利用这些模态类型，以单纯的行动元结构的形式，确立语义微观世界的存在模态类。通过功能分析或品质分析（或两种分析齐用）而得到的这些微观世界的内容，仅仅是一些变量罢了。

i）语言学认识论

把意义组织模型存在的原则设定在这一层次，便迫使我们比开始所设想的走得更远。其实，这等于提出了认识世界的语言条件，并且也强迫我们考虑语言给人类认识所提供的可能性。

此前，为了说明作为意义单位的义素的组合情况（行动元是可分离出来的语言对象，谓词则是起整合作用的义素成分），我们引入了“整体”这一范畴，这显然是有意把语言学和认识论混为一谈。不过我们这样做当然有我们的道理：其一，所有关于语言的理论都只能是元语言性质的；其二，所有未经分析的元语言概念只能从属于认识论概念库，因为认识论比语言学高一个层次。

对信息结构的分析让我们有了一点不同的看法：说一个模态类型承担着信息的内容并通过在各个不同的语言对象中建立确定的关系组织着信息，这就等于承认信息结构强加给人一种看世界的方法。比如说，“及物”关

系强迫我们设想出行动元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一个行动元有能力行动，另一个行动元却是“惰性”的。发送元和接受元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在二者间转移了一个物体，而且一个是该行为的因，另一个是果。假设这类组织意义的范畴的数量被缩减到一个限度内，再假设确立场景的各种类型是可能的，那么这个场景的类型学就应该建立在对信息结构的周遍性描写上。它将提供一个客观框架，框架中等同于微观语义世界的内容表征将是惟一的变量。认识世界的语言条件将因此得以表述。

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对物质世界的意义描写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然而，对神话表征就不同了，神话表征变化多端，各人文学科在分析它时并没有把握，可能是由于它们所得到的结论均不同构，所以根本无法进行相互比较。如果模态类型仅仅被应用于谓词，那它们的作用就局限在判断的描述和控制上。但，假若我们把它们设计成述谓和行动元共同模型的组成部分，情形就不一样了。再说，语义微观世界除了按这些模型来组织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组织方式。

关于模态类型的研究十分有限，我们仅仅能找到几个关于所谓“模态”动词的描写样品，甚至无法列出表来，而且每个语法书对此的描述都有所不同。因此，对所有关于这个议题的说法都必须抱谨慎的态度。例如前边根据法语句法所设立的两组对立行动元：

主体/客观

发送者/接受者

它们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前一组是目的论性质的，第二组是原因论性质的，前者是“能”（pouvoir：能够）的模态，后者是“知”（savoir：知道、会）的模态。

注：后边我们还将对民间故事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取出一对具有状语性质的行动元：“辅助元”/“反对元”，我们想把它们看作“愿”（vouloir：意愿、想要）的模态。

3　形象表征和非形象表征

a）一个例子：诗歌交流

我们方才一直把功能信息当作研究的重点，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很好地说明行动元的类型，而行动元类型则构成了微观世界组织的模型。这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忽视品质信息的存在。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想，在话语表征中收集到的品质信息清单服务于某个行动元，它们仅仅用于描写行动元的义素内容；在同一表征中也一定存在着功能信息，行动元本身的组织状态必须靠功能信息来确定。仅仅由品质信息组成的话语是难以想像的：它将无法进展，原地踏步，最后无以为继。许多语言学家有意无意地把话语看作是横组合结构，这大概便是原因之一。问题是，到底有没有纯粹的品质性话语表征，如果有，使

它进入交流的传递条件是什么？

如果把病理性语言活动放在一边，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似乎是人们所说的“现代诗”。现代诗试图“摧毁句法”，亦即尽量减少功能信息。另外，有些诗歌还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由负同位占上风的复合表征的例子。把实用同位缩减到不能再少的一个，现代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既是神话表征也是品质表征。

的确，诗歌的实用价值极小，但发展起来的神话表征却能补偿这一缺憾。因此，把表征切分为义子的操作也是为神话层面服务的，而诗歌义子——意象、象征、比喻性的词组和定义——就成了“负”形象，其边界与实际生活中的“正”义子的边界已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说我们宁愿用“形象”来代替“负义子”的说法，那不仅是因为划分它们边界的标准过于灵活，还因为其表现方式上的不同：例如在一个平衡的复合表征中，我们一般是先设定义子，然后再用它们来建造实用或神话信息。但在负表征中，义子的现身仿佛是“突发事件”，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临时的凑合”，它们的出场仅仅是为表现它物而服务的。这个“它物”实际上就是诗歌交流本身。就是说，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义素组在重复出现，它们与属于内感受和本体感受的定位义素结合，构成了诗歌的同位。

在这类神话表征中，形象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带有构成诗歌同位的义素，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中

转站，所有义素之间的替代转换都在它内部发生。开始有一些担任交流任务的基本义素组，然后在它们之间产生了等值关系，基本义素组通过冗余来传递诗歌信息，等值关系则把它们改造成“对称”的义素组（见下章）。形象实际上也是一个多等级的义素关系：比如说“天”这个词就含有“纵向”、“光亮”、“变幻无常”等义素成分。在此，把义素组织成义子的上下级关系似乎被改造成了等值关系：列维一斯特劳斯和杜兰都观察和描写过这一现象，杜兰甚至将其称为“同构关系”。站在义子内部的角度，这种改造是很难接受的：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释得通，那就是把义素组的对称关系看作是第一性的，把这种表征的义子结构看作是第二性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本质上，诗歌交流对义子的利用处在另一个层次，它通过义子来达成义素内容的传递，而日常话语传递内容的主要手段则是语法结构。由此可见，对神话表征的描写决不是对义子的象征性的描写。

把义素从义子中抽象出来，确认它的存在，承认它具有组成负同位的冗余义素组的能力，这就等于把这种义素组看作是形象分类的标准，而这些形象则是我们从给定的元文本中收集来的。换句话说，诗歌交流实际上就是一个分类型的话语表征。

通过对此类微观世界的描写，我们确认了一个诗歌的逻辑。这描写或者是自足的，或者继续发展成一个品质模型。自某些反复出现的形象出发，模型中的义子行

动元将由一连串修饰它的义素规定所构成。品质分析于是变成了一种对等级的描写，其衔接方式（不过有两个条件，暂不考虑本体感受“适意”/“难受”的对立，因为它起价值判断的作用；另外还要做一个定位义素的替换，把精神向度转换成物质向度）从结构上来讲与任何一个科学的分类系统——植物学、动物学——都没有丝毫区别。列维一斯特劳斯在《野性思维》中曾对这些科学分类系统做过分析，它们同样内在于实用层面。

b）暗含的与明言的

无疑，支撑和限定形象表征的是一些抽象义素组，它们暗含在表征中，使我们对形象表征进行分类描写成为可能。描写的首要任务是把暗含的变成明言的，并想办法揭示出一个“具像逻辑”（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具像逻辑构成了形象表征的理据。如果“逻辑”这个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实际运作的推理方式”（拉兰德，Lalande），它对我们十分合用，因为其抽象程度高于巴什拉所提出的“诗学”概念，这个概念是他把空间义素组当作诗歌表征的分类成分描写时提出的。

其实，罗兰一巴尔特和里察尔（J. -P. Richard）的某些作品所取的也是这个态度，只不过缺少了专门的语言学上的考虑。莫龙（Charles Moron）就指责《马拉美的想像世界》的作者里察尔混淆了两个层面，即诗歌与形而上学层面，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不过，在无意间

他在里察尔的分析中发现了一个明确的功效：在这个层面上，对神话表征的描写能提取出明确的价值观的成分，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在描写中，往往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形象表征所暗含的资料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中的明言模型。这种翻译当然可以是“自然的”，在同一种语言、同一个语言群体中进行，它可以是“共时的”：从一个表征微观世界（诗歌）过渡到另一个微观世界（文学批评）；也可以是“历时的”：我们前边已经比较勉强地使用过这个例子，如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就致力于把古神话转译成“思想体系”。翻译也可以是“人工的”，即致力于从方法论上加以阐明，属于描写性质。组织模型如何显示的问题其实就是元语言上升到哪一个层次的问题。这些层次，从描写的角度来看有以下几种：

1. 暗含层：无论是实用的还是神话层次，一旦发展成话语，就必定暗含着它自己的组织模型；

2. 部分明言层：如以上提到的在同一语言中进行的翻译，以及那些对思想体系和形而上学观念的翻译。在义子表征层面，思想体系一般来说是非形象性的，但它们仍然暗含着支配话语表征的模型；

3. 明言层：它是我们对表征层面进行语义描写的目标。

无疑，无论我们在哪个层级上建构模型，无论模型的抽象程度有多高，它们都会构成一些新的表征，既是

义子的也是话语的表征，并被整合在同一个语义世界中。

c）非形象性的

我们知道，在话语运作的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元语言活动，就是在定义和命名之间的来回往返。科学活动也一样，从语言学角度来看，科学活动就是一连串的命名程序。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语义描写所采取的也是同一手段：使用已有的语言材料，或者创造新的词位来命名新发现的定义性组合体，为自己创建出一些元语言描写用语。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这类用语，并把它们与一般的义子区分开来。

定义它们有困难，从整体上确定术语的身份也有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仅仅属于语言学：就拿所谓的抽象艺术来说，它离造型艺术的距离有多远，我们的描写术语离拟人的表征就有多远，当然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曾试图把“描写义子”看作是抽象的，因为它们的义素密度较小，但抽象并不是所有这类义子的共同特征；元语言的功能词和品质词倒常常是抽象的，可行动元却是由多个谓语规定和建构的，它无疑是具体的。

另一个可能性便是把它们看作是具体的，这当然部分地是因为列维—斯特劳斯使用过“具像逻辑”这个概念，同样也是因为——具像逻辑的提出可能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构成命名的义素常常是属于感觉世界中的东西。但是，这就等于在义素密度的标准之外又引进一个

新标准，一个我们在确定符像层边界时已经用过的标准，以便用其来定义抽象与具像的对立。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混淆：我们曾经用心地把表征本身与其所暗含的模型区别开来，严格地说，只有表征才是具像的，而用来记录提炼出来的元语言成分的术语却不可能是具像的。

所以，还是用“非形象义子”这个说法最为合适。其实，从表征的一个层次过渡到另一个层次，除义子内部的义素会被精简掉一部分之外，还会消融掉一些核心形象。为了建立模型，语义命名在形象义子或定义所包含的形象集合上进行，它通过提炼和抽象，只择取那些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义子。于是，对诗歌的描写舍弃了“顶楼”和“地窖”的具体形象，仅取了“上、下”的对立，并用它们来建构价值观念的义子——我们在此不对其命名，比如说“高处的惬意”和“深处的难受”。由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科学语言偏爱希腊或拉丁词源：它们的义素内容和现实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其含义就只能来自先于它们而给出的定义。

只考虑义子内部的组合情况，凭经验我们会说，如果表征中含有大量的非形象义子，那么这个表征就是非形象的。

d）走向科学的元语言

非形象表征最终将被翻译成科学元语言，在二者之

间，还有几个需要跨越的阶段。

1. 分解话语。所有表征都是复合的，描写致力于消除其中的一个向度以便提取出一个单一的同位。这个任务并不简单，科学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管是口述的还是书写的，无论其组织得多么干净，所有的科学论文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部分杂音，这也是传递信息的需要；反过来，文章中还会出现一些省略和暗示，其范围和程度也总是不统一和不确定的。于是，要想获得一个单一的同位关系，我们只能对话语进行分解：仅仅把义子从它们的形象核心中剥离出来这还不够，还必须把话语改造成一个话语表征，亦即一个信息清单。由此可见，一个纯净的描写只能以话语的消解为代价。不过，在某些诗歌形式中也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追求，但它们通向的并不是单一的同位，而是一个负复合表征，也就是说一个含义极其隐晦的表征。

2. 话语语段清单。在一个文本中，话语的表征，形象的也罢非形象的也罢，都可以含有甚至是常常含有好几个内在模型。描写的任务常常是分解线性的话语，有多少模型要描写就把它切分成多少个信息清单。通过描写，一个语义微观世界的话语表征便被转化成一系列处在不同层级的模型。人们开始以为可以对话语的线性特征进行代数式的表征，其实话语是多维的，用几何形式更合适。

3. 形式化。描写的另一目标是对义子的形式化。形

式化这个概念的定义十分不清，所以出现了种种不同理解。用在语义描写上的形式化概念包括以下几项基本内容：

(a)尽最大可能把谓词缩减为单一的义素群，也就是说把它们改造成描写语言表征层上的抽象义子。除了这个单一的义素群外，这些义子还拥有一个最小量定位义素基，在这个基础中，惟一得到表现的是描写价值观念的清单中的那些范畴；

(b)把行动元组合成概念，概念在此的意思是一个由抽象义子定义的、具体的非形象义子；

(c)鉴于描写会自动选择抽象的层次，并在这个层次中建造义素、定义概念，这个新的形式化了的语义表征的价值就只能根据两个内在于体系的标准来确定：价值观念使描写成为可能，描写必须与其共在；所有的描写命名都必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e）描写模型的检验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在建设元语言的每一个阶段都十分明显，而在对描写进行检验这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差距更大。大家知道，物质世界的科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有可能——这一可能远不是绝对的——在科学模型和工艺模型之间建立一种交流，并通过后者的牢靠性来验证前者的价值。通过取消走向，它允许我们建立一个等值关系，这关系的一边是

原因论和目的论的对立，另一边则是行动元结构。

我们在这儿可能提及的问题是，从已经认识和已经描写过的价值模型返回到思想意识模型的可能性：转换规则的建立使这一过渡成为可能，并给它们的一致性增加了第二个真理的标准，即精神模型的标准。不过除了检验的可能性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治疗的可能性。假设我们世界的主要价值模型已经得到了分析和描写，假设我们对思想意识各种变化的范式和转换的规则已经相当了解，我们便有可能在某一天设计并建立功能模型，用这些模型来左右个人或集体，把他们导向新的价值观念。一门有效的人文科学应该可以取代现今心理学和社会学在治疗思想病上所做的摸索。

描写的程序

1　语料库的构成

a）目标与程序

继续我们理解结构和提取意义成分的努力，继续我们对语义世界表征方式的思索，我们会以为语义学的目的就是描写那些由自然语言覆盖着的巨大的意义集合，这其实不对。首先，对自然语言的意义进行描写是所有人文科学的目标，语言学并不能取代它们。其次，语言学在应用中自然会进行描写，它只能把语义世界切分成一些微观世界，以便在其中发现组织原则。语义学的目标至多不过是建立一个描写性元语言的基础，另外便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收集意义描写的程序并把它们统一起来。语义学既借进也借出。

人文科学之间的壁垒常常让人忘记它们都是意义的科学；各自研究微观世界时所处的隔绝状态也使人们难以意识到，无论是在天然的表征层面还是在各学科所建立的模型平面上，它们其实都拥有大量共同的功能和结

构特征。至于语义学家，长期以来曾根据非语言学的标准来划分和确认词汇，如今他放弃了这个幻想，放弃了用词汇学对它们进行描写的努力，开始转向表面看来杂乱无章的意义领域。在不同的语义微观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不少成分、体系和算法，完全有权对它们之间的那些一直被忽视了的关联关系加以确认，因为意义的本质是语言学性质的。从部分结构的共生现象出发，我们有权提出各种假说，建立各种描写模型。

以上的现实使得语义学成为一门开放的学科，随时准备利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行之有效的描写方法。可惜的是，由于没有最起码的共同术语，这些成果往往难以借用。我们在下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担心决不是希望在描写语义学术语的建构上走得越远越好，或者全力满足这个学科对自足地位的要求，而是建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描写程序，至少在最初阶段，并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里使用它们。以这种方式来设计用以发现和描写（这两个词完全是同义的）的程序，并将其看作是正在成形的技术，我们会提出一系列比较幼稚的问题：比如说应该寻找什么？从何开始？又如何进行？凭经验我们知道这是一些最难回答的问题，可又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了确定研究目标和寻找研究方法，内部语言会使用一些实用手段，在这些手段和最后的结果之间会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当然不应该忽视结果，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能把我们导向建构的极为重要的途径。但我们必须小

心，免得建构的模型过于大胆和抽象，不要让它们在最后定形时显得神秘兮兮，带有唬人的色彩。举一个有点离题的例子：有一种现象非常令人吃惊，在象征逻辑的基础建设中，很少有语言学家参与，使用的语言学概念也极其支离破碎，然而逻辑基础应该说完全是语言学的世袭领地。

最后还必须明确一下：研究虽然到了这一步，但起发现作用的程序还完全是一个假设，我们假设它们可以被用在描写的各个不同阶段。我们还不能担保它们在操作中的效用，这个问题只能由大量的局部描写来回答。

b）语料库

我们可以把语料库定义为信息的集合，其目的是为了描写一个语言学模型。这个定义看来简单，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只有当一个语义微观世界的话语表征中已经暗含着一个模型时，我们才可能对其进行描写。建立一个语料库并不仅仅是为描写做准备，对语料库内容的挑选先于描写，描写的价值取决于这一选择；反之，只有当描写完成之后，我们才可能对语料库的价值做出评判。描写者在分析的起步阶段不得不依赖直觉，所谓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简洁性只会掩盖这种依赖直觉的特征。所以在进行挑选前，我们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并提出一些实用的建议，以便尽量减低挑选中的主观性。我们说，一个好的语料库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它具有代表性、完整性和一致性。

1.“代表性”应被看作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话语以语料库为基础，是所有实现和有可能实现的东西，在此语料库是部分，话语是整体。无论是个体的语料库还是集体的语料库，都同样存在代表性的问题。比如，波德莱尔的所有已知的作品不过是他所有说过的话或思想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罢了。或者假设我们收集到了所有关于15世纪法国社会的集体感受的材料，我们还是会问这些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群众的感受。

语料库只能是部分的，如果我们以为它的代表性能够囊括话语整体，那就等于是放弃了描写。话语虽然是部分的，但却具有代表性，使它具有代表性的是话语运作中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是“冗余性”和“封闭性”。我们知道所有的表征都具有重复的特点，话语会很快走向自我封闭：换句话说，话语的存在方式提供了这种代表性的条件。在这方面，很难找到比罗兰—巴尔特的《弥舍莱》(*Michelet*)一书更好的例子：该书在弥舍莱的《私人日记》全部出版之前发表，作者甚至未读过弥舍莱的日记，但却极好地把握住了他个性的主旋律，让许多大学问家们都感到吃惊，日记的持有者吕西安·菲伯佛(Lucien Febvre)甚至站出来为罗兰—巴尔特这个部分语料库的代表性做担保。

2. 完整性应被理解为建构中的模型与语料库所暗含的所有因素相符。

在整个19世纪——现今也常常如此——完整性原

则是所有人类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无所不知的博学家形象就与此相连。大家都清楚这一原则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例如“一生的论文”这种鬼体系的建立，就让我们在提到这一原则时不得不先做一番批评。不错，叶姆斯列夫把这个原则放在了描写的必备条件之中，但他在提出这一条件时用意有所不同，他是为了强调在语言研究中保持演绎和归纳之间的平衡的必要性。

所以，今天的各个研究领域几乎都在寻找更经济的方法，以便在没有所谓完整的语料库的情况下同样能保证描写的忠实性。我们所能想到的一个不太复杂的程序就是把描写的操作分成两个不同阶段：

(a)第一阶段，描写仅使用语料库中一个有代表性的部分，并从这个部分出发建立一个仅具有某种操作价值的模型；

(b)第二阶段便是对这个临时的模型加以验证。根据语料库性质的不同，有两种验证程序供我们选择，这两种程序并不相互矛盾：

α. 模型的饱和性验证(普洛普、列维—斯特劳斯)，即对语料库的第二个部分进行检验，把每一个具体表征逐一地和模型比较，直到结构性变体全部出现为止；

β. 抽样验证(J. 杜博阿)，根据统计学家(R. 莫罗)所设定的程序，在语料库的第二个部分中选择一定数量的具有代表性的切片，然后把它们应用于模型，并观察模型的表现。用这种方法可以验证模型，找出它的不足之

处，或者使它更为完整。在后两种情况下，分析有必要全部再来一遍，这一操作从整体上来说要一直进行到操作模型不再有问题为止。

3. 语料库（集体语料库尤其如此）的“一致性”初看上去受到一系列非语言因素的制约，也就是所谓语境的制约，无论是对话者和交流总量都会使语境生出许多可以感觉到的变化。杜博阿认为一致性不够强的语料库有可能用加权的程序来进行修正（见“语言学术语”，杜博阿、马尔西合写，《现代法语》，1965 年 1 月）。他认为交流量的增大会导致“结构的淡化”。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观点，但却怎么也看不出这个由量变引起的质变怎么会影响到“淡化”了的语料库的一致性；神话的散状表征很可能会消去模型中一定数量的义素组（有待于证明），但这并不会改变结构本身。我们认为以上问题并不是一个建语料库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问题，即如何选择提取信息的程序。再来看交流中对话者本身的变化，在集体语料库的表征中所存在着的历时性差异（不同的年龄层）和表征类型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等）是非语言性质的，它们在个体语料库中同样存在：一个个人的话语表征必定会在历时轴上展开，或者采用形象的形式（诗歌），或者采用非形象的形式（美学理论）。无论微观世界的表征取什么形式，只要描写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非形象的概念模型，表征方式的多变对这个内在的模型就应该没有什么影响。由于各种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这些出现在集体语料库中

的历时性变化可以用抽样法来解决。至于个体语料库，问题反而要复杂一些，我们到后面再谈。

c）文本

逻辑地看，语料库建好之后的第一个程序就是把语料转换成文本的程序。严格地说，语料是话语的一个片断，只能是一些十分琐碎的表征，对它们我们只能择取一个同位。

于是，变语料为文本的程序便显出以下两个互补的侧面：

1. 一个肯定的侧面，它涉及到同位的选择问题。这一选择在逻辑上无疑发生在语料库建好之后，但实际上它早已存在于描写实践之中：是的，描写需要把语料转换成文本，但又有几个语料库不是根据人们在描写中所设想的文本而建立起来的呢？

2. 一个否定的侧面，便是如何把语料中属于其他同位的成分清除出去的问题。这一必要性不言自明，假若“文本解释”没有被国家教育机构在文学教育中制度化的话，我们对此大概会一带而过。被解释的“文本”顶多算得上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语料，藏在这个语料中的种种模型几乎总是不完整的。于是，文本的解释必然会变成一个借口，导致了对文本各同位关系中的意义成分同时做出解释。一个语料库可以含有数个文本，我们将一个一个地对它们进行分析。文本的准备不仅涉及到为保存表征中的

一个向度而清除其他向度的问题，而且，即使在这个保存下来的向度之中，所有不符合描写所选角度的同位关系都在排除之列。比如说，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里，俄底浦斯神话解释了人类的起源，所以它是原因性质的同位；同一个神话，在另一个文本中可能被解释成社会结构的反映，于是它又是一个结果。

d）清减还是提取？

在准备文本之前，我们有必要问自己：像这样把其他所有不属于所选同位关系的成分一个个地清减出去会不会太费事，如果仅仅把那些和描写目的有关的成分提取出来会不会更经济一些？我们知道，清减和提取仅仅是两个操作性概念。实际上，如果保留下来的语料量远远超过要清减出去的语料量，那么，我们当然会采用清减非适用语料成分的方法来建立文本。反之，如果需要清减的成分的量过大，超过了需要保留下来的成分，我们就会进行提炼，从语料库中提取适于描写的材料。

到底用哪种方法得看实际。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散状的（神话或实用的）表征，用提取适用成分这个方法就会更经济，反之，所有纯神话或纯实用的表征都要求我们用清减法。因此，罗兰·巴尔特在分析弥舍莱的《生存主题》时用的似乎是提取法，利法代尔（Riffaterre）在其《修辞效果》中主张的也是这个方法——我们至少可以埋怨他事先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同位

问题；反之，列维—斯特劳斯在对俄底浦斯神话的描写中用的则是道地的非适用成分清减法。

然而，提取法看上去更容易受描写者主观的左右。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想法避免主观主义，在分析的各个阶段建立一整套修正的程序。尤其是在建造模型时，在寻找等值和对立关系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现漏洞和缺陷。虽说有许多冗余成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们只能不断地回到从前，通过反向分析来弥补这些漏洞。

e）清单

经过清理的语料是一个同位的文本，为了和繁琐的话语相区别，它还必须是一个经过了非词汇化和非语法化处理的话语表征：表征的规范化，这是我们必须在程序中事先预计到的一个重要步骤。不过这个问题以后再谈，因为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还没有这么具体，最好还是把所有与建语料库有关的问题在同一个地方一次解决掉。

一个同位文本被清减掉所有的交流杂音后很容易被人想像成一个信息的清单，即一个语义程式语言汇编，只需对其再整理一下，就可以用来建立模型了。当然，信息的清单是建立描写模型的基础，但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一个文本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信息，它完全可以是一个显性或隐性模型的清单。比如，在这个分析阶段，对俄罗斯民间童话的描写可以建立在一个由具体童话清单构成的文本上，即具体的潜在模型，也可以建立在一个显性模型清

单上，也就是说在此间分析抽象出来的模型。不管描写是单独地分析每个实例，还是对所有未经描写的实例中所隐含的模型进行比较，它们都属于建构程序。有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认为，收到语料库中的都是“事实”，而文本在原则上就是实例的清单；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扩大“文本”概念的内涵，以便给这种幼稚的想法致命一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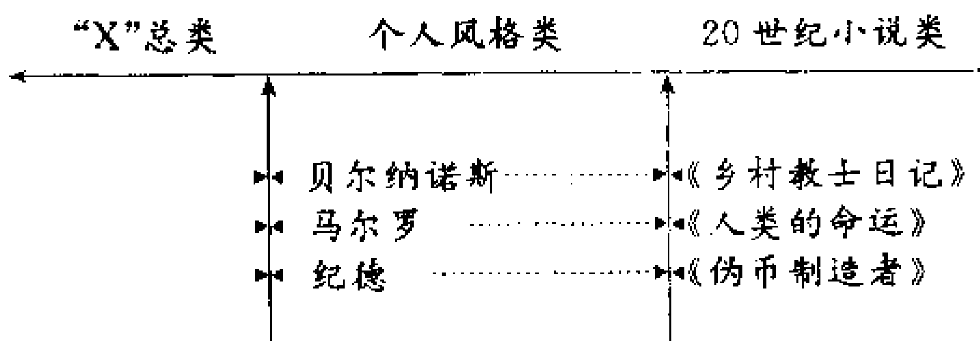
如果说模型的清单是通往我们建构一个模型类别的台阶，那么描写的目的也可以说是建立一个文本：而此处的文本是一个类别的清单。假设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民间童话定义为一种类型，那么所有相似类型的清单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总类型。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总类型就是叙事，至少是叙事的一个分支。描写可以取不同的抽象程度，描写的目标不同，语料库的构成方式也不同。我们还要强调的是：必须把所有模型都设想成是有等级的而且是环环相扣的东西，因为抽象程度高的模型的生成建立在抽象程度低一级的模型上。

f) 个体与集体的清单

个体清单和集体清单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困扰人的问题，另一个问题便是它们各自所产生的模型之间的可比性问题，以上关于模型等级的看法大概会对回答这两个问题有所启发。比如说，初看上去，描写俄罗斯民间童话所采取的步骤与描写贝尔纳诺斯(Bernanos)全部小说所采取的步骤大致相同，惟一不同的是：童话的言说

者被假定为集体的，而贝尔纳诺斯小说的作者却是个体的。还不止此，贝尔纳诺斯作为个体言说者可以被感知，他所说过的话，他所写过的所有东西构成了一个语料库，所以人们可以谈论一个“贝尔纳诺斯世界”，而他所有的小说便构成了这个世界中的一个语义微观世界。对包含在俄罗斯民间童话之中的神异童话，大家也这么认为。另一方面，贝尔纳诺斯世界还是《乡村教士日记》和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想像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介。于是出现了一个具体问题，如何理解这三个可能存在的语料库：一本小说构成的语料库，贝尔纳诺斯全部作品构成的语料库，最后是一个社会在一个特定时代的全部小说构成的语料库。如果我们从这些语料库中获得了显性模型，这些模型在结构上又有什么关联？

画个图可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有两条垂直线指向上方，一个箭头带着所有小说组成的语料库，也就是一个由潜在模型所组成的清单，构成了 20 世纪小说类；另一个箭头带着一切有代表意义的个人言语的语料库，提供了足够的表征，构成了被我们简称为“个人风格”的类型。实际上，每个文化群体都会赋予其

成员以个体的价值“特征”，以及一些特有的行为和思维“算法”（哪怕其特征被看作是对社会化行为和角色的否定，并强调了他与社会的格格不入，这也不过是用另一种方法，即符号颠倒法所设计的“风格”模型）。最上边的横线带出的也是一个清单，包含了一个语言或文化群体所拥有的各种类型，它们构成一个“总类”。

不过，该图还明白地指出了一部具体小说的独特地位：《乡村教士日记》处在两个轴线的交点上，同时进入两个不同的语料库，受到面向两个不同方向的分析。比如说行动元分析，我们知道，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被看作是20世纪文学所特有的小说行动元结构的变体，但他们同时也是贝尔纳诺斯内心世界中行动元结构的具体体现。《日记》中的人物是独特的和惟一的，两种同构但不同位的行动元结构汇在一起，便激活并表征了他们。两种结构的汇合是一个解释原则，可以说明某些历史事实的形成：几个必然的模型汇合到一起，就产生了偶然的事实。这一点P.吉罗看得很清楚，由此角度，词源学所找的就不是词源，而是那些词源模型的实现以及对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机率的计算。

g）层级和时段

为了说明异质的模型如何汇合在一起，我们选择了行动元结构，而且没有考虑整个语料库的历时性。我们已经有机会指出这一悖论：无论一句言语与另一句言语之

间是隔三秒钟还是隔三百年，这都不会改变它们之间的历时性关系。因此，一切意义的表征都是历时性的，惟有意义本身除外。人是把意义的简单结构当作一个整体来感知的，对它们的把握具有非时间性。换种说法，是什么东西允许我们说一个民间童话或一部贝尔纳诺斯的小说是有意义的呢？那就是在整个叙事中以常态形式反复表现出来的少数几个意义范畴。因此，所有的文本都是常态 8
与历时的结合。文本通过一小部分反复出现的基本结构来表现其常态，而历时性则反映在一个上下级衔接之中，即一次又一次地按上下级关系把次一等的结构衔接到基本结构上去。一个历时性语料库，无论它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是代表“法语史”还是代表“马拉美的一生”，都可以被描写成一个层层叠摞起来的结构，每个层级都有自己的结构，它们相互重叠，从下到上，恒定性越来越小。一个带有箭头的横轴象征了时间的不可逆性，在这个轴上展开的历时性语料库可以被分成几个长度不同的时段。在结构等级层和它们的时段长度之间似乎有一个简单的关联关系。

历时性语料库 →				
结构	时段			
个人风格	短	短	短	短
历史主流	中等		中等	
文化基调	长			

本图在一个历时性语料库中发掘出三个结构性层级：文化基调、历史主流和个人风格。另外还有三个前不久才被布罗代尔(Braudel)认出来的时段：长、中、短。所谓关联关系就是给每一个结构类型找一个仅属于它特有的时段，于是结构进入了时间，历史也因之而被“结构化”。以上的解释图式是我们从一个历史学家那儿借来的，所以，再举集体语料库的例子就显得多余了。把这个图式移植到个人史的层面，我们就能在基本结构和关于“人性”的传统对立观之间，在历史结构和“人的一生”的历时变调之间找到某种对应的东西。而个人风格结构则能说明由某些“冲突语境”所引起的变化，这些“冲突语境”对未来具有结构性影响。

以上是分层级的结构。既然结构就暗藏在语料库之中，那么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些结构和其语料库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图的表达方式似乎已经做了某种暗示：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语料库，它们都是一连串可分的意义成分。所谓可分，在历史学中称为“断代”，对我们而言就是把话语切分成语段。然而，当我们试图拿一个经过“断代”的语料库来与历史结构在时间中的表征相对应时，我们发现“断代”切分与结构时段并不完全相符。再举一个平凡的例子，不过例子中的提法到底是否正确我们不敢担保。下图是法国文学史中的一个阶段，竖线对应文学史的“断代”，而斜线则表明了中等时段在历时性语料库中的实际延伸。



以上发现所产生的实际后果直接影响到描写程序：

1. 试图阐明结构历时性变化的分析不能直上直下一刀切，因为这代表了结构的完全实现，而应对文本进行重叠式语段切分，也就是说在直线切分的两边还有两个相重叠的区域，在这两个区域中，行将死亡的结构和即将取代它的新结构共存；

2. 如果描写所感兴趣的是表征在语料中的历时性转变，重叠区域便成了描写最应关注的文本语段。对结构三个层级的划分深入到语义世界内部，导出一个新的向度，把历时性引进了结构描写。这一划分暂时仅具有操作价值，但我们想会有那么一天，在增加了结构和功能的标准后，该划分在理论上能够站住脚。在此，我们建议把“历时性转变”这个术语仅仅留给以上一个结构层级中发生的变化，以便把它和共时性的正常运转功能——虽说该功能也是历时性的——区别开来，无论这个运转功能是表现为聚合体的变换，还是表现为由一连串扩展和压缩所造成的等值游戏。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对某些历史结构进行专门描写，而不论这些结构到底是个人的（例：心理分析治疗）还是集体的（例：社会价值体系内部的转变）。总之，确认这些结构的历时性变化和对它们作共时性结构分析一样

重要。

不过，有些现象值得注意，它们强迫我们思考各层级结构之间的关系性质。在划分层级时，我们参照了品质模型和行动元模型，这两个模型本身都具有层级结构的性质，于是我们担心层级的划分会不会过分地照搬它们的模式。功能模型则是另一回事：它是一个横向的算法，其特征不支持层级模型之间有等级关系的说法。另外，有可能说明这一说法的事例也不是很多。比如说萨福安(M. Safouan)所收集的一系列心理剧叙述——后边我们还将谈到，就是一些很好的短时段语料，属于我们上边的“风格”层级，可以用意识模型的形式对其进行描写。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风格模型也是一些片断的算法，可以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思想意识模型中去；随着治疗法的进步，经过不断的修改，我们有可能最后完成这一整合过程。这个例子过于实际，所以需要分析其他一些类型的例子来做补充。不过，它并不仅仅是对心理医疗所给出的一个语言学解释，它还告诉我们，一个功能性风格模型完全有可能被整合到更高层次上的历史模型中去，只要这个历史模型在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和它是一样的。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来自于里察尔所谓的“主题分析”。表面上看，他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都和前例连不到一起。里察尔在尝试描写马拉美个人历史时，曾把这段个人史看作是一个惟一的基本功能模型——他描写的目的和使用的术语当然和我们的不同。马拉美的每一首诗，或

者是每一类诗都可以被“体验”成一个中等时段，表征某一局部，而所有局部加在一起便渐渐吸干了基本模型的全部内涵。于是我们拥有了另一个分析模式，它与前一个毫不相干，但也能说明功能模型的整合方式，不过，这回是处在历史和基本层级上的功能模型，这对我们更有利。

不错，以上两个例子谈的都是个人史。仅仅依靠这两个例子，我们还无法对集体历史做出相应的推断，虽说我们很想这样干。和个人史一样，一个社会文化集团的历史似乎也是有意义的，似乎也在通过许多局部的历史结构实现着一个基本模型。如果基本模型的变体无法预知，其整体组织方式却是可以预料的。于是有悲愤复压抑的心灵史，如马拉美；有魔鬼附体、梦魇缠身的病态史，如萨福安让病孩子们讲的那些故事。不过现在进行推理还为时过早。

2 规范化

a）描写的一致性

为了阐明历时性问题我们绕了一个大弯，不过这个问题对于建设语料库以及其后对它的分析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认为有此必要。现在再回到描写本身的程序上来，谈谈一个被我们称之为“规范化”的程序。我们一直想知道文本的一致性到底需要哪些条件，我们打算用“规范

化"这个提法来统一称呼所有专门用来保证描写本身一致性的方法。与其说这个程序是前一个程序的必然的后续手段，还不如说它们是并列的。它的任务是把语料库中处在原料状态的话语改造成话语表征，它有三个不同的操作：

1. 文本的客观化：就是把话语中所有属于非语言情境的语言成分都从预备的文本中清除出去；

2. 一套描写的基本句法：我们有各种已经定义的义子类，还有通过话语语句建造的信息，我们将引进一些最简单的符号来代表各类义子，并用形式统一的表达式来描写那部分数量极端有限的组合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把义子类组合成信息；

3. 一套描写用的词汇：其目的是对义子表达形式加以规范，就是说，它是描写语言内的一套重新定义过的词汇。

b) 文本的客观化

大家知道，凡话语都预设了一个非语言的交流情境。与其直接相关的是一些形态上的变化，它们一方面是情境在语句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主观"的参数，不利于描写，所以必须从文本中清除出去(除非分析把这一参数当作描写的对象)。

这些必须清除的形态成分有以下几种：

1. 人称类。除去人称类是为了获得文本的一致性，

最后的文本形式都是第三人称的，即一个“不参与”话语的标记。所有人称代词都将被一个约定的行动元所取代，比如说“言说者”或“书写者”，“听者”或“读者”；同样，在每个头语重复的位置上，我们也放上一个与之相应的行动元。本程序的目的不仅仅是对话语进行“非语法化”，描写者还必须对言说者渗入话语的各种隐蔽手段保持警惕，把它们一一剔除出文本；

2. 时态类。把所有与信息产生的时间有关的、指示时间的成分清除出去。不过，对所有“非同时性”这一特征仍需保留，例如“然后”这一与信息发生时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表达形式。对以上两种时间的表征必须进行仔细区分，因为在功能分析中我们需要使用非主观性时间；

3. 指别类。所有和陈述者本人有关的空间指别词，比如说限定词、人称代词或副词，只要和个人的主观感受有关，都在排除之列。仅仅保留在“另一域界”中形成的客观空间指别词；

4. 所有“寒暄成分”。我们从叶姆斯列夫处借用“寒暄功能”这一概念，用它来指所有让交流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的方法和成分。对这些成分的清除不仅仅意味着需要剔除类似于“喂，听见了吗？”这样的语段，同时也是对所有语法或词汇中的冗余的清理。假若冗余现象表达了一种“常态”（或一种“反复的纠缠”），那么描写的任务也是辨认和记录这一冗余现象，而不仅仅是记流水账。在此，规范化程序与清减程序走到了一起。

c）描写的基本句法

该句法的主线条已经很清楚了，现在要做的只是对其进行系统化。建立一个独立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句法，以满足我们以下的几个主要需要：

1. 剔除由形态类和句法类造成的杂乱和冗余；

2. 清除由同类义子的不同词类表达形式造成的句法上的同义现象；

3. 建立一个描写语言，对通过描写不同自然语言而得到的模型进行比较。

至于这个句法，大家还记得，它是对义子的二分：

行动元/谓词

对谓词再二分：

功能词/品质词

在许多自然语言中，功能词的内部还含有一个情态类，也需要全面进行描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不过这是一个猜测），情态词与谓词的关系是上下级的，如下例：

Jean aime jouer de la guitare.（让爱弹吉它。）

La Terre semble ronde.（地球好像是圆的。）

aime（爱）和 semble（好像）都是情态词，它们在逻辑上先于谓词，是对谓词的一种修正，对这种修正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描写，也可以置之不理。自以上判断语句而得来的信息可以表达成下面的形式：

$F(m)/A/$和$Q(m)/A/$[1]

品质词内也含有一个状态类，和谓词的关系也是上下级性质的。例如下面两个句子：

Pierre est parti précipitamment.

（皮叶尔急匆匆地走了。）

Le chemin était très long.（路很长。）

précipitamment（急匆匆）和 très（很）都可以被看作是状态词，构成了一个变数类，从下级的角度对谓语进行修正。

人们对状态词不甚了解，并常常将其同情态词混为一谈，状态词可以参与谓词义子的构造，也可以构成一个变数类，对某些谓词分析提供方便。分出一个状态词类完全是操作上的需要。我们在此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指出，借助于新的上下级关系，我们有可能扩大语义句法的分析面。以上自然语句转换成语义信息的形式如下：

$F(a)/A/$和$Q(a)/A/$.

因此，我们说情态词和状态词是谓词的“算子”。

至于行动元，我们曾临时地确定过它们的作用和数量。有四个行动元，现在我们再增加两个从属行动元，后边将用到它们，为了简化表达形式，我们把四个行动元和两个从属行动元一律简记为大写的 A，同时把它们编为 1 至 6 号：

主体 ………………………………… A_1

① F＝功能词，Q＝品质词，A＝行动元，m＝情态词。——译者注

客体 ………………………………… A_2

发送者 ……………………………… A_3

接受者 ……………………………… A_4

辅助者 ……………………………… A_5

反对者 ……………………………… A_6

我们有意地把这个句法建得尽量简单一些，我们再加几句话就能把它解释清楚：

1. 大写字母仅仅用来代表行动元和谓词（功能词 F 和品质词 Q），小写字母则用来记录那些有可能出现的上下级衔接关系；

2. 中括号内的是行动元，小括号里的是算子，谓词则不用任何括号；

3. 句法单位之间的关系用以下方法表达：

a）某种上下级关系：不用符号；

b）某种无法按描写语言正确记录的关系：（；）；

c）析分：（/）；

4. 把语句改写成信息的习惯次序如下：

$$F/Q(m;a)[A_1;A_2;A_3;A_4;A_5;A_6]$$

注 1：我们另外还用了几个比较抽象的符号。我们有意没有对它们的性质进行定义：一方面是因为还没有到时候，另一方面是出于谨慎，或者是无知。它们是：

a）≃表示关联性或等值性（或对诸如此类的关

系的强调)；

b)vs 指一般的对立(尚未确定具体性质的对立)；

c)→指先设关系或蕴涵关系。

注 2：非句法单位之间的关系的表达与本章研究无关，不过我们还是要指出：

a)义素用小写字母，以便与用大写字母表示的义素组和义子相区别；

b)义素之间所出现的那些未被确定的、但常常是上下级性质的关系用＋表示。

该符号出现时必须在上下文中注明其性质。

注 3：由于众多符号标记体系的存在，常常会出现一些混淆，所以我们尽量限制所用符号的数量。为了同一原因我们在此仅仅介绍了句法基础，每一个研究者——除非他自己另设计一个符号体系——都可以根据需要加以扩展。比如说，我们连量词也未提及(个体/全体；小量/大量)，而量词是修正行动元的算子，任何逻辑都无法绕过它们。当然，我们认为在语义学中它们的作用并不太大。

d) 描写的词汇

只要我们试图阐明一个义子，最后一定会对它命名，

其结果必然是创造一个新词。既然只有这一条路，那么规范化就应该能让我们用最经济的方式来完成命名行为。因此，描写术语的词汇必须尽可能是单义的，也就是说，以科学词汇为榜样，仅仅只覆盖一个义子。毫无疑问，要想真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有借用外语符号，或者拼合出一些新的图形，于是没人能看懂。显然，我们应该在模糊不清和无关联关系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点，然后让建构程序来分析这些描写词汇，用义素性质的定义来确立这些词汇。

注：追求语言美的人会继续诋毁这类巴罗克式的荒诞不经的新词，他们就是不明白这类用来命名的词汇已经不属于自然语言，而是第二个层次上的描写语言，如同代数符号一样。

我们知道自然语言拥有两个构词体系：一个是把义子灌进语法词类（动词、形容词等），另一个便是派生。所以，所有功能义子从原则上来讲都可以被表达成动词：résoudre（解决），marcher（行走），déménager（搬家）等，或名词：solution（解决办法），marche（行走），déménagement（搬家）等；同理，所有品质义子都可以表达为形容词：long（长），certain（肯定），intransitif（不及物的）等，或者派生名词：longueur（长度），certitude（肯定性），intransitivité（不及物性）等。这种自然的冗余现象只

会在描写的实践中造成一些麻烦。且不说我们常常遇到的如何区分行动元和谓语的问题，在分析中如何确定行动元的类型也是一个常见的难题，比如下边这两种说法：

问题的解决办法 $= F/A_2/$

老师的解决办法 $= F/A_1/$

它们的语法形式虽然一样，但行动元却不同。

面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更经济的办法就是在两种命名法中仅取一种，即排除掉语法类词汇，仅仅保留派生类词汇。派生类词汇通过加尾缀的办法改变一个义子的词性。下边是操作方法：

1. 把所有义子表达成名词的形式，就仿佛所有其他语法词类都不再存在，没有了对立面，名词本身作为类的性质也就无关紧要了；

2. 给品质义子加名词性后缀：-ement，-age，-tion等；如果是功能性义子，则加-ité，-itude，-ance、-eur 等等；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派生形式，也可以换个说法，如"……的事实(le fait de …)"。在这个程序中，词典学中系统使用的分类系统和定义系统，例如用在定义上的同义词和等值词，都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我们现在仅仅想阐明这一程序的原则，所以没有必要多谈细节：实际上，这一程序虽说是经验型的，但最近常被人采用。

以上建议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描写词汇体系。说实话，自然语言的形态类和句法类完全不一致，为了消除这种不一致性，语言学家们自觉或不那么自觉地

进行了斗争。这仅仅是斗争的一个阶段。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把句法中的行动元清减成语义行动元，从描写语言中删掉形态类。

注：在这里我们没有提及代表它们的符号，其原因当然是分析发展的实际需要。后边，当用于描写的词位减到一定数量时，我们再做介绍。

3 建 造

a）建造模型：清减和建构

在规范化的名下，我们研究了语义学句法和词汇中的一些最基本成分，它们是元语言框架，语料库中表征出来的内容将放在这些框架中描写。这个程序是对文本一致性的一个补充保证，能帮助我们更容易地发现冗余现象和结构性衔接。

这一描写阶段包括建立处理文本的模型，也就是把信息清单转换成结构。实际上，所有清单都是一个由实例组成的表，其长度与文本的特性有关，而模型则必须是简单的，仅带有有限的几个项。清单转换成结构，其第一个程序就是清减。另一方面，无论清单是一篇连续不断的文章还是一个目录性的东西，它们都是在罗列；反之，模型却是一个结构，即一系列意义关系的组织规则。建造模型

将涉及到的第二个程序自然是建构。

注：如果说我们没有按一般意义来随便地使用"建构"这个概念，那是因为我们想用这个词来专指一个特定的描写程序，该程序利用清减后的清单来建造模型。

现在我们分别来研究"清减"和"建构"这两个程序。

清减有简单清减和复杂清减两种。

b）简单清减

最简单的清减大概是对冗余的清减。我们知道，一个在话语时间上展开的文本若想具有某种常态，亦即一个总的意义，那么该意义的基本成分就必须在文本中反复出现。不过，冗余现象不仅仅是个数量问题，因为重复也常常引起"内容的形式"的相当大的变化。因此，清减冗余是以意义的某种贫乏为代价的：一旦确定了抽象的程度，描写就只能择取合适的内容，抛弃（或暂时悬置）那些属于个人风格的、对建立模型没有意义的成分。关于个人风格方面的成分，我们在后边还将谈到，如果分析的目的不同，这些成分也会有利用价值。

清减就是在数个义子或数个信息之间发现等值，用同一个名字来称呼属于同一类的等值实例。想要一下子就辨认出所有的等值关系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非

常困难的，所以需要进行多次清减，一步步地靠近目标。因此，到底清减到哪一步引进规范化会获得最佳效果，到底什么时候对建造的义子进行最终命名，就应该由描写者本人根据清单来决定。

一共有三种不同的简单清减：

1. 相同成分的清减。如果实例的构形成分和内容都一样的话，就应该对它们进行清减，仅仅将其看作是一个内容单位。比如说，在我们用过的斯坦恩的投射测验里，有一个句子的开头是："一个人的生命……"，而后边的回答都一样："……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为了分析的需要（也是为了规范化），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个实例："比什么都重要。"这个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

a)单独的构形成分不是一个清减的标准，尽管统计语言学常常使用这个方法：清减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内容的等值，而在对相同成分的清减中若想保证内容的等值，就必须对构成义子的上下文进行对比；

b)语义描写把重复看作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不是一个具有某种特别地位的东西，对某些内容成分的反复出现的频率也一样。在一个文本中，同形成分出现的频率是一个有用的指标，可以揭示隐藏着的同位现象，它的实用价值不可忽视。

2. 句法等值成分的清减。句法等值关系可以用大家熟知的例子来说明：

Adétruit B　　　　(A 摧毁 B)

Destruction de B par A (B 受到 A 的摧毁)

Action destructrice de A sur B (A 对 B 的摧毁行动)

其实，它们首先是内容的等值，既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形式的，也不完全是句法的。其次，在词汇变化上它们是很不相等的。例如，上边提到的对“一个人的生命”的评价，还有以下一些具体说法：

……比什么都有价值。

……比所有其他东西都重要。

……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

最高级形式各种变体是用词汇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把这些结构看作是等值的而非同一的。所谓句法的同一其实在此不过是等值性质的，很容易辨认出来。

3. 义子等值成分的清减。有些词位被看作是义子的义素核心，当它们不同形时，清减前必须先作分析。分析的对象是可以被转换成义子的实例，分析使用的是我们已经描写过的一些程序，例如从定义的简单比较到义子形象的建立。分析便是通过阐明所有实例内的共同成分以达到把实例清减成一个单一义子的目的。

对斯坦恩的“一个人的生命”这一测验的回答，除了用“重要”对其修饰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

……是最珍贵的东西(五例)

……比什么都重要(十例)

……比世上所有的金子都贵重(四例)

这二十个实例在表达上有许多共同点，它们可以被清减

成一份仅含有三例的清单。每个实例都可以被切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最……的东西

比什么都……

比世上所有的金子都……

它们都是一个意义成分，是修饰上的变体（在这个阶段，我们还不打算知道它们到底是一个义素还是一个义素组合），可以将其翻译成“最高级”。

第二个部分：

是　珍贵

　　重要

　　贵重

它们的定义也非常接近，是可比的，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义素内容“评价”（在清减阶段我们不做更进一步的义素分析）。

然后我们只需把提取出来的义素内容改造成品质词就行了（同时赋予其规范的形式）：经过以上的清减，我们便可以用语义学的术语来记录品质义子了：

Q《评价性》（a：《最高级》）

c）复杂清减

三种简单清减都含有相同的结构特征：它们都是通过比较和确认义素的同一性来进行的。若有必要，便对相异成分予以悬置。从结构上看，该程序利用合取关系，排

除析分关系。

我们把复杂清减这个提法留给主要用来处理上下级关系的程序。清减的目的不仅仅是建立等值类，它还企图把所有内容成分都汇集到一个类中——只要它们与文本的同位关系可以被定义为基本结构关系。

与简单清减一样，我们也可以区别出几种复杂清减。语义表征总是多义的，所以很难找到简明的例子。下边的例子就是如此，每个例子都带有全部的结构性特征，让人很想把它们分开来分析。在此，被阐明的对象的价值是次要的，重要是阐明的方式。

1. 形象清减。还是斯坦恩的例子，句子开头是"当弗兰克看见头儿走过来时……"学生的回答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下边这种类型的：

……他害怕了（三例）

……他胆怯了（三例）

经过简单清减，它们变成以下的信息形式：

Q（害怕）[A_1（弗兰克）；A_2（头儿）]

另一种回答形式如下：

……他发抖了。

……他脸发青。

……他脸苍白。

它们是"害怕"的形象表征。鉴于描写所选择的同位是精神的，而信息所扮演的角色又同时表征了"上、下级"行动元，所以清减应该从实际行为开始，比如说"脸发青"，一

直将其清减成“害怕”这一神话意义，而不是相反。不过，大家知道，这类实用谓词是上下级的，是在用具体事件表现“害怕”，它们在纵聚合轴上构成了一个无穷尽的风格变体单位。于是，下级的等值实例类还可以扩大，例如包括以下回答：

……他溜了。

……他躲起来。

……他藏到大树后。

……他闪到街角的另一边。

这些起定义作用的语段，完全可以整合到一个命名类里去。

2. 上下级关系的清减。下面有一段话，择自伏尔泰的《哲学通讯》(关于“颤抖教派”的第一封信)：

“(战后)整个伦敦灯火通明，

天空燃烧着火箭，

钟声，礼炮声，欢呼声和管风琴声响彻云空，

(而我们却在为引起群众狂欢的屠杀而哀伤)。”

除掉括号中的句子，上边择取出来的这一段话正好有三句，可以翻译成三个语义信息。其实，这三个句子(以及各种欢庆声音的列举)不过是伏尔泰夸张文风的表现罢了，它们完全可能而且必须被缩减成一个句子，一个类似于“伦敦庆祝胜利”的陈述。于规范化前的整个语段等值的这一语句，可作以下表达：

F(欢乐)[A_1(非颤抖教派)；量词(全体)]

该问题用修辞学来解释似乎比较简单。不过，它涉及到语言的语法形态功能，而省略和曲言法仅仅是其部分的表现。所有的语言功能词都对应着一个所谓“真实”的行为。功能词可以被看作是上级的：它下面可以含有一连串潜在的、仅描写某些部分行为的功能词，它们覆盖着一系列分得更细的行为；功能词也可以被看作是下级的：它其实属于而且也应该属于一个命名功能，该命名功能指向一个由多个局部性功能词所组成的算式。如果把这种所谓的命名法应用到更大的话语单位上，该问题便同样出现在信息资料的处理上。对资料我们需要压缩，于是就会用到一种研究得很不够的复杂程序：内容提要（abstracts）。与其相反的程序是扩展，在法语教学的模式中就能见到它，即那种格式固定的作文，大概是古典修辞学的遗风。两个程序是互补的，需要为它们建立一些精简和生成的规则，使它们真正成为发现和描写的具体技术。

建立这些规则当然是可能的，但有一个既是理论又是实际的困难：消减到哪一个程度才算最佳？问题不在数量，问题不在于知不知道每一个算式带有几个功能词，一个命名算式的规模有多大。在整个描写过程中紧紧抓住文本的同位，对功能词相继进行压缩和扩展，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很难掌握，带有不小的主观色彩。功能分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因素：在前一章的某个部分我们曾提到过民间童话的分析，并对普洛普（Propp）功能清单做过一点改进，以便让叙事的结构更趋平衡。读

者会发现，除了描写的最基本概念“同位”以外，清减也能够很好地借助这个例子来保持叙事的整体性，也就是模型的内在一致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清减有时以压缩的形式（即上级功能：命名的形式）出现，有时以扩展的形式（即下级功能：对一个过于抽象的功能再细分）出现，尽管这些下级功能的名字有时在表征中并不直接在场。

3. 把功能词清减成品质词。在这儿出现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它们又常常纠缠在一起：一个问题是在规范化程序中很难确认品质义子，并把它们与功能义子区分开来；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清减程序中把辨认和记录下来的功能义子分别和整个类别一起移植到品质义子的清单中去。

a）伊丽嘉蕾女士（L. Irigaray）曾为圣一安娜精神病院的老年病人设计过一个语义测验，它们能够部分地说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例如，她请病人在以下三个句子中挑出一个与“医生”这个命名等值的义群：

医生是负责泊车的吗？

医生是开火车的吗？

医生是治病的吗？

被测者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无法区分哪些是用来修饰医生的语段，哪些是赋予他一个功能的语段。无疑，这一测验构成了一个结构性检测标准，把我们称之为元语言活动在病人身上的衰退和停止给标示了出来。

问题还不止此。在所有的分析中，当区分得不是太绝对时，在这儿部分地起作用的东西还会重新出现，就是说，语段所拥有的所有功能词都具有重复的特征。在本例，构成现在时的成分中就有重复的东西，其下级含有“完成体”/“未完成体”的对立，并和客体行动元的复数形式融为一体。到底是延续体还是重复体，应该事先得到确定，以便以后好对功能词进行“退化”处理，把它变成定义的特殊形象，变成一个品质，也就是说成为行动元的一个常态定语。如果功能词带有情态词“知”(savoir)或“能”(pouvoir)，道理也一样，它们也因此而变成了一个常态的属性。还必须补充一点：在我们把形象表征消减为非形象表征的例子里，完成体“他溜了”之所以可以转换成“害怕”，是因为所有的回答都重复了同一个意思。该实例不是孤立的，它属于一个集体语料库。

我们大概有必要确定品质词和功能词之间的关系性质。假设描写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库中提取了所有关于一个行动元的功能词，这一清单能提供给我们的至多也就是一个行动元的“活动领域”。其后的分析只能把重点放在那些冗余的功能上，创建的模型也只能说明那些具有特征的行为结构。这样处理功能词当然是合法的，但无论是把它们看作是一些不完整的清单，对功能词一个个地分别进行处理，还是将其看作是一个组合模型，我们都在冒险，有可能使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像是品质词，像是清单或品质模型的下级成分。如果情况确实如

此，建一个把功能词改造成品质词的程序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我们有机会便给出几个样品。不过，对功能词的这种处理决不能和功能模型本身的描写混为一谈：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个功能词的清单并不一定潜在地从属于一个功能性质的模型，因为功能模型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对功能进行一个最起码的编程，使它们具有连贯性。

于是功能分析便具有了双重使命：如果分析只考虑行动元和功能词之间的关系，那么其模型与品质模型便是可比的，在某种条件下，它甚至是品质模型的下级；如果分析感兴趣的是功能之间的关系，它便有能力阐明这样一类模型，这类模型揭示的不是语义微观世界的存在方式，而是它们的转换方式。

d）语义学与文体学

所有前边关于描写程序的思考说明，分析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意义成分的挑选和清除。从整体上看，描写的步骤一方面是对内容常量的寻找，另一方面是对其变量的一步步扬弃，也可以说是看重内容实体，看轻形式成分。

所以说，对一个语料库进行语义描写，就是从实例出发，把它们改造成清单，然后把清单改造成各种类，必要的话，甚至是类上的类，最后，达到建立模型的目的，达到说明表征在语料库中的语义微观世界存在方式的目的。不过，这个向上的描写法可以而且有时也必须有一个向

下的描写法来补充：向下的任务就是从固定的模型出发，把那些被前边每一步剔除的变量重新汇集起来，把它们建成系统或语法形态结构，建成一个次模型，用来说明上层结构的生成能力和运行方式。这个向下的描写步骤称之为“文体学描写法”。

文体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与第一种相对应的是先它而做的复杂清减，它的性质是下级的（借喻）。第一次清减时所获得的义子与最后确立的同位之间有一段距离。该研究要说明的是能够定义这一距离的各种关系，我们称它为“义子文体学”。虽然它所处的抽象层次更高一些，但总的来说，它相当于人们长期以来研究的那些关系类别：借喻与转义。第二种文体学描写方法是把那些被简单清减放在一边的变量再捡起来，关注的是析分性质的关系（隐喻），它所促进的是对能被建造成描写义子的实例的义素分析。因此，第二种描写法是一个“义素文体学”。鉴于其分析重点，它相当于一个多少有点被忽视的语言学科：词汇的形成。现今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将很快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杜博阿的目的就是为了阐明他所说的微观系统（如：路≃道≃径；年≃岁；上午≃早上，等等），他的描写可以对这类研究提供模式。

注：这里引进的术语具有多义性，对此我们很清醒。一个语义描写步骤之所以是语义学的，完全取决于它的目标：那就是依靠义素组建立一个模型，而义

素组在原则上属于内在语义层面。

至于文体学的步骤，它一方面部分地等同于结构性修辞的层级，另一方面又把基本文化层级和历史层级之间的关系扔在了一边。与其建一个臃肿的术语体系，我们还不如先收集并确定一套术语所需的各种条件。

语义学分析和文体学分析可以说是同一个描写的两个不同阶段，不过前一个分析是后一个的前提：只在结束了语义学描写后才可能谈到文体学分析，只有在建立了一个具有不变量性质的内容同位之后，才谈得上去寻找其变量。如果不这样考虑问题，语言中的一切都可能被看作是文体学的——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语言学家和文学爱好者论战中那种隐蔽的误会也只会越来越大。

e）建构

建构这个词被我们用来指清减的补充描写程序。它的本意“建造结构”，对我们处理清减之后所获得的成分十分有用。

清减程序和建构程序既然是互补的，那么，描写作为程序，其历时性地位就有了问题。如果说描写的结果——以及我们此刻对各个步骤的解释——都让人觉得这两个术语定义了两个先后相继发生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应于两个不同的操作，那么描写只能被看作是历时性的。若

想把一份实例的清单清减为一个类并用一个义子来命名它，就必须存在着另一份与之截然相反的清单，并且已被命名。我们再解释一下：把一份清单单独地清减为一个构造义子是完全可能的，这已被我们所证明，例如我们对“劳累”类中的等值关系的清减。然而，如果不是事先已经存在着一个给定的语料库，如果不是为同位描写服务，这一清减就不一定是合适的了：所有话语表征都拥有一个独特的结构，语料库不同，每一份等值清单便也有可能不同。这等于说，清减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着一个哪怕是假设的对结构的表征，可是，对于建构程序来说，要想正常地进行，又必须等到清减的完成。

我们知道，相互预设是意义基本结构的复合衔接的一个特征。我们把描写看作是元语言，它不仅拥有与众不同的结构，而且，它还由数个程序组成。它的运作，也就是描写研究，必须同时把握这些程序。程序的各项都属于一个静态复合结构，如果我们在该结构起作用时使用这些程序，那么这些程序便是“补充”程序，它们并不会对该结构的共时性带来任何问题。描写是元语言层面上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程序的集合构成了描写模型，它们同时出场并一齐起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描写程序就是结构的运行规则，正如语法规则能够说明语法结构的运作一样。

语料库可以是简单的，仅仅只需要一次建构；也可以是复杂的，需要多次建构。在后一种情况下，描写可分为

数个独立的部分性质的描写，一个描写套另一个描写地进行下去。应该记住，每一个部分描写只是在把清减后所获得的义子内容组织成基本结构的衔接。

f）对应与生成

为了进一步弄清建构和清减这两个程序之间的互补性，我们想在此引进一个新概念：对应。据拉兰德的《哲学词汇》，有下边这样一个关系体系：

$$A/B$$
$$A'/B'$$

相对于 B 和 B'，A 与 A'之间的关系是“对应”的。更准确地说，“在数学中，两个相似形象部分之间的相应——更概括地说是‘相关’——关系，就是对应关系”。为了当前的需要，把这个概念的定义再压缩一下，我们就有了以下的对应：

$$S_{(s)}/非 S_{(非 s)}$$
$$S'_{(s)}/非 S'_{(非 s)}$$

它的意思是：相对于非 S 和非 S'而言，只要 S 与 S'共有一个义素内容 *s*（即最少一个义素），它们两个就是对应的。*s* 作为正项，与义子非 S 和非 S'中的负项非 *s* 同在。换句话说，S 与 S'作为实例义子之所以可以被清减为一个描写义子，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内部存在着相同的义素内容，而且，在与其平行的实例清单非 S 和非 S'中，还可以找到这个义素内容的对立项，使得非 S 和非 S'也可以被

清减为另一个描写义子。这第二个描写义子和前一个描写义子的关系也是对应的。如此来理解的对应关系，它既包括清减程序也包括建构程序。

由此可见，简单清减的特点就是在一例句清单中寻找同一的义素内容 s，而这个同一则必须是"建构"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确定一个义素组的正项，但它必须有一个与其相对立的负项。至于复杂清减，它需要一个为所有实例所共有的、常常是定位义素性质的基础，还需要某种义素内容在场，此类义素内容之间的等值关系则只能靠下级关系来建立。

这个一直被我们看作是二元的对应关系，其实还可以扩充，变成一个衔接着六个项的基本结构。如果大家同意一个二元的范畴有可能表征为六个实在的义子，而且每个义子之间具有足够大的意义区别，那么，就不能排除在一个以同样方式衔接的结构性框架内也可能存在着这种对应。

在历时性语料库中有一些错综复杂的区域，"对应"关系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发生在这类区域的结构性转换。雅格布森是第一个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人，他建议把它们放在对结构成分的再定义的框架中去解释。于是，变格在古法语中的消失就可以用语序体系的形成来解释：由于二者是冗余的，所以词尾的变格就不再是必需的了，当然应该消失。不错，这个例子仅仅考虑了构形成分的替代，而行动元"主体"/"客体"的对立在某些表达重

叠的地方也是冗余的，但却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

不过，这种再定义的形式完全可以移植到内容层面上来：一个对应的二元结构，以常态形式运行，以冗余的形式生产着可以用来替换的对称义子：S′，S″，S‴，等等，和它们构成析分关系的则是：非 S′，非 S″，非 S‴。在一定时候，这个结构所生产的不仅仅是二元的义子，甚至是三元的义子结构，除了带有两极的义子之外，还拥有第三个衔接复合项的义子。只要这类三项衔接的实例持续表征，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即含有二元又含有三元结构的交错区域，最后让我们只看见三元结构。这种结构性转换曾被列维－斯特劳斯描述过(《社会人类学》，第 248 页)，他指出，像下边这样的二元对应结构：

S(生)/非 S(死)

S_1(务农)/非 S_1(打仗)

就天然具有生成第三个复合项或过渡项的功能：

务农/ 打猎/ 打仗
(正项)(复合项)(负项)

注：事实上，像前边一样，问题比想像的要复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对实例变体的替换在一定情况下会影响结构。习惯上人们总是说这是由于时间长河的磨洗冲刷，这种说法并不能服人。我们在后边还将分析贝纳诺斯小说中的“生”/“死”的结构，届时将重新探讨这个问题。

生成新结构项的反向运动就是结构的蜕化，反向的转换能使结构简单化。大家只需想想布龙达尔的观点就明白了，对他来说，人类精神的进步就在于做到了简化，把结构最后简化成二元，结构于是也就蜕化了。当然，布龙达尔的这种带有价值倾向的说法——我们的术语把它颠倒过来——与语言研究无关。

g）内容的建立及其组织

为了满足建一个关联结构的需要，我们设计了各种清减程序，它们的共性是对应关系。我们根据一个封闭的表征语料库列举了关于语义微观世界的一般性程序，谈完了对应关系，列举也就结束了。下边谈到的方法与具体模型的组织有关。

内容本身，就是说处在一个封闭和冗余的表征内部的内容，是由话语的述谓活动建立的，所以我们根据信息清单对其进行描写。只要描写的是内容本身，其程序就必定是一般性的。对**功能**或**品质**谓词进行分析，将帮助我们建立单个的或全体的行动元（关于如何给它们摊派不同的角色，还必须建立一些规则）：描写了内容，研究了它们的程序，从原则上来讲，我们面对的就会是一些对应的简单结构，其数量应等同于行动元的数量。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描写阶段，考虑的应是如何识别行动元，建造它们的结构，使其构成一个描写用的微观世界。

不过，另选一个突破口也是可能的。述谓分析把一个

功能信息清单转换成一批数量有限的对应的内容结构。我们也可以不把这些结构应用于行动元，而是反过来，把重点放在功能类之间的关系上，把对应的内容看作是这些类别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行动元的组成部分。我们在确立功能词的时候发现，若想进行功能分析，就必须把功能词（此时的功能词是已经赋值的功能词，即内部含有分析过的对应内容的功能词）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连贯的，它们必须表现出历时性，在逻辑上有“先、后”之分。这是一种与建构行动元不同的描写，可以把已经赋有内容值的功能词组织成一个转换语段，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专门研究。

这是建构的最后一个阶段，它用来组织行动元或功能词内部的已经得到赋值和确立的内容，描写应该到此结束。从体系上来看，描写在本质上是分类型的，把意义组织成可操作的分等级的内容。由此出发而建立的模型应该能将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模型的存在方式就是微观世界的存在方式。不过，模型同时又比具体内容更一般，有点像是一些不变量，它们构成了微观世界的意义组织的一些固定“图式”，对其内容进行具体赋值的才是变量。

我们现在似乎有点像盲人摸象，所以不敢过早地提出假设。我们只能摸索着前行：后边的三章是我们思考的一些样本，涉及到某些具体领域，其分析也不是很完善。我们对这些样本进行了一般化处理，其假设的性质一目了然。

对行动元模型的思考

1　描写的两个层次

当神话学家杜梅泽尔（Dumézil）描写众神的世界时，他一个个地分析其代表人物，其程序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1. 随便选一个神，用所有宗教的、神话的或民间传说的文本组成一个语料库，在这个由语句构成的语料库里，神是一个行动元。从这个功能信息清单出发，经过逐步缩减，建立对应关系，最后建立了一个人们可以称之为神的活动范围的区域；

2. 然后再建一个与之平行的语料库，其中包括所有修饰神的品质词，例如神的别名，固定称呼和形容词，或者表达其神性的扩展词组，通过分析它们描绘神的精神面貌。

于是，对同一个神便有了两个可能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根据神的行为来定义神，不过，由于其活动是虚构性的，所以神被定义为幻境中的行动元；第二个定义用一连串的集体的价值判断来定义神这个行动元。

在人间发生的事也不例外：例如，罗兰一巴尔特在描写拉辛的悲剧世界时，所侧重的就是功能分析，他断言在拉辛的悲剧里并没有心理分析的成分。这对于传统上喜欢用品质来解释一切的人来说，当然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认为，在这个描写层次上，两种谓词分析——功能的和品质的——相互间并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是互补的，各自的结论也应能在两个模型之间相互转换：神根据他特有的道德观行动，而他所经常重复的被认为是典型的行为，应该可以转换成相应的品质。描写程序的进一步分离则是下一步的事。当行动元已被建立，也就是说已被赋予内容值，那才是对其生活和行动的微观世界进行描写的时候。若想进行这个更高层次的描写，我们必须对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某种把握和假设。不过，在建立行动元之前，还必须回答两类问题：a）同一个微观世界内的行动元之间保持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它们又具有何种相同的存在方式？b）赋予这些行动元一个什么样的总的行为含义？"行为"的内容是什么，如果行为是可以转换的，那么其转换的结构框架又是什么？

我们先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

2　语言学意义上的行动元

前边说过，泰聂尔曾把一个基本陈述比作是一台上

演的戏剧，这个提法非常新颖，其本意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教学。大家记得，据传统句法，“功能”是单词所扮演的角色，如主语是“行为的施动者”，宾语是“行为的承受者”等等。从这种观点出发，句子就只是一个会说话的人（homo loquens）自我表演的戏剧。这个戏剧有点独特，它总在重复同一个剧情：动作的内容变幻无穷，演员各异，但戏剧陈述却一成不变，正是角色的单一分配方式保证了这种剧情的常态。

能分配的角色总是那几个，我们说这种现象决非偶然：我们知道，人类一次攫取意义的能力决定了行动元的数量。至于这些角色的性质，似乎解释起来比较困难；至少，我们认为有必要改造那种不完善的三元关系，用两对行动元的范畴来取代它：

主体/客体

发送者/接受者

由此出发，我们再进行以下推理：既然“自然”的话语既不能增加行动元的数量也不能把对意义的句法感知扩大到句外，那么所有微观世界的情况也就只能如此；或者反过来说，一个语义微观世界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以一个简单剧的形式、或一个行动元结构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时，这个微观世界才能被称为微观世界，即一个完整的意义。

下面我们根据句法、行动元模型的新的语义地位，以及微观世界的新维度，再做一些实际调整，确定一个完

善的行动元的模型。一方面，按其句法地位对行动元进行缩减（玛丽无论是收信还是有人给她寄信，她始终是“接受元”）；另一方面，所有在场的、属于一个行动元的功能词，无论它们有多么分散，都将被收集在一个语料库中，以便让每一个表征的行动元都拥有自己的语义赋值。然后我们便可以说，不管行动元之间有着什么关系，所有行动元的集合代表了整个表征。

这是我们关于一个行动元模型的假设，它可能是语义世界的一个组织原则。语义世界过于庞大，我们无法一下子把握其整体，只有将其分解成微观世界，才有可能进行描写。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某个限定的领域进行具体的描写；或者，即使不做细致的分析，至少也要粗略地扫描一下各种不同的大型符号集合，用此来证实我们上边的语言学推理，并对意义、对行动元可能具有的衔接方式提供信息。

3　俄国民间童话中的行动元

以上假设的第一个证据是普洛普在《俄国民间童话的形态学》一书中提供的。该书的美国译本很新，法国人知道它则是更近的事。普洛普先把民间童话定义为一个在时间直线上展开的三十一个“功能”，然后向自己提出了行动元的问题，他的叫法是“戏剧人物”（dramatis

personae)。他对行动元的设计是功能性的：他认为，人物是由其“行动区域”来定义的，这些区域则由所有赋予该人物的功能簇组成。通过对一个语料库中的全部童话实例进行对比，人物（我们倾向于用“角色”这个称呼）虽然每每不同，但人物“行动域”中却总有些不变的东西。下面我们用个简单的图表来说明：

	信息 1		信息 2		信息 3	
童话 1	F_1	a_1	F_2	a_1	F_3	a_1
童话 2	F_1	a_2	F_2	a_2	F_3	a_2
童话 3	F_1	a_3	F_2	a_3	F_3	a_3

在该表中，如果我们把 F_1、F_2 和 F_3 定义为行动元 A_1 的行动域，那么，从一个童话到另一个童话，行动域并没有变，我们就可以把 a_1，a_2 和 a_3 看作是同一个行动元 A_1 的不同的表达形式，A_1 总是由相同的行动域来定义的。

由此，我们发现，角色是每个具体童话里的东西，而行动元作为角色的类，则只能从语料库里的所有童话中概括出来：角色之间的衔接构成了童话的“个性”，行动元的结构则描写了一个“种类”。因此，和角色相比，行动元具有元语言的性质。要想得到行动元，就必须先进行功能分析，也就是说，先建立起完整的行动域。

这里有两个程序：一个是描写功能行为以便确定角色，另一个是把角色汇集到一块儿然后清减成行动元类。依靠

这两个程序，普洛普建立了行动元的最终名单，它们是：

1. the villain——反面人物[①]

2. the donor (provider)——施予者（供给者）

3. the helper——协助者

4. the sought-for person (and her father)——被追求者（和她的父亲）

5. the dispatcher——派遣者

6. the hero——主人公（英雄）

7. the false hero——假主人公

根据这一名单，普洛普给出了一个关于童话的行动元定义，即童话是含有七个人物的叙事。

4 戏剧中的行动元

另外还有一份和普洛普的结论极其相似的名单，即苏里奥（E. Souriau）在其论著《二十万个戏剧情节》中所介绍的剧情“功能”表。苏里奥的分析不够具体，还有点主观，但和普洛普的思想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普洛普的思想。苏里奥很可能没读过普洛普的书，而且这个问题问得也没有意义。苏里奥思想的意义在于：他让我们看到可以把行动元的理论用在

① 右边的汉语直接从法语译出，格雷马斯采取的是意译，与英文不一定一一对应。——译者注

另一种叙事上，即戏剧作品上。戏剧和童话的性质完全不同，但它们的分析结果却十分相似。尽管苏里奥用了不同的术语，但我们在他的书中仍然能找到同样的划分：即事件性历史（对他而言是前后相衔一个个“戏剧主题”）和语义描写层面（通过描写“情节”，将其分解为行动元的动程）之间的区分。在他的书里，也有一批数量有限的行动元（他按传统句法习惯称之为“功能”）。不巧的是，他犹豫了半天，不知是确定六个还是七个“戏剧功能”，最后还是决定只要六个。米朔（Guy Michaud）对此持反对意见，在《著书技术》一书里，他试图建立第七个功能，即“叛徒”的功能。民间童话和戏剧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体裁，但对它们的行动元的定义却极其相似，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它们都是有七个人物的叙事。

下面是苏里奥提供的名单：

狮子星座 ……定向的主题力量；
太阳 ……代表价值取向，代表主人翁渴望获得的利益；
地球 ……利益的潜在获得者；
战神星（火星）……反对者；
天秤星座 ……裁判，发送和分配利益；
月亮 ……救援者，增强上边的某一种力量。

不要被其中的能量术语和星象学术语吓倒，苏里奥的理论本身还是有着某种一致性的。

5 行动元范畴：主体/客体

普洛普和苏里奥的理论都证明了我们的一个重要发现：使用有限的几个行动元便能说明微观世界的内部组织。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形式化的程度，或者过分或者不够。仅仅用行动元的数量来确定一个文学类型，对其他内容则一概不理，这一定义的形式化程度显然过高；用一个简单的名单来列举行动元，不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做在定义的第二个部分即各自特征的形式化上所下的功夫显然不够。我们有必要给行动元分一下类。第一步，我们先把三份名单摆在一起，这三份名单便是普洛普的、苏里奥的，还有我们自己从话语句法运行中概括出来的两对行动元，我们行动元的数量最少。

第一个发现便是普洛普和苏里奥的名单中都能找到"主体"/"客体"这种句法行动元的对立。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功夫还是无法确定"主体元"和"客体元"的关系，而在这两个名单中，它们关系的语义赋值却似乎是一样的，即"欲望"。似乎可以这样设想：通过以上的义素组合，处在表征的虚构向度上的"及物性"或——照我们前边的说法——"目的论"关系，构成了一个实现"欲望"这个语义效果的义子。果然如此的话，那么，根据"欲望"衔接起来的第一组行动元的

对立就定义了民间童话和戏剧情节这两个微观世界，它们能生成一系列具体叙事，而其中“欲望”表征的形式便同时是实用的和虚构的“追求”。

下面是第一组行动元的等值表：

句法	主体/客体
普洛普	主人公/被追求者
苏里奥	定向的主题力量/价值取向和渴望获得的利益的代表

6 行动元范畴：发送者/接受者

想在普洛普和苏里奥那里找到这第二组行动元范畴的对应物，有些困难。行动元的表征常常是综合性的，在句法分析阶段我们已经遇见过类似情况：在一个角色的形式下，往往会掩藏着合为一体的两个行动元。

比如，一个常见的爱情故事，没有父母横加干预，有情人终成眷属，主体便兼有接受元的功能，客体也是爱情的发送元：

$$\frac{\text{他}}{\text{她}} \simeq \frac{\text{主体}+\text{接受者}}{\text{客体}+\text{发送者}}$$

形式上是两个角色，但其内部却综合了相反的两两对应的四个行动元。

在勒格兰为“瑟堡”所写的主题歌中，以上情形更是一目了然：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一个苹果，一出戏。"

在此，客体和发送者轻易地一分为二，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由三个行动元构成的模型。

在《追寻圣格拉尔》这类叙事中，情况就不同了，四个行动元相互独立，被衔接成两组范畴：

$$\frac{\text{主体}}{\text{客体}} \sim \frac{\text{主人公}}{\text{圣格拉尔}}$$

$$\frac{\text{发送者}}{\text{接受者}} \sim \frac{\text{上帝}}{\text{人类}}$$

用此来解释苏里奥的描写完全没有困难：

发送者/接受者

的范畴在他的描写中被清晰地表示为：

裁判，利益的发送者/利益的潜在获得者

反之，在普洛普的分析中，接受元似乎衔接着两个角色，第一个还荒唐地和欲望对象混在一起：

（被追求者）和她的父亲

而发送元的名字在他那儿则叫做"派遣者"（委托者）。在具体故事中，发送元有时是国王，有时是父亲——父亲和国王可以由同一个角色担任，他（们）委托给英雄一个任务。我们不需要做太大调整，也不需要求助于心理分析，就能把欲望对象的父亲看作是委托者，如果他们在故事中是两个人，就把他们看作是同属于一个行动元的两个角色。

至于接受元，它的活动领域在俄国民间童话中似乎

和主人公—主体元完全搅在一起。对此，我们可以提一个在后边还会涉及到的理论问题：这种融合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判断标准？是不是可以用它来确定一个文学门类下的次类？

到此为止，两组行动元范畴构成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它们的中轴是“客体”，客体既是欲望的对象，也是交流的对象。

7 行动元范畴：辅助者/反对者

大概是因为我们还缺少一个句法模型，所以，难以确定其他行动元的衔接方式。不过，人们很容易见到这样两种行动域，其内部有着两类明显不同的功能：

1. 第一类功能有助于欲望的实现，它利于交流；

2. 另一类反之，它制造障碍，阻滞欲望的实现，它妨碍交流。

这两个功能簇就是两个不同的行动元，名字叫作：

辅助者/反对者

这种叫法与苏里奥的提法十分一致，“反对者”的叫法就来自于他；我们对“救援者”的称呼不很满意，所以选用了米朔的说法：辅助者。在普洛普的书里，反对者被贬称为“反面人物”，代表辅助者的则有两个人物：“施予者”与“协助者”。初看上去，我们的分析似乎过

于灵活。

不过，不要忘了普洛普（暂不提苏里奥）的“功能”仅仅是从行动域中提炼出来的，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功能之间那不可缺少的对应关系。我们在此并不想批评普洛普，其开创性不容忽视，我们仅仅是想让大家了解近三十年来在结构主义方法的普及上所获得的成就。还应牢记住一个事实：有两个可比的名单总比只有一个容易操作。

我们要问，在我们探索其行动元结构的这个神话世界里，辅助者和反对者的对立意味着什么？初看上去，情形似乎有点像一个投影在价值观银幕上的剧情影像，除了几个主要人物外，现在又出现了一些代表世间善和恶势力的行动元，它们分别是中世纪宗教剧中的守护天使和恶魔。

还有一点也十分令人惊奇，那就是这后两个行动元的次要地位。想到我们用来给这两个行动元命名的单词都是分词形式，如果作点文字游戏的话，我们会说它们是两个状语性的“参与者”，并不能算剧中的正牌行动元。实际上，分词就是形容词，它们起修饰名词的作用，正如副词起修饰动词的作用一样。

在探讨规范化程序的过程中，我们曾试图给出一个副词的形式化地位，把它们称作状态词，看作是功能词下一级的次类。在法语中，在定义非常模糊的副词类里，有一批数量很小的性质副词，其对立形式有两种：

情愿/勉强

好/坏

它们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些状态范畴，不过用语义解释有点困难：第一组，在由确定的功能词赋值的动程中，指的大概是“意愿”参与的程度，是自愿还是不自愿；第二组，是主体对功能、对其本身动程的评价（主体在此与言说者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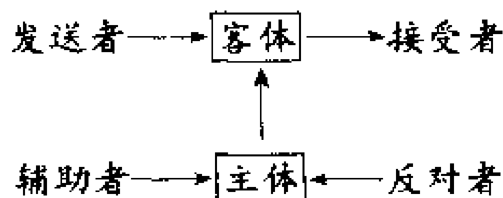
大家大概已经猜到了我们的下文：如果把功能词看作是行动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意把状态范畴看作是状态元呢？它们也是主体一行动元的下级构成部分。在我们所研究的神话表征里，大家明白，主体在干一件事时会对自己的意愿有所表示，想干或不想干，对实现欲望是有利还是有害，辅助者和反对者就是这二者的投影。

以上说法自有其价值。它试着解释两份名单中除真正行动元外的状态元，并同时挑明了它们的句法地位和语义地位。

8　神话行动元的模型

根据几份清单，并参照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我们归纳出行动元模型，但这个模型还不是太可靠。不过，其形式极为简单，仅对神话表征的分析而言，它具有一定

的操作价值。它的简单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它们是围绕着主体欲望的对象（客体）组织起来的，正如客体处在发送者和接受者的中间，主体的欲望则投射成辅助者和反对者：



9 “主题”赋值

我们认为这个模型具有操作价值，这是一个建设性假设。可能会有人问它到底有什么用，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作一个提示：我们把句法范畴和普洛普、苏里奥的清单进行对照，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把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该关系开始被看得更抽象一些，被当作一个目的性关系，即一个“能做”[pouvoir faire]的模态。在功能表征层面，“能做”将会找到一个实用的或神话的“做”[faire]）看作是一个特殊关系，具有更厚重的意义赋值，即“欲望”，“欲望”在表征的功能层面上表现为“追求”。我们认为，这个模型的具体化首先涉及到行动元“主体”/“客体”间的关系，各种具体化表现为一个变量类，而变量由补充赋值构成。

如果更简单化一些，我们以为，对一个启蒙时代的

哲人而言，欲望的关系，欲望的义素赋值，可以具体为求知欲，这个求知剧中的行动元大概按下列方式分配：

主　体……哲学家

客　体……世界

发送者……上帝

接受者……人类

反对者……物质

辅助者……精神

同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对其积极分子而言，是希望为人服务，所以可作类似下列的分配：

主　体……人

客　体……无阶级社会

发送者……历史

接受者……人类

反对者……资产阶级

辅助者……工人阶级

苏里奥走的大概也是一条同样的路，他建立了一个主要的"主题性力量"清单，尽管该清单"带有很大的经验色彩，也不够完整"（作者本人语），但却能让我们对问题的多样性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主要的主题性力量

——爱情（异性之爱或亲情之爱，友谊：包括欣赏，道德责任，发自内心的关心）；

——宗教或政治狂热；

——贪婪，吝啬，骄傲，发财欲，奢侈欲，享乐欲，对外表美的追求，对名誉、地位、权力、肉体享乐的追求；

——羡慕，嫉妒；

——仇恨，复仇欲；

——（对具体事物的、对生命的或形而上学的）好奇；

——爱国主义；

——对某项工作的向往，一个志愿（宗教、科学或艺术方面的志愿，或出游、经商、从戎、从政的志愿）；

——渴望自由、解放、和平、避难或休息；

——对新事物和异域他乡的需要；

——对激情、行动的需要；

——需要觉得活得有意义，需要自我完善、自我完成；

——所有罪恶之渊薮或经验所造成的昏眩；

——所有恐惧：

害怕死亡；

犯罪、负疚；

痛苦、苦难；

外表丑；

生病；

烦恼；

丧失爱情；

担心亲人遇难、受苦、死亡、变坏、堕落；

对彼岸事物的企盼和恐惧（?）。

这个清单不完整，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分类，不过作者自己并没有这个打算，所以我们不能埋怨他。但是，我们在这个清单中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二分，一般来说它很容易被人忽视：一边是欲望和需要，另一边是与之对立的“所有的恐惧”。由此可见，我们围绕着“欲望”关系建立起来的行动元模型完全可能经受一个负转换范畴：

困扰/恐惧

中词项的替换原则上将对模型内所有词项衔接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上的假设是：通过一步步改变赋值内容，可以使模型具体化。这个假设的主要缺陷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苏里奥所列举的各种可赋之值对模型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它们不是属于主体行动元的语义内容就是属于客体行动元的语义内容。其实，对这两个语义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程序来赋值，尤其是通过先于行动元模型建构的品质分析来赋值。

10　经济上的赋值

谈到赋值，很难不给出一个当代神话表征的例子，这个例子属于企业投资范围，在此范围似乎只有实用表征有存在的权利。这个例子本身发展出了一个行动元结构，

而且其结构的主线和我们所提出的操作模型相符。材料来自于马戈一杜克洛（Margot-Duclot）的一篇文章："关于投资行为的一次临床调查"，文章大概会被收进一本名叫《经济与人文科学》的论文集。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以非导向性采访的形式写出来的，所以用行动元模型框架分析起来比较方便。企业主对调查者描述他的经济活动，将其转换成一个事实上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清单，即一个虚构的清单。于是，一个潜在的行动元结构便从中间显示出来。

主人公主体自然是投资者，投资者尝试着描写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说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价值。

在思想上，投资的目的（客体），就是拯救和保护企业。主人公有时谈企业就像在谈自己的孩子，需要保护它免受外界的威胁。

反对者的表现形式是科技的进步，威胁着现有的平衡。

辅助者当然是先于投资的准备性研究：市场调查，办理各种许可证，盈利情况，经济计量学研究，可行性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尽管被主体说得天花乱坠，但和关键时刻善于决断的能力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决断靠的是直觉和嗅觉，一种神乎其神的能力，是它把董事长变成了神话主人公。

发送者是经济体系，它和主人公之间有一个无形的合约，把拯救企业前途的任务交给了主人公，让他个人

通过激动人心的自由运作来达成上述目的。

此处的接受者与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有所不同，在童话里，它与主体并为一体，在本例，它是企业本身，企业这个角色综合了两个行动元，客体和接受者。因为主人公在此是无利可图的，奖品也不是委托给村子里的大傻瓜伊万的公主，而是企业的效益。

这个例子肯定了神话模型的存在，就是现代人也会用它来阐释自己表面上看来是理性的活动。但我们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不在此，因为罗兰—巴尔特的观察早就让我们习惯了这一点，我们主要是为了说明话语表征的复杂性——既正又负，既是实用的又是神话的，我们在描写的任何阶段都必须牢记这一点。

11 行动元和角色

鉴于主题性赋值的方法会混淆行动元模型的描写与品质分析，因而，即便它有价值，还是不足以说明行动元模型的变化，不足以促成它们的分类。因此我们只好再回到行动元本身，看看行动元分布的图式与行动元和角色之间的修饰关系类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行动元模型的类型学具体化的标准。

几个行动元合为一个角色，该现象十分常见，它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一个类型学标准；我们可以根据行动元

合并的性质来区别模型的类型：在民间童话中，构成一个复合行动元的是主体和接受者；在经济投资模型中，复合行动元则是客体加接受者。在价值观领域之外，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例如国际象棋中的“后”，就是集“象”和“车”的功能于一身的复合行动元。

有时一个行动元也可以分解成数个上下级角色，这一混杂现象与功能的互补分布有关，它构成了我们的第二个标准。普洛普就试图把接受者定义为“the sought-for person and her father”(被追求者和她的父亲)，大概是想维护人类的尊严，免得有人把女人当作一个可以占有的物品（不过我们觉得这办法并不高明)。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表明，神话中有不少角色，其功能分布是互补的。神话里特别容易见到一些成双成对的亲属关系：夫妻，父子，双胞胎，老奶奶和小孙子，等等（反映功能分布互补的范畴对立和修辞上的对应并不是一回事，修辞上的对应很容易演变成习语，我们应把二者区分开来)。谈到此处，我们倒是可以对心理分析提一个问题：它描写个体行动元结构时一定会使用亲属关系模型，那么这些亲属关系模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们是分布在角色中的行动元吗？或者是一些经过大胆抽象、代表着行动元范畴的隐喻公式？

第三个标准应该是可能发生的一个或数个行动元的缺席。从理论上看，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值得怀疑。苏里奥所列举的行动元缺席的例子都不成立，那只是剧作

家追求的一种戏剧效果，让人期待某个行动元的出场。等待一个行动元的出场不等于它的缺席，恰恰相反：例如答丢夫在喜剧的头两场就没有上场，还有在蓝胡子的故事中对拯救者的企盼，都只会大大加强这些尚未出场的行动元在行动元结构中的地位。

从操作的角度出发，先不管行动元分布的真实情况，我们可以把以上的行动元模型看作是一个优化的描写。因为行动元有可能衔接成简单的下级结构，所以该模型既可以精简，变成一个更简洁的复合行动元结构，也可以延伸（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其延伸范围，但可以肯定不会太大）。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行动元命名的问题。我们步普洛普的后尘，试着根据功能分析来建立行动元模型。所有行动元的命名都多少受功能分析的影响，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让行动元根据品质分析来进行衔接。由于功能分析的原因，行动元的命名借用了角色的名字，而这一现象常常只能放在分类描写的框架里来解释：在这里，行动元以构造义子的形式出面，它们是价值观网络中的一些固定的点。对这类义子的命名（大家记得，我们在分析义子时曾武断地命名一义子为"劳累"）如果不是随意的话，那它就属于文体学范畴。因此，只有在进行全面完整的品质分析之后，才有可能断言一个命名是否合适。列维—斯特劳斯以为，普洛普对民间童话的描写不可能是完整的，因为他无法了解这些童话得以产生

的价值观背景。我们完全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但我们不认为它构成了描写的最大障碍，因为不完整的描写也可以是合情合理的。例如下边有几个相似语段，是从不同的童话里摘录出来的：

一棵树指出了路……

一只鹤送给［他］一匹坐骑……

一只小鸟监视着……

我们完全可以把以上三个谓语清减为同一个功能词："帮助"，并断言这三个角色都是辅助行动元。在此类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知道当时的价值体系凭什么要给角色们安上了如此奇特的名称。

由此可见，仅从功能分析出发，初步建立一个行动元文体学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

12　行动元的能量学

不要忘了，行动元模型最初是从句法结构中推衍出来的。行动元不仅是一个价值内容的命名，同时也是一个定位义素基，这个基础使其有了动程的可能；它的惰性来自于本身的模态地位，这使得它与被定义为动态的功能产生了对立。

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容易理解苏里奥为什么要用行星和星座的名字来命名他的行动元了。星象符号能够很

好地表达行动元结构中各种“力量”的聚合，它们施加的“影响”，它们对“命运”的左右。从这一角度看，弗洛伊德为心理分析选择了动力学形式，即性冲动模式，他的主要设想就是寻找一个行为模式，一个能够说明人类行为的行动元模型。一个女星相学家的头脑里装着一个星象模型，她用它可以生成一个相当大数量的占象。普洛普也这样问自己：如果建成一个合情合理的类别模型，能不能用它来自动生成新的故事呢？此想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行动元在意义效果层面上，像是一个惰性的东西，这个特点可用作某种行动元文体学的出发点。行动元文体学应能解释拟人、拟物、寓意等方法，可能的话，也包括其他类型的一些形象表现法。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最抽象的思想也会自然而然地用某种形象来表征，例如浪漫地用大写来表示那些重要的抽象概念：Liberté（自由），Histoire（历史），Eternel féminin（永恒女性）；一些作家也具有类似的风格，如那个查理·德·奥尔良在本来不应大写的地方也用了大写字母：Bonne Nouvelle（好消息）。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主体行动元常常喜欢将义子拟人化，生出以下的意思：

Le crayon écrit mal...（铅笔写不好……）

Le journal se demande...（报纸自问……）

由于客体行动元既是“受动者”又是“施动者”，它便赋

予下级对象一个可以称之为“象征”的语义效果，比如：

夏娃的苹果

普罗米修斯的火

据此，行动元文体学的一个任务，就是利用行动元的动能特征以及它们各自的衔接方式来解释由于行动元的混合而产生的具体意义。一个解释命名的理论需要做部分词源的分析，但它必须考虑到行动元的这种事先的布局。行动元的分布与内容本身的分类系统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变量清单，借助于这个清单，我们可以计算事件命名出现的可能性。

13 行动元模型与心理分析批评

在本阶段，我们不能不提到心理分析：行动元模型的野心很大，要解释所有的虚构表征，因此，它若不类似于心理分析的模型就一定会与之发生冲突。比如，在普洛普和苏里奥那儿都能找到的“欲望”就很像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力比多建立了客体的关系，原始的客体处在一种散漫的状态之中，对它的赋值具体化了主体的象征世界。心理分析中使用的各种模型都提出了自己的操作图式，而其他一些角色的分配方式则能揭示出这些图式间的异同。

心理分析公开宣称要把它的模型用在语义描写上，

而且带头这样干的就是弗洛伊德本人。所以，尽管心理分析是门玄学，语言学家这个门外汉也不得不涉足其间。不过我们并不想凑热闹，只想具体考察一个对文学作品进行心理分析的例子，即莫龙（Ch. Mauron）所称的“心理批评”（《喜剧类型的心理批评》，1964）。

如果作者没有指出他的英语来源（主要是Fairbain），我们还会以为他主要参照的是苏里奥：这可能纯粹是巧合，但也说明他们在认识论上所持的态度大致相同。

该方法有三个基本操作概念和三个有别的分析步骤。尽管第一个步骤对下一章的思想意识分析十分有用，但每个步骤之间的过渡却不是很清晰，所以我们不得不对这三个步骤做一下交待。

1. 描写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确定是否有可能从一个作家的部分诗歌中揭示出一个潜在的、共有的无意识系统。在此使用了两个前边提过的程序：一个是把具体例句清减为语义功能，第二个是功能的组合——我们在后边将谈到它。比如说，他把马拉美的“胜利地逃亡……”和“头发一束火焰飞翔……”两首十四行诗重叠起来，然后进行清减和功能组合，下面是他《从萦绕的隐喻到个人的神话》(*Des métaphores obsédantes au mythe personel*, p. 39—40）一书中的例子：

对我们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清减程序的描写步骤，但我们找不到任何提示。作者对此不感兴趣，他所

构造功能		死亡	战斗	胜利	伟大	笑
功能例句	第一首诗	自杀 坟墓 木炭	血 风暴 头盔 战士	胜利地 光荣 金子 紫红 光彩 节日 珍宝 凯旋	王室的 启示性的	笑
	第二首诗	死 叹息	红宝石 脱皮	光荣 功勋 闪闪发光 守护神	王冠 前额 加冕的	眼 含笑的 快乐的 火炬

看重的是首先证实以上系统的无意识特征，然后确认它们的常态及反复萦绕的特征，以便设定一个非语言性的、属无意识范畴的“独立心理构成”的存在。

2. 第二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没有直接联系。它使用同样的方法，在语料库中挑选一些意群，重叠起来，以便揭示出藏在各“虚幻形象”间的“相类似的秘密情结”。表征在不同文本中的这些形象是一些人物众生像，它们构成多个“形象群”。比如说波德莱尔的“被动形象”：女人、喜剧演员、玻璃匠、魔鬼、小丑、小矮人等等。如果使用我们的与之相对应的术语，他们是一群角色，可以被清减为一个单一的行动元，莫龙称这个单一的行动元为“幻觉载体”（同上，p. 134）。他把角色清减为行动元的方法是先把一些功能组织成“行动域”，然后再使用一种类似于功能分析的方法，不过他的方法比较原始。下边是一个样本，据莫龙，

“幻觉载体”有以下特点：

“1. 他们走向一个目标，向人展示自己，寻求接触。

“2. 可是他们走得很难，觉得自己每况愈下，不是找不到接触就是有害的接触（肮脏的、恶意的、让人堕落的接触）。

“……”

“总的感觉是卖淫。”（同上，p. 132）

如果更严谨一点，这种描写可能会很有价值。除此之外，莫龙还借用了心理分析的一些解释（他还十分天真地一再强调这种解释是“科学的”）：对于“独立的心理构成”，我们无话可说，因为它在定义上是无意识的（同上，p. 57），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有人物出现的无意识梦境”，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幻觉。

3. 第三个阶段对个人神话下定义。个人神话就是作者个性的结构。莫龙根据该方法的一些原则来分析某些法国诗人的语义世界，发现所有“独立的心理构成”都拥有好些个“形象群”。如果每一首诗和每一篇散文中的角色都因“流动的剧情”在交替变换着，行动元却能在冲突关系中保持常态，构成一个稳定的体系。这是一个“内在的剧情”，莫龙称之为个人神话。

14 心理分析的行动元模型

“萦绕不休的剧情结构”，它第一眼看上去很像我

们的行动元模型。不过有一点不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点：即关系问题，而结构离不开关系。对我们而言，行动元的成立有赖于功能簇，而行动元模型则得自于对行动元清单的纵聚合建构。莫龙与我们的想法相反，他以为通过“剧情的重叠”就能在行动元之间建立冲突关系。然而，剧情是流动性的，正如苏里奥指出的那样，它们是一些由句子构成的事件，其中的功能所跟随的不是语义行动元而是句法行动元。任何一种分析都不能同时处理两大类变量。然而，心理批评对这类细节问题不太在意，因为心理分析的传统已经为它准备好了一个冲突剧情的集合和一个拟人化模型的集合：“弗洛伊德的研究表明，人在自己的梦中常常会被表现为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人物。我则取以下观点：所有在梦中出现的人物或者代表了（1）做梦人的部分个性，或者代表了（2）一个与做梦人部分个性有关的人，他常常是一个做梦人内心渴望变成的人”(R. Fairbain, *Psychanalytic Studies of the Personality*，转引自莫龙，同上，p. 217)。心理批评使用的是由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所设计的模型，它利用已有的行动元结构辨认出角色和“剧情”之间的冲突，然后把冲突材料收集到一起，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建构模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直接涉及到心理分析的某些基本观点，莫龙断言他的建构非常“科学”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并不打算攻击整个心理分析的“本体”，只想对

它的术语提几点看法。专业人士(Pontalis)都承认心理分析中所用的工具概念体系相当不统一，它们是对心理现实逐渐理解并不断补充的产物，是多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融合。

1. 首先被设计出来的是一个空间性概念，它把个性结构表达成相互衔接的多层重叠（超我、自我、本我），每一层都是整体结构的下级单位。莫龙想到的就是这个模型，所以他断言："每个形象只能代表某个自我，代表超我或伊德（id）的一个方面"（同上，p. 210)，他还说："波德莱尔通常总是把意识中的自我看成这个人物(即命名为'王子猫'的行动元)"（同上，p. 134)。通过空间词汇来表征事物可能已经成为今天人文科学的一个痼疾，马托雷（G. Matoré）便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到处使用空间词汇，但决不能忘了它的本性。对我们而言，我们定义的语言的两个层面或表征的两个向度就与空间无关，它们指向复合结构中的两个冗余项，二者之间有互为前提的关系。对于上边的划分我们不敢表态，但是心理分析有时候把人格的层次看作是非常一般的结构性层次，有时候看作是行动元结构的表征（它们有行动，自我监控且自我压抑)，有时候又是意识的层次，这让语言学家感到十分为难。请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要语言学家根据"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来描写法语语法结构，他们会有多为难：每出现一个单数现象，复数就进入潜意识，直陈式则与无意识的虚拟式对立（关于这个问题我

们完全同意梅洛—庞蒂的观点）。意识与无意识的二分对人文科学来说不再有意义，所以我们个人倒是对拉康的努力抱有极大的兴趣：他试图用“升华”的概念来取代以上的二分（其实，每当需要确定诗人的哪一些隐喻是有意识的，哪一些是无意识的，莫龙自己也不知所措）。

2. 另外还有一个从描写亲属关系结构的术语中借来的行动元模型。这个模型或者是根据西方小家庭的模式（父母和孩子们）建立的，或者是根据“原始部落”建立的。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这个“原始部落”是否存在就很成问题，但在弗洛伊德时代这种说法非常流行。如果第二个具有等级特征的模式被用来说明行动元，它就会在分析中压倒并取代第一个模式，例如在莫龙对莫里哀的分析中就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想提出两个认识论上的想法。一方面，亲属关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它拥有多重关系网，再加上关于行动元的观相主义风格的词汇，就变得更为复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极难把握。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受它左右，例如好几个世纪以来它对语言学方法论的思考就起到了抑制作用。

3. 当然，在心理分析中还是存在着一些方法论模型的，比如说俄底浦斯神话就被弗洛伊德用来形象地描述某些情结而不是情结的结构，而且他还从中提取出了其代表性特征。

相对于“亲属关系结构”而言，这只能算是一个下级的、部分性的模型，建立它从方法论上讲没有什么不合适。令人犹疑的是它的归纳特征：心理分析一直在收集病例，建立清单，用神话命名案例。我们倒真希望它能超越这个阶段，给自己建立一个行动元的、转换的分析模型理论。

既然是在谈术语，所以我们还想补充一句：一个自称是科学的学科如果靠隐喻来建设自己的概念体系，那么其后的发展一定会受到极大影响。除了它时时刻刻会“无意识”地受到把隐喻当现实的诱惑之外，如果心理分析继续用诗一样的晦涩语言来表述它那些有价值的发现，它还会自断门路，永远无法建造出一个具有单义性和内在一致性的方法论元语言。

有一些学科用音乐词汇来描写绘画，或者用绘画词汇来描写音乐，其实他们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们借用一些概念来进行比喻，但这些概念所属的领域本身也在进步，它可能重新设计自己的公设和概念。莫龙在对文学个性进行心理分析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他想利用神话，可人类学对神话的定义已经变了。作者经过一连串半因果半相似、但却始终是“动态”（好一个“挡箭牌”，除“具体”外，这个词正好遮掩了我们的无知！）的引申，从幼儿的情绪冲动开始，直写到成年后神牵魂系的梦幻，最后到达个人神话；对“独立的心理构成”我们一无所知，但它却保证了这个结构性的、动态的、遗传的“整体”单

位。然而，如此定义的个人神话和所有神话叙事并无区别，它仍然是一个未经加工的表征，需要经过分析才能从中提取内在的结构。这不仅是一个术语上的悖论，心理分析止步之处反而正是含有方法论问题的分析的出发点。

对转换模型的探索

1 清减与建构

a）功能的组织方式

普洛普的《俄罗斯民间童话的形态学》一书在今天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俄罗斯童话和欧洲同类童话之间的相似性也没有任何疑问，所以我们在谈这本书时无须先介绍它的内容。大家知道，普洛普进行了功能描写之后（他的功能描写一方面是压缩叙事的横组合轴上的单位，把它们改造成一个个语义单位，并给它们命名，另一方面，他还透过这些单位在具体童话中的纷乱表象揭示了它们不变的内核），给出了童话叙事形式的两个定义：

1. 通过考察功能之间的关系和它们所属的行动元，普洛普把功能组织成“行动域”，每个行动域定义一个专门的行动元。据此，他把童话看作是一个拥有七个人物的叙事体裁；

2. 连续的功能构成了叙事，从这个角度对功能本身

进行考察，普洛普得到了民间童话的第二个定义，其特点是：a）一份数量有限（三十一个）的功能清单；b）它们有固定的排列顺序。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研究过普洛普的第一个定义，当时的目的是想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和阐明一个更一般化的行动元模型，一个在描写绝大多数神话微观世界时都能使用的模型。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新的探索。我们知道，功能分析可以用来描写行动元的内容，进而帮助我们建立行动元模型，但不要忘了它还特别适合用来描写功能之间的关系。虽然功能被组织成叙事，但在理论上它们至少有以下特点：(a) 根据话语表征中必定出现的冗余，功能应能够被清减到一个有限的数量，被处理为一个简单的结构；(b) 功能在叙事中连成一气的同时，也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成分，可以用它们来评价其在组合中地位，进而说明意义结构的转换模型。

为了在某种程度上验证这些理论上的预测，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普洛普的功能清单，看一看：1）我们能否有效地对这份清单进行清减，最后得到一个功能集合，一套简单的结构；2）功能的固定序列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多大程度上这个序列可以被解释为相当于结构的真实转换。

目标已经确定，下面我们来简化普洛普的清单。必要的话，再进行一些新的清减，并在其间建立具有建构作用的对应关系。

b）功能清单

普洛普的功能清单我们大致意译如下：

1. 缺席（absence）；
2. 禁令（interdiction）；
3. 违禁（violation）；
4. 侦察（reconnaissance）；
5. 情报（delivery）；
6. 失望（fraud）；
7. 屈服（complicity）；
8. 背叛（villainy）；

8a. 缺憾（lack）；

9. 指令（mediation，the connective moment）；
10. 主人公做出决定（beginning counter action）；
11. 出发（departure）；
12. 给一个考验（the first function of the donor）；
13. 受到考验（the hero's reaction）；
14. 获得辅助（the provision，receipt of magical agent）；
15. 空间转移（spatial translocation）；
16. 战斗（struggle）；
17. 标记（marking）；
18. 胜利（victory）；
19. 缺憾得到弥补（the initial misfortune or lack is liquidated）；

20. 返回（return）；

21. 折磨（pursuit，chase）；

22. 营救（rescue）；

23. 匿名地到达（unrecognised arrival）；

24. 见前边的 8a；

25. 指定一个任务（the difficult task）；

26. 成功（solution：a task is accomplished）；

27. 得到承认（recognition）；

28. 揭露叛徒（exposure）；

29. 确认主人公（transfiguration：new appearence）；

30. 惩罚（punishment）；

31. 结婚（ wedding）。

c）功能配对

这三十一个功能所构成的清单太大，无法进行建构。普洛普自己也认为有可能把它们配成对子，我们首先按他的提示来进行清减。不过，在本阶段进行配对只能凭经验，但须满足两个条件：把叙事切分并清减成一个个阶段性单位，每个预计中的阶段都是二元的，仅由两个功能组成。

经过“清减”，普洛普的清单变成了下边的形式：

1. 缺席；

2. 禁令/违禁；

3. 侦察/情报；

4. 失望/屈服；

5. 背叛/缺憾；

6. 指令/主人公做出决定；

7. 出发；

8. 给一个考验/受到考验；

9. 获得辅助；

10. 空间转移；

11. 战斗/胜利；

12. 标记；

13. 缺憾得到弥补；

14. 返回；

15. 折磨/营救；

16. 匿名地到达；

17. 指定一个任务/成功；

18. 得到承认；

19. 揭露叛徒/确认主人公；

20. 惩罚/结婚。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功能都可以配对。这第二份清单虽然比第一份要短，但并不比第一份更容易操作。

d）契约

试问我们能不能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解释功能配对，

从而使其变得更容易操作呢？就拿下边这一对功能来做例子：

禁令/违禁

根据普洛普横组合框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蕴涵的关系（实际上，禁令是违禁的先设）。如果把它们从横组合的上下文中抽出来，它们倒很像是一对义素范畴，二对立项间的关系既是合取的也是析分的，可以被表达为以下形式：

s/非 s

把一对功能定义为对立的，这就等于是把功能分析从横组合序列中解放了出来，至少是部分地解放了出来：于是，合取共同点和析分相异点的比较方法就可以用在表中所有的功能上。列维—斯特劳斯在评论普洛普时指出（《结构与形式》），“禁令”实际是对命令“进行转换后的否定形式”，而命令就是我们所说的“指令”。不过指令也有一个与之相配的功能：“主人公做出决定”，我们最好给它改个名字，叫做“受令”。有了这两组对立，四个功能之间的总体结构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

$$\frac{\text{指令}}{\text{受令}}=\text{签约}$$

那么

$$\frac{\text{禁令}}{\text{违禁}}=\text{毁约}$$

另一方面，如果说“禁令”是以否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命令（指令），“违禁”就是对“受令”的否定，那么

这四个词项便是一个义素体系的表征，可以记成以下形式：

——在上位，它们是一个对立组的衔接：

$$A/\bar{A}$$

——在下位，它们构成一个体系，其中的每一项都与其他项对立：

$$\frac{a}{\text{非}\ a}\Big/\frac{\bar{a}}{\text{非}\ \bar{a}}$$

这种理论上的对应关系既然允许我们把 A 看作是“签约”，那么我们就有权重新解释普洛普的最后一个功能：结婚。实际上，如果整个叙事因毁约开始，那么“结婚”就是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缔结的一个新契约。因此，“结婚”并不像普洛普所分析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功能，它是一个契约，发送者提供给接受者一个追寻的对象（客体），接受主体接收了这个对象（客体），于是在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就缔结了一个契约。所以说“结婚”也应该按“指令”/“受令”的方式来重新表述。但有一点不同：如此签订的契约只会更加“牢固”，因为其中交流并传递了一个欲望的客体。

注：对普洛普功能清单的改造由“结婚”功能开始，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明确过：对压缩功能算式的命名必须处在同一个抽象层次上，只有这样话语表征的同位关系才能得到保证。

e）考验

契约一旦缔结，当然就会产生某些由功能所代表的结果，它们构成一个功能序列，所以必须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横组合图式的一部分。

以主人公出发后立即受到的考验为例，普洛普的描写中似乎缺了点什么。比如，考验可以被分解为两个功能：

给一个考验 / 受到考验
(the first function of the donor) (the hero's reaction)

但这还不够：正如“指令”之后是“主人公做出决定”，给一个考验之后只能是答应接受这个考验。后边也一样，答应之后便受到了考验，然后以成功而告终。最后，对受到考验的人还有一个奖赏性的功能结果：获得了一个辅助者。

现在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考验”（它是我们刚刚描写过的一个拥有五个功能的横组合图式）都包含着下边按顺序排列的功能和功能组：

A＝指令/受令

F＝受到考验/成功

非c＝结果

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式用于叙事中所有的“考验”（数量不小），我们就会发现普洛普对“考验”的分析很不一致。我们只需制一个对比表，收进叙事中所遇到的所有“考验”，就自然而然地弥补了那些必将出现的不足：

给定的图式	升级考验	主考验	颂扬考验
A 指令	赠送者的第一个功能	指令	指定一个任务
A 受令	主人公的反映	主人公的决定	……
F 受到考验	……	战斗	……
F 成功	……	胜利	成功
非 c＝结果	获得辅助者	弥补缺憾	得到承认

根据此表，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童话叙事中具有大量的冗余现象：

(a)“考验”本身作为一个横组合图式，在叙事中反复出现了三次；它们之间的不同仅仅是所获得的结果有所不同；

(b) 构成契约结构的功能组在叙事开头取否定形式 $\bar{A}$（禁令/违禁），到了结尾却变成了肯定形式 A。另外，每一次“考验”都由“签约”（A_1，A_2，A_3）开始；

(c) 在三个考验中都出现了“受到考验/成功”这一对功能，但我们在后边将会看到，其中有一次，在这对功能前没有签约。

2. 考验的图式不是一个横组合语段，而是一个我们将要确定其性质的逻辑序列，原因如下：

(a) A 和 F 这两对功能在时间上并不一定总是邻接的：主人公被派出以后好久，他才会和叛徒在主考验中一决高低；

(b) A 和 F 这两对功能有可能脱出考验图式单独出现。

3. 功能组 A 有可能被看作是意义的二元结构，F 则不然，关于它的结构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f）主人公的缺席

粗粗地扫描一下功能在叙事中的分布，我们发现叙事的最高潮是主人公和叛徒的决斗。不过，这个决斗发生在遭受不幸的社会之外。在叙事中，从主人公"出发"到他"匿名地到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不在场。

仔细审视这一时间段，我们又发现了新的不同位的标准，但功能的命名需要的却是同位的标准。在普洛普那里，与主人公"出发"相对应的是"返回"功能，但其实这并不真的是主人公的返回，而是他在另一个地方战胜了叛徒之后的再次出发。如果我们把"出发"（记为 $\bar{p}$）理解成主人公开始不在场，那么和这个负义素直接相对的正义素便不是普洛普所说的"返回"功能，而是"匿名地到达"（p）这个功能。

另一方面，与主人公不在场这段时间相呼应的是他去了战斗的地方（$\overline{非p}$），而与他抵达该地相呼应的则是普洛普的"返回"（非 p）。于是我们有了下面这样一个主人公移动的图式：

$$\frac{\bar{p}}{\overline{非p}} \simeq \frac{p}{非p}$$

还应指出，在 $\bar{p}$ 和 $\overline{非p}$（英雄出发→英雄抵达战斗区域）之间有一个空间转移，即一个快速移动（d），它在

战斗发生前的叙事中由一个特殊功能作交待；战斗之后也有这么一个与之对应的快速转移，与“折磨”/“营救”这两个功能混在一起。我们有权把“折磨”/“营救”看作是一个功能混合体，它一方面含有 F 功能组（可分解成“受到考验”/“成功”），另一方面包含着一个快速移动。在主人公缺席的图式中，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功能：移动（d）。虽然这第二次移动与第一次移动的方向相反，但仍然可以被看作是冗余的：

$$\bar{p}+d+\overline{\text{非 }p}/\text{非 }p+d+p$$

关于以上图式有两点值得注意：

1. 根据行动元模型，移动的速度很可能与叙事中欲望的强度有关。由此看来，速度不能算是一个功能，只能算是功能的状态，所以把它用在功能描写中并不合适。我们在此提到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从功能混合体中提取一个冗余的 F。在本分析阶段，发现了混合现象就必须做一定的处理；

2. 移动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去”与“来”的对立，其有意思之处仅仅在于它揭示了主人公的孤独，他远离叙事凡间，孤身一人在别处生活。玻勒姆和瑟巴的研究（D. Paulme，L. Sebag，刊 *l'Homme*，III）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类型学析分的意义：主人公入鬼域上神界，时而地下时而海里时而天上。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甚至极为复杂：如果仅仅局限在民间童话的框架中解释它，我们没有足够的价值体系作为背景。暂时我们还是把主人

公的缺席看作是一个指别性表述，它与主人公的中介功能构成冗余，在后边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注：对先人（=发送者）的缺席也可以做类似的解释。

g）异化与再同化

普洛普的读者大概都注意到他在描写中明确地区分出最前边的九个功能，并用希腊字母标示它们，把它们看作是进入叙事体裁的引子。我们已经了解了前三个功能（缺席、禁令、违禁）的作用，并在叙事的中部和尾部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结构。现在再来考察一下构成这个“引子”的三对功能：

侦察/情报

失望/屈服

背叛/缺憾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便是这三对功能仿佛是一个接一个的不幸，已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于是引起一连串灾难。它们是负面的，根据我们前边所建立的对应原则，叙事中一定存在着一个正面的序列。

第一对功能，“侦察”/“情报”，似乎可以放在交流的整体框架中去考虑，可以简单地转译为“询问”/“回答”。与这一经过分解了的语言交流相对应的似乎是处在叙事尾部的两个功能：

标记/得到承认

它们被其他一些功能隔开，但也可以被转译为

（一个信息的）传递/（一个信息的）接收

尽管我们在此用的是另一套能指系统，但这两个功能确实构成了一个正面的交流行为，而功能组

询问/回答

则更像是一个负面的（反向的）交流行为。

如果我们考虑到神话叙事中经常出现的拟物法，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便是释放出一个信息客体，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对信息的索取。我们虽然发现了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对应性，但只有在另两对功能也具有相应的对应表现时这种对应性才能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在叙事的最后一部分，紧跟在对主人公的承认之后的是对叛徒真实面貌的揭露。不过，如果对叛徒需要揭露，这说明他带着一个假面具。虽说这一点在“失望”这个单词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但普洛普并没有忘记指出这么一个事实：为了欺骗主人公，叛徒总是要伪装的。所以在“失望”和“揭露叛徒”两个功能之间有着确定的对立关系。

至于该对立组的第二个功能，主人公的“屈服”，表明他也带有一个面具，尽管表现手法十分隐晦。实际上，主人公在叙事的这个阶段显得像是一个憨厚的、没头脑的乡巴佬，动不动就受骗上当，在比较极端的例子中，叛徒猖狂时他甚至在沉睡。总之，这是一个蒙尘的英雄。相

对于这个英雄蒙尘的阶段，叙事的结尾有一个大转折：主人公盛装而出，尽显英雄本色。把开头的功能和结尾的功能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这样说：与开始叛徒奸计得逞和英雄的蒙尘相对的是最后对他们真实身份的揭示。尽管给这些功能取个合适的名字比较困难，但我们的假设得到了证实：开始出现的负面功能和最后结束时的正面功能是并行的。

人们不可能不察觉到表现在这些功能组发展中的上升趋势：跟随在负面交流也就是“情报的索取”之后的是欺骗行为，欺骗之后是背叛，背叛则以盗窃或劫持的形式完成。从结构形式上来讲，最后的一对功能与第一对功能极为相似。实际上，这两个序列有着某种共同点：在两种情况中都有一个客体——一个信息或一个象征“善”的代表——从主人公（或他的家庭、亲人）的手中转移到了叛徒手中。在嵌在中间的那对功能中，客体转移的线索不太清楚：将其与主人公所受到的第一次考验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主人公在经受考验之后得到了辅助者，也就是说获得了能使其成为英雄的某种神力：经过这一比较，我们就能理解在“失望”的动程中转移的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时候被叛徒窃走的是英雄的身份。

叙事的头与尾在结构中的地位更加明确了：它们都拥有三对冗余的功能组这一特征。这的确是一种共有的交流（亦即交换）结构，有一个客体的转移：信息客体、

神力客体或者财产客体；开头的序列是一遍又一遍地对主人公及其亲人进行反复剥夺，结尾的序列则给主人公提供一系列与之对应的补偿。

不错，“背叛”/“缺憾”这对功能构成了一个负面的交换，但在与之对应的结尾处，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与背叛相对的当然是对叛徒的惩罚，但消解缺憾却采用了冗余的形式，一是主人公打败叛徒后达到了惩恶扬善的目的，二是主人公通过娶得丽人归而得到补偿。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上面的分析，并引进一套标记符号。用大写的 C 来记录我们刚分析过的六个功能组。C_1、C_2、C_3 中的 C 代表它们共有的不变的交流结构，1、2、3 代表其中变动着的客体。

另一方面，我们把开头的功能系列看作是结尾功能系列的负面，把它们标为：$\overline{C_1}$、$\overline{C_2}$、$\overline{C_3}$。由于 C 指的总是一组功能，所以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对衔接的义素：c/非 c。于是，我们有下面两列既平行又相反的表达式：

$$\overline{C_1}=\frac{\overline{C_1}}{\text{非 } C_1} \qquad C_1=\frac{C_1}{\text{非 } C_1}$$

$$\overline{C_2}=\frac{\overline{C_2}}{\text{非 } C_2} \qquad C_2=\frac{C_2}{\text{非 } C_2}$$

$$\overline{C_3}=\frac{\overline{C_3}}{\text{非 } C_3} \qquad C_3=\frac{C_3}{\text{非 } C_3}$$

然后，按通常的说法，我们把开头的系列称为“异化”，把结尾的系列称为“再同化”。

注：有了以上符号标记，我们就无须给这些被我们重新定义过的功能起新的名字。

h）考验及其结果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来对“考验”的结果作一个解释了。一共有三次考验，每次考验包含两对功能：A 和 F，外加一个被看作是考验结果的单个功能，每次考验后的结果都不一样。下面是这些结果在叙事中出现的顺序：

获得辅助者

弥补缺憾

得到承认

既然所有其他功能都可以组织成对，这几个作为“结果”的功能为什么会是孤零零的呢？

十分幸运，上边关于异化和再同化的分析对我们理解这类结果很有帮助。我们从主考验的结果说起：缺憾的弥补是一个正面的功能（非 c_3），与其对立的负面功能就是缺憾（$\overline{\text{非 } c_3}$）；同理，“承认”可以解释为“获得信息”（非 c_1），与其对立的是正义素“标记”（c_1），还有“情报”（传递信息〔$\overline{\text{非 } c_1}$〕）。升级考验的结果是“获得辅助者”，我们已经知道它是对主人公失去功力的补充，所以它与“屈服”对立（$c_2$vs $\overline{\text{非 } c_2}$）。

一旦把这些**结果**整合到异化和再同化的序列中，我们就不难理解考验本身的意思：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造成异化，**结果**的作用就是消去异化所带来的有害影响。

i）清减的结果

第一部分分析到此为止，它是我们对功能清减程序的一个修正。最后清减出来的叙事功能清单见下表：

正常秩序被破坏　　　　　　　　　　　　再同化
异化　　　　　　　　　　　　　　　　　重建秩序

主考验

$\overline{p}$ $\overline{A}$ $\overline{C_1}$ $\overline{C_2}$ $\overline{C_3}$ p A_1 $\overline{p_1}$ （A_2+F_2+非 c_2）d $\overline{非\ p_1}$ (F_1+c_1+非 c_3） 非 $p_1dF_1p_1$ （A_3+F_3+非 c_1） C_2C_3A （非 c_3）

升级　　　　　　追寻　　　　　　再追寻

A＝契约（指令/受令）

F＝拼斗（受到考验/胜利）

C＝交流（传递/接收）

p＝在场

d＝快速移动

2　阐释与定义

a）叙事的历时性和无时性成分

上图代表了清减后的功能清单。普洛普以为，叙事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顺序；除非对此定义持比较自由的态度，否则就不可能进行以上的清减。

因为，这一清减要求我们必须对功能之间的纵聚合

关系和无时性关系做出解释：要想对功能进行配对，就必须根据包含在配对功能的义素内容中的析分关系把下面的蕴涵关系

非 s→s

改造成

s/非 s，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功能组当作意义的基本结构来处理。

这是从纵聚合轴角度给出的一个解释，它是从整体上把握叙事意义的一个条件。有了它我们不借助横组合轴也能发现那些较大的意义单位，这些单位的各个项就是显示在单个功能中的义素组。这些单位内部的构成关系同样也是析分的。不过，为了清楚地区别两个结构层面，一方面，我们用大写字母来记录组成单位的词项，以表示它们本身已经是一些范畴，另一方面，用重叠“非”和“—”号的方式来表达它们的反项。

对这一程序稍加琢磨，就能发现它的作用不过是先把**功能**清减成为**功能范畴**，然后再建立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据此，我们在脱离叙事序列的情况下对冗余进行抽象，仍提取出两个对应的功能结构：

$$\begin{matrix} & A/\overline{A} \\ 与 & \\ & C/\overline{C} \end{matrix}$$

于是我们估计到以下的可能性：把叙事阐释成一个简单的无时性结构。

注：$C/\bar{C}$ 的交流结构分析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它需要很长的推理过程，在本章无法进行。我们将在其他场合演绎这个过程。

整个叙事都可以被清减成这个简单结构，当然仍然残存着一点历时性的东西，例如被我们标示为 F、名叫“拼斗”的功能组：

受考验/成功

它无法被改造成一对基本义素的范畴。

b）考验的历时性地位

F 功能组有两个不寻常的特点：它不仅不能被解释成一对对立义素的范畴，而且还是惟一的一个不对应的、独立的功能序列。也就是说，在叙事的全过程中再也找不到一个与之相反的形式。

另一方面，F 作为一个构成成分还进入了我们称之为“考验”的历时性序列，其顺序如下：

A＋F＋c.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考验”是一个把叙事定义为历时性的、无法再精简的内核。关于这个历时性地位，我们有必要现在就提出几点看法：

1. A 和 F 之间的关系应该被看作是前后连接的关系，而不是必须蕴涵的关系。实际上，A 与 $\bar{A}$ 有可能单独地在叙事中出现，在它们之后并不一定非出现 F 不

可：A 不是 F 的先设。另一面，F 在叙事中出现时，其前边并没有 A 的情况也是存在的：F 也不是 A 的先设。

这就等于说，“考验”这个序列虽然体现了叙事的连续性特点，但却并不是像普洛普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必须出现且只能按此顺序出现的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考验”的表征反而具有某种自由度。如果它更像一个凝固的序列，那决不是由于其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是由于将其作为形式固定下来的冗余现象，冗余现象赋予它一个对主人公的自由的肯定，相当于一个补充上去的神话内涵。

2. 虽说 A 和 F 之间的关系是连接关系，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一个由能指“邻接”所代表的关系。连接之间完全可以插入一些别的东西，最明显的就是在“主考验”中，A 功能组和 F 功能组之间拉开了距离，但叙事却反而因此而变得更加紧凑。

3. 能够给予 A+F 的连接一个历时性地位的是它们自由结合之后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实际上，结果是必不可少的，它暗含了 A+F 的存在：在某些简短的叙事中，主人公不经过“考验”也可以获得辅助者；考验仅仅是对 A 和 F 之连接发出的一个邀请，结果非 c 才是它们连接的认证。

如果说考验拥有一个特别的历时性地位，那么它同时也与前边提到的行动元模型保持着确定的平行关系。

事实上，考验不仅涉及到六个行动元，而且那些使得模型衔接得以成立的范畴也都能在考验中找到相应物。例如，与交流范畴相对应的是契约结构，F 中的二元对立则表现了发生在主人公的辅助者和反对者两种力量之间的拼斗。至于结果，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主体所获取的欲望客体。

叙事一共含有三个考验：

资格考验

主考验

颂扬考验

只有后两个考验中的功能和叙事行动元一项一项地都能对上。至于第一个考验，是为了使主人公获得面对更大的考验的资格，它不过是一次模拟的拼斗，也就是说是象征性的，在此扮演反对者的是发送者。

c）叙事的戏剧性张力

如果说叙事的惟一历时性特征是考验，那么为了表现叙事在时间中的延续还会用到另一些方法，如大家熟知的“情节”、“悬念”、“张力”和“剧情的紧张度”。它们构成了叙述的技巧，是叙事的“次级制作”，可以被定义为功能的隔离，也就是说，在构成叙事的功能链中把属于同一个意义结构的义素内容分隔开来。

例如，与义素$\overline{\text{非}\ c_3}$（缺憾）相对应的非 c_3（弥补缺憾）离前者就有十五个功能之远。我们没必要对“缺

憾”做更多的解释，苏里奥曾说它是一个不能忍受的、让人产生需要并采取行动的情境。负义素一旦被设立，叙事的进展就指向了对其正义素的寻找，以弥补这一缺憾。通过拉开$\overline{\text{非}\,c_3}$与非 c_3 之间的距离而形成的张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追寻”。

在“追寻”的张力展开的同时，叙事中又设定了一个新的义素 c_1（标记），于是张力便走向相反义素非 c_1（得到承认）的实现。这里的紧张程度要低一些，因为所寻找的义素是正面的（“追寻”中的则是非负面的），可以称之为“再追寻”，也就是说要求对主人公予以承认。

至于第三个张力，“获取资格”张力，它连接的是$\overline{\text{非}\,c_2}$ vs 非 c_2。如果它的紧张度也不够高，那是因为获取资格仅仅预示了主人公那还没有最后实现的胜利。不过它的结构和“追寻”结构一样，它们两个一起构成了引导情节发展的冗余张力。

我们把下边一类通过功能隔离而产生的张力看作是主要张力：其义素 ad quem（终点）同时就是考验的结果，因为这么一来张力就被整合进了考验结构本身，并且构成了对其定义的一个补充。反之，对于因隔离对立义素而产生的张力，当其义素 ab quo（起点）并不紧挨在考验结果之前时，它们就是次要的、可以忽略的张力。

d）对叙事的两种阐释

尽管考验定义了叙事的历时性，并成为叙事的关键，

但它还远远不是叙事的全部。实际上，除了拼斗（F），其他构成成分在考验中的存在可以说仅仅是形式上的：它们的语义赋值，它们的意义——当然也就是考验的意义，只能从叙事的上下文中获得，只能从位于它们前后的序列中获得。

苏里奥非常精炼地定义过一部戏剧的总体结构：比较平静的开头，与之对应的是恢复常态的结尾，在二者之间，出了点事。我们知道在叙事中"出了点事"是什么意思，然而，叙事的整体意思却只能通过开头和结尾的常态来把握。

叙事的头和尾这两个序列是由两个义素组构成的，其形式或正或负：

开头：　　　　结尾：

$\bar{A}+\bar{C}$　　　　$C+A$

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个序列包含了叙事最基本的语义赋值，那它们的结构就应该向我们提供一把能解开民间童话意义的钥匙。可是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这要看我们把结构项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什么关系。有两种可能的读法。第一种读法是将其组织成无时性的范畴，建立两个范畴之间的关联：

$$\frac{\bar{A}}{A}=\frac{\bar{C}}{C}$$

其意为：有契约（有序）和无契约（无序）的对应，也就是异化和完全接收某种价值观的对应。

第二种读法考虑了词项在时间中的分布情况，让我

们以为它们之间具有蕴涵关系：

$$(\overline{A}>\overline{C}) \simeq (C>A)$$

对这个式子大概可以做以下说明：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里，价值被颠倒了；重新恢复价值使社会有了回到法制的可能。

尽管这两种读法中的各项都一样，但实际上它们有很大区别。

e）叙事的无时性意义

第一种读法是在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两个秩序之间建立关联：

1. 社会领域：法律秩序，社会组织契约所构成的秩序；

2. 个人或人际关系领域：在人际交流中存在的、或可以被个体所拥有的个人价值体系。

从纵聚合轴看叙事，便能在两个领域亦即个人命运和社会的命运之间建立关联。照这样理解，叙事不过表现了存在于价值观层面上的各种关系，它不过是这些关系的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民间童话也只能是某些意义结构的特殊表征，意义结构先于童话，而且很可能在社会话语中是冗余的。

借助"关联"，我们把叙事看作一个简单的意义结构。所谓"关联"其实就是关系，它本质上是对关系的肯定，在日常语言中通过连词"如同"（comme）表达出来，这

就在比例相当的项之间建立了连接关系。

现在让我们来认真考察一下关联中的各个项，试试在没有价值观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加深对民间童话意义的理解。

先取比例式中与个人领域有关的第二个部分。在清减时，我们曾说过每个C都是一个交流程序，其特征是传递一个象征客体。根据传递的客体的变化，交流被具体化，每一个客体变量都标有编号：1、2、3。我们以为没有必要再强调这个关于“交流客体”的价值观神话模型——人类学常用的模型，不如立即确定它们的性质更有意义。

1. 以C_1为例，交流的客体对象是一个信息，某种形式固定、被“物化”了的话语，因此可以传递。信息是个关键，有了它就等于认识了什么或者认出了某人，所以信息客体在神话层面上可以被看作是关于“知”(savoir）模态的表达形式。

2. 以C_2为例，交流的客体对象是功力，它夺去人行动的必要力量或者赋予他这种力量。功力客体相当于神话层面上的“能”（pouvoir）模态。

3. 以C_3为例，交流便是传递一个欲望的客体对象，它当然与“愿”（vouloir）模态有关。

关于构成叙事的价值观念与组成行动元模型的模态之间的关联，其性质我们现在还不敢妄加评论，但这一关联的存在却证明了它们二者都具有极高的抽象程度。

自价值观提出的“异化”和“再同化”这两个概念被我们用来指叙事中的 $\bar{C}\bar{C}\bar{C}$ 序列和 CCC 序列，以上的新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它们的一种验证。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说，这个结构性比例式的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一个设定：在异化的人和全面享受价值体系的人之间做一抉择。

至于比例式的第一部分，它既简单又复杂。A 的身份被我们确定为社会契约，第一眼看上去它也拥有一个交流的形式：发送者命令接受者行动，接受者接受了命令。虽说是个命令，但执行者乐意接受。至于在 $\bar{A}$ 中，发送者禁止接受者行动，这毫无疑问是 a 的否定形式，命令的否定形式——命令是“请做……”，而这儿是“请别做……”。这是一个否定性的契约，剥夺了人行动的权利。

另一面，与“受令”相对的是“违禁”，虽说它在形式上是受令的否定，但其意义并非完全如此，因为禁令阻止人行动，而它是对禁令的反抗，含有要求行动的意志。因此违禁这个词有点含糊：

(a) 相对“受令”而言，它是接受命令的否定：

$$非\,a/\overline{非\,a}$$

(b) 禁令是命令（命令行动）的否定，违背禁令则是否定的否定（对不准行动的命令的否定），于是有：

$$a/—\ (\bar{a})$$

换句话说，否定之否定便是肯定（见法语中 si [如果] 的肯定用法）：

$$-\ (\bar{a})\ = a$$

这等于说违禁也是某种类型的命令。尽管这猛一听起来有点荒唐，但只要我们把推理限制在功能的转换上，而不涉及行动元，它在理论上还是站得住的。不过，一旦纳入了行动元，悖论就出现了：违禁也是一个指令，它是对发送者的否定，用接受者去取代发送者。实际上，发送者和接受者在命令功能中的同一似乎构成了对意愿行为、即对个人意志的定义。

据以上推理，假设

$$A/\bar{A}$$

代表了立约和毁约之间的对立，那么毁约就具有了另一种肯定意义：对个人自由的肯定。于是，叙事便要我们在个人自由（亦即无契约状态）和全盘接收社会契约二者之间做出抉择。经过以上的补充分析，我们突然发现民间童话的真正含义与神话完全一样：列维一斯特劳斯就察觉到并且肯定了神话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无论你做出哪种抉择都永远不可能十全十美。

在俄罗斯民间童话的背景中，我们对这一神话的矛盾可以做如下表述：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是异化，而要融入某种价值体系就必须建立社会秩序，即放弃个人自由。

下边再看看叙事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

f）转换模型

这样对叙事进行分析有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定义。

第一种定义是历时性的。叙事被压缩成“考验”序列，“考验”在话语中是一个行动元模型，对意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拟人，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人类（或模拟人的）行为的延续。我们知道，这些行为同时涉及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时间中的延续（既非邻接关系亦非逻辑蕴涵关系），一个是延续中的自由，也就是大家习惯上赋予历史的两个性质：不可逆性和选择性。我们还发现这个不可逆的选择性（F 在 A 后）总带有结果，这便使得在历史进程中活动的人具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叙事的基本历时性序列从定义上来说就具有了人类历史活动的所有特征，即不可逆性、自由性和责任性。

对“考验”做这样的解释，就等于把考验看作是一个形象模型，即一个由神话行为组织成的集合，它能够说明历史的转换，即历史中那些真正属于历时性的东西。按此方向继续分析，就一定有可能描写出叙事的转换模型。自这个角度，考验的作用就更清晰了，它承载着一个内容的给定结构：

$$\frac{\bar{a}}{\text{非 } a} \simeq \frac{\bar{c}}{\text{非 } c}$$

然后通过一个神话的操作，即重新看待其中的各个词项，把它转换成另一个不同的内容结构：

$$\frac{a}{\text{非 } a} \simeq \frac{c}{\text{非 } c}$$

我们把转换前后的两个结构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转换似乎就是去掉需要转换的式子里的负号，换

句话说，转换是一个元语言手段，它消去负号，以便获得肯定形式。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试着来处理一下"考验"图式中那些尚未被分析过的成分。大家知道三个考验中的每一个都带有一个不同的具体结果：非 c_1、非 c_2 和非 c_3。它们不仅是考验的结果，而且同时也是义素范畴中的正项，其负项则处在前式之中，而前式正是"考验"打算转换的结构。因此，"拼斗"（它们是惟一的一对无法进行无时性结构分析的功能，其符号为正，紧跟着它出现的词项属于我们试图转换的结构）应能说明这个转换本身。

拼斗首先是辅助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抗，也就是说，它是复合意义结构中被我们看作"正"与"负"二者间关系的表现形式。这个表现形式既是功能的、动态的，也是拟人的。紧跟在对抗之后的是"成功"，它是辅助者对反对者的胜利，也就是说它摧毁了负项以便肯定惟一的正项。这样一解释，拼斗就成了复合结构被粉碎的象征，也就是说它代表了一个元语言操作：清除负项，只保留基本结构中的正项。我们在下一章还会有机会谈到这个质量判断问题，不过那将是在不同的非形象的层次上。无论如何，拼斗表达了一个元语言行为，因而它自己并没有内容，但却包含着"结果"的内容；而"结果"，我们知道，它独立于"拼斗"，与"拼斗"是分开的。

但是，结果并不只是拼斗的出路，它也是拼斗前已

达成的部分契约的出路，而部分契约也是考验的组成部分：结果是对部分契约的认可，是它已经实现的证明，被毁的总契约因此而得到了部分的修复。对于肯定判断的语言学解释我们不想谈得太多，因为我们后边还会提到它，所以我们只限于说明："考验"是转换模型的形象表达，它引进了一个历时性维度，该维度把转换前后的两个结构中所赋的价值观内容对立起来，并借此说明它们的转换方式。

g）作为中和的叙事

由此可见，对叙事进行功能分析是为了确定话语内部各功能间的关系性质，而叙事（尤其是俄罗斯民间童话）有可能提供两种不同的解释，并因此产生两种不同的内在模型。第一个模型是一个组合模型，把一些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内容用纯符号形式组织在一起，而且还把这些价值观内容看作是不完善的和不可避免的；第二个反之，它阐明了一个转换模型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转变观念的解决办法，即一种转换赋值内容的可能性。

两种解释都可行，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叙事内部具有大量矛盾。它既肯定一个常态，又肯定了变化的各种可能；它既肯定了必要的秩序，又肯定了打碎和重建这一秩序的自由。当然，这些矛盾凭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叙事在表面上给人以平衡和没有矛盾的感觉。正是在这一点上，叙事显示了它实质上的中和作用。而且应该说是

多种中和作用：结构和行为的中和，常态和历史的中和，社会和个人的中和。

这样做可能抽象得有些过分，但我们还是觉得有可能把叙事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秩序被接受的叙事，另一类是秩序被拒绝的叙事。在头一种情况下，叙事一开头便提供了一个现存的秩序，然后再对这一秩序进行解释，说明它的正确性。现存秩序是一个社会或自然的秩序，所以人是无法把握的（时间上的昼夜转换、冬去春来，人则被分为男女老少、农夫和猎手等等），叙事站在人的立场上解释这些现象：追寻、考验都是人的一种行为，正是人的行为创建了某种秩序。叙事的中和作用就是"对世界人格化"，赋予世界一个个体的事件性向度。于是世界的存在得到了解释，人也就与世界融为一体。

在第二种情况中，现存秩序被认为是不完美的，人被异化，生存状态无法忍受。叙事被投射为一个标准的调节机制，有如一个获得拯救的许诺：人必须担负起一个历史使命，经过一连串的考验和奋斗来改造世界。这一叙事模型提供了各种形式的获救之路，给各种缺憾和无法忍受的境况提供解决办法。

无论历史是解释性质的还是投射性质的，是循环的还是开放的，引进它就等于给分析补充了一个新意义：经过分析俄罗斯民间童话，我们发现了这些模型，现在可以对其价值及应用范围提出问题了。

3　转换模型与心理剧

a）从集体到个人

叙事作为话语的表征通过链接功能展示了一个潜在的转换模型，叙事的这一定义可惜仅仅建立在对一种叙事形式的分析上：俄罗斯民间童话。因此，假若我们不能指出童话叙事中的模型在其他价值哲学领域里的效用，假若我们不能把它应用到不同的叙事形式上，这个模型的意义就一定十分有限。人们甚至可以说，能应用它的新领域离它的原产地越远，它的意义就越普遍。

拿一新领域做试验虽说有些盲目性，但它至少得满足上述条件。我们挑选了一些故事简述：一个被恐惧缠身的孩子在接收心理剧治疗时讲了这些故事，我们把它们从萨福安的文章“关于分析心理剧的思考”（*Bulletin de psychologie*，30nov. 1963）中连同作者的评注一块儿摘出来。为语义学描写获取原始的、未经处理的心理分析材料非常困难，而萨福安的简述有两个优点：它简明扼要且完整地描述了孩子在治疗中的表现。这个语料库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民间童话是集体的产物，而它相反，其中所有的叙事都是纯粹的个人创造。另一方面，叙事的形象表征和意义结构之间的区别在其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语料库由一系列短故事组成：侦探和间谍的

故事、中国童话等，尽管如此，所有叙事的话语表征还是统一在一个主题之下，反映了一个单一的意义结构，即使它和民间童话的结构不是同一的，也是可比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心理剧治疗看上去像是这样一种技术：它对一步步建立叙事的转换模型起促进作用，直到最后给出一个完整的模型。而治疗的作用就是注意串联那些零散的叙事，让它们为预计中的结构性模型服务。为了验证我们以上的简述，下面我们逐步对萨福安的治疗做一个全面介绍。

b）起始的补偿结构

孩子是由母亲领着介绍给心理医生的，母亲的性格显然比较霸道，跟在后边的父亲很不显眼，也比较慈祥，一个常见的家庭模式。这是我们掌握的第一批背景材料。医生请孩子为心理剧游戏编一些故事，于是孩子就“一周接一周地讲了一些侦探故事，故事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具有以下的共同点：一边是一个讹诈者，另一边是一个高尚的受害者，勇敢却被诈光了钱财。揭穿他的谜底，故事讲的是一个人物受到了损害，而这个人物本该受到全力的保护，这个人物常常就是他父亲”（见上述引文，第 365 页）。

这是一个潜在地显现在所有叙事起始阶段中的结构，如果我们把前边用在民间童话描写上的符号体系移植到心理剧叙事上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反复出现的结

构表述成下式：

$$\frac{\overline{c_2}\text{（失望）}}{\text{非}\overline{c_2}\text{（屈服）}} \simeq \frac{c_2\text{（揭露叛徒）}}{\text{非}c_2\text{（确认英雄）}}$$

也就是说，用一个简单的纵聚合体系，仅把个人价值观以极为简练的对立形式表达出来：英雄在起始序列中被剥夺了的生命力，因其对自身英雄本质的发现而得到了补偿。

不过，这份叙事清单的结构完全是无时性的：尽管该结构像列维—斯特劳斯所定义的“神话”那样，让孩子“体验”了一次不可能发生的经历，但它并不导致任何历时性串联。大家都会承认，起始情境虽然在叙事中没有显现，却是间接存在着的，并可被表达为 $\overline{A}$（父子之间契约的破裂）；在此不可能把个人价值融入“社会秩序”，其表达式只能是：

$$\frac{\overline{C}}{C} \simeq \frac{\overline{A}}{x}$$

并且意谓着在远景上没有一个可预知的契约。由于缺少发送者，孩子在叙事中一再强调的英雄主义也无法得到承认。

我们发现，在此惟一出现的是 C_2，它既是叙事清单的一个代表特征，也是整个语料库的代表特征。也就是说，剥夺和给予生命力是个人价值观念中所偏爱的做法，它大概构成了这类结构的定义成分之一。

注：有一点很有意思，医生中止这一起始结构

的重复时所采用的干预方法，就是对叙事整体做出一个语义结构解释。至少在治疗的这一阶段，“意识的觉醒”似乎仅局限于起始阶段。

c）拼斗的出现

医生干预后，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叙事。所有这些叙事都具有同一个观点：“恶人自有恶人磨”。“警察上了坏蛋一个当，不过最后还是抓住了恶人；或者讲的是一个强盗，他不按行规办事，想撇开同伙，结果自作自受，反而被同伙给算计了，等等”（同上，第 365—366 页）。

叙事在此处对赋予它无时性特征的补偿成分 c_2 和非 c_2 弃之不用，试图组合一个历时序列，引进一个新的功能组 F：

$$\overline{C_2}\frac{(\text{失望})}{(\text{屈服})}>F\,\frac{(\text{战斗})}{(\text{胜利})}$$

通过研究这一新的叙事清单及其结构性序列，我们会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 以上结构性序列虽然具有历时性特征，但其意义相当含糊，与补偿性质的无时性结构区别不大。实际上，在这些叙事中英雄和叛徒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叙事作者有选择当英雄或当叛徒的权力，不过一般他还是喜欢当英难；

2. 是什么使得角色可以互换，使得拼斗（F）无法演变成考验呢？显然是在叙事结构中缺少一个契约（A），当然也就缺少了一个发送者，只有在发送者赋予了辅助

者一个使命的情况下，辅助者才能变成主体行动元。

注：医生的干预此时直接进入游戏，而不再是来自叙事之外：医生不再是医生，他扮演受害者，拒绝继续受迫害。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意识层面上的问题，而是如何分配和承担角色的问题。

d）考验的发展

发誓要复仇的孩子第二个星期又带来了一个极复杂的中国童话：李松（译音）和李拓克（译音）是两个敌对的山大王，其时两军对阵。商是李松的副将，他禀告大王说抓住了一个大夫，在中国只有这个大夫能治瘟疫。李松命令秘密扣留大夫，并想出一个破敌妙计。李松的女儿去李拓克军营附近采花，被敌人抓住做人质。被俘后，她假装患了瘟疫。李拓克要四箱金子才肯放人，并自以为得计。李松则提出反建议，用能治瘟疫的大夫交换女儿外带二十箱金子。交换后，李松向副将口述一信寄给敌方，信中说大夫本人已患瘟疫，李拓克离死不远了。

讲到这里，医生插话，向孩子提了一个令其进退两难的问题：给敌人寄信，这不是告知敌人赶快想办法躲过一死吗？如果要消灭敌人就不该寄信。孩子无言以对，便不再继续讲下去。

该故事虽然复杂，但还是可以被看成一个模拟的考

验。先看看这个考验由哪些功能构成：

预期的	非$\overline{c_3}$（缺憾）	F（拼斗）	A（契约）	非c_3（补偿缺憾）
↓	假装大意被擒	模拟的拼斗要赎金和反要赎金	假契约：英雄与叛徒（而不是与发送者）之间的交换	赎回女儿（而不是欲望对象）
表征的	—（非$\overline{c_3}$）	—（F）	—（A）	—（非c_3）

整个考验完全在“失望”层面上展开，也就是说靠的是假象和欺骗。另外，表征的符号都是反的，功能的横组合次序也是颠倒的。尽管如此，除“标记”外，“考验”的构成成分应有尽有，因此，在整个语料库结构的发展中，它无疑代表了一个进展。

妨碍这个叙事样例展开的主要困难在于角色的分配：假契约从功能上来说是站得住脚的，但如果细查其签约的行动元，就很难说通了：英雄只能和叛徒签约，因为在此处他还兼任了发送者的角色，所以不可能再充当接受者。在缺憾得到补偿时这种身兼主体和发送者二职的情况就更清楚了：由于同样的原因，欲望的客体转回到发送者—父亲的手中。然而，作为发送者，他不可能赋予自己获得资格的活力，所以只好给叛徒送去“反活力”（疾病）。更加狡猾的是，送给叛徒的反活力实际上仅仅是所谓的非活力，可叛徒却信以为真，以为自己会被剥夺生命力：获得资格考验于是以曲折的方式得到了

完成。

对叛徒的惩罚（c_2）也一样：英雄既然兼任发送者，就有责任处罚叛徒，于是这一次他给叛徒送去了一个真正的反活力：患瘟疫的大夫。可是，只有当英雄已被确认时我们才能知道谁是叛徒，于是发送者—英雄就掉进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作为发送者，他要发出一个信息客体（非 c_1），否则人们就无法认出他这个英雄。医生的插话便发生在此处。

注：医生的插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主体＋发送者”这种身兼二职的不可能性，另外，英雄也不可能是自己的发送者。没有一个外在的独立发送者，叙事就无法把英雄确认为英雄。下面两个故事将被同时用来寻找发送者和确认英雄。

e）考验的完成

孩子最后编出的新叙事终于以正面形式完成了考验。这是一个间谍故事：“反间谍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在开罗的一家酒吧里小口地呷着威士忌，他退休了，想过安定的生活。他的前任长官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知道又有新任务，立即想‘开溜’，可是被长官适时截住。这次任务是派他去另一个城市，那儿有一个他不认识的间谍将交给他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他的任务就是把情报安全送到目的地。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他历尽艰险，其细节的含义也很丰富。他还将受伤。一个卖花生的小贩模样的人靠近他，塞给他一包花生。东西刚到手，陌生人就被一颗飞来的子弹打死了。他怀疑此人的身份，最后终于在花生中找到了情报。”

尽管这故事有些地方缺点儿什么，交待得也不清楚，但要进行叙事分析却没有任何困难：

非 c_3（缺憾）	A_1（指令/受令）	E（获取资格考验）	F_1（拼斗）	c_1（标记）	非 c_3（弥补缺憾）
等待情报	长官给退休的前间谍一个任务	历险	枪击	受伤	得到情报（!）

注：叙事省略了起始序列的重复，认为该重复可有可无，仅在人被异化了的背景中保留了缺憾这一情境。叙事和叙述者的兴趣显然不在此处。

仔细分析叙事，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中先是重新找到了发送者，但没有认出他来，于是最后又失去了他。实际上，发送行动元在叙事中表现为两个角色：反间谍局的长官，他是寻找接受者的发送者；化装成卖花生的陌生人，他给了英雄一个“情报”。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很容易找出心理分析医生的影子，他是埃及人。顺便提一句，发送者—心理分析医生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可以将其简化为三个功能：

1. 这是个接受者不认识的发送者；

2. 他的作用是传递信息客体，即侦察和得到承认的标记（伤口则是一个冗余的标记）；

3. 一颗流弹飞来打死了陌生人，他的作用结束。

所以说，即使得到了“情报”，英雄并没有得到褒奖，因为发送者已经被杀死。

注：医生既然已“被杀死”，他也就不再插话了。

f）得到承认和褒奖的问题

孩子最后一个故事实际上是伏尔泰《查第格》后几章中一个故事的翻版，名叫“隐士”。大家记得，查第格最终回到巴比伦后遇见了一个愿意陪伴他的隐士，他们一起找地方过夜，一连四夜他们换了四家，每家主人都不一样。四个主人的顺序是：慕虚荣者、小气鬼、哲学家、贞妇。为了向他们表示谢意，隐士从慕虚荣的家伙那里偷了两个纯金烛台，把它们送给小气鬼，报答哲学家好客的法子是临走时在他家放一把火，答谢贞妇的方法是杀死她的侄子。

不难看出，叙事的第一部分被用来处罚叛徒（c_3）和奖赏英雄（非 c_3）。这很正常，考验在前边的叙事中已完

客之道是不好的（负面的），应该惩罚，可实际上只罚了一个；哲学家和贞妇的接待应该是不错的（正面的），应该得到奖励，可事实恰恰相反。这和话语开头所显示的一模一样，英雄总是一个“失望”（上当）的英雄。

不过叙事还没有结束：别忘了，隐士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他有能力给予英雄（＝查第格＝孩子）一个信息。这儿的英难已经被打上了标记（受伤的伤口），他完成了任务，补偿了缺憾（他按要求得到了情报）。这个情报是主体的欲望对象。大家还记得，仅仅收回这个客体对象是不够的，叙事还必须让发送者把这个客体以冗余的方式重新交还给主体：客体既是一个奖品又是一个新契约的担保。完成最后这个功能的是隐士一发送者，尽管此处他给出的信息是如何“分辨善恶”，但它仍不失之为一个奖品。

由多个形象叙事清单所宣示的这个话语的总含义现在就比较清楚了，它有一个特别的转换模型（了解其价值的专家可以将其看作是叙事的一个特殊次类的模型），可以被定义为$\overline{\text{非 } c_1}$借助考验转换到非 c_1，其中的非 c_1 在考验中被当作非 c_3 来处理。也就是说，初始的缺憾状态以欠缺信息客体为特征，即缺少“知”（savoir），这就给了叙事“缠绕不休”的初始结构以一个摇摆不定的地位，使得主体既是一个容易上当的家伙又是一个“自知的英雄”，其结构式为复合项（$\overline{\text{非 } c_2}$＋非 c_2）。在这种情况下，转换模型若想运转就必须把缺憾的对象（在此为非 c_1）当

作欲望的对象（非 c_3），这也是它的定义所决定的。这个独特的欲望客体（非 c_3＝非 c_1）将在主考验中获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它就是那个要弄到手的情报），然后由发送者重新送给英雄作为奖赏。实际上，隐士的解释性“信息”提出了一个“知”的模态，它通过揭穿假面具，即区别“真实”与表象，有能力把（$\overline{非c_2}$＋非 c_2）复合项分解成为一个析分的范畴：（$\overline{非c_2}$/非 c_2）。所以说结束叙事的这个信息客体既是一个奖赏，也是让我们能认出这一奖赏的“知（识）”（savoir），因为它把奖赏与惩罚区别开来。

g）模型的形象表征

显然，有一个内在的转换模型在操纵着表征本身。下边的一览表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以上几个具体故事的整体结构的形象表征是如何完成的。

叙事名	$\bar{A}$	$\bar{C}$			E					C		A
诡诈者	$(\bar{A})$		$\frac{\bar{c}_2}{非c_2}$							$\frac{c_2}{非c_2}$		
愚人自有愚人福			$\frac{\bar{c}_2}{非c_2}$				F_1					
中国童话				$-(\overline{非c_3})$	$-(A_1)$		$-(F_1)$	$-(非c_3)$		$-(非c_2)$	$-(c_3)$	
间谍				$\overline{非c_3}$	A_1	E_2	F_1	非 c_3	c_1			
隐士		$\overline{非c_1}$									非 c_3 (＝非 c_1)	A

h）转换模型的意义

思考到了这一阶段，我们承认自己面临着困惑：我

们把从民间故事中提取出来的模型用到了心理剧的分析上，可是所得到的结果不仅出乎预料，而且也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可是对心理分析来说，它似乎又没有任何出格的东西。总之，如果我们的分析步骤正确，那么以上的分析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转换模型的概括程度到底有多高，除了民间童话和心理剧之外，它是否能通过衔接各种变量来阐明所有历时性转换，亦即意义结构的历史。尽管两个例子中的结构是一致的，但心理剧结构毕竟是萦绕性的，它具有自己的结构特征：欲望的对象和心理剧追寻的客体都是"知"，而转换在纵聚合轴上则表现为用"知"取代"不知"。这是该模型的一个不可否认的特性。

现在做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关于转换模型，我们对其各种可能的衔接做了一些初步设想，将其用在形象表征的描写中只能算是一个假设。比如考验，我们知道它在叙事进程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它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形象的转换模型，但我们还远不能用语义学术语将其完整地表述出来。

一个描写的样本

1 总 则

a）样例：贝纳诺斯的世界

我们以为，在这一理论探索即将（暂时地）结束之前，找一个样本来做基本完整的描写应该是有益的：从一个给定的语料库出发，阐明所有的应用程序，最后提出那些组织着一个语义微观世界的确定模型。抱着这个想法，我们选中了贝纳诺斯的世界。我们不由自主地选定这个作家是因为塔善·尤赛尔（Tahsin Yücel）在这方面已经做过不错的研究，他最近在伊斯坦布尔文学院答辩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贝纳诺斯的想像世界》。

尤赛尔所用的方法和语义学描写步骤没有矛盾。不过，选一个已经被人清理过的场地来工作一定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是尤赛尔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研究涉及到贝纳诺斯的全部作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他研究的代表性。选择任何一个其他样例都会因为我们的分析将受到篇幅的限制而过于片面。他的研究不仅具有代

表性，而且对语料库进行了前期分析，因此我们无须回避在描写中出现的种种困难，也使得下边这个练习成为真正样本的可能性变大。最大的弊病就是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说很难担保他的描写完全合乎情理，因为不管他说什么，既然我们选用了他的论文，就应该相信他的工作态度。另一个困难来自于尤赛尔的描写形式，是被人称之为文学批评的那一种，文学批评不过是语义学前期分析中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仅有它是不够的。另外在鉴定资料时也有些不确定的东西：对有的资料他完成了清减，但有的资料他只进行了部分清减，有的甚至原封未动。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多少应有点保留，所以说，下边的样例只是为了演示一下如何使用那些初步的描写方法，并且仅勾画其中的几根主线。

b）通过提取组成文本

《想像世界》的作者为了建立文本似乎使用了提取法：我们在前边仅仅简略地提过这个方法，我们现在可以按他的描写方式来给出具体的例子。

作者发现一些词位具有冗余现象，并假设它们代表着一个需要描写的同位关系，这就是提取法的出发点，其中最重要的词位是：

生/死

它们是最初的压缩清单，提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所有含有以上词位的上下文收集到手。从方法论上讲，这

等于把清单中的每一个词位都看作是一个不变量，每个不变量作为一个类，下边统领着多个变量，变量便是提取出来的一系列品质词。也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语料库中，一个不变量词位是由一个拥有多个变量的类来定义的。如果再把一个变量类清减成几个数量有限的义子，我们就能获得足够的品质词信息；分析如果到此为止，我们便已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可以用它来说明“生”与“死”的语义内容。

仅仅对从语料库中提取出来的小部分信息进行描写，这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们不应马上进行清减，而应将其推迟，把前边提取出来的每一个品质词变量看作不变量，再按上边的方式进行第二次提取。

这一新清单将有两个用处：

1. 对第一次提取后所获得的品质词类就可以作类似的处理，并根据它们来寻找那些与表中已经定性的品质词具有等值关系的词位。通过这些品质词不变量找到等值词位，再由等值词位组成行动元类：

死 水 忧	与	生 火 乐

在所有的上下文集合中，修饰这三个词位的都是同样的变量。我们应当认为，这些品质词类定义了“生”与“死”，确立了这个给定的语料库中特殊的“生”与“死”的内容。所以它们给予那些等值词位的也只能是相

同的内容，它们可以相互取代，可以被缩减成一个共同的义子行动元。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即使在此后分别谈论“死”和“水”、“生”和“火”，它们实际上还是一回事，是一个单一义子的不同表达式，其命名或者是“生”，或者是“死”。

注：姑且把“乐”与“忧”留给未来。

2.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依靠品质词清单来提取新的词位，确定这些新词位的不是整个类而是分开后的每一个单独的品质词。这个新的词位清单也像前一个清单一样是二分的，而帮助我们建立这个新清单的品质词本身则有的属于“生”域，有的属于“死”界。它们构成两个次类：

(a) 尸体—老朽—疾病—假象—仇恨，等；

(b) 活体—儿童—血肉—真理—爱情，等。

于是便建立了一个生的序列和一个死的序列，每个品质词本身都和其中的一个序列保持着上下位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提取法就是进行一连串的提取，我们从上下文中提取一个清单，然后自这个清单出发去提取新清单，如此这般一直提取下去，直到把语料库提净为止，也就是说，对最后的清单（n－1）进行了最后的提取（n）之后，在语料库中就再也找不到相关的品质词了。这样的提取法具有完整性：我们选定了“生”与

“死”作为同位关系，然后从附属于这个同位关系的语料库中提净所有有关的意义成分。我们进而甚至可以这样设想：一步步膨胀起来的清单还提供了新的材料，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用它们来验证我们在描写开始时所提出的假设。

c）同位关系的选择

进入提取法之前要做一个战略选择，该选择不仅仅建立在可观察到的关于词位“生”与“死”的冗余现象上，它还预设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天真问题：对贝纳诺斯而言生与死意味着什么？他赋予了这两个词什么样的特殊的含义？此处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对“生”和对“死”这两个事实，在描写中我们都不宜取物质向度。例如文本中关于“死”有这样的形容：

死是黑色的，

死是冰冷的。

这儿谈的当然不是死的颜色，也不会是死的温度。描写在此对准的是精神向度。与冗余现象一样，被选中的“生/死”这个二元对立的同位也是最初的天真假设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只要我们把贝纳诺斯的书读上五十几页，就会知道“生/死”在他的书中总的来说并不是两个功能，而是对两种可以相互交错的“生存状态”的指代：活着的可能是死人，死了的可能仍活着。换句话说，人生由

生与死组成，它们是人类精神状态中的两个项，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

于是，尤赛尔提出的同位关系便表现为一个二项复合的基本结构，我们可以将其表达为：

$$E_{生存状态}=（V_{生}+M_{死}）$$

在结构中，两个成分间的平衡其实是相当不稳定的，它有时向正项倾斜，有时向负项倾斜，使得其中的某一项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的生存状态表现为一个复合结构，那么“理想的生存”就只能是消灭负项，仅仅发扬光大正项。同理，对于“堕落”来说，其语言学表达式就是正项在结构中的消失。因此我们作了一个假设：贝纳诺斯的话语是一个神话表征，其同位为E（生存状态），同位通过综合两个矛盾项给出一个框架，表现为一连串的结构性变迁：

$$E_{生存状态}=（V_{生}+M_{死}）$$

同位关系的比重在正负两项间摇摆不定：

$$E_1=（V+m），\qquad E_2=（v+M），$$

并渐次走向两极分化，最后导致复合结构的破裂：

$$V_{生}/M_{死}$$

注1：我们用大写字母表示在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用小写字母表示被统治的次要成分。

注2：我们差点忘了在此处引进那对关于本体

感受的范畴："适意"/"难受"。它们包容着表征整体。我们可以根据一个语料库来描写数个模型，但若想让模型具有价值判断和思想意识上的特征，这对范畴就必须在场。

2 生存的"中间"

a）表征的形式和分析的类型

我们已有机会强调词位"中间"(milieu)的模糊性，它既可以指某物的中心又可以指包裹着中心的某物。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指别性复合结构反映在词类上的一个典型例子，按加斯柏(Jaspers)的说法，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

包容（物）/被包容（物）

我们认为这种提法要比尤赛尔的"容器"/"内容"的说法更好一些。

如此命名更有概括性，这一范畴也出现在贝纳诺斯的世界里，但并不能说它代表了其世界的特征。不过，它是精神空间里的一个基本衔接，起桥梁作用，允许我们以最佳方式从"抽象"过渡到"形象"，把抽象概念转换成行动元。例如，在确定了同时用来修饰词位"死"和"水"的那些词汇的类别后，我们就很容易在"水"中看到一个形象义子，它扮演的角色就是包容另一个角色：尸体。换句话说，"包容"/"被包容"初看上去仅仅表达

了两个指代物体间的拓扑关系，但它们也可以被用来确定行动元之间的关系。其后才是加在行动元之后的品质谓语或功能谓语。

我们发现，由于以上的行动元关系相对简单，此处的拓扑构形对品质分析极为有利（对“水”和“火”的描写就揭示出一个非常丰富的义素衔接网），但一进入到有机体的形象描写，表现的不再是物理性质和空间性质时，用同一范畴解释就不灵了。

人对贝纳诺斯来说是一个“血肉”之躯，可以看作是一个包容物，它的内部包容着一个扮演死神下属的角色，如癌症，是它在损害和毁坏着这个有机体。不过与前一类构形不同的是，在这儿扮演主体的不再是“包容物”，而是“被包容物”，被包容物在复合结构中占统治地位。更有甚者，有时代表占上风的死神的竟不是主体，而是客体：“老朽”和“傻瓜”就是死神的客体对象和受动者；但同时它们却不再是被包容物，而是包容物，死神在其内部活动。最后，第三种情况便是一个外界的家伙在攻击非人类的生命体：“老鼠”、“蛇”，它们扮演的角色是死神的下级。

因此，当贝纳诺斯使用的形象表征涉及到有机体时，“包容”/“被包容”这一范畴，就不再与我们此前说过的生存结构的“统治”/“被统治”衔接成互补关系，也不再能帮助我们把不同角色清减成主体或客体行动元。因此，死神，作为行动元，表现为不同的角色，相对于

上边的两对范畴而言，它们的身份可以表述为下图：

行动元	角　色	比　重	位　置
死　神	癌症	统　治	被包容
	老朽	被统治	包　容
	老鼠	统　治	不包容亦不被包容

可见，在表现有机体时，角色的分配具有文体学特性，它与无机世界中那种极简单的分配方式是不一致的。从方法论上看，由于角色本身的这种多变性，我们一开始无权把行动元看作是不变量然后到谓语中去寻找其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又不得不借重功能分析法，或许通过建立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清除和缩减掉部分角色。

不过，对无机界形象进行品质分析是非常方便的，行动元结构和比重、位置之间的关联是勿容置疑的：

$$\frac{\text{主体}}{\text{客体}} \simeq \frac{\text{包容}}{\text{被包容}} \simeq \frac{\text{统治}}{\text{被统治}}$$

然后再给主体赋进“生”或“死”的内容值，复合结构的正负项也就确定下来。

我们下面从定性描写开始。

b）生与死

比较简单的方法便是先画一个图表来介绍品质模型，然后再给出其成分的解释。模型是根据尤赛尔提供的资料建立的，不过我们稍微做了一点改动。

生			死		
符号	义子	义素	义素	义子	符号
V_1	变化	变异… 上升…	…同一 …下坠	静止	非 V_1
V_2	光明	光亮… 透明…	…幽暗 …晦冥	黑暗	非 V_2
V_3	热量	热量…	…寒冷	寒冷	非 V_3
非 M_1	纯净	纯洁… 干净…	…不洁 …肮脏	混杂	M_1
非 M_2	气态	升空… 轻飘…	…朦胧 …沉重	液态	M_2
非 M_3	有形	味道… 色彩… 节奏…	…乏味 …无色 …单调	无形	M_3

品质模型在表中表现为一个有等级的结构，其实它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本章开头那个天真假设中所说的“生存状态”这个概念的内部衔接方式，它由三个不同的、平面组成：

1. 行动元平面。我们认为“生存状态”是一个复合结构，属于精神向度，可以二分为“生”与“死”；另一对与其共生的范畴“适意”/“难受”也强调了它们的这种衔接方式。另外，我们还曾明确指出，在被赋值前，“生”和“死”这两个结构项在形象表征层面上是两个指别词。不过，由于它们有可能被赋予某些品质，它们在

句法中具有行动元的地位："生"和"死"是两个指别行动元，那些赋予它们的品质一方面给了它们一个语义内容值，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两个不同的精神空间。

2. 义子平面。行动元的品质在模型中表现为由品质信息构成的义子，它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构成了行动元和义素之间的中介。

3. 义素平面。义子的建构取决于义素分析，义素分析借助义素间的对立把例句组织成一个个相互分离的并列类。换句话说，行动元结构是一个初始的假设，义素分析与它交接并且验证了它，模型是义素分析的结果。对模型整体而言，义素组本身是一个潜在的分类系统；另外，构成模型内涵的完全是本体感受，所以模型也是一个作价值判断的模型。

至于作为中介的义子，其在结构中的地位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十分反常的是，似乎在清减前它们之间就已经有了对应关系。事实上，如果属于"生"的那些义子因义素之间的对立关系与属于"死"的那些义子产生了关联，那么这两类义子只能是构成了两个清单，每个清单有六个义子，不过其间的衔接方式不太明晰。

注：义素描写本身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例如义素有时像是一个成分，有时又像是还可以继续切分成更小单位的义素内容。因此请读者把重点放在方法论的步骤上，而不是放在具体细节的准确性上。

c）火

关于“变动的生”和“静止的死”，在贝纳诺斯的“罗列”里有着大量的冗余实例：乍看上去，“动态”/“静态”这一对义素范畴便是解析其价值观的基础。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生”这个行动元仅由功能构成，“死”这个行动元仅由品质构成。“生”与“死”首先是两个指别词，“生”被定性为活动的区域而“死”被定性为静止的区域则是后来的事。

不过，生的变动特点可以作为一个起点，由于清单中的义子还不成体系，对义子的衔接可以由此开始。变动可以被理解成一个变异，也就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从一个性质到另一个性质的动态过程。因此它具有功能特征，我们有可能从中提取出一个功能信息。事实上，一般的字典和大众习惯都是这样描写“火”的：“通过燃烧发热发光”。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表述原因的功能，它可以拥有两个行动元：发送者为因，接受者为果。经过以上解释，我们可以把关于“生”的义子清单中的三个义子汇集在一个信息里：

$$V=F\text{（变化）}[A_3\text{（火）；}A_4\text{（热/光）}]$$

有了这个表达式，我们就可以理解义子在价值观模型分布中的作用了。

1. 这个公式首先让我们看到了对“火”的两种解释，二者表面上还有些矛盾。我们说，由同一类品质词所确

定的“火”是“生”的等值物。在刚刚推理出来的功能信息里，“火”仅仅是这个信息的发送者：所以“火”是生命，同时亦是生命之源。据语言学术语，可以说“火”在表征层上有两种不同的运行方式：按照句法，“火”是行动元；按照语义学，“火”是功能信息总体的下级代表，既然是代表，它与“生”的一部分表现为义子的品质便是等值的。

2. 这种带有文体学意味的行为方式同样也反映在“光”和“热”的双重身份上，它们不仅是“生命的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生命本身的下级代表和等值物。

注：“热”/“光”之间的对立将帮助我们建立精神世界的二分：光便是光亮和透明，它代表了人的“精神之魂”，“热”则与“身体之魂”有关。可惜我们没有机会读得更具体些。

3. 我们可以利用下级行动元来理解义子的中介作用：作为行动元，它们从属于功能信息结构，而“生”这个指别行动元便是部分地由这个结构定义的；作为品质的内容，每一个正义子都会有一个与其相对立的负义子，全部负义子的总和就是“死”的内容。

根据方法论的需要，我们可以在本阶段给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如果我们把 V_1、V_2、V_3 看作是“生”的正定义，那么，通过对它们进行义素分析，确立义素之间的对

立，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关于“死”的负定义。正定义蕴涵了负定义，负定义由非 V_1、非 V_2、非 V_3 组成。比如说，用热来肯定“生”就等于是在用冷证明“死”。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专门给“死”的负定义建一个义子清单了：它们的衔接方式不过是“生”的正定义的投影罢了。反过来，对“生”的负定义也一样，我们只需对“死”的正定义提出一个解释的原则，就能通过推理自然而然地得到“生”的负定义。

d）水

我们知道，“死”与“生”相对，“生”代表变动，“死”代表静止。如果我们把变动解释为从一个状态（或一个性质）向另一个状态（或另一个性质）转化的动态过程，那么静止就是一种“静态”，也就是一个共相或异相的常态（至少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状态）。

我们没必要一个个地解释“死”的负定义，它们可以从“生”的正定义直接推理出来。在此我们只想强调一下它们所具有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即非必要性结构特征。借用法语中的一个现象来打比喻，法语的名词有一个特征，即阴阳性，所以我们说“生”的正定义像名词，是不变的；“死”的负定义像形容词，是有变化的。正如名词的阴阳性是固定的，“火”只能是“热”的，而“水”却允许有不同的搭配：水可以是凉的、温的或热的。我们还可以换种方式来表达以上区别，说“生”的正定

义的内容是法语性的，也就是社会性的，而“死”的负定义的内容则是贝纳诺斯的，即纯个人性质的。无论怎么说，对具体范畴的分析让我们发现了一些“合语义性”的标准，值得深入研究。

水也可能是正定义，我们可以把这些正定义放在水的复合结构中进行考察。

“生”是一连串前后相接的同一性和相异性，在修辞上应该属于反衬，“死”则同时拥有了同一性和相异性，在修辞上是正话反说。将其当作一个意义的基本结构来分析，“死”相当于一个复合项：

$$\frac{\text{同一性}}{（\text{正}）}/\frac{\text{混杂性}}{（\text{复合}）}/\frac{\text{相异性}}{（\text{负}）}$$

注：在使用贝纳诺斯的术语进行的义素分析中，我们还应该做一点修正：纯洁＝同一性；不洁＝（同一性＋相异性）。“干净”和“肮脏”不过是以上对立的冗余，且主要是视觉方面的冗余。

我们之所以把“混杂”看作“死”的第一定义，这主要是因为该“复合结构”有可能帮助我们弄清到底是什么东西促使贝纳诺斯选择了“水”作为“死”的等值物，而水并不必然地和死连在一起。这一等值关系一旦建立，其他的正定义便被整合到一起，成为一系列特殊的衔接，并表征出其结构的复合项。

因此，在稳定性这个轴上，水处在另两项的中间：

$$\frac{\text{气态}}{(\text{正})} / \frac{\text{液态}}{(\text{复合})} / \frac{\text{固态}}{(\text{负})}$$

事实上，水既不是固态的也不是气态的，它是二者的综合。火由于其恒定的气态被定义为负，由此可见与它相对立的并不是正项，而是复合项。水同时拥有义素组中的两个项。把复合项看作正定义，就能通过推理得到简单项，而不是相反。

如果到此为止我们的推理没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对义子“有形”作义素分析就能找到衔接的复合项。如“无色”初看上去虽然像是一个与“颜色”对立的负项，但在义素轴上可被分解为“黑”/“白”的对立，二者的综合生出一个复合项，就是“灰”，“灰”概括了所有关于“肮脏”的色彩。同理，“单调”不过是“同一性＋相异性”的不断重复，也就是说，变化演变成常态。以上观点用在“乏味”上大概也不会有困难。因此，义子“无形”在构成“死”的所有精神领域和感觉中都表现为一个复合结构。

因此，“死”的正定义应该被看作是复合结构的冗余，一个个新赋值被补充进来，其性质是复合的，其义域是“稳定”的，其情感空间的衔接是复杂的，于是这个复合结构便被我们逐步地把握住了。与以上结构相对的“生”的负定义（它们并不是对“生”的否定）也由此被推理出来，得到了肯定，成了正项：清除掉复合项中的负项，我们就获得了正项。

注 1：如果想加深分析，大家可以把所有复合义素的衔接一个个取来，研究清除其负项的条件。

注 2：义素衔接"上升"/"下坠"被我们用来定义"变化"/"静止"这一对义子，对此我们还须补充一句：实际上这里是个义素组合，义素"轻飘"给了运动（空间的变动）一个附加特性，使其具有了向上的趋势；静止则和"沉重"组合，于是下沉。

e）组合模型

义子清单表面上看是信手拈来的，它们组建了"生、死"两个行动元。我们一直在努力地说明义子的结构性组织，最后终于确定了模型的一个新平面，一个处在行动元层次和义子之间的平面。那六个确定行动元"生"的内容的义子可以被我们再细分为两类："生"的正定义和"死"的负定义；反之，构成行动元"死"的内容的六个义子也可以编成两组："死"的正定义和"生"的负定义。如果不看模型中的实际赋值内容，我们说其形式表现为两组对立的关联关系：

$$\frac{V_{(生)}}{非V}=\frac{M_{(死)}}{非M}$$

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生"与"死"的对立，而是衔接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虽说这个新的模型表达式推翻了我们最初的假设，但它在衔接形式上和民间童话的内

在的、无时性的结构一模一样，和列维—斯特劳斯为神话设计的模型也是一样的。

这种结构上的相同绝非偶然，我们在各个极不相同的领域里都见到了这种关于内容的无时性组织模型，所以我们有权假设它具有极大的概括性。该模型超然于具体内容之上——而赋值内容既可以通过功能分析（民间童话）、也可以通过品质分析（贝纳诺斯的世界）来获得。我们在归纳中使用品质模型或功能模型来说明义子和义素组上表征的内容，而该模型要比功能模型和品质模型更高一层，所以我们只能将它看作是一个元语言模型。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区分，我们大概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义子和义素组层次上的组合模型，以便和转换模型相区别。

3　生存的赌注

a）疾病

在贝纳诺斯创造的形象表征中，精神领域作为生存之外射，与体积指别词混为一体，且可二分为“水”、“火”，其内化的表现舞台则选择了人的肌体。一个活人对贝纳诺斯来说就是一个“血肉”之躯，尤赛尔提取出了所有关于“有血有肉”的其他的冗余表达形式，建立了第二份信息清单，为新的分析做准备。在贝纳诺斯的世界里，疾病频繁多样，健康的人常常受到疾病的折磨。

疾病有两类：

肉体疾病/血液疾病

这一划分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起点。我们可以将其表达成两列：

符号标记	P′		N′
病　例	癌　症 坏　疽 溃　疡 创　伤	与	贫　血 出　血 败血症 水肿等
总　称	“癌症”		“贫血”

为方便起见，我们用“癌症”这个在贝氏世界中最常见的病来命名第一类病（P′），同理，用“贫血”来指称第二类病（N′）。

提取出这些与疾病有关的谓词之后，再进行清减，就能得到两种功能义子。如果把这些疾病看作是主体行动元，把人的健康肌体看作是客体行动元，我们就能给出两个格式固定的功能信息表达式：

$$P' = F\text{（吞食）}[A_1\text{（癌症）}A_2\text{（肉体）}]$$

$$N' = F\text{（吮吸）}[A_1\text{（贫血）}A_2\text{（血液）}]$$

b）动物

贝纳诺斯的动物群体与其疾病一样变化多端，具有冗余的特征。一边是：

马

驴

狗

猫

鼠

蛇

昆虫（等等）

另一边是：

审判兽

墨水兽

道德兽

统计兽

民主兽

独裁兽

唯物兽（等等）

尤赛尔对此清单进行组织分类，他将其一分为二，两个清单构成了以下的对立：

野兽/家畜

注：尤赛尔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这两个清单，不过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行动元文体学领域，所以对我们建立语义模型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据尤赛尔，剩下的动物可以分成三组：

啃咬类

软体类

昆虫类

对这三个角色的功能信息进行提取和清减，得到以下两个功能信息：

$$P''=F\text{（吞食）}\left[A_1\frac{\text{（啃咬类）}}{\text{（昆虫类）}}A_2\ (x)\right]$$

$$N''=F\text{（吮吸）}\left[A_1\frac{\text{（软体类）}}{\text{（昆虫类）}}A_2\ (x)\right]$$

注 1："昆虫类"既"吞食"又"吮吸"，在两个信息中都出现了这个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表达复合结构项的词，这个复合结构在"啃咬类"/"软体类"的析分中已经表现出来，所以，在后边的功能描写中我们可以对其忽略不计。

注 2：尽管我们可以说啃咬类吃肉，软体类吸血，我们还是宁愿用一个 x 来指代这些信息中的客体行动元，其目的是为了暂时避开另一个困难：比如说癌症既从内部吞食人的灵魂又从外部吞食人的肉体。

对清减后的两类清单中的信息的这一比较，显示了疾病类功能和动物类功能具有同一性。据定义，我们说行动元由功能组成，既然信息 P′和 P″、N′和 N″中描写的功能是同一的，那么，癌症和啃咬类、贫血和软体类也就应该是等值的。疾病类功能信息和动物类功能信息之

间的惟一区别就是它们的客体行动元不同。

c）假象

假象是贝纳诺斯话语中的另一类可能组成集合的新的冗余词位。假象清单可以一分为二：

次要假象/本质假象

对于次要假象，我们大致列举以下几项：

诡计

虚伪

冒充

态度上的假象

恭维性的假象

礼貌性的假象

提问题不得法而造成的假象（等等）

注：在上述情况下，次要假象仅仅是本质假象的下级。

至于本质假象，其分类情况如下：

T‴：失望、梦幻；

T″：骄傲、轻视；吝啬、自私、好色；

T′：仇恨、无情。

不难看出，在贝纳诺斯的世界里，“假象”不过是“疾病”的非形象的等值物。换句话说，从“疾病”到

“假象”，我们只是换了一个表征的层面，同位关系一点也没变。这就进一步从客观上证实了品质和功能之间的同一性。下面表述它们之间的关联关系：

$$\frac{\text{死}}{\text{生}} \simeq \frac{\text{水}}{\text{火}} \quad \text{和} \quad \frac{\text{假象}}{\text{真理}} \simeq \frac{\text{疾病}}{\text{(血、肉的)健康}}$$

如果我们不理会相关范畴本身的内容，以上表达式便清楚地显示了表征（形象和非形象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本节的描写中有两个难题：首先是把不同的表征层面清减成一个单一的非形象层面，并给因此而得到的各个义子命名；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义子之间的平行的对应关系：一方面是属于假象系统的义子，另一方面是与之对应的属于真理系统的义子。另外还有一个麻烦，作者没有单独提供一个假象功能清单，所以我们不可能用以上分析疾病和动物的方法来分析假象。

注：该清单的短缺到底是因为作者的粗心大意，还是这本来就是语料库的一个特点，这都不是很重要：语义描写从原则上说应该已经预备了一些其他方法，足以应付以上局面。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把存在于假象和疾病之间的部分的等值关系作为起点，另一方面要牢记形象层面上有着以动物为行动元的语义信息，然后进行一次主体行动元的而不是功能的清减。这一清减过程可以同时利用假

象和真理之间的对应关系所提供的各种可能。

d）及物的假象

暂时把第一类假象（T‴）放在一边，根据尤赛尔的划分我们可以把剩下的两类排成两列：

符号	P‴	N‴
T′	仇恨	无情
T″	骄傲 轻视	吝啬 自私 好色

假定说P‴类代表了那些以“啃咬”功能为特征的行动元，那么N‴就代表了那些以“吮吸”功能为特征的行动元。

不过，谈到对假象做T′到T″的横向切分，我们有必要回到前文：前边我们专门提示过，分别表达疾病的功能和动物的功能的信息在涉及到客体行动元时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无法把二者都消减成一个单一的表达式。该不同之处在于：疾病在人的身体内发生，从内部攻击人体；而啃咬类动物和软体类动物则从外部攻击人体或事物。因此，与“吞食”和“吮吸”功能相关的客体行动元还含有一个义素的析分：内部客体/外部客体。

我们建议将这个析分看作是特属于及物性范畴的衔接，它时而将功能导向一个外部客体（$A_1 \rightarrow A_2$），时而导向一个内部客体，即主体行动元本身（$A_1 \rightarrow A_1$）。用及物

性概念可以对假象（及其形象表达）进行分类，即把疾病所扮演的角色和动物角色对立起来，前者的功能是自反的，后者是及物的，我们可以根据与其等值的形象来分配假象。对及物性概念的借用允许我们把表征形象清减成非形象的“假象”：

符　号	P	N
T′（$A_1 \to A_1$）	仇恨 癌症	无情 贫血
T″（$A_1 \to A_2$）	骄傲/轻视 啃咬类	吝啬/自私/好色 软体类

e）经济的清减

在上表中，假象类的表达词汇和从“疾病”类中清减出来的义子“癌症”、“贫血”一一对应，但在假象类词汇和动物类词汇之间，却并没有同样的对应关系：非形象性词汇比清减后的形象词汇更多。由于前边对它们的定域分析是分开进行的，所以其分析深度可能不一样。为了使它们平行起来，我们可以或者重新分配动物类的角色，或者对假象类进行新的清减。第一个办法似乎行不通（这可能是因为尤赛尔认为没有必要把动物类也分得那么细，也可能是因为贝纳诺斯的风格就在于建立结构与结构之间的对应，而非项与项之间的对应），所以我们应采用第二个办法：

1．例如，表现为“啃咬类”的假象 T″衔接了两个词：

有两类材料可以帮我们把这两个词缩减成一个义子：

（a）通过与"啃咬类"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功能"吞食"和非形象性行动元是相容的；

（b）试着建立一个对应关系，我们在对"真理"的描写中找到了一个既与"骄傲"对立又与"轻视"对立的词：谦卑。

根据《普通词典》对三个词的定义，我们稍加分析就能知道它们共同的义素内容就是"评价"，其衔接方式有二：评价"过高"与"过低"；自我评价或评价他人，这是它们的及物性。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词汇表达成功能信息：

$$\begin{cases}\text{轻视}\simeq F\ (\text{评价过低})\ [A_1\rightarrow A_2]\\ \text{谦卑}\simeq F\ (\text{评价过高})\ [A_1\rightarrow A_2]\end{cases}$$

$$\begin{cases}\text{骄傲}\simeq F\ (\text{评价过高})\ [A_1\rightarrow A_1]\\ \text{谦卑}\simeq F\ (\text{评价过低})\ [A_1\rightarrow A_1]\end{cases}$$

在贝纳诺斯的世界里，"谦卑"既是"骄傲"的反义词又是"轻视"的反义词，并使得以下的等值得以成立：

对别人评价过高≃对自己评价过低

尽管"骄傲"和"轻视"是两个词，但根据上边的等值我们就能得到下边的等值内容：

对别人评价过低≃对自己评价过高

不过，由于T″类需要一个及物的功能，而"轻视"和"骄傲"是等值的，所以我们选"轻视"来命名对"轻

视”/“骄傲”范畴清减的结果。

2. “吝啬”、“自私”和“好色”在贝纳诺斯的词汇里很容易找到对立项：“施舍”、“团结”、“交换”。不过在形象表征层面上，与它们相对应的只有一个义子：软体类。经济原则和对应原则强迫我们只能选择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即把两个系列的词汇清减成两个义子，免得再去研究那些在风格描写层上使它们对立起来的类型。下面仅仅强调清单中已知的义素成分：

(a) 三个假象共有一个功能，我们暂不命名，但与这个功能相对应的是“吮吸”功能：其行为方式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剥夺他人的所有，吸进一切，把所有的东西都往自己身边拉；

(b) 三个词都是及物的，它们潜在地代表着一种行为，行为的对象是周围的事物。因此，我们只需在三个具体例词中选一个来命名它们就够了：比如说“吝啬”就可以用来指那两个范畴所限定的义素内容，“软体类”自然同时受到了清减并被包括在这个共同的命名之下。

f) 不及物的假象

现在来看最后的两个没有描写的假象：

失望/梦幻

如果以上对假象的分析从整体上来说没有问题，那么到本阶段，对剩下的词项，我们几乎可以用手头上已有的描写范畴机械地进行整合。

比如，这两个词之间的对立可以被看作是上一级功能的对立，即：

P＝F（吞食）[A_1（失望）]/F（吮吸）[A_1（梦幻）]

同样，既然及物性范畴还尚未得到全面开发，而“不及物性”这个词更可派上用场，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定义这一对功能，即把它们的客体行动元看作是零：A_2（∅）。于是我们填满了下表：

符号		P	N
T	T′	仇恨	无情
	T″	轻视	吝啬
	T‴	失望	梦幻

由此可见，对假象的描写仅用了两对范畴，下面我们将对其性质做出详细的说明。

注：读者可以看出这两对范畴所代表的分析深度是不一样的，及物性范畴是非形象的，而区分两个功能的范畴却仍停留在形象阶段。

g）真理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组成真理清单的那些词汇，衔接起来，使其结构与假象清单的结构既相对应又相矛盾。这样才有可能把假象和真理看成是同一模型的组成部分，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为此，我们有一个二项对立可以把所有功能一分为二，甚至还有了一个可以把客体行动元一分为三的衔接方法。如果把真理项看作是主

体行动元，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真理清单中的词项纳入以上框架。

现列表如下：

	符号	P	N
真理	T'''	希望	希望
	T''	谦卑	贫穷
	T'	爱情	爱情
假象	T'	仇恨	无情
	T''	轻视	吝啬
	T'''	失望	梦幻

对这个表我们需要做几点解释：

首先，真理域在表现行动元的形象这一方面较弱。除了表达“身体”的“血”和“肉”这两个词外，惟有那些非形象的行动元才与假象域中那些众多的个体和变化多端的角色相对应。实际上，正是因为真理项数量的不足才使得我们不得不采用一个较简单的方法，即建构非形象的行动元。

第二点要提示的是非形象行动元词汇的贫乏。例如“希望”和“爱情”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P列和N列里。这一不对应的情况也不是不可避免，但必须先消去“吞食”/“吮吸”间的对立。想像出这一消减的结果并不很难：

$$\frac{\text{真理}}{\text{假象}} \simeq \overset{T'''}{\frac{\text{希望}}{\text{智慧}}} \Big/ \overset{T''}{\frac{\text{交流}}{\text{孤独}}} \Big/ \overset{T'}{\frac{\text{爱情}}{\text{怨恨}}}$$

目前，我们宁愿原样保留以上的功能对立（其原因后面将会看到），暂时将与析分功能相符的行动元表达层面的同一性解释为结构复合项的词汇化。

4 模型的比较和挑选

a）一致性的缺乏

一种是品质分析，一种是功能分析，两种建立在被暗中承认的假设之上的分析同时进行，探讨以下的关联关系：

$$\frac{死}{生} \simeq \frac{假象}{真理}$$

其最后的结果是建立两个模型，这两个模型之间虽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其不同之处也相当惊人。

有一些不同是由分析的性质造成的，例如我们按及物性对真理和假象分类，而及物性和功能分析密切相关，似乎和品质分析无缘；另一些更醒目的不同则是由于它们各自的分析深度有别。例如，依靠义子所进行的品质分析处在无机形象层，然后这些义子才被分解成具有符像性质的义素。而功能分析本身却代表着两个不一致的描写层面：主体行动元所处的层面是非形象的，但指代功能的却是两个"有机"形象，"吞食"/"吮吸"。我们还发现在形象层面根本无法留住主体元，因为真理类皆无形象可言；不过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变动功能的名字，我

们必须先在模型之间建立起可比的并列关系，以便对每个模型的地位和价值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事实上，“吞食”和“吮吸”这两个功能的性质虽说不太明确，但都明显地和动物有关。这让我们瞥见了功能模型的一个本质特征：功能本身含有一种动感，它们有可能把这种动感传递给行动元，于是行动元便因此而拥有了某种“活力”。以上现象我们既可以用来解释各种活生生的角色，也可以用来解释作为概念的行动元的拟人化。它们很自然地在功能模型中表现为一股股“力量”，并因此而说明了功能模型能够制造神话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理类和假象类的那些具体行动元，即“爱情”或“谦卑”，“仇恨”或“轻视”，都是一些可以行动的力量，所以说，通过功能分析而建立的模型只能是一个非形象的行动元构造。

它们有两种行动方式，表现为两个义子形象：“吞食”和“吮吸”。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两个形象加以提炼，从两个义子内部提取出足以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对立的义素组，如果义素组脱离了有机层转移到无机层，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利用它来对我们从前边的一系列分析中所得到的模型进行比较。

为此我们使用以下义素组：

扩展/收缩

这一衔接可以说明模型中的主体行动元的两个潜在面貌。我们说，当提取出来的这两个义素和“适意”组合

时，它们就构成了“真理”的两个功能；和“难受”组合时，则构成了“假象”的两个功能。

一旦把功能从一个形象层面移到另一个层面，我们便发现自己对这些功能的具体赋值内容知之甚少。它们衔接成两类，与其说构成一个赋值，还不如说是某种预先设定的模态。因此，即使功能模型拥有一种独特的行动元组合形式，它仍然独立于它的赋值内容。总之，内容的组织有赖于两种模态或类模态的衔接，也就是说，相对于被赋值的功能来说，模态属于元语言层次。

b）结果的比较

以上两种分析是分开来进行的，其结果是给出了两个模型的描写。分析到此，对两种分析的结果做一比较应是比较诱人的。第一个模型阐明了行动元“生”/“死”之间的衔接，第二个模型谈的则是行动元“真理”/“假象”。我们曾根据直觉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两对行动元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关系，但却不知道是何种关联关系。通过比较两个模型，我们应能确定这一关联关系的性质。

只要把它们并列起来，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异同。最令人惊讶的反而是它们整体结构之间的极大相似性。

1. 二者皆是二分的；

2. 每个模型都拥有十二个义子：六个行动元，六个品质；

3. 十二义子分开来又构成了两个行动元；

4. 另外，按同样的方法，每个行动元中的六个义子还可以被重新分成三个一组的义子，如下式：

$$\frac{\text{正定义}}{\text{负定义}} \simeq \frac{\text{扩展功能}}{\text{收缩功能}}$$

把所有这些可比的形式特征诸项并列，我们就得到了两个拥有十二个义子的模型[①]：

		扩展≃正定义		收缩≃负定义	
		行动元	品质	品质	行动元
真理≃生	T‴	希望	变化	有形	希望
	T″	谦卑	光明	气态	贫穷
	T′	爱情	热量	纯净	爱情
假象≃死	T′	仇恨	混杂	寒冷	无情
	T″	轻视	液态	黑暗	吝啬
	T‴	失望	无形	静止	梦幻

正因为两个模型之间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把它们并列起来。但是，当我们想把表中的三个行动元义子和三个与其对应的品质义子之间的关系理顺时——一个品质配一个行动元，我们就遇到了麻烦。若要把这种搭配的全部推理过程叙述一遍需要很大篇幅，所以长话短说：在此我们使用了变品质为功能的相容性标准（给品质词增加一个“动态”义素），以及行动

① 该模型后来演变成著名的“符号学方阵”，具体结构及演算形式参见“符号学规则及实用”，格雷马斯，吴泓缈译，载《国外文学》，北京大学，1998第一期。——译者注

元本来就拥有的关于及物的三种可能性（及物、不及物、自反）。比如说，配给“爱情”的“热量”可以被改造成一个自反功能（“爱情温暖了她的心”）；而“光明”作为“谦卑”的功能则可以是及物的。至于“变化”，细察其义素衔接，作为一种自由自在的变异，尤其是作为上升，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不及物的功能。换一种搭配的话，不是解释不通就是不相容。如果再加上对应性标准，这种相容性标准就更加站得住脚了：一个品质若与一个行动元相容，那么这个品质就会有一个与其相对的“负”品质，这个行动元也会有一个与其相对的行动元，它们二者也是相容的。这种方法相当灵活，当然不能保证每一个相关的搭配都绝对准确。不过我们认为这并不能推翻我们关于关联性的原则。

第二个问题与上述对比本身的基础有关。应该承认，这个基础首先是归纳性的：两个分析是分开来进行的，它们出人意料地给出了两个可比的模型，所以我们认为对其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也是有价值的。当然，这个标准并不是强制性的。

另外再谈谈其结构上的特点。比如说，对两个模型奇特的衔接方式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第一个模型具有行动元的特征，其赋值的内容则表现为品质，也就是说，其内容是述谓性质的；第二个模型具有功能的特征，与第一个模型相反，它的赋值内容表现为行动元形式。如果我们能够在两个模型的结构特征之间建立一个分配合

理且具有关联的体系，那么在两个内容清单之间建立等值关系就是完全可能的。初看上去，建立这类等值关系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先设立一些规则，然后用这些规则来达到把品质改造成功能的目的。

c）模型与内容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两种模型进行对比也具有极大意义：一旦在行动元的赋值和功能的赋值（暂不考虑其他内容）之间建立了并列关系，我们便能对两种分析（形象层面上的分析和非形象层面上的分析）的结果进行对比。大家知道它们的结果能够相互补充和相互验证。如果说，某些被列为行动元的概念，如“希望”、“谦卑”、“爱情”等都属于基督教意识形态，很容易被大家连在一起当作是一个统一的范畴，那么“无情”、“吝啬”和“梦幻”却不尽然，它们是被贝纳诺斯组织到一起的，在建构行动元体系时我们首次发现了它们，现在，在“死”的负定义中它们又相聚在一起。

另一方面，这种重叠还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一对对义素的作用。通过建立等值关系，它们成了两个模型的基础，只需要十几对义素就足以描写贝纳诺斯的虚幻世界：义子，有时被看作是功能赋值，有时又被看作是品质赋值，它其实不过是义素组合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单位。贝纳诺斯的世界便建立在这个分类系统上。这一比较能让我们更深地理解行动元的性质，它们不过是社会

化了的词汇在个人话语中的具体表征。我们看见，那些代表行动元的概念，如“希望”或“爱情”——且不说“仇恨”或“梦幻”——是如何承担起个性化内容的，义子被改造成了功能，赋予它们个性化内容，并折射出以上的分类系统。

我们还记得义素组属于语言的符像层，通过贝纳诺斯这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又一次证明了义素组在整个语义世界里具有极为特殊的作用。

以上的结论同时也让我们多少窥见了定位义素类的专门作用，它们是另一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属于语言的语义层面。例如，把行动元和谓语衔接起来的语义信息结构，区分品质和功能的范畴，把不同行动元衔接起来的义素组，以及我们在后边将要谈到的各种模态，它们皆独立于语义的赋值（将来对语法做过语义描写后，全部、至少大部分语义赋值都可以在语法分析中得到确认），并一起构成了建造模型的最基本材料。使用同样的语义赋值，它们同时可以提供好几种模型衔接的可能性。研究如何在不同性质的模型之间建立关联关系，以及如何把一种模型改造成另一种模型，这二者构成一个整体，其基础是定位义素群之间的等值关系。定位义素群具有不同的结构，但它们的内部都表现出含有一些相同的义素，以上研究就建立在对这些相同义素的寻找上。这种对改造（而不是转换）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意义。

d）功能模型的模态性质

把在品质分析中描写的义子看作是可以被整合进不同组织模型的内容，这是一个假设。这一假设若想成立，我们就必须先确定每个模型的特殊地位以及它们关联关系的性质。

我们知道，品质分析的结果是给出了十二个义子，每个单独的义子都是一个类似于下边的品质信息：

Q（热量）[A_1（生）]

Q（混杂）[A_1（死）]

根据上边的观点，经过整合的品质义子能给我们在后边描写的功能模型提供内容，而模型的功能我们无法分析。其实这些义子的整合并不像表面上看那么简单，并不仅仅是往义子里边加一个“动态”义素我们就能把品质谓语改造成功能谓语：从一种描写过渡到另一种描写，它不仅涉及到改造谓语，还涉及到行动元的替换，用新的行动元“真理”和“假象”去取代老行动元“生”和“死”。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的关联关系不是谓语之间的关联关系，而是不同信息间的关联关系。

不错，我们可以从一个正在等待着语义赋值的功能信息中认出一个主体行动元，该主体行动元已经和一个品质义子建立了关联关系，并能对这个义子“施加影响”。对它的功能，我们知道可以按及物性的三种情况进行分类：一旦这个功能被赋予内容，这个内容就拥有了某种施动的意味，生出某种动感。我们从法语中选了一

些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例如下面两句：

L'enfant fait pousser la plante.（孩子使植物长大）

L'amour le rend pur.（爱情让他变纯洁）

这里边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信息：

A B

/孩子做了什么事（以便）/+/植物长大/

/爱情做了什么事（使得）/+/X 变纯洁/

这一划分能帮助我们理解品质信息和功能信息之间的关系本质：

1. 在结构上信息 B 可以说与前边首次描写的品质信息是等值的：

Q（光明）[A_1（生）]

2. 反之，信息 A 相当于第二次描写的功能信息，功能信息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行动元，对于行动元的功能我们仅仅了解其及物性或施动性，例如：

F（x；m：及物性）[A_1（真理）]

这是汇合在一起的两个信息，把它们翻译成法语，其意思大概是这样的："真理使得生活一片光明"。

注：在我们所选的两个例句中，表达两个功能的动词是不同的。不过，一个动词同时表达两个功能的情况也很常见：如，如果不说"爱情使他变纯洁"，我们可以说"爱情净化了他"，"化"这个后缀就足以反映出第一个"功能"。在有的情况下，词根

本身既包含了功能又包含了模态。

和我们前边所设想的相反，此处的情况既不是把一种谓语改造成另一种谓语，也不是把一种信息改造成另一种信息，而是两个信息的重叠。其中的第一个信息不是别的，正是被描写内容的表达式。在贝纳诺斯的世界里，这个表达式是品质分析的结果。但这并不等于说本层次上的描写都必须如此：如果我们有了另一个语料库，或者假定我们对有机表征（大家还记得“吞食”／“吮吸”的对立）事先做过一个功能上的预分析，就完全可能获得一系列关于内容描写的功能义子，并不一定非是品质义子不可。

对内容的这一描写应该和内容的组织区分开来，因为内容的组织相对内容来说处在元语言层次上。由此我们清楚地见到了两种元语言模型：对第一种模型我们曾提议命名为组合模型，它以义子的形式承载着描写内容，并将其组织成无时性关联关系的结构；第二种模型现在看来并不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是一个功能模型，而是一个“模态模型”。它承载的是组合内容，或者对其重新进行组织，或者致力于说明它们可能发生的转换。有了以上的理解，我们曾全力探索其结构特征的模型就只能是一个转换模型，转换模型在本例中的表现形式是非形象性的，不过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研究过它的形象表征：考验。

注：我们暂时把"扩展"/"收缩"这对范畴放在了一边，不过它们的模态特征马上就会得到澄清。

5 辩证的生命观

a）模态

把模型解释为转换模型，我们就有可能把行动元"真理"和"假象"定义为模态信息的主体，而模态信息则是可变的。在"真理"和"假象"名下出现了许多具体角色，它们可以用及物性的三个选项和"扩展"/"收缩"两个选项之间所生出的各种搭配来解释。另外还可

[illegible]